

马华文学之窗

MA HUA WEN XUE

马峇 著



新亚出版社



夫妇于1995年11月7日在天津留影

马倚沉吟不异工
 苍山旷野景相融
 梦乡谁解庄周蝶
 平等众生本性空
 丙子岁前夕 淳于汾题

拉曼大学中文系图书馆惠存

当代马华文丛①

馬華文學之窗

马崧 著

马崧



2012-8-31日 于士姑東

邱名崐(馬崧·夢平)

KU MIA KUN

57, Jln. Timah 6, Tmn. Sri Puteri,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7-5567608 H/P: 012-7345845

新亚出版社



新亚出版·必可信赖
GOOD BOOKS • OUR BUSINESS

当代马华文丛①

马华文学之窗

主 编 梦 平
责任编辑 罗兆德
作 者 马 峇
封面设计 欧阳智 (中国岳阳)
封面题字 李自由 (中国岳阳)
扉页题字 萧劲华教授 (已故)

出版·发行:

新亚出版社

Singapore Asian Publications

Blk 34 Commonwealth Lane #04-30

Singapore 149553

Tel: (65) 7741003

Fax: (65) 7775810

Printed in Singapore

ALL RIGHTS RESERVED

第 1 版 1997年

序

云里风

在漫长人生的道路上，总会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驿站，对于一个勤快的跋涉者来说，在未抵达旅程的终点时，是永不会言倦的。顶多是在新驿站休息片刻，然后又会整装出发奋勇前进，力求达到更高的境界，马华作家马岩（梦平），就是这一类型的文艺工作者；近四十年来，在崎岖不平的文艺道路上，他以无比坚强的斗志，焚膏继晷，埋首创作，在不同的年代里，在许多个驿站上立下了新的里程碑，展示出他文学的才华。60~70年代时期，他专心致力于小说和散文的创作，写出了许多质量俱佳的优秀作品。到了70~80年代期间，他除了写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外，更殚精竭虑地进行搜集新马华文作家资料，先后编写了《马华写作人剪影》（1979），《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90年代初期，他的心血结晶《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的出版，轰动了新马华文文坛，这部辉煌的巨著，内收新马华文作家三千多名，共六十余万言，不愧是新马华文作家史料的经典之作，虽说其中难免也有一些疏漏之处，但白璧不能无瑕。据我所知，中国出版了几部有关新马华文写作人史料的著作，如《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五分册，1992年7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台港澳暨海外华人作家辞典》（1992年5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新诗大辞典》（1994年5月，辽宁沈阳出版社）等，都是以他的这两部《群像》和《扫描》为主要的参考资料，足证其书的文学价值，已受到国际华文文学界的赏识与肯定。

根据马峯的新著《无根的花木》一书中的作者简介，至目前为止，他“已印行问世的单行本逾30种，总字数不下260万言”，其中包括小说、散文、游记、儿童文学和作家史料等。他不但勤于创作，也是首位出版本地华文作家传记的文学史料工作者，更是荣获出版基金奖最多（共有七部小说集获奖）的马华小说家，说他是著作等身，应该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我和马峯结交，已有二十多年了。我俩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同是在华文教育界服务，同是担任华文报章的地方通讯记者，同样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也同样是利用课余时间创作。基于这几点原因，虽然我俩平日相处的机会不多，但感情上却特别亲切。不过他创作之勤、产量之丰，却是我所望尘莫及。在80年代末期，他曾担任无型（没有书记）的华小校长数年，在校政繁忙之下，竟能抽空编撰划时代的《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一书，还筹款自费出版，亲力发行，这种精神和魄力，令我由衷地敬佩。

几天前他交给我一束作品剪报，表示即将出版一部理论与评介性的专集，书名《马华文学之窗》，嘱我撰写一篇序文。我一向不擅于作序，近年来由于参与许多社团工作，且又业务缠身，真是公私两忙，但对于这位文坛挚友的要求，却是不得不应命的。于是忙里偷闲，把剪报浏览了一遍，觉得他对马华文学的评论，持平公允，深入浅出，绝非无的放矢之作。由于他对马华文学有透澈的认识，所以写起评论，得心应手，尤其是《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导论》及《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等篇，都是很有见地的力作，不过他似乎是本着“以和为贵”与“息事宁人”的宗旨，所以文章委婉敦厚，缺乏不怕忌讳的无畏精神。我认为一位严正无私的评论家，在下笔时不应有太多的顾虑，只要认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妨直抒胸臆，这样才能鞭辟入里，达到评介的真正效果。

综观马峯在本书所评论的对象，仅限于小说、儿童文学和作家

传记等几项而已，其他许多文体的作品如散文、诗歌和戏剧等都未有涉及，这可说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希望他今后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以便对马华文学有全面性的评介。还有一点，本书中《68年来的马华小说风貌（1919～1987）》和《马华小说25年（1965～1989）》，内容连篇累牍，颇有重复之嫌，未知马峇兄以为然否？

马峇是一位在马华文艺道路上长跑的健将，这部评论集的出版，证明他又越过了一个驿站，竖下了新的里程碑。他今年才不过56岁，正值中年旺盛时期，只要今后再接再厉，锲而不舍，不难再攀上文坛的另一个高峰。身为他的多年老友，谨此略抒肺腑之言，算是替他在再出发之前打几声边鼓，希望这鼓声能增加他前进的激情与勇气，并带动马华文坛的创作热潮。

序于1996年11月5日·加影



大马作协主席云里风（右）与本书作者
（1996年10月27日·新加坡）

目 录

序 云里风

卷一

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脉络	1
马华小说的特质与创作方向	19
68年来的马华小说风貌 (1919~1987)	26
马华小说25年 (1965~1989)	44
90年代前期马华小说丰采 (1990~1995)	55
《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导论	68
《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 (1955~1993)	79
南马文苑的繁花硕果 (1970~1991)	97
〔附录〕柔佛州6个文艺团体一瞥	109

卷二

小说与生活	112
在文学的小径上迈大步	115
亚洲华文作家的写作方向	121
如何推展马华儿童文学	124
教师、文学与马华作品	140
小说蹊径录宫门	145
浅谈马新中学课本录用的马华文学作品	162
《新课程纲要》欢迎马华文学作品	167
大马华文报章应重视马华文学	177
我对国家文化的看法	181

营火照亮华文文艺前景	183
进行应有的与严肃的省思	189

卷三

《新亚少儿文学丛书》总序	193
两套儿童文学丛书与我	198
参加最多文艺活动的一年(1988)	201
《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作者的话	204
《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后记	211
出版《新马文坛人物扫描》的经过与感言	219
《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修订综述	221
笔航小说海卅五载	237

■ 附录 ■

莺 莺：《并不迟开的槟榔花》	
——介绍《新马华文作家群像》	270
施颖洲：随思录·新马作家	273
马 阳：撰写传记著称的马岩	275
潘亚瞰：《人间喜剧的剪影》	
——梦平小说集《笑傲山野》读后	277
潘亚瞰：《马华社会的深刻反映》	
——读梦平第十四本小说集《无根的花木》	280
潘亚瞰：《南马生活的小说化》	
——读《马岩文集》评要	283
把炉中之火传给他人——代《后记》	286

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脉络

引言

众所周知，新马华人的祖先从中国大陆南来拓荒，已有一段悠久的历史了。根据不久前（今年4月1日）才辞世的名学者陈育崧的说法，由1890年至1933年是大量的华人迁移南洋各地的“移殖期”。早在19世纪中叶，便有马华旧文学存在了。

然而，由于早期南来的华人，绝大多数是从事垦荒、种植和开矿之类的劳苦工作，他们之所以南来，经济困迫是主要的因素，极少有机会受教育，所以文化水准低落。加上居住在英殖民地，连起码的人权都没有；而文学是文化的先导，当地文学运动的发展自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过，马华文学是华人文化的一大支柱，马华新文学运动是华裔社会运动的一环；既然在本土埋下了文学的种籽，它迟早总会萌芽的。

华人南来，一直到了20世纪初期，才算是比较可以安家立业，成为当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不受忽视的一族。不过，他们仍然被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歧视，几乎没有权力过问当地的事务；尤其是处于劳工阶层，依旧受到封建地主和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及剥削，生活没有保障，待遇未获改善。因此，他们都对现实社会感到不满、反帝、反殖是自然的现象。

而另一方面，这些早期移殖马来亚的华人，大多数与中国的家族保持着血缘关系，侨民意识极为浓厚。既然所关心的是那些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难免就有太多的委屈要说出来，有不少的心声和愿望要表达出来，藉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恰巧在这个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这项文学革命运动，

正好适合成为他们表情达意的新工具和新形式。

于是，当时的华族知识分子多起而响应，也搞起新文学来了。后来，又不断地从中国的新文学发展中汲取营养，丰富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写下臻于完美的文学作品。故此，我们强调：马华新文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的影响下产生的，它是随着五四新文学的道路而推进的。

发展分期与文艺的思想

马华新文学的诞生，迄今已有65年的历史了。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经过前辈的辛勤耕耘，累积下来的华文文学作品，数量可观——先后出版了数百种的报纸文艺副刊、杂志及丛刊等，文艺作品的单行本约2千本。

一路来，华人社会对马华文学史料是漠视而忽略的，加上时代的动荡，日军占领马来亚，致使华裔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未曾妥善地保留。尤其是战前至日治时期的文学史料，有不少已散失湮没了。这些文学遗产，深刻地反映了数十年来新马人民的生活遭遇与社会风貌，促进三大民族的和谐团结，以及对于理想幸福的追求和战斗；同时也表现了本地人民的文艺创作的才华，让读者了解往昔的现实生活情况。而民族的根，早已深植在这片土地里。

在马华新文学60余年的发展史中，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从1919年至1925年的萌芽时期，经历1925年至1931年的扩展时期，以至1932年到1936年的低潮时期，到1937年至1942年初的繁盛时期；1942年至1945年（3年8个月）的日治的黑暗时期。

第二阶段：包括从1945年至1956年的战后初期；经历1948年至

1953年的紧急状态时期，1953年至1956年的反黄运动时期，1957年至1963年的马来西亚独立时期。

第三阶段：包括1963年至1965年的新马分治时期，由于马新两国成为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前者仍然沿用“马华文艺”的旧称，后者开始以“新华文艺”的新名称，表示跟过去的“马华文艺”有所区别。新马两地的华文文艺界分道扬镳已19年了。自1966年至1974年的低潮时期，以至1975年到1980年的觉醒时期，从1981年至1983年的现代时期。

新加坡学人杨松年，曾根据表现在不同文艺时期的本地意识，将1919年至1949年分为6个时期，值得我们参考。他的分期是：

- ①1919年~1924年——侨民思想浓厚的时期。
- ②1925年~1926年——南洋思想萌芽的时期。
- ③1927年~1933年——南洋色彩提倡的时期。
- ④1934年~1936年——马来亚地方性提出的时期。
- ⑤1937年~1942年——本地意识挫折的时期。
- ⑥1946年~1949年——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的时期。

这六个时期各有特色，当时的写作人在文艺理论上已把文艺思潮明显地直写下来。杨松年表示可以用作者在理论上的要求来审核其作品，甚而把他们的创作归划在以上6个时期来分别讨论。

马华新文学史的分期，已有几家之说。在几个时期里，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学运动。那些新文学思潮与流派的起伏变化，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发展而引发的。比如创作“南洋文艺”口号的提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探讨，以及反黄运动、爱国主义文学的倡议，要求马华文学成为国家文学的一部分……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以期通过文学来推动社会向前迈进，进而改良和变革。

以下是战前和战后马华文学史上的几个较重要的文学运动，直

到现在，本地文艺界仍深受其影响。

①马华新文学自立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说过：马华新文学的产生，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的影响，然后得到中国作家的创作艺术的陶冶。不过，马华新文学的茁壮成长，却是靠本身的自立运动不断推进的结果。在萌芽时期（1919年至1924年）的副刊上，只有一小部分的作品能够反映本地现实，其它多数的文章都充满浓厚的侨民意识。幸而有的编者，如“南洋评论”的编辑，便十分关注南洋精神生活的建设问题，他要读者从南洋社会的是非善恶当中建设一个标准来。一进入扩展时期（1925年至1931年），它很快地便选定了服务的对象；在创作的内容方面，也开始自辟蹊径，走着自己的文学道路。新国民日报的《南风》和叻报的《星光》的出现，影响当时的写作人越来越关心南洋文坛的趋势。

②提出南洋色彩、创造南洋文化的口号——从1927年1月开始创刊的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几位发起人表示“打算专把南洋色彩，放入文艺界里去”，编者黄振彝经常呼吁投稿人多写具有南洋色彩的作品；发刊人张金燕更在理论上，一再确定南洋色彩的文艺的价值，他本身也大量的发表了具有南洋色彩的小说创作。黄振彝还有意通过鼓励白话文的写作与整个社会接触，与社会结合；在侨民观念浓厚笼罩的当时，《荒岛》着实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大约过了两年之后（1929年7月），叻报文艺副刊“椰林”的编者陈炼青，也“憧憬于创造一种南洋的文化”，所登文字，“一律以提倡南洋文化为标准，如有文艺创作，也一律以描写南洋生活和景物为限。”较早时（1929年4月）创刊的檳城南洋时报的《星火》副刊，也强调它离不开时代，并建议建设南洋文学。严格说起来，“铸造南洋艺术的铁塔”等口号，还不能概括马华新文学的根本精神，它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在客观的效果上，却使当时见报的作品洋溢着热带生活的气息。1930年前后，新兴文艺的问题在《椰林》

更广泛的提倡和讨论；从此，许多创作里的南洋色彩更加浓郁，而且在描写上已深入到现实的本质。不仅在文艺作品中有了南洋色彩，而且以南洋色彩去完成时代的使命。在这一阶段里，马华新文学自立运动的正确理论及方向总算是确定下来了。

③马来亚地方性的文学——由废名写的发表在南洋商报《狮声》副刊的《地方作家谈》（刊于1934年3月），指出马来亚有了文艺，而马来亚文化、马来亚文学的概念已受到一般作者所采用。后来，曾艾狄发表的《马来亚文坛界漫画》（刊于1936年9月），引起另一场论争，所得的结论是：马来亚文学应有其生命，不能抹煞了马来亚的地方特殊性。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意过分批评搬用中国文学理论的作为，但盲目地、受领导于中国文学运动的做法是错误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在理论上确立了以马来亚为本位观念的文学时代。

④“救亡、抗战文艺”的口号——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这一个中国局势的刺激，激发了马来亚华人的中国意识，救亡、抗战是应有的责任，于是这一口号在1937年初被提出来了。当时活跃的作家如金丁、丁倩（张一倩）、思明、谭庭裕、铁亢等，都撰文阐释了“抗战文艺”的概念。这么一年，在这一时期以前逐年增长的本地意识的发展面对了挫折，比如上阶段的论争达致的马华文学特征有异于中国，强调马来亚地方性的文学的言论，如今也少有人再提及了。

——杨松年指它是“一个本地意识的发展受到挫折而关心中国感情极为高昂的文学时代”。

⑤马华文艺独特性——发生于1947、48年间的马华文艺独特的论争，纠正了“侨民文艺”的创作倾向，更加强了未来马华文艺的创作方向，并使写实主义的传统地位获得更有力的肯定。这项独特性的提出，是针对失去现实意义的侨民文艺；人在此地，心在中原

的“侨民作家”，具有浓厚的侨民意识，只描写中国题材是不正确的创作态度。马华作家必须关注此时此地，所服务的对象应该是本地的社会与人民，甚且应参与本地的政治斗争，争取华人应有的地位及权益。既然马来亚要求独立了，华族准备与友族同胞做独立的主人，当然没理由追随中国文艺的路向；马华文艺与当地的独立运动结合，也只是它自立运动中进一步的必然趋向。

⑥马华文学的反黄运动——战后的1953年至1956年，是马华文学发展史上的“反黄运动时期”，使原是冬眠状态的马华文艺界，在相当程度上恢复蓬勃的气象，直接给青年学生界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个多半是属于青年学生的运动，间接地刺激了新马社会运动的突破，不仅为马华文艺复兴提供有利的条件，使作品内容更健康明朗，还带动人民重新喊出了反殖的呼声，几乎全面性的要求结束战乱，争取独立自主。这个时期，土生土长且有相当才华的马华文艺工作者日益增加，作品的水准普遍提高，大家都乐意推行健康文艺活动，勤于创造马来亚艺术的独特风格。

⑦爱国主义文学——随著1957年的到来，整个马来亚已从殖民地步上独立建国的年代，旧制已结束，面临这新形势，马华文学运动踏上“爱国”的一个新阶段，藉以配合客观形势的发展而扩展。为了联络文艺工作者的感情，互相研究切磋，有些写作人还发起筹组写作人协会。文艺界提出“爱国主义文学”的口号，呼吁马华写作人改变侨民观念，热爱新生国家马来亚，参加独立建国的伟业。新加坡作家赵戎曾拟下爱国主义的任务和特征：“爱国主义文学是发扬各民族各阶层一致爱护这新马来亚国家的文学”；“爱国主义文学是团结各民族各阶层和平共处的文学”；“爱国主义文学是团结各民族各阶层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文学”；“爱国主义文学是建立马来亚新文化的文学”。这四大原则，也是独立后马华新文学运动所要实践的工作。

⑧马华文学在新、马分治后——于1963年由马、新、砂、沙组成的马来西亚，因客观环境和政治因素，新马竟于1965年8月分家了。在新加坡独立前，她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单位；脱离马来西亚后，新加坡的华文文学称为“新华文学”，它与仍旧称为“马华文学”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在不同的层面分道发展——两国有着不同的活动情况和迥异的文学使命。新马分治时期，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写作人一时失去传统上的发表园地（过去多投到新加坡的报章副刊发表），不免影响写作情绪；直到两大报可在吉隆坡正式印刷出版，这种现象才逐渐改善。之后，两大报的文艺副刊侧重发表评论本质问题的作品，并强调作家的尊严和地位，同时倾力筹组自己的协会，多方面与外国作家交往，而且也着重国内各族的文学交流。

⑨争取马华文学成为国家文学的一部分——马来亚独立和马来西亚成立迄今，马华文学与马华文化、教育及经济等发展一样，虽然早已身为国民的一份子，即未能享有应得的地位及权益。马华文学不仅不能被纳入国家文学一环，甚而被忽视它的存在，或被视为“移民文学”。马华老作家方北方说：“独立后的马华文艺虽然仍被摒弃于国家文学的门外，但由于全体华人的政治思想日趋成熟，文艺工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日益提高，热心写作的文艺青年日见增加，看来马华文艺成为国家文学的一环不日是可以实现的。”不知有多少人也有这么的乐观的想法？

考察新文学发展动态

马华文学有史以来（尤其是在战前），一直以报纸的文艺副刊为主要的园地。早期的新文艺作品，有90%以上是靠文艺副刊来容纳的，那是因为当时的出版条例和印刷条件等因素，不利于杂志和

专集的印行所致。

战后至今，虽然在出版条件方面已大大的改善，可是，大部分的专集在出版单行本之前，依然以报章的文艺副刊作为刊登作品的主要园地。故此，有意考察马华文学的发展动态，非翻阅报章的文艺副刊不可。战前和新马分家前，新文学运动的主要中心是在新加坡，其次是檳城。1919年，是公认的马华新文学诞生的年份；从这一年10月到1925年中，是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时期，也是马华文艺园地的草创时期。

据文学史家方修指出，在萌芽时期，“较纯粹的新文艺刊物还未出现，文坛的主要支柱是一批文白混杂，写剪相兼，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副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其次是叻报的《文艺栏》及《叻报俱乐部》，南洋商报的《商余杂志》，檳城光华日报的《光华杂志》等几个。”（详见《马华新文学简史》）

杨松年与周维介这两位师生在合著的《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一书里告诉我们：

“纯新文学作品的文艺副刊的出现，是1925年的事。1925年7月15日创刊的新国民日报的南风，和同年10月9日创刊的叻报的星光，标志着新加坡华文文学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有了这两份副刊奠定基础，我们看到在1927年以后，直到1930年，新加坡华文文艺界，出现了文艺活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不但华文报章文艺副刊较前大量出现，作品素质较前也有显著的提高，文艺的方向问题也受到写作者的关注。”

根据杨松年与周维介的资料，从1927年至1930年在新加坡出现的文艺副刊，主要的计有15种，那是：

新国民日报的《荒岛》，南洋商报的《洪荒》，新国民日报的《绿漪》，新国民日报的《瀑布》，新国民日报的《昶旭》，叻报

的《椰林》，南洋商报的《文艺周刊》，叻报的《荒岛》，南洋商报的《曼陀罗》，叻报的《流产》，星洲日报的《野葩》，星洲日报的《流星》，南洋商报的《压觉》，叻报的《奠基》，和民国日报的《新航路》等等。

此外，南洋商报的《商余》，星洲日报的《繁星》等综合性副刊，也刊载不少的文艺作品。

早期在新加坡的文艺副刊发表作品的主要作家，有写小说的林独步、陈桂芳、李西浪、拓哥、李梅子、吴仲青、曾圣提、曾华丁、海底山（林其仁）、张金燕、宿女、细胡、浪花等。有擅长散文的如张叔耐、林稚生、谭云山、孙艺文、陈炼青、林仙峇等。有创作诗歌的胡鉴民、石樵、槐才、张楚云、邹子孟、寰游等。有编写剧本的如新晓、邱国基、郭乐仙、陈晴山、林姗姗、静倩（马宁）、旧燕（陈树南）等。而林独步、拓哥、海底山、谭云山、曾圣提、曾华丁、陈晴山等是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

至于马来亚早期（1927年至1930年）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所刊登的文学作品，内容也相当精彩。这一时期，马来亚华文学的主要活动中心是在槟城；到了1928年下旬，才有文艺副刊在吉隆坡出现。

据杨松年说：“这一时期的马来西亚文艺界，不但副刊大量涌现，作者与作品纷纷出现，而且也响应新加坡文艺界的号召，大力提倡南洋色彩的文学与新兴文学，成为新马文艺界较具规模的文艺思潮。”他也强调，这时期（1927~1930年）的马来亚华文学，应该和同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一样，是新马早期华文文学的第一个蓬勃时期。

以下是1927年至1930年间，出现在槟城的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

①属于《南洋时报》的有：绿洲、杭育、荔、海丝、八月、玫瑰、诗、微光、喇叭、怒涛、荒野、骷髅、洪荒、南洋的文艺、沈

波、野马、混沌、血涛、涛声、蔓萝、真善美、朝曦、牙牙、心弦、流连……等等。

②属于《檳城新报》的有：椰风、狂涛、浪华、现实、倒霉专号、关仔角、碧野、嚣张……等等。

③属于《光华日报》的有：光华杂志、帆声、灯塔旬刊、孔明、励群、顽石、一第、路政、绝缘回线、南国的雨声、诗词专号、光华复旦……等等。

④属于《中南晨报》的有：羔丕店、南针……等。

在吉隆坡方面，只有属于《益群报》的副刊《枯岛》《绿荫》等。

当时的南洋时报，几乎每一天都有文艺副刊出现在报上，完全不逊于同一时期新加坡报章的文艺活动，这应归功于该报的主编林浪沅的领导和策划，是他提供许多的文艺园地给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年作者，让大家共同为马华新文学奋斗下去。

早期在檳城和吉隆坡的文艺副刊发表作品的主要作家，有写小说的汪开竞（慎良）、朱冷夫、杨实夫、饶百迎、曾玉羊、林雪棠等。有写散文的温志新（士心）、陈晴山、曾华丁、孙艺文、林姗姗等。有创作诗哥的吴照愿、温梓川、张放、阮痴石、李一息等。根据杨松年的研究：从1927年至1930年间，马来亚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有两个辉煌的时期：是从1922年10月3日至1928年11月，和从1929年3月至同年12月。——由于这一阶段的新马华文报章资料已不容易掌握，所以无法介绍得比较详细些。

至于马华新文学的低潮时期（1932至1936年）和繁盛时期（1937至1942年）的文艺副刊，和该时期的主要作家与作品，以及战后的情形，只约略提到而已。

上述的低潮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32至1934年的这一时期的刊物，共有15种。1935至1936年的这一时期，也有11种文艺报刊，

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及作品是：蔡增建（曾见）、丘士珍（著有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饶楚瑜、吴广川、流浪、林参天（1936年出版长篇《浓烟》）、林岩（林棘）、李润湖等等。

1937年至1942年初的繁盛时期，文艺界在各方面都呈现崭新面貌，文艺报刊多达44种。这一时期突出的现象，是戏剧活动空前的蓬勃。剧作家流冰、吴天等人的作品，便是时常上演的剧目。

在繁盛时期的马华作家行列中，主要的有：叶尼（吴天）、孙流冰、铁抗（中篇《试炼时代》的作者）、张一倩（著有《一个日本女间谍》）、乳婴（殷枝阳）、上官彖（韦晕）、张天白（马达）、金丁、高云览、陈南（陈子遗）、刘思、桃木、王君实、叶倾凤、紫焰、莹姿、郁达夫、漂青、林晨、老蕾、静海、李蕴郎、椰青、野火、冯蕉衣、朱绪、清才、林棘（林岩、一礁）、静邦等等，他们在创作上都有不俗的表现。

发生在繁盛的时期的几场文艺论争，如：《笔尖的动向》、《文化人南来》、《知识份子救亡问题》、《写作人的危机》、《南洋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通俗与媚俗问题》、《郁达夫的几个问题》、《现实主义与朋友主义》……等问题，都牵涉在环绕着抗战问题的文艺论争里面。参加论争的重要作家有：吴天、孙流冰、铁抗、张一倩、汪金丁、张曙生（蓬青）、吴适鸣（静邦）、郁达夫等。

1942年至1945年是日治时代，曾被称为“断指的岁月”；当时各报章都相继地停刊，有几位写作人罹难了，如铁抗、王君实、清才、李词佣、饶百迎等都殉难了，而郁达夫、胡愈之、高云览、张楚琨等作家及时逃到苏门答腊去，后来郁达夫遭日本宪兵枪杀。这个时期的文艺活动在表现上是死寂的，但在抗战的过程中，多少动人心魄的现实故事或素材，已让隐潜的写作人选取积累，精心构思，等到光复后公诸于世。谁说那是个空白一片的年代呢？

南来的作家与土生写作人的表现

马华新文学作品，大略可划分为三个时期：①从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至1945年；②从战后初期到新马分家——1945年至1965年；③从新马自治到今天——1965年至1984年。

在第一个时期的优秀或重要作品，大都已被方修编选入《马华新文学大系》里，而第二个时期的优秀或重要作品，则大半已分别收入新社主编和方修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和《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已出版四集）里。这两三套大系，加上由台湾作家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选新华作家1945年至1980年间的作品）。在导言和简介中，已把各期的历史背景、重要作家及作品介绍得颇详尽了；这里只略谈早期南来的写作人的概况。

在上述的第一个时期，新马文艺界几乎被中国南来的作家所垄断；他们都深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且带着浓厚的侨民意识，因而早期的马华新文学作品中的侨民意识非常浓厚，常充满了思乡之情，被人视它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

在1920年前后，由中国南来的文人已源源不绝，尤其是在1927年，中国发生北伐失败事件后，各地进行清党阴谋，许多知识分子被迫纷纷的从厦门、汕头、海南岛各地南来。其次是在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好些中国文人又在马来亚沦陷前，由华中和华南各沦陷区避难南移。再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至中国发生内战的这一段期间，也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从印度、缅甸、安南、暹罗等各战区复员，移居到新马来。这一批又一批南来的知识份子，有多位是擅长写作的，他们很快地就成为本邦文艺界的一份子，甚而成为中坚份子或领导人。

据新加坡青年作家林万菁说：“除了老舍、艾芜等之外，中国作家到新加坡来，仿佛是结群而来或相继来后联成一气，有共通的工作范围与作风，尤其在太平洋战争前一年最为明显。就这样，他们组成一‘代’（generation）。这一代，是不同于往后的任何一代的，而这之后，再也没有中国作家南来了，更不可能组成‘代’了。”（详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年~1948年》）根据林万菁的资料，1927年至1937年中国抗战南来的中国作家有：洪灵菲（1929）、老舍（1929）、艾芜（1930）、吴天（1936）、马宁（1930）、许杰（1928）等。郁达夫是在1938年杪南来新加坡，而胡愈之是在1940年底南移。从1937年中国抗战后至1941年南来的其他中国作家有高云览、金山、王莹、汪金丁（1937年、1946年两度南来）、冯伊湄、王纪元、杨骚、王任叔、沈兹九、陈残云等。从1945年至1948年，真正从北方南渡的中国作家有杜运燮、夏衍、岳野等。从马岩编著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里，知悉笔名吴进的杜运燮，原是马来亚人，1918年出生在吡叻的实兆远，初中毕业后才回中国深造。此外，在文学创作上有极高成就的作家，如孙流冰（生于新加坡）、戴英流（生于吉隆坡）、刘柳（生于和丰）、韩荫、米军和史汀（后3位都在北马出生）等，常被人误会是南来的作家，其实，他们只是北返深造罢了。

到了上述的第二期（1945年~1965年），在本地崛起的写作者人如：铁戈、夏霖、苗秀、赵戎、萧村、鲁白野、周槃、坚石、贺巾、杜红、苗芒、陈凡、林臻、斌子、黄叔麟、泡蒂、吴天才、巍萌、吴岸、纪铮、君绍、莽原、林方、完颜藉、田流、李向、云里风、范北羚、慧适……等等，已足与南来的作家分庭抗礼，50年代末之后甚且后来居上，本地文艺界的中流砥柱，非他们莫属了。这个时期的作品内容，绝大多数是反殖、反帝、反封建和反黄等，同时侧重反映中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甚至暴露黑暗的实况，题材则多以

职工运动和学生运动为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

从马岑搜集和访问的史料专集来看，到了第三期（1965～1984），在现阶段的文艺界活动的重要作家，几乎90%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前往台湾及香港留学的年青作者，写作的表现手法及技巧娴熟，作品新颖别致。新华作者除了诅咒黑暗之外，也歌颂光明——赞颂新加坡的建国事业和刻苦的精神。马华作者选取题材，已有较广阔的天地，所完成的作品颇能与时代紧密结合，反映了时代精神。

必需在此顺便提到的，是从1959年以来，马华现代文学已在本地打开另一个崭新的局面。80年代初开始，马华现代文学作家的步伐似乎比新华现代文学作家跨得大些、快些。天狼星诗社社长温任平曾在马华现代文学运动21周年纪念专册《愤怒的回顾》里，将21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1)探索时期（1959～1964）；(2)奠基时期（1965～1969）；(3)塑形时期（1970～1974）；(4)怀疑时期（1975～1979）。为了庆祝25周年，温任平和张树林等订于今年4月14、15日，举行为期两天的“全国现代文学会议”和“现代诗发表会”。温君早于1978年11月就在论文《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史的回顾与前瞻》里写道：“开创现代文学的新感性，加强现代文学内涵的社会感，我想，正是马华现代文学必然要踏上的路。”

文艺刊物及其他

在早期马华新文学的发表地盘，附在报章上刊出的“副刊”，在当时却被称为“刊物”。这些“刊物”在文学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报纸上的文艺副刊，就是早期马华文艺创作活动的具体表现。

也许有人要发问，早期的马华文艺界，难道没有真正的文艺杂志吗？

事实上，像战后这些独立出版发行，完全不需要依赖报馆协助的文艺杂志，在战前的马华文学史上也出现过好几种。根据一些记载，从萌芽时期一直到1941年冬这一段时期，本地出版的杂志期刊，少说也有十几种，可惜经过一场太平洋战争的浩劫后，那些文艺杂志已经完全散失或被焚毁了。最早出现的一个纯文艺的杂志，是《南方月刊》（1932年1月发行，只出一期），同年5月，陈慧玲主编的《南洋文艺》也出版了，也只出一期。这是马华文艺界最早出现的两份杂志。《南岛半月刊》、《今代》（1934年5月出版约出6期）、《椰风月刊》（1935年10月创刊，仅出2期）和《南岛旬刊》（1936年6月创刊，共出30期），是较后印行的4种杂志。在这6种文学杂志中，比较受重视的该是《今代半月刊》和《南岛旬刊》两种。《南岛旬刊》也是马华新文学低潮期中寿命最长的一个综合性杂志。

到了繁盛时期（1937~1942年初），在新加坡、檳城、怡保等地出版的杂志约有15种，最受推崇的3种是：①南洋周刊——1938年8月11日发刊，8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文艺稿占三分之一。由马康人、傅无闷先后主持。②文艺长城——1939年4月2日创刊，纯文艺杂志，16开本，由铁抗主编，约出7期，被公认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纯文艺刊物。③现代周刊——1939年4月2月创刊，在檳城出版，16开型的综合性杂志，洪丝丝主编，延续至战后，出数百期，影响最大。

有关新马出版过的纯文艺或综合性刊物约240种，我们可从赵戎编著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找到，不过赵戎所收集的材料，是从战前至1977年12月止；换言之，从1978年之后的刊物就没有介绍了。

战后至马来亚独立前时期（1945~1956年），可分为“战后初

期”（1945~1948）、“紧急状态初期”（1948~1953年）和“反黄运动时期”三个阶段来谈；在“战后初期”，新马各地出版的刊物多达27种，综合性杂志以《风下周刊》、《现代周刊》、《新妇女》和《南洋周刊》等较为突出。而在“紧急状态初期”，由于言论出版限制特别严厉，所以影响到本时期的刊物大大的减少，只有13种罢了；常有文学创作发表的综合性杂志《星洲周刊》和《南洋月报》等，可读性颇强。“反黄运动时期”（1953~1956年）的文艺活动，又呈现了蓬勃的气象，这一阶段的刊物多达21种，著名的《文风》副刊（南洋商报，杏影）、《晨星》副刊（星洲日报）、《绿洲》副刊（南方晚报）等，都是出色的文艺版。姚紫编的《文艺报》、文丁编的《沙漠风》、高宁波编的《生活文丛》，以及《人闻月刊》、《耕耘半月刊》、《人间半月刊》等则是当时重要的副刊。而一直出版到今天的《蕉风》和《学生周报》（后改为《学报》），也是在反黄运动时期创刊的。

马来亚独立时期（1957~1963年）的刊物（报纸文艺副刊和杂志）有22种。方修编的《文艺》（1958年四月创刊），和杏影编的《青年文艺》等副刊最为出色。叶世英编的《蜜蜂》和南大出版的《大学青年》，以及南、中、北马同时出版的《新潮》、《荒原》及《海天》等，都各拥有一定的读者。

从马来西亚成立初期到新、马分治时期（1963~1965年），因受政局的牵涉，造成文艺活动处于沉寂状态，许多刊物停刊了，直到1964年才开始稍有改观，这一个时期新、马的刊物分别有8种和10种。联邦方面的《半山月刊》和《浪花月刊》，是16开型纯文艺刊物，读者群较多。

新马分治后的第一个10年（1965~1975），可分为两个小阶段来谈；在1965年至1969年这一阶段里，新加坡方面有10个刊物，大马方面则有8个刊物，纯文艺刊物已越来越少了。在1970年至1975

年的另一个阶段里，新加坡方面有20个刊物，大马方面则有9个刊物；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甄供编，1975年10月杪创刊），和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前身是新加坡版的《新年代》，初期由紫阳编，后由钟夏田接编，1974年创刊）两大文艺副刊，迄今仍然是大马最突出的刊物。

从1975年至1982年，这个还未正式被定名为《觉醒时期》的期间，新加坡方面的刊物有12种，大马方面则有11种。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先后出版了《文学月报》和《文学半年刊》杂志，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出版了大型文艺季刊《新加坡文艺》；而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也于1979年出版了《写作人季刊》。最令人欣慰的是大马的一些民间社团，从1974年创设了学术文艺出版基金，资助写作人出版专集；大马福联会暨雪福会馆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令人激赏。

至于在新加坡方面，独立初期，由于国家倾力于经济建设，所以未致力推动文化的发展；不过在70年代下半期，文艺团体纷纷成立，出版好些刊物。同时，在报章文艺版编辑和学生文艺刊物的引发下，冒出了不少的年青作者，目前多已成为新华文艺的中坚份子。而妇女作者的涌现，是过去所不能看到的现象。

结语

文化是一个种族的根源，也是民族的灵魂，而马华文学则是我华族文化的重要一环。我们更认定：马华文艺不仅是华裔社会的文化要素之一，而且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主要源流之一，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瑰宝。

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主办文学史展，接着几个社团相继承办而巡回展出，已明显看出华社正用集体的行动来扶助马华文学。这是

个良好的趋势。参观了马华文学史展，我们可发觉每个阶段的文学发展，从题材、内容、人物形象，乃至形式和风格等的变化，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实际上，它是由社会历史不断发展而决定下来的。通过这一层的认识，可确定了马华文艺工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

我国的华裔社会，正处于寻根追源、肯定地位的觉醒年代，目前正积极地全面的展开自强自救运动。在文学方面，有人建议把优秀的马华新文学作品翻译成国文或英文，以达致文化交流的目的。1983年5月间，大马语文出版局属下的翻译咨询委员会已经成立，而且展开了各族文学交流活动。最近（今年4月6日），在吉隆坡举行了各民族诗歌朗诵晚会；像这一类的活动，不仅能加强各民族文学交流，而且有助于促进民族间的谅解与团结，有了好的开始，今后继续通过各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我们的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脉络，自有鲜血在流动着。这么一来，马华文学必然发展成一种不可分割，人人引为自豪的马来西亚文化；一个合理的地位便不难争取得到，不是么？

◎1984年4月13日下午2时完稿。

◎参考资料：包括文学史家方修和杨松年、周维介、方北方、黄孟文、苗秀、温任平、赵成、林万菁、黄梅雨、孟沙、马荅等作家的数十本专集和单篇文章，以及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的《史料展纪念特辑》等，特此敬谢。

◎本文曾转载于1986年6月第9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台北）

◎原系1984年4月15日新山中华公会等团体联办文艺讲座会上之讲稿

马华小说的特质与创作方向

“马华小说”之称谓，简单地说，就是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华裔人士运用华文创作下来的小说作品，这包括新加坡在独立（1965年8月9日）之前的小说创作在内，因为当年新、马是一家的共同区域。

正如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文艺作品一样，马华文学艺术也泰半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尤其是小说作品，绝大部分可当作是社会文献来使用，深具研究的价值。曾经阅读过早期的马华小说的读者，都会同意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内容，早期的小说作者多能认真地描写人与社会的关系。

一般特质的形成

文学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式。从约莫70年来的马华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到马华文学与当地的实际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表扬了由侨民意识的进化成为效忠新马的爱国意识，展示了每个时期和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概貌。涌现在每一个阶段的写作者，对马、新加坡社会的生活思想，都作了相当忠实的记录。

从事马华文学史料的研究者都指出：马华文学不仅是个文学运动，而且还是一个思想运动，作品中富有新思想、新内容，并倾向于提倡南洋色彩和南洋题材。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文艺工作者，无不接受了那一个时代思想的洗礼，继而在笔下发出共鸣，并在作品中表现出现实的发展性。

试想：要是早期的马华写作人不关心当地社会的话，那么，他

们怎能确定了自己的崭新路线，致力于提倡科学、提倡民主、反对封建和反对侵略，强调作品的新兴意识，甚而把自己看作是发扬新思想，和改革社会的一份子呢？

要是早期的马华写作人不关心当地社会的话，那么，新文学运动怎能继承着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而滥觞开来，长久与中国新文学血脉相连，息息相关？

要是早期的马华写作人不关心当地社会的话，那么，本地文学怎能与社会结合起来？他们又怎能负起社会的使命感，建立起自己的作战阵地，形成一种新文学运动、新思想运动？而现实主义写作路线又怎能发展成为马华文艺的主流，以文学来反映本地生活和表达当地的问题？

是的，马华小说作者关心当地的社会是肯定的。我们翻阅那些马华小说先驱作者如林独步、陈桂芳、李垂拱、陈晴山、罗依夫、海底山、曾华丁、吴仲青等等的小说创作，便会理解他们已写下反映时代先进思想的作品。早期报纸副刊的编者与写作人所提出的南洋色彩、南洋题材这一类的理论和口号，在一般小说作品中，都具有写实主义精神，和富有地方色彩；早期的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潮流，已普遍地体现在各种不同型态的作品中。有一部分的马华写作人还进而直接的参与社会活动呢！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文学，都会有各自的特色。这种文艺特色，是由一个区域的文化、社会、历史和环境形成的。

马华文艺界何尝不是这样。数百年来，马来西亚各民族和谐共处，终于，产生了一种特有的“马化生活形态”。这儿的中、巫、印和西欧四种主要文化，通过互相交流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然融汇贯通而产生马来西亚文化，最终则形成国家文化。这么一来，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便不是单纯的中华文化，而“马化”的中华文化了。

文学是文化中主要的一环；自然的，马华文学与中国、香港、泰国、越南、菲律宾和印尼等地的华文创作所特具的色彩不同。马华文学最基本的定义应该是：在华文创作中所表达的是马、新华人的思想与感情；所描绘的是马、新的现实社会。由于语言都受到地域性一定的局限，所以马华小说语言的应用，便具有马化的特色。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跟随区域的不同而改变；而这些语言是从马、新的一般语言中选择、提炼、加工、净化，甚至是人民创造出来的，越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文学语言最为恰当、可取。我们在马华小说作品中，便可以体认到它的文学语言特色；这是前辈作家长期以来竭力创造的成果。

马华文艺作品已然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影响了社会，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作用。尤其是马华小说，它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帮助大家认识一种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律与具体面貌，所以，从马华小说的内容，你不难窥见本地社会生活的变革和发展。

无论在战前、沦陷期、战后和独立建国的几个重要阶段，数百上千的小说作者都先后完成各个时代的使命。这一批批的小说作者把自个儿所认识的社会生活，和个人所产生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传送给读者。唯有多阅读马华文艺作品，我们才了解以往的社会现象是怎么回事儿。比方从马华小说中听到了50年代中大伙儿高喊“默迪卡”的呼声（如梦平的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你自然感到了当年争取独立的各族同胞的脉搏的跳动！又譬如我们阅读殷枝阳（乳婴）的短篇小说《八九百个》，便多少可以了解在抗日救亡时期本地华裔群众对日本商人的“不合作运动”的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许多小说作者通过自己的笔下人物对当年时势寄以感慨，表现出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他们不断地通过具体的小说创作，反映出人民的思想与感情、愿望和要求，并提出了跟群众的权益有

关的重大问题。

大体上来说，在60年代以前的马华小说作品，多深受中国五四遗风的影响，那是文人标榜健康与写实，过分重视文学教育功能的时代。当年的小说作者循例偏重社会改革学说，讲究题材现实，强调主题和严谨态度，每每将社会现象和问题极端化，而小说人物却简单化；创作的目标不外是在暴露社会现实的黑暗面，歌颂民众的奋斗精神。他们笔下的小说题材，主要是中产阶级以下各阶层的现实故事，尤其是属于劳苦大众斗争的事迹。

总的来说，60年代以前的马华小说，大抵是以反侵略、反封建、反战争和反殖民政府为主题，所反映的是乡村人民落后和悲苦的生活遭遇，并暴露奸商的卑诈及生活糜烂的一面，以及当年侨教种种不合理与畸形的现象……很显然地，60年代以前的马华作家是有意藉小说作品指陈现实社会的缺点，进而唤起人们的良知以改善当前的社会。

纵观上述，马华小说的这些特质是自然形成的；它的特色也是独有的。或许当年的马华小说作者，把政治文化革命的使命看得比文学使命更重些，加上要掀起抗战文艺运动，因而未能精心构思和艺术加工，对生活的材料缺少提炼、融汇，以致无法通过形象的艺术概括，把现实生活加以典型化，变成未臻于完美的艺术作品。我们几乎不能否认：马华小说在艺术创作上失败的多，技巧达到了化境的少之又少。此外，马华小说作品似乎还欠缺一定的文学风格，这包括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和阶级风格等。

今日的读者，对这一类的马华写实小说，未必都感到十分的欣赏，因为它呈现的人生，往往公式化、简化了人生；它的深度当然是不够的。福克纳就曾经说过：“我们读小说，首要了解，而不是褒贬。”

文学创作是持久不息的历史事业，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

连现代派大诗人艾特略也说过：“伟大的诗人，必须接受传统。”因此，作为一名爱护马华小说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深一层的研究马华文学的起源、发展、背景及特点等，然后赓续与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扬弃其糟粕，同时以群策群力，创造公正而辉煌的大马文化。

别做时代伪证人

小说是一种富于弹性的文体，没有外表上的格式。小说作者应有较大的活动领域。马华文学发展到60年代初，有不少的写作人已向外国寻找理想的创作方向，选择作家与作品作为学习和思齐的对象。于是，本地的文学流派愈来愈多啦。

这原本不是什么坏现象，然而令人有点疑惑的，是时下的好些文艺青年似乎缺少了创作的基本精神，不是文过其实，就是爱唱低调，不愿作客观的、本质的反映；不是一味要片面追求形式之美，就是他所描写的多是停止在事物精神以外的物相上，不能充分而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有的年青作者在描写人类的心理世界的时刻，不是描写人生的虚无，就是尽量暴露人类的罪恶行为，并过分地描写性爱情形，几乎完全忽略了理性与善良的一面。这么盲目的“自由选择”，自以为学到新颖的创作手法，致力追求一种新的综合，描写破碎的梦和灵魂里的隐忧，内心的渴望，失落的悲哀……他笔下的小说作品必然是不完整的机体，而且语文不精确妥贴，尽朝着“浑浊”的方向前进，令人难以索解，而作者本身很可能成为时代的伪证人。

现代欧美小说作家所着重的，是把现代人的痛苦、人类共同的精神缺陷抽剥出来。欧美的现代小说家这么写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因为西方现代人经过世界大战的摧残，并在工业社会中体验到残酷

的现实生活，面对着孤独感和悲剧……然而在我国，泰半的人民居住新村或农村里，他们纯朴的生活方式和闲适的心情，都是有理性存在的。所谓现代人生活的困境与荒谬，在此时此地绝不是普遍存在的；年青的小说作者没有必要专用那一套艺术手法来反映时代、表现人生，并以扬弃传统为荣。

我们同意，写作需要有高度的艺术技巧；不过要是把技巧看作一切，那就错了；更重要的是熟悉生活和理解生活，跳出了狭隘的生活圈子，学会概括生活和表现生活——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选择较有意义的人物或事件来着笔，踏踏实实地把典型现象，通过有性灵有血肉的个性表现出来。一位忠于读者的小说作者，必然也忠于生活；他时时刻刻在生活中吸取各种人生体验，然后提升为概念，又把概念回归生活，选取典型，以更质朴深广的笔致，进一步扬弃“知识人的偏激”，只凭艺术的真诚使自己的小说增加感染力。如果长时期的深入钻研正确的文学理论，虚心学写，广泛地涉猎社会科学知识，热爱生活，参与生活，进而敏锐地观人察世，他是不可能写不出优秀作品来的。

创作的新方向

若是我们花点时间翻阅80年代的两部小说创作比赛作品专辑：1983年出版的《围乡》，和1989年出版的《候鸟高飞时》，便不难发觉青年小说家丁云、许友彬、诗蓀和纪连国、黄慧琴及郑祖等，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三名，是具备一定的优越条件的。

荣获第一名的丁云作品《围乡》以伐木生活为题材，很值得尝试；丁云的文字活泼灵动，写起来层次分明，有情有景；所表现的技巧也很新颖，结构也完整匀称，再加上主题正确、很有现实感。

也同样在另一个规模甚大的小说创作比赛中获首奖的《候鸟高飞时》，作者纪连国对吉胆岛的渔民生活相当了解，涉及移民热但更倾力于重建家园的主题，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其他数位得奖小说作者对他们笔下人物的生活都有极深刻的了解和生活的体验……这使我们坚信：只有根植于广阔的现实生活的小说，才有真实的生命。

今年（1989）4月9日，《蕉风》作者出席座谈会，讨论《当今马华文学的趋向》；我们很高兴听到北马作家陈政欣说：

“我在小说创作上的转变和诗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走向明朗，着重刻画对社会、民族、国家的忧患，这是我目前创作的趋向。我发现到一些年龄和我相近的几位作者也有同样的趋向，例如小黑和雅波。他们的小说已经转向到表达一些历史感、使命感的境界。这是我所知道的马华小说的趋向。我也觉得我目前所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至于一些年轻的作者，我觉得他们还处在‘风花雪月’的阶段，写的只是一些爱情啦、学业啦之类的东西，缺乏深度。”

聆听陈政欣在该次座谈会上这么说，我们仿佛已望到马华小说的趋向，自然不难地可选定自己的方向。

1989年7月27日·马星园

◎转载于1991年3月出版第28期《亚洲华文作家》（台北）



左起：马峇、隆华法师与小徒弟、郑泓校、罗民广
（1996年2月4日·新山）

68年来的马华小说风貌

(1919~1987)

小引

最近三五年来，我们在马、新常听说“行情太坏啦”。这里的经济不景气、百业萧条，失业者或被裁员的人数遽增，大家无不感到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少的村民和小市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痛苦难挨。

要是你有阅读最早期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品的话，你将晓得早在50多年前，马来亚（当年包括新加坡在内）也曾经发生过经济全面崩溃所带来灾难的悲惨现象。——你不妨也来读一读以下一段小说作品的叙述：

“受了世界经济的突变的影响，这酣睡在地球上的土腰上面的没有春天的热国里面所有的土产，都像银行里突然失了信用和效能的钞票一般，一齐跌了价，且已跌到无可再跌的地步了。于是生活不能得到保障的弱者，被青面獠牙的强者排挤出生活圈外去。在种种的饥寒痛苦的恶魔的侵蚀之下，这许多失业的劳动者的性命的活力都渐次地、渐次地被榨净尽，消失，而至病死了。”

“生活的巨流滚滚地奔涌着，无数在追求生活的可怜的弱者的灵魂，沉溺在这生活的巨流的赤波之中，跟着生活的巨流的冲激而西北，而东南。有的在苦笑，有的在呼吼，有的在哭泣，各反映着各的生活的苦恼——他们的内层意识的表现。生活的巨流不住地流转着，无数的弱者的灵魂在那上面飘荡着。”

——这一段文字，是从早期的马华小说家曾玉羊的短篇小说《生

活圈外》引录出来的；它发表在1930年9月间的《南洋商报·压觉副刊》上。原来在57年前，曾玉羊眼见3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打击了马新的树胶、锡矿的生产，也使得百业萧条；原已生活艰苦的工人，更面临失业的打击，举家陷于无靠的悲剧。这位早期的马华小说家便针对吡叻矿产停顿，工友的日子难挨的事件写下短篇《生活圈外》，反映出当年经济不景气影响工人生活的情形。

30年代的经济大崩溃事件，距离今天少说也有57、8年了，然而读了《生活圈外》这个短篇小说，当年的悲剧情况便跃然纸上，那图景是相当明晰的。由此，可见小说是有生命的；而小说家那枝笔的功用是很大的。难怪连拿破仑也说过这么一句话：“世间只有两种力量——剑和笔；结果呢？前者常被后者征服。”

我们都晓得，小说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小说是描写人的艺术。优秀的小说家为你划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人生；而那个世界，也许就在你的身边，那个人生，也许与你有关，或者是属于你自己的。读到好的小说作品，你不能不佩服，小说家擅长透过意象而写出人生的或然与必然。

（一）马华小说一二三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小说是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之一，可是，在多种文学体裁中，小说却是最入世、最自由的一种形式。小说的题材，也是无穷的，表现题材的手法及方式，也几乎是无穷的。

是的，“今天是小说的时代。”

早在1903年，美国小说家法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在他那篇《小说家的任务》一文中就写过：“今天是小说的时代。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时期或任何工具能够像今天的小说这样充分表现时代

生活。22世纪的批评家，在回顾我们这个时代，试着重建我们的文明时，他们所注意的将不会是那些画家、建筑师或者戏剧家，他们将从小说家方面进行发掘我们的特点。”

诚如已故小说家苗秀所说，法兰克·诺里斯这些话多少也适用于说明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现代马华小说的价值。

我曾花过一些时间研读马华小说，虽然对本地小说作者创作的倾向与中国30年代的特点没有多大的区别感到有点失望，不过，他们多能够要求提高到以使命感的层次来看问题，对当地的人民有更大的关爱，总算表达了群众的心声，这倒是难能可贵的地方。可不是么？小说家最崇高的表现，还是对“人”的关爱，从而扩大到对国家、对世界，乃至对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的关爱。

一个小说家，他尽可以一定时期的历史跟某一个现代社会为背景，然而它们都不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它们都只不过是作家捕捉社会上某一些“现象”再向横的推“广”，或者向纵的挖“深”后构想出来的结果。

小说本身必须扎根在现实生活中，不但要融合生活，也要提领生活，创造生活，因为文学是向上提升的，把人的情思感受升华成为艺术。小说的情趣，是藉人物和情节表达给读者。马华小说当然也是写作人以“现实”为题材，用文字描绘出来的活动世界。

我学写小说，因为我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取材，然后提出个人对现实生活的看法；这也是本身表达情意的一种生活历程。而一般的小说创作，可以比较全面和完整地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思潮等。再说嘛，写小说可以舒畅自己的心灵。

我也相信，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只要有使命感，认真地去生活、去思考，细心观察众生相，写自己所熟悉的题材，有现实性的题材再加上无限的想像力的配合而铺张成的作品，一定将是比较像样的小说作品。

在马华文学的多种文学形式中，我选了小说——以《67年来的马华小说风貌》为讲题，因为我认为在马华文学创作的领域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小说；它最能够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

根据资料显示，从1945年光复到1965年，新马两地出版的小说创作单行本共有2百90部，其他文学体裁的单行本，比如诗集只有70多部，散文只有90多部，跟小说比较起来，可说是少了三、四倍以上呢。最近20年来，已出版的马华小说的单行本数量也较其它文体的多出几倍。

关于“马华小说”的定义，我们的看法是：马华文学，就是马来亚（马来联邦与新加坡，以及加入马来西亚的砂劳越和沙巴二州）地区的华族文学。在马华文学中，属于小说体裁的作品，就叫做“马华小说”。1965年以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这里所讲的“马华小说”，自然把独立后的“新华小说”省略不提。当然，谁也不能否认马、新二国“无论从历史发展、社会现实，还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来看，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是东南亚地区国家所没有的”（忠扬在《新马华族文学的概念与特征》一论文中语）。

（二）战前马华小说拓展一瞥

一般文学史家都认为，马华新文学是在1919年中国的反帝、反封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五四”新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从马新殖民地的华族社会的落后、贫困文化荒地上萌芽发展起来的。它是以1920年马新华人反对殖民地当局对于华校和华文教育的控制作为开端的。在当时，这种文学的发生是代表马新华族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文化利益的，也体现了华族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

在马新殖民地社会的存在与成长，并宣告了华族在马新社会的地位，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此，马新华族文学一旦产生，就作为争取华族在马新殖民地社会的人权与地位的一股力量。……（根据评论家忠扬的看法）。

①文学史上第一个短篇

我们常听说，马华作家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林参天著的《浓烟》（1936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一部中篇小说，是丘士珍著的《峇峇与娘惹》（1934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王哥空著的《面包及其他》（1934年4月出版）……

很自然地，也有人会问：出现在马华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是谁的作品？题目叫什么？发表在什么时候、什么报刊？

这个问题，还是由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来解答吧，他在《马华新文学简史》一书中写道：

“在马华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小说雏形的创作，是双双的《洞房的新感想》，发表于1919年12月底的《新国民杂志》副刊。”

这篇《洞房的新感想》，是描写两个青年在参加一个朋友的婚宴时的一段对话——认为现代青年虽然做了盲婚制度的牺牲者，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不满意，但基于人道立场，也不应另寻对象。因为南洋社会的风气还很闭塞，普通女子离了婚之后是很难找到出路的。

双双是谁的笔名，似乎还没有人查出来；他这篇《洞房的新感想》发表至今，已经67年了，它内容简单，水平不高，主题也不算是很明确。然而，双双的这篇作品却开了马华问题小说的先河。

不久之后（大约是1921至22年间），成就比较高的小说作者是林独步（林氏也擅长写诗），他的几个短篇小说：《珍哥哥想什么》、《笑一笑》、《两青年》和《同窗会》，小说中的人物大抵是类似的，内容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不过，令人佩服的，

是林独步早在60多年前，文字上便有相当细致的表现，同时不论在心理的描写、性格的刻画，或是气氛的烘托等方面，林独步也有相当高明的技巧表现。

双双和林独步是马华小说萌芽时期的代表，这里特别举他们做例子，目的不外是说明最早期的马华小说，还谈不上具有独特风格：当年写作人视野的广度还是有所局限的，不过，他们已开始注重表现技巧了。

在“马华新文学的扩展初期”（1925~1926年），拓哥是重要的小说作者之一，他相当重视描写与结构。有人曾武断地表示，战前的马华小说毫无艺术技巧可言，那是说不过去的评论。

跟拓哥同时在文坛上露面的吴仲青，他的小说成就也值得一提。已故的小说家苗秀便十分欣赏吴仲青的小说；苗秀说过，吴仲青的《辜负了你》，可说是马华文学的第一个有一定成就的现实主义短篇创作，而且也是最先反映华侨教育的小说创作，这是马华小说史上的第一个有着相当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品。苗秀还进一步地说：《辜负了你》发表之后，现实主义便成为马华小说创作的主流。

李西浪也是马华小说界的先驱作者之一，他的名著《蛮花惨案》是中篇小说，于1925年初发表在《新国民杂志》副刊；它是一部半文不白的章回小说，但作者企图描写殖民地社会现实的思想精神，加上它超越同时期一般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使它被公认为马华新文学萌芽期较为圆熟的作品之一。作者在这部中篇里，精彩地写出猪仔劳工在锯木厂所过的暗无天日的生活：数十人被堆挤在一间像牢狱的小房里，一大清早要冲冷水“消毒”，工作不好就要惨遭鞭打，鞭打到死就被掙入大海。

②不俗的小说家和作品

大约是由1928年中到1931年，马华新文学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新兴文学运动”，同时，有的小说作者已提倡南洋色彩，而新兴

意识的影子经已在槐才、陈晴山、王探和冷笑等的小说作品中出现了。

紧接下来的另一个时期的小说代表作者，该是罗依夫、李梅子、浪花、慧聆、海底山等；他们也是“扩展时期”（1925~1931年）的小说作者。我们读酝酿时期的马华小说，可约略窥见五四初期当地一般侨生的社交生活、知识青年的心态、劳苦工人的遭遇，以及群众的思想意识的一个轮廓。——这时期，已有多位写作人自动自发地以当地的生活为题材，下笔时，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社会与人民的热爱和真挚。

海底山的《拉多公公》是个比较受人赞扬的新兴小说，是当时新兴小说中技巧最圆熟篇幅也最长的创作。海底山的原名是林其仁，祖籍福建，毕业于新加坡华侨中学，可惜在银行界任职后，就不再写作了。

海底山的这个小说，确为马华浪漫主义的创作建立了一个新纪元；作者那丰富的想像力真令人激赏！

《拉多公公》的内容大略是这样的：拉多（拿督）公公是海洋群岛的开辟者（拉多本来是马来人传说中的神），这里的风光绮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一天，三宝公来南洋，还带了许多华人到这里来垦殖。三宝公与拉多公公一见面，就谈得十分投契，两人就结拜为兄弟。自此，华巫两族人民在南洋群岛和睦共处。不久，拉多公公听三宝公说西方有一位如来佛，他能够超度人类上天成为神仙；只要去拜如来佛做师父，听他念经，就可以长生不老，登上天堂。于是，拉多公公扶杖西去，天天听如来佛现身说法，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却始终修不成正果。拉多公公怀念家乡，关怀他的子民，终于又回到故乡来了。不料他的家乡在一百多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岛屿先后变成欧西人的殖民地。他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地方竟然变得很肮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目睹各种各

样的悲惨的景象，便立下决心，联合他的人民，全力地改造南洋群岛，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独立国（根据文评家的叙述）。

这是一个具有思想性和启发性的短篇小说；要是作者本身缺少真感情，就不可能写得这么动人、这么有深度。

依我个人的阅读和欣赏，大约自1919年到1942年这22年间，比较活跃、成就较大而且有一定影响力的10位马华小说家，他们该是：

“吴仲青、曾华丁、郑文通、邱士珍、饶楚瑜、细胡（胡一声）、林参天、丁倩（张一倩）、乳婴（金枝芒）和铁抗。

他们的作品如吴仲青的《辜负了你》、曾华丁的《五兄弟墓》、郑文通的《创痕》、邱士珍的《没落》、饶楚瑜的《囚笼》、细胡（另署古月等）的《历史的终点》、林参天的《浓烟》、丁倩的《一个日本女间谍》、乳婴的《八九百个》和铁抗的《白蚁》……等等，有多篇是震撼心灵的佳作。

其他同年代的小说作者，他们也都注意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稍嫌停在说道理的层面上，文字的应用也多未能做到更细致精炼；不过，他们几乎都有一个使命感。

从战前的马华小说中，你可了解早期华工南来的原因；他们南来后，或成为猪仔，或成为自由劳工，所挣的工钱不多，又常遭受老板、工头的欺压凌辱，或无情鞭打，或扣减工钱，或残酷迫害；而那些女工，有时还不幸地遭受到奸辱呢。

从战前的马华小说中，你可晓得当时的一般妇女问题、华侨教育界的阴暗面、颓废的浪漫主义表现和各族人民的反殖斗争的场面。南来的文人，有一部分是直接写中国题材的小说，反映抗战初期马华救亡运动的面貌。这些小说创作，多是战前历史的真实记录；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与发展，常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

我们同意，马华小说的发生和发展，一直深受中国“五四”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因此也就直接地继承了“五四”的反帝国反封

建、提倡科学、宣扬民主等的精神传统，并把这种精神与马新人民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忠扬语）。

（三）战后小说家的笔向与收获

马新沦陷的日治时期，马华文艺是一片空白的。

①历史动向的影响

根据方修的说法，战后初期（1945～48年）的马华文学基本主题，是反对恢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主。

新加坡作家孟毅（黄孟文）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的导论中说：

“战后新马华文文艺特色，除了单行本不断地涌现以外，就是作家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改变。在1947年尾和48年初，新马文坛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有关‘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方面的论争。在这个论争以后，本地的写作人（不论是从中国南来或是土生土长的写作人）才普遍地具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意识：马华文艺不应该再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支流或是附庸，而应该是道地的马华文艺；它不应该描写几千里外的中国的事情，而应该反映‘此时此地’；它不应该唯中国文学的马首是瞻，而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特性’。这个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异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当大家认清了文艺的服务对象以后，才能明确地指导读者，才能有效地发出光和热，才能脚踏实地地完成历史所赋予作家们的崇高任务。”

马峇也在《马华当代小说选》的导论中指出：

“早在战后初期（1948年左右），经过一场‘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大论战之后，大部分的写作人都不同意马华文艺再附庸于

中国文艺，而且多能体认到自己的正确身分，再加上多位优秀的来自中国的作家，因故相继地回到中国去，土生土长的新生代写作者逐渐可以取而代之，于是马华文学正式脱离了中国而自立了。”

②战后初期的小说界

日本投降之后，最先在马华小说界出现的是一些描写沦陷时期的事物的小说创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丘天（也是战前的邱士珍、废名、邱家珍）、林参天、殷枝阳（即乳婴、金枝芒、周容）和夏霖等。

丘天在战后初期写的中篇《复仇》（约4万字左右），内容叙述北马某市镇的一个青年店员吴仇，他和妻子不堪日军迫害，便参加了抗日工作，可是他被汉奸杨雄出卖，以致吴仇一家大小被日军杀戮。战争结束后，吴仇终于找到了汉奸杨雄，报仇雪恨，大快人心。1948年民生社出版了《复仇》这部中篇。

在战前，以写长篇小说《浓烟》出名的林参天，发表了小说《馥哀》，写的是澳洲籍俘虏反抗日军的迫害而被虐杀的故事，可惜写作的深度不够，评价不高。

殷枝阳早在战前，已经是个优秀的小说家，他用乳婴为笔名，在战前发表在《南洋周刊》的中篇《弗琅工》，就获得很高的评价。更难得的，是他在马来亚沦陷时期，还拿起枪杆捍卫马来亚领土呢。小说家苗秀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的导论中，就赞扬过殷枝阳的小说风格质朴但是亲切动人。马来亚沦陷时期抗日青年的英勇斗争，他们悲壮牺牲，成为战后马华作家最普遍的题材。而把这类题材写得最成功的小说家，非殷枝阳莫属；他当时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牺牲者的治疗》。

夏霖原名曾九洲；他在1948年出版的《静静的彭亨河》，在这个短篇集子中，他塑造了一些在民族民主运动的热潮中的新型的人物形象，如他的代表作《静静的彭亨河》、《急潮》和《憧憬》等。

他不幸已于1987年8月初病逝，享寿65岁。

③几位代表小说家的创作

从1948至1953年，是马华新文学史上的所谓“紧急状态初期”，杰出的小说家首推韩萌，代表作有内容着重于中国问题倾向的中篇小说《七洲洋上》。韩萌的一些短篇小说，则多取材自新马的生活现象。这位名小说家出生在北马吉打州万那峇鲁县。

目前定居在汕头的韩萌，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大规模的《侨乡人家》等长篇小说，收获丰硕。他的中篇《七洲洋上》，于1950年初在香港出版，内容是描写一个新加坡华侨家眷在潮汕区受难的故事，也写出了“海外孤儿”的悲苦生活。

与韩萌同个时期的苗秀（战前的文之流）、韦晕、谢白寒、萧村、赵戎、丘絮絮、于沫我、姚紫等，都是当时小说界的一时之选，他们都有个人的小说集刊行。

韦晕是在1937年从中国南来的，早在30年代末期就以“上官豸”的笔名，发表了《非英雄史略》等佳作。光复后一直到今天，韦晕写得很勤快，他的长篇小说《浅滩》、中篇小说《还乡愿》，和短篇小说集《乌鸦港上黄昏》等作品，都得到高度的好评。今年（1986年）10月间，在吉隆坡出版的《韦晕小说选》，是韦晕在超过半世纪的创作历程的各个阶段的作品，所以书中收集的小说除了战前之外，从50年代的《乌鸦港上黄昏》到80年代的《噢！那感喟桥》，这包括了韦晕在战后创作的每个时期。从这个集子里可以知道各个时代的风貌，以及各个时代的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创作历程。

在新加坡出生的苗秀和赵戎，也是在小说创作方面成就不凡的著名小说家。

不幸已在1980年9月逝世的苗秀，他是新华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苗秀遗下的长篇《火浪》和《残夜行》、中篇小说《新加坡

屋顶下》和《小城忧郁》等，以及短篇小说集《旅愁》和《人畜之间》等等，都是一流的新马华文小说。

赵戎著的长篇《在马六甲海峡》是战后马华文艺的第三部重要长篇小说（前两部是苗秀的《火浪》和韦晕的《浅滩》）。赵戎的中篇小说《海恋》和短篇小说集《芭洋上》等作品，都是值得一读的好小说。

谢白寒的小说集《新加坡河畔》、萧村的《国术师》和《椰子园里》、丘絮絮的《房东太太》和方北方的《两个自杀的人》等短篇小说集，加上姚紫的中篇小说《咖啡底诱惑》和短篇小说集《马场女神》等，都是比较受人欢迎与注目的小说。姚紫和另一位小说家洛萍（白蒂、江陵）的小说作品跟传统的马华小说是有一段距离的，有人甚至批评他们的写作态度不够严肃，不过，姚紫和洛萍的小说创作是丰收的。

在当年，丘絮絮算是多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大部分小说，都以教育界的人与事为题材，代表作是中篇小说《播种者》。

根据方修的分期，1953年底至1956年，是“反黄运动时期”——这是战后马华文学的第三个历史阶段。这时期的优秀小说家、该是李汝琳、黛丁、陈全（白蒙）、丁之屏、谢克、麦青、贺巾、李过、貂问湄、云里风、田流（铁流）、宋雅、方天、光华、原上草、范北羚等。

据说，贺巾、韦嘉和高静朗是同一位小说家的笔名。贺巾的代表作是《青春曲》和《青青草》等。李汝琳于1947年12月前来新加坡定居，50年代末出版了小说集《悔》和《姐妹俩》；他的长篇小说《漩涡》（1962）和短篇小说集《新贵》等，都是已有定评的佳作。香港小说家刘以鬯于1952年至1957年间，在新马办报，大约在60年代前后数年，曾以葛里哥等笔名在《南洋商报·商馀副刊》发表好多劲健新奇、结局多样、摄人心魄的短篇小说，可惜迄今未汇

集成书。

大体上来说，黛丁（黄山）的《阴影》、陈全的《小城之夜》、李过的《活动地狱》、貂问渭的《金马梭胶园》、云里风的《出路》、方天的《烂泥河的呜咽》、原上草的《韭菜花开》等小说创作，都给读者有个好印象；这批小说家多能提高到使命感的层次来看问题。

④有些小说的落后面情况

1957到1970年，是“新马独立前后”的另一个文学史的阶段，比较引人注目的小说家该是：巍萌、斌子、马阳、马汉、淡如、孟毅、莽原、端木虹、黄叔麟、年红、梦平、梁园、陈孟、雨川、牧羚奴、温祥英、黄戈二、韦西、李学文、李士源、杰伦、黄崖、姚拓、张寒、集文、郑易、高秀等。这批马华小说作者所触及的题材，是相当广泛的，可说是应有尽有，泛写了各阶层的人物；从内容与形式上，多有着其独特的地方。

从早期的1919年到战后的60年代中期，马华小说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可以说在将近46年里，本地写作人一直深受着中国“五四”遗风的影响——那是写作人标榜健康写实，过分偏重于教育功用的时代。这么一来，绝大部分的马华小说作家都偏重于社会改革学说，讲究题材现实，强调主题思想，要求有社会价值和意义；于是，创作目标是在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面，歌颂劳苦大众的战斗精神。有很多时候，这些走现实主义的马华小说家，反而被自己的框框给限住了。

有不少人说过，马华小说最显著的缺点，是在写故事，没有注意到刻画人物，谈不上有什么深度；而且题材不广，加上写得粗糙，不够细致，描写和文字造詣也不高。

评论家忠扬在《文苑纵笔》一书中，曾经毫不客气地说：

“从目前华文文坛的创作水准来看，新马的小说创作，还需要有一个奋起急追的努力阶段，小说家们还需要尽快地提高创作技巧，分析研究自己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或给予扫除，或给予突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小说创作的落后状况；否则坐井观天，闭门自守，满足于点滴的成绩，实在是一种致命的病态，迟早会为迅速发展的小说创作形势所淘汰。”

忠扬这番话言重了，然而任何马华小说作者，都应当为此而反省再三吧。

（四）现代思潮的冲击力

1957年8月杪，马来亚独立了；1963年新、马及沙砂合并成为马来西亚；1965年新、马却分成两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了，此后，“新华文学”脱离了马来西亚。自此，我们谈马华文学自然不包括新华文学在内。

任何作家都不可能避免所处的时代的影响；随着社会急剧改变，经济和工商业更趋发达，原有的旧题材因环境的不同或变迁而消失了，却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值得描绘。这些新题材的广大领域和新的社会形态，都必需用新的文学来表达，任由小说家去开始，更深刻地发掘人性，透过艺术的表现力量，以探究人生的究竟。

进入了60年代初期，年轻的写作人处在一个不断迈进、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之中。他们坦言：马华小说的题材与创作技巧也应有新的趋势。

新派小说家强调小说人物的心灵和精神的存在与活动，却“内在的人”。他劝请现代小说家们，应该凭直觉来渗入人物的内心，把逻辑及时间观念，以及一切传统抛开，让人物任意在自己意识的

川流中浮沉、游荡（香港评论家丁平语）。

自法国的蓝波以还，“现代主义”以及演变到今天的“现代派”，少说也有70多年的历史了。青年作者要求自己的文学艺术能跟时代并进，不要永远在时代的后面去进行摸索与追赶。——他们的这个欲望与做法，当然是没错的。许多国际的著名小说家，不是在意识流的技巧上获得很大的成功么？

①从60年代中叶开始

过去，写实主义的创作主张，是要求艺术应以人生的现实为对象。而现代小说家是向人类最真实的心理世界去探讨人性的真相，而摆脱了“理性”的控制，不再因袭传统的诉诸于理想中所需要的故事。

约略提过了现代小说的基本精神，我们对于现代小说在新马出现，就不再感到惊异了。现代诗人温任平在《愤怒的回顾》一书中说：“马华现代小说大抵是在60年代中叶才抬头的。”此后，马华现代小说由奠基时期、塑形时期到怀疑时期共15年间，经过大批现代文学的爱好者的努力，终于把握了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使马华现代小说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般来说，从70年代中期开始，马华小说作者多半已打破了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藩篱，不再以主义把自己给套住。他们更相信好的小说，必定具备写实与写意这两项素质。正如丁平在《现代小说写作研究》一书中所说的：

“真正的现代主义者的作品，并不是把传统的东西全部都舍弃的，他们只是把旧的东西中已用不着，或不能用的作一次‘批判’的扬弃，把优美的部分保留下来，再加进一些新的东西。”

②现代小说家及其分期

马华现代小说发展至今，已出现了不少的现代小说作家。温任平将“这21年来的马华现代文学……分为几个主要的阶段：即探索

时期（1959年至1964年），奠基时期（1965年至1969年），塑形时期（1970年至1974年），怀疑时期（1975年至1979年）”。

出现在这四个阶段的现代小说作者该是：①探索时期：牧羚奴、芙渠（南子）、张寒、温祥英（山芭仔）、黄戈二、宋子衡等。②奠基时期：麦秀、梅淑贞、李有成、李永平、菊凡、落叶等。③塑形时期：小黑、温瑞安、陈政欣、方娥真、李忆蓀、张贵兴（纪小如）、商晚筠、潘友来等。④怀疑时期：叶淮、张锦忠、何谨、洪泉等。

从80年代初期到今天（1986年12月底），擅写现代小说的写作者该是：傅承得、陈蝶、陈远帆、许友彬、吴维凉、林月丝、陈绍安等。他们多能引进世界各国的文学思潮，写出一代新人的心声，虽然那不是真正地具有大众性的作品。

是的，世界在变，人生在变，富于弹性的小说，自然也有变革的必要。本来嘛，小说的变革，往往正是文化革新、时代进步的先驱。不过，若是要变就变得不仅是与以前的不同，而且要昔不胜今，才是上策。

或许有人会担心一小部分一再强调技巧的现代小说家，很可能为了技巧而失去更重要的东西；不过，从最近小说家菊凡出版的现代小说集《落雨的日子》看来，他的小说内容都是本地的人情事物，这就像另一位优秀的现代小说家宋子衡一样，他俩的小说创作都取材自现实生活，用不同的技巧表现出来。无疑地宋子衡、菊凡及小黑等，已大大的提高了马华小说的水平；内容与形式相合无间，这是他们过人之处。

（五）一个好的开端

自60年代末叶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冲击之后，在我国各地，仍然有不少坚实的小说作者，从不爱标榜，也不在乎个人的创作是否处在支流旁系的地位；然而，他们多认定健康的积极性的文学，才是统领着文学的主流，占着正统的文学地位。于是，他们细心地借鉴海外小说家的现代派技巧，同时尽量向主流国当代小说家的细致、气派和胸怀看齐。他们正在按照文学艺术特殊的规律，创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反映本邦某些社会现象的本质。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么？

在此，我要特别推崇几位马华小说家：潘雨桐、碧澄、林之流、梦平、游牧、雅波、连铜、马汉、萧冰、赵林、沧海、姚拓、云里风、文戈、年红、爱薇、诗葆、丁云、梁放、文征、郑祖，以及前辈小说家韦晕、方北方、原上草等，他们多半很冷静，热爱生活，有各自的看法、定向和价值观，不要技巧，或把自己囿困在某一种文学流派中，但却有时空感，也对表现形式力求多元化，推陈出新。

我们希望马华小说家们，都有一份悲天悯人的感情，深入到实际生活的核心中去，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观察和体验生活中每一次脉搏的跳动，着重于塑造人物，把最有意义的一些生活现象、人物性格等概括和集中起来，根据自己的思想认识，加以艺术的典型化；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自可从80年代末叶开始，提高马华小说的创作水准，让读者在完美的艺术创作中，仍能体现到最深刻和有巨大社会意义的思想。

1986年12月杪初稿

1988年4月中旬重修

【附注】本篇文稿在下笔前，曾参考文学史家赵戎、志扬、苗秀、方修、杨松年、丁平等评论家及本人的著作与单篇文章等，谨此附记。

◎原载于1988年6月5日第42期《香港文学》月刊

◎曾转载于1990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第9期《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



1986年12月27日·新山文艺讲座会上发言

马华小说25年

(1965~1989)

引言

大约在1984年7月间，我曾在一本文学奖作品专辑里，读到这么几句话：

“有人批评马来西亚五百万华人一点也不关心马华文学，我们以为这些批评很粗浅。我们的先辈其实已为我们做出不少牺牲，而且也为我们扎下了根。我们同学很多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华人，而且也是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我们要把眼光放大，去关心及鼓励高层文化。”

——哦，是的，只有粗浅者才会对大马华人做出这样的评语。

事实上，早在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1920年至1925年7月），当时的本地报馆便已开始重视文艺副刊，培养马华写作人材了。几近70年来，本地华裔社会孕育了马华文学，而报章杂志让它顺利地诞生下来；尤其是早期的华文报馆，它对于马华新文学的奠基与发展，居功厥伟。那些报章对于文学界的贡献，是值得赞扬的！

马华文学的发展，一直到了70年代中，才渐渐地受到华人社团的扶持及关照，除了设立“青年文学奖”之外，还主办文艺出版基金奖，让作家申请到出版基金可印行专集。到了80年代末期，多种文学创作比赛由社团相继推出，调整奖金达数千元以上；同时也创办了“马华文学奖”（1989年11月），由这几方面看来，谁敢说大马华人一点也不关心马华文艺？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大马福州社团联合总会青年团暨妇女组已

主办3届的“乡青小说奖”；今年又让《新明日报》和《中学生月刊》协办“青少年小说工作营”——一年比一年举办得更成功、有更好的成绩表现出来。这是多么可喜的现象！

过去，也有人感叹地说：马华社会是一片文化沙漠。

针对这一点，我们也不表同意，尤其是文艺工作者——当我们翻阅已经问世多年的三几套马华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大系》（10册）、《新马华文文学大系》（8册）、《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已出版4册）、《马华当代文学选》（已出版散文选、小说选2册）……等书，我们不能不敬佩过去的写作者，他们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能设法去把握着历史的动脉，奉献了各自的热忱与智慧，为马华文学的枝叶花果而努力，终于有了一定的收获。这些创作成果，不仅刻画了大马人民的精神面貌，而且丰富了国家文化。

大家有幸在一起来回顾和探讨有关马华小说的问题，这机会对于我是珍贵的。主办当局指定的讲题范围是《略论马华小说》，而我缩短了范围——选择《马华小说25年》为讲题。我谨在此，敬请大家指正我的一些浅薄的见解。

马、新华文小说分道开展

战后至1957年8月31日，我们的国家——马来亚独立啦！

1963年，新、马和沙巴及砂劳越合并成为马来西亚；然而，在1965年8月9日，新、马却分成两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了。随着新、马分家，“新华文学”也脱离了大马；此后，我们所谈的“马华文学”自然不宜把“新华文学”包括在内。

到了1990年8月8日，新、马华文文学分家已足够25年矣！这25

年，也是马华文学大事变革与发展的年代。

马华现代诗人兼评论家温任平在《愤怒的回顾》一合集中指出：“马华现代小说大抵是在60年代中叶才抬头的。”——他把1959至1979年（21年）的马华现代文学分为几个主要的阶段，那就是：（一）探索时期，由1959年至1964年；（二）奠基时期，由1965年至1969年；（三）塑形时期，由1970年至1974年；（四）怀疑时期，由1975年至1979年。

可以说，从60年代中期开始，马华小说界新锐的创作，不论在题材、文字及表现手法等方面，多与过去（1919~1962）的有所不同。直到70年代初，他们文笔敏锐的探索人性问题、人生哲理以及伦理道德等，无不拓宽了当地人民内心的深度和生活的广度。“现代主义”既然已成为20世纪文学思潮的主流，而20多年来，台港遍吹的“现代风”又一直都导航着马华小说；留学台湾的青年作家甚至把现代派小说视为唯一可循的创新风格，于是，马华现代小说遂变成时代的产物。

文学思潮的演变

我们都承认：“现代派”是继“自然主义”之后的一支最强大的艺术和哲学的流派。“自然主义”早已在19世纪末期衰落了，20世纪的艺术则由“现代派”取而代之。

从世界各国的文学史看来，任何地区的小说家都无法避免所处的时代的影响。随着当地社会的变革，加上经济与工商业日益发达，尤其在城市，旧有的题材因环境的更换或变迁几乎消逝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却涌现了，值得小说家去挖掘与描绘，许多新题材的广大领域和新的社会形态，都需要你用新的表现手法去表达，才

能更深刻地发掘人性，并透过艺术的表现力，藉以探究人生的究竟。况且，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谁也不能只满足于某种表现形式，或执着于某种技巧；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他必需多方面进行试验，力求充分地运用最适切的艺术表达力。

由于讲究多方面的创新，所以他们被称为“新派小说家”。这批新派小说家侧重于人物的心灵与精神的存在和活动；他们喜欢凭直觉来渗入人物的内心，进而把逻辑和时间观念，连同一切传统都抛开，让人物任意在个人意识的河流中浮沉、游荡……这么一来，新派小说的生活气息比较淡薄了，中心思想变得不明确，跟以反映现实为主的比较正规的途径不一样。

根据温任平的分期与推荐，出现在四个阶段的现代小说家是：

（一）探索时期：牧羚奴、芙渠（南子）、张寒、温祥英（山芭仔）、黄戈二、宋子衡等。

（二）奠基时期：麦秀、梅淑贞、李苍、李永平、菊凡、落叶等。

（三）塑形时期：小黑、温瑞安、陈政欣、方娥真、李忆蓀、张贵兴（纪小如）、商晚筠、潘友来等。

（四）怀疑时期：叶淮、张锦忠、何谨、洪泉等。

——1980年12月间，当我为《马华当代小说选》写《导论》时曾说过：

“把过去20年（1961~1979）的马华小说作者分为‘现代’或‘非现代’之流派，同时指出他们是属于哪一时期的小说家，这等做法未免大胆一点，也很可能有错误的地方；然而总的来说，这对分析某些作家的小说，自有方便之处，所以还是贸然地划分下来。”

如今，10个年头过去啦；在80年代里，现代小说家更着重于心理的意象描写。他们的再出发，更令人刮目相看。不过，小说界的新锐多对“传统主义”有着激动的反叛，同时多师心自用、独出新

意，各自表现各自的独特风格。小说自然成为他们用文字描绘出来的活动世界。

香港的评论家丁平在他所著的《现代小说写作研究》一书中指出：现代小说的特色，就是人物心理上的“意识流”，以及由意识的流动而把“时间”、“空间”予以压缩在一个平面上的以“空间”为基准的小说。……“现代小说”到今天，仍在演变着……用“意识流”来划分“现代小说”的疆界，显然不是一块适当的“界石”了。

因此，我们始终认为温任平在上述的4个阶段所推荐的现代小说家，并不是一个确切无可非议的“定论”。——有些原属于现代派的小说家未能被推荐，而有极少部分已被列名者却写过更多的写实派小说作品。

更有趣的是，有些当代小说家不喜欢自承是某个流派的作者，而且表示不晓得自己是某个流派的追随者。因此，当我们进行调查的时候，每每也得不到某小说家是属于哪一个流派的正确答案。

如果也让我们来把从1980至1989年分为两个阶段的话，我这不确切的看法是：（一）定向时期：由1980年至1984年；（二）再出发时期：由1985年至1989年。在“定向时期”里，比较有代表性的现代小说家该是：陈蝶、许友彬、陈远帆、林月丝、吴维凉、傅承得等。在“再出发时期”里，较为有代表性的现代小说家该是黄锦树、李恒义、杨川、鞠药如、岩沐、陈绍安、马威辉、陈文瑞、雨子、林慕红、夏绍华等等。

在这25年间，原已成名而且表现不俗的马华现代小说家如宋子衡、温祥英、菊凡、李永平、张贵兴、陈政欣、梅淑贞、商晚筠、温瑞安、小黑和洪泉等，他们在7、80年代里，都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小说是他们用文字虚构的一种生活历程，作品中的艺术已与时代并进。尤其是李永平、张贵兴和商晚筠，他们的小说创作也已经

扬名台湾哩！而小黑、陈政欣和洪泉，是当前最受瞩目的小说家。他们3人的小说创作，不仅开拓了新境界、求新与求变，而且富有社会意识，确实是一种很有创意的表现。

坚实路线上的阵容

记得我曾经在一篇笔谈文章《在文学的小路上迈大步》（1985年6月2日南洋商报《文星》副刊）里写道：“严格来说，我们的马华文学，在艺术创作上失败的多，技巧达到了化境的少，传世之作简直是‘凤毛麟角’。此外，马华文学作品还欠缺一定的文学风格，这包括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和阶级风格。因此，不容易找出它显著的一些特征。”

当时，个人的要求是高了一些；顺便在此略予增补。

从60年代中期至今的25年间，在马华小说界，坚持着现实主义传统的小说家仍大有人在；可喜的是，写实小说家多不会是照相式、镜面式的反映。诚如旅台作家陈慧桦在《马新留台作家初论（上）》（1988年10月号《蕉风月刊》第419期）一文所说的：“写实早已包孕了内在心灵的刻画，个人生活梦幻虚实的杂揉，河水岂能倒流回来反映早被揉碎的影子？”

个人最推崇的就是那批坚实的小说作家，纵然很多人正在追逐时髦，口口声声强调“现代主义是20世纪文学思潮的主流”，可是他们只认定“小说是描写人的艺术”、“小说的世界就是现实人物的世界”；于是，他们不喜欢标榜，也不在乎自己的小说创作是否被处在支流旁系的不利地位，只坚信健康的积极的作品，才能统领着本地文学的主流、占着正统的文学地位。

这么一来，那批坚实的小说作者甘于默默耕耘、多读多写，细

心地借鉴港、台和大陆小说作家的创作技巧，同时向国际名家的细致、气派和胸怀看齐。他们长期遵循着文学艺术特殊的规律，创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反映了当地某些社会现象的本质。

我尝试将这25年（1965～1990）分为3个阶段，并推选几位代表性小说作家的如下：

（一）建国与彷徨时期（1965年至1975年）：在这10年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写实小说家计有：韦晕、方北方、原上草、巍萌、黄崖、梁园、游牧、马汉、梦平、端木虹、淡如、陈孟、碧澄、雅波、年红、姚拓、郑易、高秀、孟沙等。

（二）忧患意识时期（1976年至1980年）：在此5个年头里，具有代表性的写实小说家该是：潘雨桐、郑祖、连铜、驼铃、紫曦、文戈、丁云、爱薇、文征、钟羔羊、江水、融融、方野、湘云等。

（三）社会功能时期（1981年至1990年）：在这10年间，表现得比较优异的写实小说家该是：梁放、诗葆、雷健恩、曾沛、雨川、林思维、唐珉、黄慧琴、毅修、李天葆、洪金春、孙彦庄、张玉怀等。

上述多位马华小说作家，如韦晕、方北方、原上草等数十年来驰骋于马新文坛，从不间断，为马华文学贡献良多。读韦晕的小说作品，你可以知道本地各个时代的风貌，以及各个时代的特征；同时也反映了韦晕在各不同时期的创作历程。韦晕和方北方的小说作品，在中国也有了受邀出版的机会，足见他们已扬名神州，为马华文坛争光不少。

早在50年代中期已开始投稿的潘雨桐，是70年代末期最杰出的小说家；读他在台北出版的两部小说集：《因风飞过蔷薇》和《昨夜星辰》，不仅反映了时代和社会，也表露了社会、报道了社会，甚而表现了人生。在这么一个时代里，在一个种族政策强烈的气氛

中，他对许多人物所做的描绘，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他在台湾，也拥有了不少的读者。

能够使用多种语文写作的碧澄，他的小说作品不单内容好，技艺方面也兼顾。细心的读者，你不难在碧澄的一些短篇小说中接触到“国家意识遭受挫折之后，随之而来的忧患意识”。梦平、驼铃和郑祖等的小说，都是根植于广阔的现实生活之作。

从梦平的中篇小说《深芭行》和短篇《西归又南飞》等创作中，读者自然可以体味到知识分子在70年代所承受的苦闷及压力，而年青护士选择移民南飞的无奈处境……

小说家雨川写作已有32年，然而他在80年代末期的创作表现更为突出，作品的内容依然坚实，表现手法却转向多样化，例如短篇小说《红树林的鹰》，即是一个好例子。

力求内容与技巧融和

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人生也在变；富于弹性的小说，当然也有变革的必要。连现代艺术，也在现实的环境中激烈地在演变着。留学台湾的写作人陈俊华在《谈历届得奖作品中的“乡土意识”及写作技巧的问题》一评论中分析道：

“战后，从50年代开始，华人的中国政治倾向逐渐被马来西亚国家意识所取代。独立后，华人那种‘身在海外心在汉阙’的移民心态，可说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不仅仅是国家意识，还有国家意识遭受挫折之后，随之而来的忧患意识。……从此，华人一直都生活在隐忧重重的氛围里。华人一方面表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观念，另一方面却对现行制度和政策上的偏差深感不满，于是情感和理智便产生不平衡的状态，有赖于多元民族共同建构的国

家意识或国民意识也因此遭受挫折。……（《大马青年》第7期·1989年7月）”

已步入中年的小说家雅波，也在小说集《焚烧一卡车的愤怒》（1987年10月出版）的后记中写着：“近年来，我的创作观念、风格与题材一直在变动，因为我早已跨过了织梦的年龄，对于四周所发生的事，不能再无动于衷或视若无睹，必须忠实的反映出马来西亚社会的真实情况，绝不能昧着良心去粉饰太平或掩盖事实。……”

雅波也在《焚烧一卡车的愤怒》一书的《代序》中写道：“……华巫印等写作人，应摒弃狭窄的种族观念，努力摆脱政治人物言行的干扰，同心协力去创设一个不分种族，不分语文以及不分界线的真正和谐与亲善的马来西亚社会。”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原来就是息息相关；经过多名小说家如雅波、梦平、丁云（详见他们3人的最新小说集《蓝天、逐渐褪色》、《黄梨成熟时》和《下一站，贝谷村》的序文与后记）等的吁请或强调后，今日的马华小说，多半使人感觉到有股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内容丰富沉稳，敢于正视某些社会问题。——1980年12月，我在《马华当代小说选》（1984年7月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的《导论》中写道：

“展望80年代的马华小说创作，发展的潮流是怎样的呢？前期的走在两条主要的小说路线上的作家将往何处去？……可以先断言的一点，就是今后的小说作者，自会避免以往过分的西化、膜拜式的接受外来文学思潮，改为批判式的吸取，才能获取养分，化为自己的血肉。作者们不至于再主观地粉饰现实、歪曲现实或无视现实，当可加强思想深度，并力求技巧与内容的融和。大家使用同一种语文来创作、来表达，以期使自己的小说深度和涵盖面真正扩大而成为伟大的创作，可以在世界文坛上竞耀生辉。……”

我10年前的预言，证诸80年代马华小说家各方面的成就，我们

对今后的马华小说家的收获有了更大的信心。

当前小说界的“三衰六旺”

展望未来，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现阶段的小说发展动态。现有的客观条件，加上小说家本身的勤力，今后必将呈现新风貌。

当前的马华文学界，诚然是空前的热闹与蓬勃，不过也有一些令人杞忧的地方。从几方面来看，马华小说界正有“三衰六旺”的现象，那就是：

①绝大部分上了年纪的马华小说家，尤其是60开外的老作家，多已封笔不写小说了。这是第一个衰落的不良迹象。

②现阶段的马华小说作家，所创作的多数是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极少进行中篇或长篇小说的创作，势必造成马华长篇小说更歉收。这是第二个衰退的现象。

③目前的各报文艺副刊编辑，似乎越来越不喜欢选刊5千字以上或1万5千字以内的小说作品，却偏爱刊登极短篇小说。这样必然会影响小说作者的创作兴趣。这是第三个马华小说作品衰减的现象。

至于马华小说界的“六旺”，我们可将它列为：

①报章的文学副刊普遍增加，3、4千字以内的短篇小说比1989年之前有更多的刊载机会。②目下的小说类型多，小说家除了勤写极短篇之外，也可撰写科幻小说，不愁没有发表的园地。③小说创作比赛增多，而且奖金极高，直接地刺激青年作者勤写。④社团设有小说出版基金奖，而目下的报社增设文学奖，奖金优厚，小说作者更乐于冲刺。⑤目前的文坛活动增加，小说作者交流的机会倍增，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创作力也旺盛了。⑥除港、台外，马华小说作

品也有机会在中国刊登，流传得更远。——你说，今日的小说家能不乐观么？

1990年10月26日午后·可冬小筑

◎本文曾转载于1991年2月第47期《香港文学》（香港）



左起：新加坡国大副校长康长杰夫人、丁云、陈蝶、李忆蓉、梦平、何乃健。后排：梅筠（1995年9月9日·新加坡）。

90年代前期马华小说丰采

(1990~1995)

前言

随着80年代的结束，马华文学正走向世界；90年代是个重要的新时期，所有的马华文艺工作者自当充满信心，加倍努力，立足本地，放眼海外，冀期自己的文学创作，有朝一日能冲破国界，最终可被世界文坛所认可。

马华作家对90年代的到来极表欢迎，反应亦敏锐。在90年代即将降临的一天（即1989年11月19日），由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马华文学节文学研讨会”，主席云里风就在致词时强调：

“马华文艺自1919年发轫以来，所走的一条迂回曲折、崎岖不平的道路，文艺工作者面对着无边的孤单与寂寞，前辈们本着拓荒的精神，不断地在这块贫瘠的园地上披荆斩棘，耕耘播种，现在这些种子总算已经长出幼苗，而且还渐渐茁壮，今后怎样去施肥、灌溉，使它开出灿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便是我们当前所要负起的责任……”

东马名诗人吴岸也在《新时期的马华文学》一文中指出：自90年代开始以来，随着马来西亚社会与经济的迅速变化以及国际形势的改观，具有70多年发展历史的马华文学，正处于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全新时期。……几年来，马中两国作家相互访问日见频繁，文学的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这种形势将不可避免对今后马华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详见《90年代马华文学展望》，1995年5月出版）。——从多方面看来，马华文艺工作者多已迈步

向前了。

1、现有的自觉性不够

举凡从事文艺创作的工作者，都有极高的自觉性——自动自发；为了文艺每每做出一定的牺牲，这种例子在每个年代里都有，尤其是马华文学初期和抗战期间，无数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发表文章、搞文艺刊物和推动文运，非但常无稿费可图，还得自掏钱包，甚而还有“文字狱”的危险。然而，很多作家为了崇高的目标，进而肯定文学对群众所产生的影响，直接负起时代的使命，所以决心自愿为马华文艺贡献一己的力量。

数以百计的这类战前文艺作家，他们的所作所为，怎不令人钦敬呢？

这里就以从战前一直到战后初期仍继续写作的张天白（他就是写文学评论的丘康或马达，写短篇小说的张晨）来说吧，早在1930年8月间，他从广东平远县来到马来亚芙蓉，就开始在《星洲日报》、《雷报》（李西浪主编）和《益群报》、《槟城新报》、《星槟日报》及《新国民日报》等写杂文、社论和小说等。据张天白约于1981年给我的回信，他在1934年以前发表文章是没有稿费的。到了1934年，才由《星洲日报》首倡发予作者稿费；后来各报都相继发稿费，但是1千个字的稿费只是1元或5角钱罢了。注①

我们再以原名李公仪的李梅子作为例子吧，李梅子也在1981年11月从广州回信告诉我，他从1928年起，旅居新马21年。1929年中，他与罗依夫（李梅子和罗依夫均为20年代末期的小说与新诗作者）合编《奠基》半月刊，附在《叻报》出版，大力提倡新兴文学。李梅子当时是在新加坡平民学校任教，后来转任吡叻和丰兴中中学校

长多年；像李梅子这么忙碌的人，却能抽空撰写不少的文艺作品，也翻译过一些童话，还从事音乐创作。注② 李梅子和许多同个年代的本地作家为推动马华文学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是一般70、80、90年代的写作人难望其项背的。

由于众多战前马华作者的努力耕耘，所以战前马华文学各种文类的作品都不乏优秀之作。重读早期写作人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中的佳作，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

纵观80年初期开始至90年代初期的马华文学创作，其水准并未臻理想。由于多个社团和报社及刊物举办征文比赛，所以多位新秀或杰出青年作者都通过征文得奖而登上马华文坛，3、5年后逐渐成为优秀作家。

由征文获得优秀奖，加上屡次夺标，提高个人的知名度，终于成为知名作家，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作家成功历程。可是曾听过一些青年作者表示如没有举办奖金优厚的征文比赛，便失去了创作的冲劲，甚而形成“没奖金、没稿费、懒于动笔”的心态，那就不是务实的写作态度。至少，他们的自觉性和忠于文学创作的精神，已大大不如昔日的作家了。

我们也不难发现有十几位马华青年作者，既已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平时不勤动笔，只有在奖金高的大规模创作比赛举行时才上阵，志在赢取优厚的奖金。若是马华青年作家都抱着这种态度来从事文学创作的话，令人担忧的是本地文学作品无法普遍地提高水平。当然我们同意小说作家小黑所说的话：“文学创作当然不必为奖金而进行，但是崇高的文学奖不可否认，却是社会对文学创作者的一种具体回馈，深具激励的作用。”注③

诗人吴岸在一篇评论文字《马华文学的再出发》写道：“曾经抱怨华社冷漠与不关心的马华文坛，近几年来情况已经很大的改善。马华作家的地位似乎已经提高，不少的乡团热心资助文艺创作比赛，

奖金也相当丰厚，各地都有文艺研讨会或文艺营活动。从文学社会的观点来看，这种客观条件的改善，大大有利于马华文学的发展。然而从这些年来马华文学作品歉收的情况看，现阶段的马华文学实际上还是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现时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不少的作家比较热衷于文学的社会活动，而不热衷于文学创作，所以几年来，文学活动虽然频繁，马华作家创作的成就，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是差强人意。”

吴岸的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是值得所有本地写作人，尤其是青年作者省思的。我们原是对90年代的马华文学充满信心，断不能由于上述所说的因素而使文学创作停滞不前。

2、六年来文学活动多

从1990年直至今年（1995），90年代将过了6年啦。

6年来，马华文学的各类作品，其丰收的情况是值得介绍的。

以整体来看，早从80年代末期开始，马华文艺界便显得活跃和蓬勃，到了90年代初期——就以1991年来说吧，促进马、中文学交流、颁发文学奖和举办创作比赛等鼓励创作的活动，显得更为活跃与蓬勃，“不过方式没有特别显著的变化，像前几年一样，一般重点不外是讲座或文艺营，以及创作比赛或文学奖等等。反而是文学交流活动比较频繁，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注④

过去的文学集会并不普遍，然而到了90年代初，举行文艺营和讲座会，或举办研讨会、交流会、座谈会等等，几乎遍及全马各地。例如在1991年度里，最大规模的文艺营是在吉隆坡由《星洲日报》所举办的“花踪国际文艺营”，号召力强，影响力也大。其它比较

小规模文艺营计有：（一）全国青年文艺营——由大马青年作协和马青总团文化体育局联办。（二）“诗的约会”文艺营——由《中学生月刊》和居銮中学联办。（三）第4届青少年文艺营——由笨珍文艺协会、南马文艺研究会和笨珍华校教师会合办。（四）青年之友生活营。（五）佛教写作人工作营。（六）全国中学生文艺工作营和（七）基督教写作团契举办的写作营等等。这些文艺活动散布全马各城镇，对地方性的文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单在这一年（1991），来自海外的著名作家就有多位在全马巡回演讲，例如中国大陆小说家莫言和王安忆、香港政论家李怡、台湾小说家黄春明和柏杨、诗人痖弦，旅美小说家于梨华等，他们的演讲会对推动文艺都有一定的作用。

有关的机构或单位为了配合文学而举办的作家交流讲座会如：“从华小开始播种”、“赵淑侠讲座会”、“海内存知己”、“面对90年代的华文文学”、“专题讲座会”、“边缘文学”、“文学女人的情关”等，都吸引了不少听众和观众。由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主办的“面对90年代华文文学研讨会”，是于1991年11月23日举行，值得一提的是主持人有来自邻国新加坡的作协长黄孟文、锡山文艺中心主席团成员秦林、东马砂华作协秘书李采田、诗巫中华文艺社秘书黄国宝等区域文艺团体的领导人。黄孟文主讲的《90年代的新华文学》、孟沙主讲的《马华文学90年代的冲刺》、年红主讲的《面向90年代的马华儿童小说》、林云龙主讲的《马华华文文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一点观察》，和黄国宝主讲的《拉让盆地的文学经验》等，讲题都蛮有意义，并对90年代寄予厚望，大家展望未来，无不充满信心。当时的大马华文作协秘书孟沙，就曾在他的讲题中强调：“华社华团介入发展马华文学的行列，是马华文学界之福。……而华团与文学团体合作推展马华文学，最突出的事例，应算马华文学节了。……像‘90年代马华文学出版基金’，若不是热心的商界慈

善家慷慨解囊，也不可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筹到数达10万以上的巨款。”注⑤

孟沙在该讲题的结语中指出：“回顾过去，瞻望将来，马华文学是有前途的。不管是站稳岗位、自始至终在默默耕耘的资深作家，还是刚刚起步的新一代写作者，90年代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准备做出新的冲刺之前，我谨祝各位好运。”注⑥

90年代转瞬间即将进入第6个年头；依我个人观察，能够交上“好运”的马华小说作者并不多。正如小黑在“得奖感言”中披露：“过去几年，小说写得比我好的朋友都渐渐隐退了。一代又一代，社会对文学如此冷漠，好朋友的名字都快要成为历史上的黄花了。”注⑦

许多文学界朋友在研讨会上都相继表示：华团和文学团体正大力推展马华文学，本地写作人应好好地利用当前大好局势，配合世界性的“华文热”，加强主观方面的努力，在国内尽力达成马华文学纳入国家文学主流的愿望，对外则与海外各地华文文学建立联系，促进文学交流，从而开拓视野，为马华文学注入新的生命，进一步提升马华文学的质量，以回馈社会的关怀和保护。这也是任何一位有良知的马华作家所应有的社会使命感和历史任务。

在这方面反省，马华写作人的努力还做得不够。大家理应不时提高各自的醒觉性，在90年代仅剩短短的4、5年里，应加把劲地为马华文学耕耘。文学界的朋友也应该以此共勉。

3、已无“写实”与“现代”的论争

好几年来，有三几位研究马华文学的华裔写作人，在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和把马华小说译成马来文之后，都先后表示马华小说作品的质量已落在马来文小说之后，好多马华小说已越来越远离固有的

传统和大马的社会现实。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就很难创造出具有民族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的艺术形象。这当然是90年代马华小说的一大弱点。

针对这一点，诗人吴岸就曾这样地评论：“现阶段的马华文学，存在着两种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第一种趋势是文学作品社会性低，第二种趋势是马华文学的独特性逐渐消失。”（吴岸著《马华文学的再出发》）

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经常发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文艺论争，到了80、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初期，这类的笔战论争似乎完全消失了。是的，我们同意台湾专业作家兼学者林耀德所说：

“不论是任何一个华文文学区域，一向来都有所谓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分，也有所谓左右派斗争的问题。这任何一个区域都会面对的，包括菲律宾，它的文坛里也有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同时有左右派的问题出现。大马、台湾、大陆都是如此，几乎我们脱离不了这种问题。因此这种争论性问题我们应该超越出来，把它当成到了这个时代已经成了不是课题的课题。”注③ 可喜的是，今天的马华文艺作者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超越”。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仍然要适时强调，比如吴岸所说的：“如果马华文学要真正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立足，我认为它应该避免马华文学的中国化（或台湾化）。目前马华文坛上已经出现一些内容与形式上与台湾文学相仿佛的作品，这些作品，即使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程度，在性质上也还是与马华文学有一定差别的。”注④

我们很高兴见到一路来几乎高达90%刊登现代文学作品的《蕉风》双月刊，在90年代初期也发表了一小部分属于写实主义的小说作品，而且替几位前辈小说家如方北方、韦晕和姚拓在《蕉风》双月刊出版专辑：“长者风范·方北方专辑”刊于第452期（1993年1、2月号）、“长者风范·韦晕专辑”刊于第455期（1993年7、8月

号)、“长者风范·姚拓专辑”刊于第457期(1993年11、12月号)。是的,方北方是永远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作家,是马华文坛上创作成果最丰硕扎实的小说家,同时他的胸襟开放,所以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同侪或后辈略有所成,他都会加以赞赏。而韦晕是从未停笔的杰出小说家,小说结构严谨,表现手法极富艺术水准,人物形象生动,多姿多彩,而且他勇于揭示马华社会的真实面貌,反映大马的文化色彩。至于姚拓,40年来,他一直默默地资助、维持《蕉风》的出版,永远怀着崇高的文学理想。我们阅读姚拓的小说创作如《姚拓小说选》(“蕉风文丛”,1992年再版)等专集,自会承认他是不同凡响的作家。

4、当前活跃的小说群

约于1984年7月,由我编选的《马华当代文学选》(第2辑,小说)出版了。当时,总编辑温任平嘱我在小说选集中收入60年代至70年代20年来的小说作品,结果共有54位小说作家的作品入选。

注⑩

这54位60、70年代的马华小说作家,到了90年代初期仍常有小说作品见报或出版,只有大约26位,48%罢了。长期以来极少封笔而有相当成就的当代小说家,该是韦晕、方北方、姚拓、原上草、云里风、驼铃、张寒(张弓)、潘雨桐、马汉、年红、碧澄、孟沙、林之流(杭冬)、陈政欣、李永平、温瑞安、雅波、小黑、李忆蓓、商晚筠(已故)、张贵兴、郑祖、丁云、洪泉、梦平、雨川等。而表现最优异的小说作家当推小黑、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雨川、雅波、陈政欣、碧流、林之流、李忆蓓、孟沙、年红、丁云、郑祖等等。

旅居台湾的李永平和张贵兴这二位名小说作家,他们近年的创

作，无不赢得热烈的掌声。李永平的新著《海东青》，已然使他成为当前小说界的巨人，不仅对小说作品的表现独出心裁，而且对艺术技巧操纵自如。

跟李永平同样的来自东马砂劳越州的张贵兴，素来以文字典丽、情节精采见称。张贵兴于90年代初期所出版的长篇小说《赛莲之歌》（1992）和《薛理阳大夫》（1994），先后都引起读者界的阵阵震荡，超群出众的创作才华，令人赞叹。

在西马这段新时期（1990~1995），较引人瞩目的小说单行本，首推小黑出版的小说集《前夕》（1990）、《悠悠河水》（1992）和《白水黑山》（1993）。小黑的作品被公认为简洁俐落、情文俱佳，敢于用不同的叙述形式来创作，而且文字和结构也很有气魄。中国书评家钦鸿赞誉《白水黑山》“以恢宏的气势，博大的视野，反映了从3、40年代抗日斗争直至进入8、90年代这样一段悠长历史时期的风云际会、悲欢离合、沉浮曲折，塑造了一大群各具性格而无不深深烙印着时代痕迹的人物形象，读来给人以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沉重感。”（详见钦鸿著《海天集》，页109）

商晚筠（已故）在台湾出版的小说集《七色花水》（1992），也像她第一本书《痴女阿莲》一样的甚获好评。这位英年早逝的杰出小说家，善于布局情节，主题是多方面的，刻画人性尤其深入。其作品的内容、内涵和技巧都达到相当的水准。

在同个时期，韦晕出版的小说集《日安·库斯科》、雨川的《埋葬了的鲜花》、丁云的《焚给泥土》（1993）、孟沙的中篇小说《灯火阑珊处》（1991）、年红的微型小说集《少女图》、陈政欣的《山的阴影》、雅波的《谁在黑雾中熄灯》（1991）、李忆碧的《痴男怨女》、碧澄的《南渡》（1990）和《退休》（1993），以及洪泉的《欧阳春》等新书，都是较受读书人欢迎的90年代前期（1990~1994）的本地小说作品。

在这一段时期，跟以往30余年来的《蕉风》作者阵容大致相同，总有一些热诚而认真的创作者，默默地在这份双月刊耕耘——发表了好多可读性颇高的小说作品，例如黄锦树、许友彬（瘦子）、雨川、宋子衡、温祥英、潘雨桐、鞠药如、夏绍华、叶明、李国七、李天葆、杨川等等。在这批小说作者群中，有几位是年青写作人，他们勤力地创作，作品的发表率亦高，不到5、6年光景，即已提升了个人在文坛上的文学地位。任何一位创作者若不断地以不俗的文学作品作为攀登文学地位的阶梯，都是最正确而令人尊敬的具体表现。我们冀期小说界冒现更多这一类的实力派小说作家。

至于在90年代前期表现优异或在这段期间崭露头角的小说作者该是毅修、曾沛、庄魂（洪金春）、梁放、融融、宋志明、艾斯、朵拉、文征、微风、凡民、陈文瑞、许友彬、李天葆、北淡云、邱碧茵、田风、唐珉、岩沐、萧洋、蓝波、柏一、叶蕾、野蔓子、戴小华、曾丽连、马盛辉、廖宏强、孙彦庄等。

先后获得好评的小说专集，计有：黄锦树的《梦与猪与黎明》、唐珉的《津渡无涯》、毅修的《辗转》（1993）、曾沛的《行云万里天》（1992）、郑祖的《讨海人》（1990）、许友彬的《一根头发》、鞠药如的《猫恋》（1992）、柏一的《粉红怨》、李天葆的《桃红秋千记》、朵拉的极短篇集《行人道上的镜子》、萧洋的《暮色渔村》（1993）、孙彦庄的《火车厢内外》、盛辉的《赞美一座城市》（1994）……等单行本，都普遍受到读者群的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内，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家该是黄锦树、李天葆、柏一、毅修、庄魂、岩沐等位。

黄锦树“这位90年代前期旅台文学苍穹中最早出现的一颗新星，仿佛已经‘预设’了构筑其创作生命的两条座标轴——移民的身分认同与马华文学史的‘经典焦虑’。他吸收了流行于台湾的后设小说技巧，在标志他大量焦虑的座标上游移其关怀的焦点……”注⑩

他具备多样的根柢，而且勤奋创作，自然成为了马华文学界期待的一颗巨星。

李天葆的小说作品具有不俗的独特风格，其“文字空灵跳脱，情境如画如诗。象征手法运用高妙，写描花的心理，异常深细，真是个淡墨深情。……其每段每行出现的事物皆带有象征性，自然浑成不造作。把人物强烈的感情用‘淡’笔写出，但深沉蕴藉，反而产生强烈的震撼。”注⑮

柏一这位在60年代出生的优秀女小说家，在90年代初期得创作比赛优异奖更多，已完成的2部长篇小说《黑恋》（已在台北出版）和《画城倾情》，在在显示着她可在小说的星空中飞得最高最远。

早在80年代末期就脱颖而出的毅修，于1993年4月出版小说集《辗转》。毅修“是一个面向生活与对社会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学青年，他试图以自己的直观与单纯的理解，通过稍嫌人为化的戏剧性小说效果，来诠释国家、社会、民族、家庭、乃至人生等重大的课题。他似乎选择了超乎自己所能负荷的社会题材和主题。但他正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做着很大胆的尝试。”注⑯

庄魂似未出版过小说集，但他的创作才华洋溢，早已引人注目。他的成名作《梦过澹台》荣获第一届“花踪”文学奖小说组冠军奖。决审委员陈瑞献认为《梦过澹台》，让大家仿佛看到创作未知地带的光芒，作者有大作家的潜质。另一决审委员英培安则认为这篇小说在文字雕琢方面很下功夫，是现代派的写法，人性刻画也极深入。

本名陈仰庄的岩沐，小说作品虽不多，然而她的构思新颖，意象纷陈，文笔细致、和谐。岩沐的得奖佳作《圣洁娃娃》，是用意识流手法探讨反常的性心理。决审委员陈瑞献认为《圣洁娃娃》常有神来之笔，比别的参赛作品都好。

以上6位较有代表性的青年小说作家，他们已经具备优越的创作条件，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寄望也更加殷切。

5、三大流派60多位小说家

我们同意孟沙在《马华小说沿革纵横谈》一文中的论述：

“回顾过去70年历史，马华小说从战前的五四型现实主义路线，到战后大量注入本地色彩和吸收现代主义的优良成分，开拓现实主义更为宽广的踏实道路，使马华小说更具特色和风格。事实证明，写实和现代两派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一味服膺某个流派或完全否定别的流派的做法，是不足为训的。马华近代不少优秀小说创作，作家追求内容形式在艺术上完美结合，实际上就是写实现代的相辅相成。”注⑭——一般来说，当代马华小说作家多深切理解这一点，而且已经落实进行，因此有多位优秀作者已是内容与形式在艺术上完美结合的实践者，我们姑且称这类小说作家为“融合边缘主义”者。

若是容许我划分所谓派别的话，大概可分为3大类，各流派的当前小说作家，较为活跃者计有：

（一）写实主义：韦岸、方北方、姚拓、原上草、云里风、梦平（丘岷）、马汉、年红、孟沙、驼铃、雅波、方野、爱薇、毅修、微风、曾沛、萧洋、古寅、艾斯、柏一、戴小华、丁云、凡民、融融、英仪、文征、马夫之、端木虹等等。

（二）现代主义：宋子衡、菊凡、小黑、陈政欣、温祥英、李永平、张贵兴、温瑞安、许友彬、商晚筠（已故）、洪泉、杨川、夏绍华、陈蝶、黄锦树、张锦宗、叶谁、梅淑真、陈文瑞、鞠药如、廖宏强、欧文林等等。

（三）融合边缘主义：潘雨桐、碧澄、李忆蓀、雨川、唐珉、梁放、庄松华、朵拉、李天葆、郑祖、麦秀、张寒、李国七、岩沐、庄魂、潘友来、林之流、马盛辉、孙彦庄、林春美等等。

在当前的马华小说界，虽则在90年代前期多位小说作家的创作

表现还不算理想与满意，然而，我们仍然深具信心。既然有超过60位小说作家还常执笔写作，在未来4、5年间，必有另一番丰硕成果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盼吧。

1995年8月20日午后·马星国

附注：

注①——详见马岩编著《新马华文作家群像》（页11·1984年1月新加坡风云出版社）。

注②——同注①，页212。

注③——得奖合集《秋千，落花天》（页218·1990年10月大马福州社团联合总会青年团出版）。

注④——李锦宏《1991年马来西亚华文文艺活动》（页23·1992年12月《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35期）。

注⑤、⑥——孟沙著《风砂路上》（1994年12月雪隆海南会馆出版，页100-101）。

注⑦——同注③，页219。

注⑧——林耀德《华文文学未来发展的根源》（《马华文学》，页19·1995年1月出版）。

注⑨——吴岸《90年代马华文学展望》（1995年5月出版，页10）。

注⑩——马岩编选《马华当代小说选》（1984年7月马华文化协会出版，见“目录”页）。

注⑪——黄伟胜《大马舞台文学的星空》（1995年7月18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副刊）。

注⑫——司马中原、郑明娟评语（1990年10月28日，大马福州社团联合总会青年团出版《秋千，落花天》）。

注⑬——吴岸序殷修小说集《辗转》（1993年4月，大马华文作协出版）。

注⑭——同注⑤、⑥，页29。

①转载自1996年 Uni Press 出版《马华文学新成就新方向》一书，曾于同年9月略予修正。

《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导论

大凡各国的文学，都有它各自的背景源流；马华新文学根植于新马社会中的华裔社会，由当地特有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精神所形成。它自然是华族同胞高度的精神表露。

若要追溯马华文学的胚变，揭露其发展史的风貌，我们不能不提中国五四运动；它是该运动发展一个小环节。早期的马华社会很快地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文学创作当然不例外。故此，马华小说作者的创作一开始就反映了本地的现实生活，和注重地方色彩。当时的文艺工作者都关注民族前途、政治经济、民生问题，乃至社会的一切；而这关切，出自内心，发自诚意，是表达，而不是传达；他们献身的精神是应予赞扬的。

马华文学史家方修说：“马华新文学诞生之初，已经出现了很多创作，真实地反映殖民封建社会人民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的要求改变现实的思想愿望。如陈桂芳的《苦》和《人间地狱》……”^①今日的我们，阅读了早期的马华小说，觉得一般上的短篇不具严格意义，但“地方色彩”却是它共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谓地方色彩，根据已故新马著名小说家苗秀说：“‘地方色彩’应该是指一个特殊地域的现实生活底透视及其反映。所以，凡是忠实地反映当地现实生活的马华小说创作，就必然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②

战前，道道地地、土生土长的马华小说作者为数不多；关于这点，新马文艺评论家赵戎说过：“大约是从1930年到1942年春日军攻陷新加坡为止。这一时期里，马华文学运动可谓十分热烈的，参

加这一时期的文学工作者几乎有90%是中国来的文人，这是其中的一个特点。”^③ 当年的这批中国文人，都具社会代言人的意识，特别着重民族主义思想的昂扬。南来后，他们很快地便直接介入现实社会，善于开拓生活境界，提高思想分析能力；新文学代表新思潮，他们选择了小说创作来装载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多半是以反侵略、反战争及殖民政府为主题。比如在30年代就以长篇小说《浓烟》饮誉文坛的林参天，就曾在60年代初期承认：“我的作品大多用新写实主义方法的，内容材料具有充分的现实性。”^④ 过去的马华小说作家，所立下的闪闪生辉的里程碑，其中便有不少闪耀着新写实主义的思想。这是传统的马华小说的特色之一。

从战前马华文学的萌芽到战后60年代中期的茁长过程中，马华小说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一直深受着中国“五四”遗风的影响——那是文人标榜健康写实，过分偏重文学教育功用的时代。因此，一般的小说作者都偏重于社会改革学说，讲究题材现实，强调主题思想，将社会现象和问题极端化，小说人物却简单化；创作目标是在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面，歌颂劳苦大众的战斗精神。当我们读了《马华新文学大系（一）》和《战后（二）》（小说一集），以及《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共5巨册小说选之后，不能不承认在60年代中期以前的新马华文小说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已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小说作者忠实地把人民心中的问题反映出来——在作品中加以提示。在马华小说发展史上，最鲜明拓展而有丰硕收获的，当然是非现实主义的小说莫属了。

我们概括地回顾60年代中期以前的马华小说风貌，目的是说明马华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是这样沿袭下来的；直到现今，仍有不少的小说作者在发扬它。比如云里风、巍萌、端木虹、年红、张逸萍、孟沙、紫曦、诗悌、凝秀、郑祖等就是。

有人曾批评道：“海外的文坛不成气候，虽受大陆和台湾的影响，但反应微不足道。一般趋向，仍是拾取五四以来，到30年代文学思潮的馀绪”^⑤像这种论调，固然是太武断，可是我们也得承认它有多少的真实性。

事实上，早在战后初期（1948年左右），经过一场“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大论战之后，大部分写作者都不同意马华文艺再附庸于中国文艺，而且多能体认到自己的正确身分，再加上多位优秀的来自中国的作家，因故相继地回到中国去，土生土长的新生代写作者逐渐地可以取而代之，于是马华文学正式脱离了中国文学而自立了。这场极有意义的文艺论争，也对现实主义有所助益——使它的传统地位获得有力的肯定，并加强了未来的马华文艺的创作方向。

之后，约莫十年光景——1957年马来亚独立了；1963年新马及沙砂成立为马来西亚；1965年新马分成两个国家了，此后谈马华文学不可能将新加坡文学二而一的并论了，“新华文学”是它的新名称。任何作家都不可能避免所处的时代的影响。随着社会急剧改变，经济和工商业更趋发达；原有的旧题材因环境的不同或变迁而消失了，却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值得描绘。这些新题材的广大领域和新的社会形态，都必需用新的文学来表达，任由小说创作者去开拓，更深入地挖掘人性，透过艺术的表达力量，以探究人生的究竟。晋入了60年代，我们处在一个不断迈进、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之中，马华小说的题材与创作技巧也应有新的趋势。何况小说原本就是一种富于弹性的文学体裁，每个小说作者都有经常省思各自作品的必要。

1963年8月上旬，全马约有26位知名的青年作者在太平举行两天座谈会，所研究的两个课题是《我们的基本信念》和《我们对马华文坛的看法》，担任主席的是黄崖，分别由陈孟与梦平（笔者较

早期惯用的笔名)记录。后来两篇记录稿整理了发表在蕉风月刊第131期及第133期;1971年被选入赵戎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八集《史科》(页227至页236)。陈孟在记录稿《我们的基本信念》里写道:

“目前文学流派很多,要跟随哪一流派,随各人的能力而定,完全是技巧问题。文艺工作者应容许各家各派存在,尽力采纳各家各派的长处,扬弃它们的短处。不要死心塌地跟定一个流派,因为如果模仿到底,就没有新的东西了。文艺属于一种创新,内容求新,形式也求新。如能创出一种新的流派,实在非常可贵。”

梦平则在《我们对马华文坛的看法》一记录稿里写着:“过去,马华小说可分为两大派:一是传统小说,一是港派小说。前者深受五四时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刻画深入,题材现实,态度严谨,强调主题;后者注重情节及故事性,技巧平平。至于现代派的小说,是这几年来才有的;这种创作,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述,所作的是人类精神及心理探讨。……目前有不少青年作者,一方面承受传统文学的精华,扬弃其缺点,一方面吸取现代文学的特点,从事内容新、意境新、形式新的小说创作。以往曾经备受读者欢迎的港派传奇小说,现成已经少见了。至于专向本邦老牌作家学习风格的青年作者,也开始感到传统作品不太适合于这个时代,而尝试‘新’的小说创作。”

上述2篇记录性专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为当时出席发言者都是青年作者群中的佼佼者;由此足见在正式扬旗起现代文学的大旗之前,他们确曾先对当时的文学现状展开一番探索及评价,而大部分的青年作者已对盘踞在马华文坛数十年的“写实主义”表示不耐甚至厌恶了。出席那两个座谈会的多位文艺青年,如张寒和山芭仔(温祥英),后来已成为60年代举足轻重的马华现代小说家。鲁莽是马华现代文学评论家暨散文家温任平盛赞的现代散文“启蒙期”

的散文作家。乔静、周唤、冷燕秋、陈慧桦、黄怀云和秋吟这6位诗人，后来都成为温任平所说的20位“前行代”现代诗人。^⑥

依我的看法，在马华现代小说的“启蒙期”，如马汉、陈孟、梁园、年红等也该列入现代小说作者的行列里；从马汉的短篇集《美好的时刻》里所收的《前夜》等小说看来，他便运用了部分的意识流来表达。不过到了60年代末期，这数位小说作家的作品，就很少有太显明的现代小说倾向，却归向乡土流派去了。

正如温任平所说的“马华现代小说大抵是在60年代中叶才抬头的。”^⑦此后，马华现代小说由奠基时期、塑形时期到怀疑时期共15年间^⑧，有好多有才气又肯力求进步的年轻小说作者，不愿困囿在一个小圈圈儿里；他们在创作上突破传统，推陈出新，尊崇独创，不断地从西洋文学及台湾现代文学那儿取得借镜，吸收养分，化为自己的血肉。他们开始尝试掌握一些新进技巧，要表现新的阶段、新的境界，还包括了表现人生，表现社会和表现生命，不愿再循老一辈的小说路线走下去。他们认为创作要表现主题，一定要有形式，有了形式，才能表现得好；好的小说，必须技巧好，表现好，才能使作品流传久远。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把握了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使马华小说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60年代中期前后，最重要的马华现代小说家是牧羚奴、英渠（南子）^⑨、张寒、温祥英、黄戈二和宋子衡等。较后崛起的属于奠基时期的马华现代小说家是柯彬、麦秀、梅淑贞、李有成、李永平、菊凡、落叶（小莫邑）等。属于70年代塑形时期的马华现代小说家计有：小黑、温瑞安、陈政欣（绿浪）、李忆碧、张贵兴（纪小如）、商晚筠、潘友来等。到了70年代末期，而有不俗表现的属于马华现代文学怀疑期的小说作家，是叶谁、何谨和洪泉等。——把近20年来的马华小说作者分为“现代”或“非现代”之流派，同时指出他们是属于哪一时期的小说家，这做法未免大胆一点，也

很可能有错误的地方；然而总的来说，这对分析某些作家的小说，自有方便之处，所以，还是贸然地划分下来。

三

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并不是无往而不利的；它先后遭受到不少的责难，有的甚至大肆的讨伐，目为异端。到了70年代末期，这里的文艺界也向台湾文艺界看齐——涌现了批判“现代主义”的浪潮，发出文学的民族性及社会意识的呼声，希望作品归向乡土流派，最终是投入历史文化的民族主义里去。

有关现代文学所受到的阻碍及抗力，温任平曾这么写道：“现代文学的崛起使得写实主义的一派觉得自己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乃群起抗衡，现代文学于是被斥为‘异端’‘崇洋’‘晦涩难懂’‘表现的只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没有道出劳苦大众的心声与愿望’。因为写实主义作者几乎一开始就与现代主义作者发出龃龉，所以这两派以后便演变成对峙之势，……”^⑩ 我们认为，年轻人的特殊性格，就是否定上一代；他们希望找寻小说新出路、新技巧和新内容；勇于创新与突破的精神始终是令人敬佩的，可惜的是他们的傲气，也跟冲劲一样的大；固然具有了艺术表现的涵养，但却稍欠做人的涵养，使人对“现代文学”望而生畏。因此，许多文学流派的论争，年轻人要负更大的责任。文艺副刊编辑钟夏田（早期也是现代诗人）就说过：“就主观而言，现代主义者的气焰，是令人反感的一个主要因素。”^⑪

如果他们都能像温任平这样具有真诚的态度，而且及时指出：“相对于‘写实主义’的是‘理想主义’（Idealism）。确实地说，‘现代主义’，更重视‘内在的心理的写实’。”^⑫——相信过去

的几场笔战，纵使不能使对方心诚悦服，但至少可换取彼此的基本友谊。温君的论点是有所根据的，然而看了1977年8月在台湾掀起的“乡土文学”论战，我们深觉乡土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是不容易很快便与“现代文学”融和为一的。年来，台湾文学已开始归向乡土，马华现代文学也会从璀璨趋于平淡吗？这是时下写作人最关注的问题吧。

其实，身为一位小说作者，他只要在思想、生活及文字技巧方面追求真善美的境界，记住主题是作品的灵魂，技巧是作品的躯体；任何艺术品的完成，在于表现；表现的好坏，不在于某种流派，只要写得好，那就是好作品，何必一定拘泥于一家之言。紧记着这几点，然后身体力行就大有作了；没有什么必要以某种流派自居，或整理出一套强迫别人接受的理论来。宋子衡是目前公认的最杰出的马华现代小说家，他创作的态度也最令人激赏；你听，他说：“说句实话，我并不强调文学派别。实际上，‘现代’和‘非现代’作品有时也很难括分。就我本身来说，我也不知该属于哪一类，但却曾被封为‘服膺现代’和‘颓废派’的。所以我不能指出‘现代文学’的优点和缺点。”^⑬

台湾小说家王拓，就表示过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巨大决心。马华小说界也有这类生猛有力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若指出他们有新写实主义的倾向也无不可吧；它的代表者是驼铃、雨川和连铜。尤其是连铜，他的小说集《当朝阳初升》里的短篇，几乎都是具有乡土味的乡土小说；作者对农村有相当的透视力及理解，所以能尖锐地揭露客观存在着的大小矛盾。他的短篇《化外的一群》，使我们联想到台湾小说家宋泽莱的中篇《打牛嘴村》，同样描写贫苦农人所承受的层层盘剥，始终无法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前期或老一辈的小说家，风格固然已定型，可是在挖掘新的题材及内容上，乃至在技巧手法和内涵方面也有了新表现。韦舜、温

梓川、方北方、原上草等几位老牌作家，雄踞文坛几十年了，如今的创作力仍是旺盛的。他们的作品多包含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精神的道德观念，温梓川通过马来西亚人的思想感情写成的英国背景的短篇《泰晤士河畔》，便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韦晕的《他乡》是新作之一，这位马华小说界的头号作家始终不断地在超越自己。读《他乡》让我们嗅到那些异国情调的气息，但随着错综的故事情节发展，也感染到了华侨离乡背井的哀愁与苦闷；主人翁不愿与作者重逢，必有“相见争如不见”的苦衷吧。我国有不少的高等移民搬迁到澳、美、加、纽等国去落户，能不事前警戒么？

写作约有廿余年历史的潘雨桐（凌紫），近两年来发表了多篇以留美学生的生活面貌和心态为主的小说。《冬夜》是他的代表作，与韦晕的《他乡》同样是以美国为小说背景的创作，情景交融，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

在我国各地，也有一些坚实的小说作者，向来甘于澹泊，默默耕耘，不爱标榜，从不在乎自己的创作是否处在支流旁系的地位，但他们多认为健康的积极性的文学，才是统领着文学的主流，占着正统的文坛地位。这些坚持立场，但在创作上却能兼容并蓄的小说家，他们的题材和技巧也有了很大的转移——运思取材、独出机杼，从事更深、更透澈的人生与社会的接触，于是，他的创作使读者看到完整的形式和有机的内容。这类小说家，可推荐林之流（陈孟）、游牧、郑易、碧澄、高秀、雅波、萧冰和丁云等为代表。读了《土地》、《龙山镇》、《赛车场上》、《占锺》、《第二道符》、《警察》、《最迟回家的那一夜》、《控告》等短篇，都会有此同感吧。

四

本书选载的短篇，仅限于1960年至1979年的创作。我有幸得此机会来一次20年的小说总结；无知所以胆大，我竟然放手编妥了。

我们都希望这部选集，可成为近20年来马来西亚浮生百态的一部“字典”；然而，要在马华文学的20年间，只收集40万言的小说来，确是不易编得很理想的一项工作。最大的难题是要在有限的篇幅中，网罗哪些小说作家的代表作呢！——文学作品的评审，原无绝对标准，只能凭观者的主观意识来定优劣，加上对于其他作家的作品涉猎不多，搜集也非易事，所以有不少佳作未为本人所及见，祈盼有关者鉴谅！

本选集编选了54位小说作者的54个短篇，其风格多是不调和的，各人以各自的创作形式来表达。事实上，许多人的文学观并不一致，有人高唱写小说的普遍永恒主题：写人性、写生老病死。有人却主张在小说中表现强烈的社会意识，具有对社会的批判和人道主义精神，忽略小说的艺术性。故此，要做好这份工作，切忌用褊狭的小说理论来迷惑读者，否定他人，进而肯定自己；他必须冷静客观，真正地欣赏个别小说家的作品，不能只囿限于某一流派的创作。我重视的，是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互相平衡，内容与形式取得统一的佳构。个人始终有这样的感觉：无论怎样“纯粹”的小说，在更具体的研究和较深的分析中，都受着时代精神的影响，甚而为它所决定。绝大部分伟大的或具有永恒意义的小说，无不表达了作品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反映了真正的人们的爱憎与悲欢。

这一阶段的小说作者并不少，然而真正第一流的却不多，足以传世的佳作恐怕更少。本书里每家仅选一篇创作而已，这对好几位杰出的小说作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但限于篇幅，实在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心里有所憾然！我愿意这么表示：比如韦晕、原上草、

方北方、林之流、云里风、雅波、潘雨桐、游牧、孟沙、端木虹、宋子衡、小黑、菊凡、麦秀、张寒、温瑞安、李永平、黄戈二、陈政欣、张贵兴、落叶、潘友来……等小说家，尚有一些极佳的短篇，都因受到字数限制而抽掉了。不能收纳他们更多的上乘之作，无疑地，这是本书的缺憾与损失。

展望80年代的马华小说创作，发展的潮流是怎样的呢？前期的走在两条主要小说路线上的作家将往何处去？这都是大家所关切的问题。

可预先断言的一点，就是今后的小说作者，自会避免以往过分的西化、膜拜式的接受外来文学思潮，改为批判式的吸取，才能获取养分，化成自己的血肉。作者们不致于再主观地粉饰现实、歪曲现实或无视现实，当可加强思想深度，并力求技巧与内容的融和。大家使用同一种语文来创作、来表达，以期使自己的小说深度和涵盖面真正扩大而成为伟大的创作，可以在世界文坛上竞耀生辉。

期望马华小说界呈现新风貌，将来总结的时刻有满穗金黄的大丰收，今日站在原有两条路线上的小说创作者，理应踩废了藩篱，真诚地携手合作！

1980年12月初稿·81年4月重修

附注：

- ①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一）》理论批评一集，页四。
- ②参阅《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八集《史料》（赵戎编），陈征雁特访稿《马华小说家谈创作之一》，页255。
- ③见《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苗秀编），赵戎作《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页93。
- ④同②，页263。
- ⑤见司马长风著《文艺风云》，页9。
- ⑥见温任平主编《愤怒的回顾》，页86，注⑮。

⑦同⑥，页74。

⑧详见温任平主编《情怨的回顾》一书的“代《编者的话》”，页六：“即探索时期（1959年至1964年），奠基时期（1965年至1969年），塑形时期（1970到1974年），怀疑时期（1975年至1979年）。”

⑨在1965年之前，新加坡尚未成为独立国，牧铃奴和南子等仍是马华作家。

⑩同⑥，页66。

⑪见温任平主编《情怨的回顾》，页93。

⑫同⑥，页64。

⑬同⑥，页126。



左起：莎琳、捷克汉学家李沙娃教授、艾舒、马崧
(1992年11月10日·士姑来马星园)。

《蕉风》扬起马华文学旗帜

(1955~1993)

年少蕉园迎蕉风（引言）

各位在座的写作界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所举行的“蕉风38年展”和文学座谈会，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学集会、——《蕉风》38岁了！时光是多么神速，而《蕉风》是何等坚强能耐呀！

出席这样的文学集会，连我也突然变得年轻起来啦！可不是么？回忆使我们年轻，回忆使我们忽然又满怀壮志，回忆使我们回到了以往年少的时光。想当年，在蕉风轻拂的校园里，谁不是乐于与文艺女神亲近为伴呢？

第一次见到创刊号的《蕉风半月刊》，我便对她产生了异样的感情。那年11月间，我才满15岁又两个月；在学校的图书室阅读到这份新刊物，她封面上印上“纯马来亚化文艺半月刊”等字样，我一见到她就“钟情”，因为她内容好、配图美、设计佳，加上我对她的名称颇亲切哩！

我自小在柔佛文律一带长大；文律特产一种香蕉，肉色金黄，甜美可口，俗称“文律蕉”。我那三几位住在外埠的老师，经常托买三几串文律蕉于周末时带回家与亲人共尝。文律人常以特产名蕉为荣。我家在山芭，四周的槟榔园里也种了不少的香蕉树；购买了这份新刊物后，我在香蕉园里阅读，倍感亲切。我把那篇《蕉风吹遍绿洲》（发刊词）朗读了几遍——我特别欣赏较后的四段文字：

“……过去的历史可证明：我们的祖先在马来亚这块沃野上，对物质文明的创造方面，已有了辉煌的建树，但在精神文明的创造

方面，还不能等量齐观。基于这种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马华文化工作者必须积极地，主动地负起这项任务，用我们的几支秃笔，把马来亚的文化沙漠开拓成文化绿洲。”

“星马两地，我们华族后裔占了全部人口的半数以上，在今后悠长的岁月里，我们还要与其他马来亚民族协调生活在一起。那么，对于我们生于斯，葬于斯的马来亚，如果不够了解，岂不被人引为笑谈，如何去了解一个地方，如何去了解一个民族，绝不是翻阅几本史地书籍，或诵读几篇宣传的文字所能济事的，必须深入到社会的内层，浸润在实际生活之中，才能够慢慢地体会出来。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从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来认真观察，才能够找出正确的答案。原野上的一山一水，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可以透过文艺的笔法，清楚地体现在我们的面前，观微知著，这也许就是我们了解环境达到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最好办法。”

“几位文化界朋友，每当谈到上述问题时，都有共同的感觉，一致认为在今日的星马，创办一份纯马来亚化的文艺刊物，实在太需要了。虽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雄厚，我们的阵容还不够坚强，但这点赤诚之心，如能引起社会共鸣，招来更多的文化健将，来和我们共同开垦，则这份刊物的前途，还是非常乐观的。”

“蕉风二字除去代表南洋风味外，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用不着引经据典地去为它找注脚。我只希望，这蕉风不会奏出秋风夜雨的凄凉悲调，而能使马来亚的沃野在它的吹抚下，滋长出茁壮的文化嫩苗。”

谁也预想不到吧，这蕉风不仅“能使马来亚的沃野在它的吹抚下，滋长出茁壮的文化嫩苗”，而今日——经过38个年头后，她早已飘扬着独立后马华文学的大旗，还把这面旗帜树立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高峰上！

这不单是蕉风出版社同仁的荣耀，也是在蕉风耕耘过的写作者

的光荣；一份纯文艺性质的刊物，能够支撑长达455期，历经38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直到今天，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在内，在所有的中文文艺刊物里头，还找不到另一份期刊像《蕉风》能有如此长的寿命。单凭这一点，就可证明大马华裔人士对文化事业甚为重视，献身文艺的作者及出版人大有人在。

历任主编培植新秀

蕉风创刊号是在1955年11月10日面世的，那年头还是英殖民地时代。等蕉风半月刊创办了将近20个月（蕉风第44期于1957年8月25日出版）后，我国马来亚才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而马来西亚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的）；可见在我国独立之前，蕉风经已负起时代使命，在争取独立与种族间融洽方面尽了一定的力量。

这回推动“蕉风38年展”的工委会主席姚拓先生，早在13年前发表的《25年话家常》（为蕉风出版25年而写。刊登于蕉风第333期1980年12月号）一文中说：“……刚出版时是在新加坡登记注册，出版人是中青兄，主编则为方天兄，其他几位编辑，都是义务性质的协助，我记得编辑委员中有李汝琳兄、陈振亚兄、常夫兄以及已过世的马摩西兄等人。我于1957年2月由港到星，始参与编辑工作。……”

在今天晚上出席的文友里头，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位写作人最早在蕉风发表文章；据我所知，在座的马汉兄和蕉风基本作者山芭仔（即温祥英）、梅井、黄枝连以及李定华等早在1956年之前就开始在蕉风发表创作了。尤其是麻坡的马汉兄，早在1955年12月10日出版的蕉风第3期就有他的作品出现了，当时他用求勤、丁湘、夏之炎、西林、士默等笔名，发表多种文体的作品。我本人则较迟于1957

年2月10日和3月25日，在蕉风第31期及第34期以署名“江汛”和乳名“邱亚皎”发表短篇小说及散文习作。

马汉兄亲口对我说过：蕉风第一任主编方天先生是他的文学恩师。后来，从许多例子看来，蕉风的编辑们多擅长培植新秀；用心编好蕉风，“尽量接受年轻作者的作品，发掘他们的才华，给他们最大的发挥机会，是我们的本份。……创作方面，沙燕、水生，温任平、飘贝零的作品，都是第一次在蕉风刊出，对于新秀我们都尽量鼓励”。（详见蕉风第216期，1970年12月号）

比如今日已是马新著名女小说作家商晚筠，她于1975年11月号的蕉风第273期发表短篇小说《秘密》，编者在《风讯》栏（编辑室）中写道：“比较上，商晚筠还是一位新人，目前正在台大外文系深造，这篇《秘密》，对一个少妇心理的秘密，有相当细腻的描述。”——如果不是得到这样的好评，当年的商晚筠很可能不会这么勤于从事小说创作，而后来在台湾和马新等地多次参加征文比赛获优异奖。台湾某出版社为她印行的小说集都风行一时，而目前是位出色的女编辑。

在1977年，当荒漠还是一名在籍英校生，他在蕉风第293期（1977年7月号）发表短篇小说《突》，当时的编者就在《风讯》栏中赞荒漠“这篇充满了象征意味的作品，也象征了他将来不可限量的成就”。——这位年轻作者荒漠，就是后来改换笔名的何谨；今年8月14日晚间，何谨（陈和锦）在关丹荣获第3届杰出潮青文学奖；他现任南洋商报副刊主任。试想，当年的荒漠，要是他没获得主编的提携扶植的话，很可能他无法在十多年后就成为这么优秀的作家之一。

我们再以南马小说家洪泉作为例子吧，记得洪泉在1981年9月和10月联号的蕉风第342期发表短篇小说《解脱》时，当时的主编也在《风讯》栏里予以褒扬：“……洪泉是蕉风其中一位肯于尝试

的作者。经过几个月的埋首苦‘写’后，洪泉终于拿出货色《解脱》……读者可以注意到他时时在创作领域上力求突破，另拓疆界的痛苦与努力。《解脱》虽然不是作者在创作困境中的一次脱颖而出，却是一个真挚，果敢的尝试”。——我想，70年代末期的洪泉后来能够创作出这么多不俗的小说作品，这跟当年的主编致力于培植与提携不无关系吧？

蕉风月刊重视新秀，引导年轻作者走入现代文苑，希望一批批的新人不断悉心创作，才能显出些朝气，否则文坛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成现代派中心刊物

已故新华作家赵戎在他编著的《新马华文文艺辞典》（1979年8月教育出版社）一书中简介《蕉风月刊》时指出“……起先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其版型也由32开变为16开及24开。一个长时期全载香港及台湾作品，自202期起成为现代派中心刊物”。

在马华文学史上，蕉风月刊的“稿约”也最有特点，颇有吸引力：“我们希望作者们寄来的作品是：态度要诚恳的，不要虚假的；表现要创新的，不要模仿的；内容要扎实的，不要浮浅的。文责由作者自负，版权由我们与作者共有。”

蕉风主编在1977年6月号第292期的《风讯》栏里又提出：“我们认为，单单指责社会不关心文学是不公允的，反过来看，作为一个作者，我们又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谈到对社会贡献，除了描写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之外，一个作者最基本的任务，便是写出好的作品来。我们相信，本刊所订的3点稿约，足以审定一部作品的水准。”

在第338期的《蕉风》（1981年5月号）“稿约”里，我们也读

到了蕉风“希望收到的作品是扎实的创作、公平的评介、最新的翻译、独到的理论。我们的选稿原则是只要好的作品，不拘内容形式，不分派别主义，不限字数多少，不看作者名气”。

一个刊物或副刊的编辑所定下对来稿的取舍标准，往往指定了作者的创作路线与方向，仅有极少部分的作家不受影响。姚拓先生在为蕉风出版25年而写的《25年话家常》（第333期刊出）一文中写道：

“……这25年以来，编蕉风的老编，有如走马灯一般，早期有方天、彭子敦、黄思骋，中期有黄崖、白垚、李苍、周唤，近期则有牧聆奴、梅淑贞、川谷、悄凌……一直到现在的小将张瑞星。”

最近，姚拓在《闲笔说蕉风》（1993年8月20日刊于《新通报·通苑》版）一文中又写道：

“黄崖主编《蕉风》的时间最长，大约有10年之久。……大约在1970年，黄崖离开《蕉风》后，由白垚（刘戈）主编，开始采用现代诗，以后又由周唤主编，出版了《美的V形》，大量刊出现代诗作，于是有人就给蕉风起了‘现代派’的名号。事实上，蕉风一向兼蓄并容，现代或不现代的作品，同样在《蕉风》上刊出，例如黄润岳、郑良树和我的文字，都‘不现代’得很。”

“周唤以后的蕉风编辑，有梅淑贞、悄凌、陈瑞献、张锦忠、李有成、川谷、沙禽、许友彬、王祖安、梅采、黄昭谕等等，一直到现在的黑与朵拉，他们大多是义务的道义协助，尤其是陈瑞献老弟远在新加坡曾为《蕉风》义务效劳3年之久，梅淑贞小姐为编《蕉风》竟得了高血压，都令我由衷感激。”

“《蕉风》创办迄今，38年如飞而过。我虽然月月看到《蕉风》如期出版，但全心全意去编《蕉风》，只有一两年的短短时期。所以，我有一个心愿：愿我在退休之后，专心一意地只编《蕉风》，其他业务，全部踢开。”

姚拓先生有着那股儒者的长者风范，慈蔼谦冲；唐林先生在《姚拓的蝴蝶梦》（详见《心里的星星》。1992年8月出版）一文中介绍姚拓：“……夸张一点说，称他做‘蕉风之父’也不算过分。”有关这个雅誉，我相信高义薄云的姚拓先生是不会领受的。接着，唐林先生所叙述的倒是实情，——他写道：“……讲到姚拓，就绝对不能不提到《蕉风》月刊，姚拓不是与‘蕉风’相依为命，‘蕉风’能够生存下来，倒是完全靠姚拓的不懈支持，才可以在销路稀少的困境中，惨淡经营而度过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成为马华文坛上生存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文艺月刊。”

“除了出版《蕉风》月刊，姚拓还主持一分《学生周报》，它就是后来改名的《学报》。这两份文艺刊物，在马华文艺陷于低潮的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培养出不少马华文坛的作家。”

我们万分高兴听到姚拓先生表露他的心愿——他强调：“愿我在退休之后，专心一意地只编《蕉风》，其他业务，全部踢开。”等姚老这番话落实的时候，蕉风必然呈现新风貌与姿采，攀向另一个高峰。

播种者已届丰收期

跟我交往已有34年的文艺战友马汉兄，在今年7月下旬寄赠影印的专访姚拓先生的文章给我做资料，访员是女作家永乐多斯女士，日期是1993年5月24日；原文是在《先生》杂志刊登的。

永乐女士问：蕉风一直在培养新的作者，在马华文坛，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姚先生，你当编辑的时候，怎样去培养或鼓励他们？除了鼓励他们投稿之外，有没有举办一些活动呢？

——这是个蛮好的问题，可惜过分谨慎与谦和的姚老却“避重就轻”地回答：

“我们说不上有培养作家。……不过，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很多写作者都曾在蕉风写稿，蕉风提供了发表的园地，例如马汉、梁志庆、牧羚奴、梅淑贞、白垚、周唤、林木海、悄凌、张发、梁园、小黑，都跟蕉风在文字上有缘分。我们也时常和作者联络感情，参加一些作者营和座谈会，在金马峇、波德申……”

在我还没阅读到那篇访谈之前，曾经略为划分统计，此刻我不妨把那批跟蕉风有过文字缘分的写作人列名下来：

马华小说作者——马汉、温祥英、张寒、梁园、陈孟、黄戈二、原上草、宋子衡、菊凡、麦秀、年红、温瑞安、纪小如（张贵兴）、李忆碧、潘友来、陈政欣、朱牛人、曹岚、商晚筠、何谨、麦浪、小黑、许友彬、林月丝、雅蒙、洪泉、落叶、张锦忠、叶谁、鞠药如、雨川……等等。

马华散文作者——鲁莽、庄牧（沙燕）、蓝影、梁瑞明、陈慧桦、林绿、冰谷、黄润岳、忧草、刘放、思采、何乃健、梅淑贞、川谷、温任平、何荣良、张树林、李有成、梁纪元、吴海凉、陈蝶、悄凌、林燕何、苍松、迈克、李国七、佐汉、凤山泛、钟可斯、赖瑞和、公羽介、廖雁平、叶蕾、继程……等。

马华诗人——白垚、淡莹、王润华、慧适、周唤、归雁、丘梅、艾文、方娥真、张尘因、沙河、沙禽、沈穿心、川草、黄远雄、周清啸、李宗舜、赖敬文、子凡、陈强华、方昂、萧艾、傅承得、林若隐、宁牧儿、李敬德、张永修、蓝启元、杨际光、飘贝零……等等。

马华论述作者——李有成、谢川成、张瑞星、陈鸿洲、叶啸、李锦宗、杨升桥、庄声涛、陈应德、张光达、骆耀庭、碧澄……等。

新加坡独立前后，一直与蕉风有过文字因缘的新华作家计有：

君绍、林方、南子、贺兰宁、牧羚奴、完颜藉、歹羊、英培安、钟瑜、文恺、谢清、莫邪、君盈绿、周望桦、喀秋沙、变质岩、西河洲、孟促季、蔡蔡、家毅、杨松年、林山楼、黄继豪……等。

其中尤以才华盖世的陈瑞献（牧羚奴）居士，他与蕉风的关系最为密切，早从1969年开始，他跟姚拓、白垚及李苍接编蕉风月刊3年多。蕉风为陈瑞献与郝小非伉俪出版合译的《尼金斯基日记》（1971），也曾先后为这位文坛暨艺坛巨人陈瑞献出版了《牧羚奴专号作品》（第224期，1971年9月号）、《关于陈瑞献/陈瑞献集珍庄个展专号》（第332期，1980年11月号），和《陈瑞献专辑》（第443期，1991年7、8月联号）等。

长期以来，尤其是革新后的蕉风（1970年初开始），除了拥有一群热情洋溢的基本作者之外，还在一年半载里涌现了一批批的新秀。蕉风的主编曾说过：“拥护和攻讦什么流派都没有用，最实在的还是这句话：拿出作品来。……这句话使说空话的人胆怯和脸红，使沉默创作的人得到安慰和鼓励。”（详见第210期，1970年5月）。到了90年代初期，蕉风的生力军仍源源加入。

大体上说，蕉风作者的创作，都有相当优异的表现。除了50年代末期出版过包括江陵、马摩西、方天、古梅、常夫、胡牧（范北羚）等人的作品列入“蕉风文艺丛书”外，后来还先后印行了原上草、歹羊、完颜藉、黄润岳、拉笛夫（马来现代诗人，由牧羚奴和梅淑贞翻译其诗作）、周国灿、蔡蔡、刘放、小黑、宋子衡、洪泉、温祥英、姚拓、王润华、韦晕、郑百年、郝毅民等人的专集。

打从1957年开始替蕉风写稿的黄润岳校长，至今已写达36年之久。黄校长是蕉风和学生周报（后称《学报》）的专栏作家；他优雅凝重的笔触，深入浅出地把人生的感受娓娓道来；他的醇厚，使读友如沐春风。50年代以冷燕秋为笔名发表诗作的刘放，也是社会学博士；《刘放杂文集》兼有诗人的敏锐观察与社会学者的科学研

究心得，讽世劝世两者皆备，有独白也有传统，有机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远。梅淑贞的专栏《人间集》，卓犖不羁，言明扼要，值得仔细体会琢磨。郑百年替蕉风写过《文史丛谈》、《百年专栏》、《学与思》和《香江随笔》等专栏，内容深广，气势豪放，可读性高。宋子衡、温祥英，菊凡、小黑、陈政欣和洪泉等等，都是比较用心创作的现代小说作家，多已树立了各自独特的小说风格，而且其作品是道道地地的现代马华文学，与港台的同类现代小说有所不同。——最难得的，是那些蕉风的基本作者，多年后仍没忘了把最满意的新作寄给蕉风发表，比如商晚筠的二万余言小说作品《暴风雨》（刊于第441期，1991年3月及4月联号），便是一个好例子。蕉风获得广泛的基本作者不断的支持与爱护，于是刊登在蕉风的文章，泰半是上选之作，后来提出申请文学奖或出版基金的作品，多原载于蕉风期刊，如最早期申请荣获出版基金的慧适、何荣良和菊凡等他们都曾经是蕉风的基本作者。又例如潘友来的短篇小说《我儿我女》，荣获了南马文艺研究会举办的“王万才青年文学奖”；这篇力作《我儿我女》即是发表在第270期的《蕉风》（1975年8月号）。宋子衡的短篇小说《冷场》，荣获马华文化协会颁发的年度小说奖，这篇佳作也原载于《蕉风》月刊（第320期，1979年11月号的《宋子衡小说专题》）。还有好多不胜枚举的实例，这里不再赘言了。

创举特色领导群刊

在马新华文文学史上，《蕉风》和《学报》是两份比较创新、敢于不断革新与挑战的刊物。在1970年间，革新后的蕉风，出版了3个专号，即“诗专号”、《戏剧专号》和《小说专号》，另外还有

尼金斯基专题、牧羚奴小说专题、苏辛尼申专题及三岛由纪夫专题（共四个专题），这一系列的推出，是编辑同仁有系统、有价值而重要的推介，之后翌年（1971），蕉风又推出马来文学作品专号、留学生专号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后来又出版过评论专号（蕉风第240期，1973年3月号）、诗专号（第292期，1977年6月号）等，也先后推出多个专题，让作者群发挥对当前文坛某些现象或某部作品的看法和见解，可说是创作与评论并重，相辅相行。——针对评论，蕉风主编说过：“如果有更多人在文学理论方面落实地下功夫研读及写作，将有助于视野的扩展，消除多少年来由封建思想所造成的闭塞局面。”（见第243期，1973年5月号）

凡是蕉风的基本读者，相信都会承认：“多少年来，我们即本着开放的心灵来编蕉风，也让读者接触多方面的作品，是西方作家作品的介绍也好，是3、40年代作家作品的回顾也好，目的是让读者多看，同样地，对创作文学的刊登，也求多方面风格的照顾。我们不否认其中有些作品稍欠成熟，但是，对热衷于文艺创作的人，我们在应加鼓励的心情下，发出一两声喝彩，是必需的。”（见第242期1973年4月号）

革新后的蕉风（1970年初开始），所谓高水准和新风格，是编辑们长期性的通盘计划和编辑方针，虽然有不少人叫好，可是也有好些读者无法接受，因此《蕉风》的销路更不理想了。当然，身为写作人，我们始终同意在创作以外，应该扩大视野，多接触外国或西方的文学作品。文学既然是人类心灵的投射，涉身其间的作者与读者，自然必需有广阔的胸襟，才能领略它所涵容的无穷的奥秘。

一般上来说，蕉风的新人都能提供些充满锐气的作品；经过数年的磨练后，他在蕉风所发表的文章多有代表性。于是有人说，马华当代优秀的作家多来自蕉风的阵营。虽然我们不一定承认这一点，不过，我个人倒同意下列三点：（一）马新现代文学的前行者，无

不来自蕉风。（二）我国独立后，在马华文坛冒出来的写作人，几近占60%曾在《学报》及《蕉风》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三）蕉风是跟港台及欧美华文文学交流最密的一道桥梁。

至于战前和战后初期及50年代的马华作家，曾经在某段时期于蕉风刊物发表过作品的起码也有廿余位，例如：丁丁（依藤）、陶焰、温梓川、洛萍（江陵、白蒂）、萧遥天、曹兮、絮絮、李士源、原上草、斌子、光华、东方月、史立恒、韦晕、方北方、朱昌云、彭士麟、吕朗、李汝琳、周粲、夏弦、余寿浩、黄炳炎、刘瑜、范北羚、沈安琳、吴静子、梦君、马阳（蒋慈）、梦平、游牧、罗纪良等。

蕉风常给予潜质佳的新秀适当的褒扬，并制造机会让他们参加青年作者野餐会（即生活营），大规模的生活营分别于1961、1962、1963及1964年在波德申、金马峇高原、太平山和摩立海滨等地举行，受邀参加的四届的全马青年作者共约百名，来自马、新各地（有关的第三届全马青年作者座谈会的记录稿——陈孟整理的《我们的基本信念》，和梦平整理的《我们对马华文坛的看法》，都收入赵戎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8集史料》一书里，由227页至第236页，原载于《蕉风》第131及133期）。

蕉风出版社的负责人是热诚实干的，除了在马来亚搞过多次青年作者生活营之外，在新加坡，蕉风同人也举行过类似的座谈会，例如，在1970年3月杪于新加坡牧岭奴的“客棧”举行的文艺聚会（姚拓与白垚等赴星出席，详见《这一群人说东说西地》，刊于蕉风1970年4月号）。后来又在1977年10月16日召开的30位新华作者非正式座谈会（详见第298期，1977年12月）。到了1979年，蕉风也出版了《潮变时候·新加坡年轻作者专号》（1979年10月号），奖掖新人。

当年马新的写作人很少有较大规模的聚会交往的机缘，蕉风在

这方面的安排与联络，几乎是个创举；这批与会者，多已成为今日的文学界硕彦人物。蕉风除了丰富马华文学的宝库之外，在扶植与提携文学接班人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难怪姚拓先生会对访员永乐多斯说：“与蕉风有密切关系的人，不管是在南洋、星洲、中国报、光华、生活出版社，或者是商海，都做得很好，起码，他们都没丢蕉风我的脸呀。”

从80年代末期至今，蕉风仍常在适当时候表示尊敬作家和表扬作家，安排出蕉风作者的专辑，例如黄远雄、陈强华、雨川、李宗舜、方北方和韦晕等作家的专辑都与读者见了面。这等做法，也是由蕉风创始的，现时有的期刊编辑也来出个人专辑这一套。近年来，我们在蕉风也读到了《童话故事与童诗》（第449期，1992年7、8月联号）和《新生代》（第454期，1993年5、6月联号）等专辑；这也是其他刊物编辑较少动脑筋组稿的新措施，而蕉风已经有了导航的表现。

早在1962年间，在南马、中马及北马，有3份姐妹刊在同一个月份里相继出版，那即是：（一）新潮月刊——于5月5日在麻坡创刊，16开型纯文艺刊物，马汉主编，约出过10期，新潮社印行。

（二）荒原月刊——于5月15日在吉隆坡创刊，16开型纯文学刊物，鲁莽主编，约出过20期，荒原社印行。（三）海天月刊——于5月25日在北马创刊，16开型纯文学刊物，梁园主编，约出过21期，海天出版社印行。后来，该社还于1965年12月，出版了报纸型纯诗歌刊物《海天诗页》数期。——这3、4份文艺刊物，都是在当年的蕉风月刊主编黄崖先生大力协助之下成功出版的；因此，我们说蕉风月刊曾领导群刊不是过誉之辞吧。——1962年前后，蕉风主编黄崖所主持的新绿出版社，也替马汉、陈孟、梁园、慧适、集文和鲁莽6人出版了6部专集。

蕉风主编在第349期（1982年5月号）的《风讯》栏里写道：“为了设计与编排上的方便，蕉风编辑部同人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从350期（即1982年6月号）起，把蕉风原有的版本改为16开本。蕉风创刊逾4分之1世纪以来，由大变小，由小变大，面貌改了好多次。每一次改变是一次尝试。这次的改版，我们力求不只是换件衣裳而已，而尽量逐步充实内容，使蕉风成为一本真正值得看阅和收藏的文艺刊物。”——蕉风的型版自350期起，由原有24开本改成16开本。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旧有的24开本（四方本）曾经是多种刊物和丛书效法的对象，试看：当年的蕉风文丛、犀牛文丛、天狼星诗社、人间出版社、大学文艺，和在新加坡出版的《新社文艺》、《潮声》，以及五月出版社印行的丛书杂志等，不都是采用24或25开本型么？这也是蕉风月刊的影响所及和集体仿效的一大例证。

原载蕉风被选佳作

在38年里头，蕉风已出足第455期，如果平均每期容纳九万的文章稿的话，至今已刊载了约达4千零95万字的文艺作品，真是浩如烟海。在本邦，蕉风月刊可成为“蕉风学”（简称“蕉学”）。要是您肯痛下决心花它三几年的工夫去搜集455期的蕉风，加上寻找蕉风引起反响的所有资料，悉心予以整理、分析及立论的话，足可完成一部博士论文的巨构吧。

提到写博士论文，我们联想到曾经在蕉风园地上耕耘过的几位马华作家，他们先后都出国苦读而拥有了博士衔头；这些学有专长的蕉风作者即是：王润华、陈慧桦、林绿、刘放、赖瑞和、李有成、何荣良等博士；这份荣誉也可以让蕉风同仁分享吧？而李有成（李苍），还曾当过蕉风编委哩。

记得在去年（1992）初，我在蕉风（第445期，1991年11月及12月联号）拜读了陈应德博士在他的《文坛省思》专栏里写的大作《迫切的工作》；这的确是一篇令人省思的好文章。

陈应德博士指出：“……表面看来，马华文学发展是很蓬勃，可是只要我们肯冷静地检讨一下，这几十年来，我们华社、尤其是文学和学术界在马华文学发展所做过的实际工作，还是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迫切地，脚踏实地去做的。出版一套《马华新文学大系——1960~1990》便是马华文坛最迫切的工作。”

较后，陈博士又写道：“严格地说，大马华裔社会出版了以上两本选集只是相当接近文学大系，而且还只限于散文和小说而已。自从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西亚之后，整个大马华社，虽有这么多华人团体（包括很多文化、文学团体）连区区一套马华新文学大系也编不出来，实在是我们华裔社会共同的羞耻。”

是的，目下积极地进行出版一套文学大系，是一项比较迫切、有深远影响的工作，希望华裔社团的领导人予以重视和关注，不久之后可实现所有写作人的这个愿望。

扯到大系，根据我约略的统计与记录，发表在蕉风月刊的许多文学作品已被编入一些大系和选集里，现试简述如下：

（一）《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共8集，是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于1972年3月至1974年陆续出版的一套战后马华文学大系，由李廷辉（主席）、孟毅、周繁、苗秀、赵戎及钟祺合编，收集了由1945年至1965年为止的马华文学作品。

这套大系的第二集是《散文①》，被选的原载于蕉风月刊的佳作只有一篇，那是郭升新的散文作品《出海》。第三集是《散文②》，内收原载于蕉风的作品计有：君绍的《当红毛丹成熟的时候》（蕉风71期）、忧草的《大山与他》（蕉风第122期）和《海之歌》（蕉风第136期）、原上草的《含羞草及其他》、鲁莽的《信念的

孕育》(蕉风第133期)、林成兴(冰谷)的《吡叻河的召唤》(蕉风第127期)、山芭仔的《太平湖之恋》(蕉风第21期)、梁志庆的《沙滩》(蕉风106期)和《怀念丰盛》(蕉风第138期)、蓝影的《第一颗星星》(蕉风115期)、沈安琳的《自由的召唤》(蕉风第121期)、陈慧桦的《重游王城》(蕉风第133期)、梁瑞明的《海滨遐思》(蕉风第111期)等等。慧适、鲁莽、沙燕等都是60年代初期的蕉风基本作者,他们都有多篇散文入选,但由于《散文②》不曾一一注明来源,故这里无法详告。

这套大系的第四集是《小说①》,内收洛萍的《赌博世家》(蕉风第38期)和《山野底孩子》(蕉风第6期)。

第五集是《小说②》,内收方天的《十八溪乾》(蕉风第9期)、《暴风雨》(蕉风第17期)及《烂泥河的呜咽》、山芭仔的《孩子的心》(蕉风第49期)、黄戈二的《病》(蕉风第104期)等。原上草、斌子、牧羚奴、端木虹等这些有作品入选的蕉风小说家,由于文末未加以注明来处,故这里不赘。

第六集是《诗歌》,有作品入选的也常在蕉风月刊发表诗作的诗人计有:常夫、范北羚、冰谷、萧艾、慧适、北蓝羚、年红等,但由于诗末没加以注明来处,所以无法在此汇报。

第八集是《史料》,这部厚达968页的巨著,内收蕉风半月刊创刊号至第72期的所有目录及出版日期等。在“作者小传”中,数十位蕉风基本作者的简介,也刊入第406页至442页里头。蕉风的创刊词、蕉风月刊文艺座谈之一至之八,以及第三届全马青年作者座谈之一与之二,和文艺座谈会《马来西亚的文艺读者和作品》(附录)、《诗人看马华诗坛》(附录)、青年作者与马华文坛(附录)、和《马华文艺的新生力量》(作者叶逢生即黄崖)等,多半都在蕉风登载过,幸而被转载于《史料》集里。

(二)方修于1979年到1981年之间也编了一套4册的《马华新

文学大系》（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包括：（一）小说一集，（二）散文一集，（三）诗集，（四）戏剧一集。这一套似乎不曾出齐的大系，除了诗集收集了1945年到1971年左右的作品以外，其他各集只收由1945年到1956年之间的作品。这套大系的第6集是《诗集》，于1982年5月第一版；常在蕉风发表诗作的忧草、萧艾、冰谷、北蓝羚、英培安、完颜籍、贺兰宁、谢清、文恺、流川、孟仲季、蔡蔡、南子、林方、吴伟才、沈璧浩、林也、黄继豪、望无际、钟瑜、李苍等，都有诗作入选，唯无从由诗末找到更详尽的注明，故无法汇报哪些诗作是转载自蕉风月刊。

（三）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于1985年左右出版了张树林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及马崧编的《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二辑：小说》。小说选限于1960年至1979年的创作；散文选限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作品。

这部散文选，共收55位散文作家的作品，由于文末未一一注明原载处，故无法查明哪些散文作品是原载于蕉风月刊；不过，其中有40位是常在蕉风发表散文的作者，因此我说：在《马华当代散文选》（张树林编选）一书中，至少有72.7%的作者曾在蕉风发表过多篇散文作品。

这套文学选的第2辑是小说集（简称《马华当代小说选》），是由我本人编选的；从文末处得知姚拓、黄崖、宋子衡、张寒、梁园、小黑、李忆蓀、何谨和洪泉等9位小说家被选的佳作都原载于蕉风月刊，在54位入选的小说作者中占了16.7%。此外，还有多位被选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创作也常在蕉风登载过，例如温祥英、林之流（陈孟）、绿浪、温瑞安、落叶、商晚筠、张贵兴和叶谁等，都是通过蕉风在技巧与题材上表现新风格的小说作家。

从多部大系中的选集、文学选，以及文学奖、征文赛和出版基金奖的得奖人等等实例看来，足见与蕉风曾经结缘的当代写作者，

在马华文学界所占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是何等重大而深远哩！

今天的马华文艺报刊，十之六七的负责人是来自蕉风和学报的阵营；这些编者也喜欢在各自的文艺园地上掀起现代文艺创作运动，一如早在1967年，现代派诗人完颜藉在新加坡南洋商报编《文艺》副刊的手法一样。喜爱追随现代文学创作运动的写作者，一定更有一种满足感吧。

蕉风吹拂更上层楼

（结语）

蕉风是强劲带动的。如果不是有阵阵强劲之风，它又怎能扬起马华文学的大旗呢？

多年来，既然已经在马华文学的山峰上树立了一面旗帜，大家又怎能不加倍地努力耕耘呢？——我们的前辈姚拓先生年事已高，战斗了约40年，为了出版这份长寿的《蕉风》，每期亏损马币3千元，他至今都从不言倦；我们怎能不向他老学习呢？

我想，今年8月底所举行的“蕉风38年展”和文学集会，只是事前的一些“热身运动”罢了；我们衷心盼望蕉风同仁今后能够出版《蕉风文学大系》和《蕉风目录大全》，等多两年或12年之后，再来搞一个声势更大的40或50周年纪念的“蕉风周”，庆贺马华文学在蕉风吹拂下更上一层楼。

1993年8月21晚脱稿于可冬小筑

◎本文曾转载于1995年3月出版第44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

南马文苑的繁花硕果

(1970~1991)

悠悠廿载续旧题

从几方面看来，经过约73年集体煞费苦心耕耘的马华文学，直至今今天，它不仅在世界华文文艺界占了一席位——在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大陆港台及欧美等地，先后确立了一定的国际地位，而且已有好些人开始将它列为“马来西亚文学的”的一环；甚至许多人已把马华文坛视为亚细安华文文艺的重镇之一。最近听说，即将在今年七月底由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印行的《世界华裔文化名人传略·文学卷》，就收录了好些马华作家的生平传记，推崇他们在文学上的丰硕成就，给予适当的定位；这该是另一项令人欣慰振奋的事吧。

所谓“马华文坛”，原是包括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二大单元的人文文学在内；长期以来，新马是一家，两地的华文文学自然是一体的。过去，一般人在论述马华文学时，新马的华文文学是不分彼此的。马来西亚自1963年9月16日成立之后，砂劳越、沙巴和马、新这4个单位更是一家亲，不分畛域。

然而，到了1965年8月9日，南端的新加坡宣布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从此才有“新华文学”这个名称——新加坡共和国的华文文学也脱离了原有的“马华文学”而独立发展。

马来亚半岛俗称“西马”（西马来西亚半岛）；而东马是指沙巴和砂劳越二州而言。至于“南马”呢？它是马来亚半岛（西马）的南部地区，包括马六甲至柔佛二州。古色古香的马六甲，是“古国之都”，历史悠久，骚人墨客甚多。柔佛有“天府之州”的美誉，

经济作物丰收，文艺人才辈出。由于它靠近文化发达的新加坡共和国，两地写作人交流频密，受新华文坛影响更深远，所以热爱文学的写作人有更多精心构思、观摩锤炼的机会。在创作方面别树一帜的南马作家，也不乏其人。

马来西亚的总面积约330434平方公里，而南马地区面积只有20951平方公里（柔佛州面积约18941平方公里，马六甲面积约1650平方公里），在这块仅占全国总面积约6.23%的区域，却是整个马华文坛的重镇之一，有多位耆宿学士的名山之作，见称于世。因此，南马地区可与中马、北马或砂劳越等区域相提并论，并驾齐驱。尤其是在南马土生土长的写作人，是绝不落入后的。如今的南苑，林木葱茏，枝叶茂盛，繁花满树，果实累累。

笔者早在1969年间，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漫谈南马文艺界》（署名邱子浩）的简介文字，后来被新华作家赵戎先生（已故）收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八集·史料》（1971年出版）一书里。转眼间，已过了22年！今天，笔者所发表的这篇史料文章，可说是前文的续篇，冠以《南马文苑的繁花硕果》为题，并附上《1970～1991年》字样，希望高明之士多予补正。

南方适宜培文才

在上文里头，笔者已约略提到，南马地区多文人的原因；事实上，还有几个因素促成南马人爱好写作。大体上，他们多是受师友的影响所致；文学导师全系犁田耙地、播撒种籽、植树造林的文坛功臣。

战前，由中国南来的文人作家多集中居留在新加坡等商港；南马（尤其是柔佛州的柔南地区）与星洲相距甚近，他们喜欢就近前

来这一区域从事教育工作。我们就以20年代中期的段南奎为例子吧。笔者在《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一书的页94处写道：段南奎“大约于1925、26年间，曾与谭云山、周钧、邹子孟、常焱、曹国宾等先后编过新加坡叻报的《星光》副刊。该早期的文艺副刊从第74期开始，由于编辑委员大多数到柔佛丰盛港去教书，故而星光编辑部就由新加坡的育英学校移到丰盛港的培智学校去（由写作人邹子孟、段南奎、常焱、曹国宾四人负责）。……段氏曾到丰盛港出任校长。”……这说明了纵使是在战前的20年代中期，南来的中国文人也乐意到偏僻的柔南村镇来教育下一代。老师爱好文学与写作，很自然地也影响学生写作，茁壮成长，渐渐地踏上了写作的漫长道路。

根据史料显示：在战前，柳北岸、潘国渠（潘衣虹、潘受）、老蕾、李蕴朗、王君实、杜边、沈思明、叶冠复、林潮、陈清华、漂青、李树梧等等都在柔佛州的教育界服务过。大约在5、60年代间，前来笨珍培群中学任教的作家或写作人，就有曹兮、黄伟强、杜门、林中杏、钟祺（在图书馆任职）、姜凌、黄敬恭、匡光照、沈櫓等。约在5、60年代时期，应聘成为新文龙中华中学（龙引）教师者，计有：黄润岳（校长）、沈安琳、林鲁生、王恢、蔡寰青、萧劲华、陈植庭等。后来到了6、70年代，出身于上述两间中学的马华作家特别多，诸如杨夷、钱柏华、李伙、林丹、林青、吴宏声、钟山松、陈浩等（以上为笨珍培群中学校友；以下则为新文龙中华中学校友）、晓帆、高秀、梦平、艾芸、华山、郑易、古寅、蓝沙、郑国治、李万千、杨冰等。这批新一代的写作人当年之所以会走上文学的道路，谁说不是多少受到了上述作家老师的影响？其他多间华文中学，何尝不是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南马接近新加坡，许多青年学生相继前往狮城深造，在当地，接触了更多文学界的良师益友，切磋琢磨，于是，加速了他们成为严肃的文艺工作者，终于升堂入室，享誉文坛，留下可传世之作。

离开南苑异地芳

为了深造，为了谋生，为了施展抱负，为了憧憬未来，也许更为了有个良好的写作环境，好多好多在南马土生土长的写作人都移居他处了——南马已成为他们的故乡所在地；他们早已是属于其他国家、区域、海外的作家啦；在异地，他们取得新的文学突破。在此，我们仍怀念这一批写作人，甚而以他们彪炳的文学成就为荣！

值得一提的有下列约123位原是南马的写作人：

现居新加坡——李过（原是巴莪人）、杜诚（麻坡）、林丹（笨珍）、杨贵谊（笨珍）、林青（笨珍）、李学文（马六甲）、黎声（乌鲁槽）、郑文辉（玉射）、米然（居銮）、蔡良乾（马六甲）、陈朗（东甲）、陈剑（新山）、饶柏华（笨珍）、李贩鱼（新邦）、韩山元（古来）、廖青（马六甲）、蓉子（笨珍）、周天（即陈之，三合港）、杨涌（昔加挽）、李烈（新山）、贺兰宁（马六甲）、李伙（笨珍）、彭世灼（边佳兰）、流军（边佳兰）、罗林（边佳兰）、冬琴（边佳兰）、谢世涯（边佳兰）、丘克难（三合港）、网雷（笨珍）、张清江（新山）、吕振端（麻坡）、林虹（北干那那）、宋雅（峇株巴辖）、吴振强（双溪沙翁）、黎达材（昔加挽）、梦君（古来）、朱扬（新山）、贺平（乌鲁槽）、夏金水（乌鲁槽）、萧平（亚依淡）、周牧……等等。

现居吉隆坡——孟沙（昔加挽）、许简（许光道，麻坡）、黄碧云（麻坡）、陈雪风（麻坡）、李冰人（麻坡）、郎格非（乌鲁地南）、萧萌（玉射）、艾维丹（笨珍）、陈清德（利民达）、高青（峇株巴辖）、采多（麻坡）、吴仲达（麻坡）、郭隆生（昔加挽）、林鲁（新山）、吴恒灿（永平）、江上舟（巴罗）、何国忠（加亨）、孙彦庄（新山）、黄学海（彼咯）、张永修（马六甲）、王祖安（乌鲁地南）、郑云城（马六甲）、林年绿（马六甲）、雅

蒙（马六甲）、吴维凉（马六甲）、史阳（即史雷、韩弓、张汉音、陶熙，边佳兰）、林雪乐（马六甲）、佐汉（马六甲）、陈亚才（新山）、陈泽清（麻坡）、陆庭输（麻坡）、曾荣盛、张永新（居銮）、张丽珍（马六甲）、谢祝南（新邦令金）、张灿泉（峇株巴辖）、刘慧华（峇株巴辖）、何谨（马六甲）、郑辉（麻坡）、庄若（马六甲）、张文光（峇株巴辖）、陈毓平（麻坡）、陈欣（昔加挽）、邓章钦（峇株巴辖）、陈志明（峇株巴辖）、爱薇（麻坡）、凝思（巴罗）、钟天祥（彼咯）、李万千（亚依淡）、张木钦（麻坡）、钟松发（笨珍）、蓝琪（马六甲）、顾兴光（马六甲）、庄延波（新山）、黄子（方圆、黄福溪，昔加挽）、纪青（马六甲）、古玉樑（马六甲）等。

现居关丹——文征（麻坡）；现居哥打峇鲁——萧冰（东甲）；
现居江沙——王枝木（居銮）；现居实兆远——黄寒秋（居銮）、
黄浪平（马六甲）。

现居中国大陆——马阳（居銮）。

现居香港——夏浓（笨珍）、晓帆（龙引）、郑良树（新山）、
郑赤琰（士乃）等。

目下居住在海外的南马作家有：文戈（美国，峇株巴辖人）、
黄戈（加拿大，士乃人）、柏青（澳洲，居銮人）、水兴浪（美加，
麻坡人）、裨素莱（日本，马六甲人）等。

旅居台湾的南马作家有：易草舒（峇株巴辖）、叶曼沙（峇株
巴辖）、林绿（马六甲）、陈质采（新山）、黄雪艳（新山）、曾
庆豹（居銮）、赖瑞和（新山）、黄锦树（居銮）、林绥迅（新
山）、叶其忠（居銮）等。

志业永垂忆故人

文艺园林是靠集体培植才有成果，始能树高林密，生机旺盛，百花吐蕊。

曾经在南马写作界有所表现的已故写作人，也有约26位；他们为文学创作而尽了一定的努力，永垂景仰！在此，我们也悼念下列修文地下的笔耕者：

佐丁（1969年辞世，下同）、马摩西（1971）、火王（林金明，1977）、冯业勤（1978）、朱辉（朱孟堃）、高逸群、郑成勋、陈傲三、谢又斋、老杜（1980）、吴金谷（1981）、江边篱（1984）、熊念光（1984）、柳潇潇（1985）、迅郎（1986）、草兵（彭初南，1986）、曾奋（曾纪礼，1988）、陈廷春（万山，1988）、张白萍（1989）、廖富山（1989）、陈漫思（1989）、黄哲真（1990）、乔木（1990）、普洛（1990在汕头谢世）、吴静子（1991）、周清渠（1992）……等。

这批先走的文人作者，有的是福寿全归，有几位是天妒英才，英年早逝，诸如冯业勤、柳潇潇、迅郎、草兵（彭爷）、陈廷春、廖富山、黄哲真等是；他们的志业永垂、式范长存。怅望高风，谁说“人琴俱亡”！

作者分期及新秀

如果根据年代来列分的话，比较勤笔的南马文艺作者该是：

战前有：李冰人、叶倾凤、漂青、林潮、夏浓、许亦周（硕果）、荒草（荇水）、村边、佐丁等。

50年代有：李过、沈慕羽、李定华、黄润岳、吴静子、熊念光

(司马海)、沈安琳、马摩西、叶迎章、史历、何戟、杨夷、江帆、饶柏华、马阳、陈庆昌、马汉、高秀、老杜、石诗元、刘清、王剑、林绿、田里夫、吴宏声、叶斌、林青、林丹、钟山松、江夏、颜龙章、简斋、少鹰、陈汝桐、笔抗、李寿章、梦平、梁志庆、萧萌、李伙、赤阳、采人、端木虹、梦彤、夏金水、罗林、流军、史阳、刘祺裕、黄炳炎、淡如、杜晖、吴华、米然、集文等。

60年代有：郑易（陈雅）、李叔鸣、廖青、静华、林鲁、秃橡（差它，由淡边南下，居住振林山，曾写下数十万言的各类诗文）、江南、李金坡、孟沙、蔡家茂、雅蒙、古寅、李树藩、沙乐夫、方理、林洛人、华山、叶曼沙、彼岸、易草舒、叶吟、梁文华、凝秀、艾芸、艾宁、林过（梦莎岩）、于青、黄寒秋、庄延波（艾梦）、江上舟、马雷、爱薇、迅郎、蔡淡、陈剑、廖梓祥、邓国先、赖瑞和……等。

70年代有：文戈、郑辉、洪泉、郑祖、柏青、文征、艾斯、孙快雨、吴维凉、艺青、颜圣兴、郑玉礼、芸亦尘、符肇流、赖文星、劳文青、翻腾、笔戈、东海客、何谨、采多、刘涓、方圆、飘逸、白杨、佐汉、余飞飞、林年绿、林雪乐、蓝琪、风山泛（黄学海）等。

80年代有：小曼、胡马（徐光成）、何国忠、林思维、郑云城、杨川、蔡培春、叶夏贵、李逸思、许育华、孙彦庄、杨善勇、王绣庵、佩韦、萍义（俊义）、曾庆豹、棚素莱、李振兴、碧枝、水流星、水兴浪、骆青莲、黄学明、黄锦树、黄雪艳……等等。

据笔者约略统计，南马华文作家/写作人有单行本问世者，约有113位；目前仍居留在南马区的写作人，最多著作行世者，该是年红（约有大小集子30余本）、马汉（30册）、梦平（约23种）、爱薇（约16种）、林思维（约15本）、端木虹、梁志庆、吴华、彼岸、李寿章、高秀（以上作者至少出版3本书）等。

南马新生代作家/写作人的阵容也相当壮大，六字辈（1960年~69年间出生者）的新秀多的是；潜质佳、蓓蕾已开，一串串果实缀满枝头，例如：艺青（1961年生）、杨川（1962年生）、黄雪艳（1962年生）、何国忠（1963年生）、黄学明（1963年生）、水流星（1963年生）、邓章钦（1963年生）、郑云城（1963年生）、孙彦庄（1965年生）、曾庆豹（1966年生）、杨善勇（1968年生）、还有棚素莱、水兴浪、黄锦树等等，他们多有一枝生花妙笔，在写作上得心应手、吐故纳新，斐然成章；要是今后能够匠心独运、千锤百炼，当可写下光芒万丈的作品，留传后世。

散居各县齐迈进

除了移居南马区外的南马写作人，目前仍居住在马六甲和柔佛二州的南马文艺作者，他们有的默默在写作，有的正积极地在地参与文艺活动，据笔者所知的略述如下：

马六甲——端木虹、静华、张昆来（梦兰）、何戟、邓日才、骆青莲、林思维、赖文星、心香、许万忠、沈墨义、古望利、萍义、杨川、泽兰、佐汉、丁仇、高天、苦艾、方鸿毛、蔡淡、周景妮（回流）、林宣崇、成新、丘敬耀、李金坡、南乡子（潘正联）、魏家祥……等等。

麻坡县——林潮、年红、陈庆昌、梁志庆、刘祺裕（衣谷）、方理、洪泉、刘发振、笔抗、浩于豪、啸军、郑玉礼、集文、村生、梁爽、楚军（蔡金殿）、侯享钊、苏和生、集群（周宜帮）、周庆芳、符肇流、黄白（鸿奎）、王绣庵、陈寅、杜保兴、何克忠、李叔鸣、金霖、陈之刚、李敬德（释开御）等。

峇株巴辖县——艾斯、杜坚、林洛人、于青、唐旭、夏思霖、

舒颖、蓝沙、剑客、蔡培春、宁子、碧枝、颜龙章（水沫）、林腾飞、陈春福、珮韦、杨冰、黄世文、克柔、郑国治、沙乐夫、胡英兰、欣逸、冷冰冰、庄迪澎、黄文林、杨秀、灵子等。

昔加挽县——石诗元、晋斌、金傅、漠北羊、金叶子、郑举、方圆、杨善勇、韦辛、黄圣钦等。

居銮县——叶斌、叶吟、白杨、小双、劳文青、孙快雨、采人、凝秀、赤阳、冯东阳、李振兴、胡兴荣、钱圣叹、浪雨寒、驹光等。

古来县——高秀、艾宁（夏桦）、翻腾、罗长风、章云、闪华、翔雁、静夫（庄客）、幻风、田土、艾原、林明华、欣荣、多明、陈云、戈雷、凌秀、吴雪、潘剑鸣、苏群、吕才易、星子（蔡国保）、傲雪（慧贞）、刘育龙等。

笨珍县——匡光照（斐楼）、郑祖、林过、惠铭、许元龙（白龙村夫）、霭秀、嘉立、土戈、梓帆、赖孙耀、江夏、洪松、郭青、郭美熹子、罗鸣、颜宁虹、萧志洋、罗继明、陈祈錠（雨浪）、潘雨桐、黄妙倩等。潘雨桐自80年代初至今，居住在龟咯某大园丘担任高职，业余勤于写作，小说作品屡获台湾比赛的大奖，所出版的两部小说集，也都是在笨珍县完成的佳构，目下已是全马杰出的小说名家。

哥打丁宜县——李定华、林子亮、郑锦、郑尧子、曲归、玄阴、谢泗匡等。

新山县——漂青、江帆（吕公明）、吴华、郑易、陈汝桐、荇水、李福喜、史历、秃橡（差它）、彼岸（人间、野夫）、李寿章、田里夫、华山、黄振忠、芸亦尘、江南（江醉月）、古寅、马汉、叶迎章、陈育青、张瑞发、叶夏贵、小曼、艾芸、刘湄、艾舒、北风、史君轼、符传曙、熊柔波、曹盛干、林明华、吴海湖、邱永泰、龚秀琴、彭质斐、舒庆祥、李浩财、林楚莲、黄甦、刘淑娟、颜金屈、王观新、李昆生、蔡家茂、雷栋、李逸思、飘逸、钟山松、戈

军、龙翔、笔戈、蔡家茂、胡马、余飞飞、马雷、梦平（马峇）、罗民广、邱滴、莽流、季情、丘碧茵、左手人（黄远雄）、东海客、黄璧光、蔡崇辉、李继林、姚新光、陈文浩、海雁、黄复生、黄循积、莎琳……等等。

以上简介的约236名南马华文写作人，散居于上述的马六甲及柔佛二州各地，他们都能站稳在个人的岗位上，埋头读书与写作，并推广文学运动，提升文学修养，提高阅读兴趣，塑造一个更优雅闲适的社会；同时号召和鼓励年轻一辈，积极参与文学活动，勇于学习创作，并培养接班人，发扬文学创作，以期马华文学更为丰富、灿烂和多彩。

文社出版及特点

在马华文学界由文人与作家组织的文学团体和合作的出版社并不多见；这在南马地区也不例外。不过，本区的一两个文学团体，却做得十分成功，值得推崇。

首先，我们要简介设在麻坡的“南马文艺研究会”，简称“南文会”，它在全国也是华文作家历史最久的团体之一。

于1969年，由年红、梁志庆、梦平、马汉、蔡淡等发起成立的“南文会”，迄今已有23年的历史。它除了大力推动会务之外，还搞文学作品的出版工作，计分“南马文丛”、“南风文丛”、“南马艺术丛书”、“青年文丛”、“南文会少儿丛书”和其他文集等，总共出版了近60种单行本。通过“南文会”出版社策划出书者约有15位，这项贡献是其他文学团体所罕见的现象！

南文会会长年红和秘书梁志庆领导有方，经之营之，总其大成，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他两人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努力和培养接班

人的热忱，也是其他作家所难以媲美的地方。他们在中国大陆和港台等地，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南文会”与其他社团合办了4届的“青少年文艺营”，对于训练与培养新一代的写作人是深具意义的；其实，目下的好些文学新秀，他们多参加过由“南文会”联办过的青少年文艺营。是的，“要使马华文学的创作水平和地位继续提升，那么培养接班人应是急不容缓的事，因为只有在‘后浪推前浪’的情况下，马华文学的光彩才会持续和永存。”

由古寅所领导的“大马华文作家协会柔州联委会”（秘书高秀，成立于1988年11月8日），和洪祖秋所领导的“笨珍文艺协会”（秘书惠铭，成立于1991年1月19日），也办过一些活动，唯成效还不显著。我们寄望这两个文艺团体，跟即将成立的“峇株巴辖文艺协会”（林洛人出任主席，剑客为秘书），能够像“南文会”那样有不俗与创新的作为，使南马文苑饱含生机，朝气蓬勃，竞放鲜花，垂实如珠。

最后，我们要提到另一项南马作家“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南马的儿童文学家特别多；这是中马、北马或东马以及西马东海岸等区所罕有的现象。

在整个马华文坛上，已有创作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版的作家寥若晨星，他们该是：流芳（陈孟）、曹莽、小星星（罗柏）、碧澄、永乐多斯、年红、马汉、梁志庆、马峇、艾斯、文戈、爱薇、方理等。然而这13位作者当中，除了流芳（北马）、曹莽（北马）、永乐多斯（中马）、碧澄（中马）和小星星（中马）5人之外，其他8位全部是属于南马作家。这难免令人觉得，除了南马作家之外，其他地区的华文作家并不重视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啦！这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南文会”还与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组团互访，并联合出版了

会员合集《一般风物》（1991年6月）。

小结

像大马的所有地区一样，今日，南马的写作群已不再寂寞与孤单啦！以往的马华文学，是在困境中自力更生而发展下来的；当时的马华写作人，尚且能够在重重困难之下有不俗的表现。目前可不同了，不仅他们的地位已普遍受到肯定，且有本地报社的负责人关照（定期提供副刊发表该文艺团体会员的作品），和乡团的文学评审会扶助（颁予出版基金让写作人出书）；以团结大马写作人为宗旨的马华作家协会已成立15周年，贡献不小；最教人振奋与安慰的，是马华写作人已与世界各地的华文写作界进行交流或联系。……这些文学交流等的工作，南马作家也跟其他区域的华文作家一样，表现得相当积极与合作，展望前景，谁不乐观呢！

[附录]

◎脱稿于1992年5月29日·新山马星园

◎原载于1992年12月出版第35期《亚洲华文作家》（台北）

◎1996年6月21日转载于菲律宾《世界日报·文艺副刊》

附录

柔佛州6个文学团体一瞥

出生于柔佛州的马华写作人或作家众多，居大马各州之冠。在文艺团体的组织方面，获得当局批准注册的文艺社团也最多，至少有6个单位。

这类组织的宗旨，不外是在联络各地文友的情谊，进而在写作上互相切磋，互相研究，以求进步。写作人的本位是写作，在行有馀力时，则推广文学活动。

这几个文学团体成立之后，在一般上的运作都使各县各地的文友们加强连系、增进情谊，研讨文艺创作上的心得，共同推广马华文学活动，并提高创作水平。

兹将这些文艺团体的负责人或领导者名表列下：

①南马文艺研究会

“南文会”会址设在麻坡，成立于1969年9月，迄今约28年。

该会第14届（1995～1997）理事会名表——会长：年红。副会长：爱薇、静华。

秘书：梁志庆。副秘书长：浩于豪。财政：刘兴。

理事：方理、高秀、艾斯、佩韦、郑祖、碧枝、灵子。查账：陈庆昌、刘麻生。

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柔佛州联委会

成立于1988年11月8日，于1996年11月23日改选的新届理事会名表：

主席：翻腾。副主席：古寅、马峇。

秘书：江南。副秘书长：高秀。

财政：艾芸。联络：华山。委员：马汉、赖孙耀、洪祖秋、陈含黎、李寿章、欣荣。查账：曾庆容。

③笨珍文艺协会

正式成立于1991年1月间。首届理事会理事名表：

主席：洪祖秋。副主席：林过、许元龙。

正秘书：曾立旺。副秘书长：赖孙耀。财政：黄剑智。

理事：张美增、黄盛夏、高淑腾、薛愿平、张维民、钟玲玲、黄金看、李云飞（已故）、陈含黎、罗继明。查账：郑兴成、萧志洋。

④峇株文艺协会

于1993年3月27日举行成立和首届理事就职仪式。1997年3月11日改选，新届理事会名表如次：

顾问：颜龙章（水沫）。

主席：林庆文（林洛人）。副主席：黄良佐（沙乐夫）。

秘书：庄茗贵（茗庄）。副秘书长：张秀贞（艾斯）。

财政：黄秀坤（佩韦）。理事：符蔼立（舒颖），戴贵英（碧枝），陈芝琳（灵子），张暖薇（文欣），谢礼如（柔剑），杨秀麟（杨秀），冯笃生，王诗富，林腾飞，江巧珠。查帐：谢立娟，陈明真。

⑤居銮文艺协会

在1994年6月间获准注册，第1届理事会理名表：

主席：许福昌校长（小双）。副主席：叶斌，陈有木。秘书：陈家文。副秘书长：蔡莹莹。财政：陈桂莲（凝秀）。查账：李友生，蔡海棠。出版主任：符传昌校长（白杨）。委员：吴丽梅，萧青，林栏，郑荣宗，钱圣叹，高秉益，郑剑治，简瑞平。

1997年1月25日，该文艺协会召开会员大会，改选第2届（1997

~1998) 新届理事会, 理事名表如次:

主席: 许福昌。副主席: 叶斌、陈有木。

秘书: 吴丽梅、邓佩珍。财政: 凝秀。

理事: 彭伟君、郑剑治、萧青、凝思、劳文青、胡绣美、何美秦、白杨。查账: 蔡海棠、符致文。

⑥麻坡南洲诗社

约于1973年成立的南洲诗社, 至今已有23周年。社址在麻坡, 社员来自柔呷各地。现任正、副社长是陈之刚和苏和生。

全马共有四间诗社, 那就是吉隆坡的湖滨诗社、怡保的山城诗社、檳城的艺术协会诗词组及麻坡的南洲诗社。这四间诗社每年都轮流举办全国诗人雅集的庆典。这20多年来, 南洲诗社的30多位文友, 每个月定期举办一次雅集。在集会上, 他们吟诗作赋、舞文弄墨, 默默的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诗词书画, 秉传薪火。

1997年2月3日·河畔丘园



南马文艺研究会执委、会员及顾问, 前排左起: 林过、郑易、马峇、谢又斋、年红、李晋华、梁志庆。中排: 刘雅翠、刘士琪、彭初南、林庆文、庄延波、钟赋。后排: 端木虹、金叶子、艾芸、韦辛 (1975年10月1日·麻坡)。

小说与生活

有这么一位老友，与我是无所不谈的。

他醉心于西洋文学，吸收了不少的西方的存在主义和意识流，老爱强调现代主义是顶先进、顶犀利的一种创作方法；而佛洛伊德发现人类最大的世界并不是大而无当的宇宙，却是内心生活。于是，他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阐明现代人生的处境。

过去，我曾故意跟他抬抬杠，笑他沉酣在文学的“象牙塔”里头。我引用台湾评论家高全之的话说：“……中国的小说家，如果没有海明威、卡夫卡、卡缪、贝克特的‘哲学构式’，未必就缺乏哲学的‘深度’。”——由于切磋琢磨，我们争辩到面红耳赤，观点不相同，见解不一致，但为了寻求真理，始终无损于友谊。

分别数载，最近老友有信来，他竟然写道：“现代文学固然开拓了本地小说的领域，不过有大量这类作品都好作哲学的默想，或进而以小说为工具来宣传存在主义，使属于感性的小说艺术特质削弱了。同时在表现手法上，多无法表达当前知识分子的内心实况，却借用了西方作家的思想结晶，甚而文过其实，把莫名的绝望与惶惑的知识分子的世界呈现开来。此外，他们还把作品弄到神而化之，晦涩难懂，佶屈聱牙。小说必须出自生命的真诚，不容渗进丝毫的虚伪、……我仿佛已从浑沌中清醒，从迷茫中觉悟，我忽又觉得那些人道主义充满希望和乐观的世界之作品会更可贵的。完全背叛上一代的传统，会是完全正确的创作路向么？若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纵然在艺术技巧方面有较新颖的表现，能反映现代人生活的那种复杂情况和心理，也弥补不了损失的。写小说绝不能与社会有太多的隔阂。如果一个作家不把当前生活面貌投射入小说里，他的作品迟

早是要僵化的。今后，我不会像过去那样尽写身边琐事，或吟哦个人主义的情怀。我应该从多样复杂的生活现象中去感受，以便取得在创造小说时有用的原料，继而加以集中概括，用语言表现出来；也唯有这样，我们笔下的人物形象才能塑造出来，活生生的具有现实的典型价值。……”

这是老友出于苦思而得的妙语。经过冷静而深入的思考，引起我深思——我们也要端正自己的文艺观呀！

我自然又想到沉酣在文学的“象牙塔”的一群，记起朱西宁所说的：“小说作家不应追求时髦，若自己的生命中没有‘存在主义’的内涵，又认为如果不写存在主义，将被讥为‘落伍’、‘不体面’、‘不前进’，被人耻笑，因此而勉强表现，这些因素，就与关云长的‘虚伪’如出一辙。因此我们不应追求身外之物。”

谁也不能否认，“文学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式，是人类现实生活生活的缩影，有着思想认识的作用”。而小说绝非一种高深不为人解的学问，可以说，它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常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写小说必须具有多多益善的生活经验。凡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小说，自然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和理解生活、丰富我们生活的经验、扩大生活的视野及眼界。

我们容或相信“诗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碎’的粪土中长出来的奇异的花朵”，然而写小说（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则非对生活的体会达到相当的深度不可。如果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斯坦贝克、海明威和萨洛扬……等等名家，他们不广泛的深入生活、实践生活，甚而一切创作从生活出发的话，其小说一定黯然失色；缺乏生活气息，失去感染力，绝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创作。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时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工具。

一般陶醉在文学的“金字塔”里面的小说作者，虽然他们也“身

入”生活，但却从未“深入”生活，故而无法把真实的生活图画深刻地、生动地展示出来，读者当然难以从其小说中直接感到那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有血有肉的生活情景。

小说创作不可能完全违反生活的真实，纯粹走向反现实主义的。谁都同意，写作需要有高度的艺术技巧；不过，若把技巧看作一切，那就错了，更重要的是熟悉生活和理解生活，跳出了狭隘的生活圈子，学会概括生活和表现生活——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选择较有意义的人物或事件来着笔，踏踏实实地把典型现象，通过有心灵有血肉的个性表现出来。再说，纵使为了发掘大众生活中的口头语言，我们也得深入群众生活去寻索。

凡是忠于读者的小说家，必然也忠于生活；他时时刻刻在生活中吸取各种人生经验，然后提升了概念，又把概念回归生活，选取典型，以更质朴深广的笔致，进一步扬弃“知识人的偏激”，仅凭艺术化本身使自己的小说增加感染力。有志于写小说者，更应当深入钻研正确的文学理论，虚心学写，广泛地涉猎社会科学知识，热爱生活、参与生活，敏锐的观人察世；与其推崇某种文学流派，不如多多观察生活、思索生活、研究生活……

我们坚信：只有根植于广阔的现实生活的小说，才有真实的生命。

稿于1978年5月

◎原载于1978年7月30日《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

在文学的小路上迈大步

正如好多国家的文艺作品一样，马华文学艺术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尤其是文学作品，可当作社会文献来使用，深具研究的价值；盖因早期的马华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内容，文学工作者多能认真地描写人与社会的关系。

忠实的记录

文学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从约65年来的马华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马华文学与当地的实际社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它表扬了由侨民意识的进化成为效忠马新的爱国意识，展示了每个时期和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概貌。涌现在每一个阶段的写作者，对马新华人社会的生活思想，都作了相当忠实的记录。

文学史家告诉我们，马华文学不仅是个文学运动，而且也是一个思想运动，作品中富有新思想、新内容，并倾力于提倡南洋色彩和南洋题材。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文艺工作者，无不接受了那一个时代思想的洗礼，继而在笔下发出共鸣，并在作品中表现出现实的发展性。

我们深信任何一位稍为接触过马华新文学的读者，他都不会说“马华写作人不关心社会”的。

设若不关心社会

设若马华写作人不关心社会，那么，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怎能确定了自己崭新的路线，致力提倡科学、提倡民主、反对封建和反对侵略，强调作品的新兴意识，甚而把自己看作是发扬新思想、改革社会的一份子呢！

设若马华写作人不曾关心社会，那么，新文学运动怎能继承着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而滥觞开来，长久与中国新文学血脉相连，息息相关？

设若马华写作人不关心社会，本地文学怎能与社会结合起来？他们又怎能负起社会的使命感，建立起自己的作战阵地，形成一种文学运动、思想运动？现实主义写作路线又怎能发展成为马华文艺的主流，以文学来反映本地生活和表现当地的问题？

设若马华写作人不关心社会，文学史家方修著的《马华新文学史稿》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定评：“……就内容方面说，它是一种经常体现着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主义的时代思潮的文学。”——而马华文学作品的本质和内在价值，又怎能让读者带来不少的宝贵历史性知识呢？

设若马华写作人不关心社会，那么，那些先驱作者如林独步、陈桂芳、谭云山、海底山、曾圣提、陈炼青等等怎能写下反映时代先进思想的作品？早期的编者与写作人又怎能提出南洋色彩、南洋题材这一类的理论和口号，进而更结合了地方色彩与写实主义？

设若马华写作人不关心社会，早期的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潮流，又怎能普遍地体现在各种不同形态的作品中？有的写作者还直接地参与社会活动呢；不是么？土生土长的知名作家诸如：孙流冰、戴英浪（疾流）、杜运燮（吴进）、韩萌、米军、史汀（陈秋舫）、夏浓、冰梅等，何尝不是由于太关心现实社会而不

容于殖民地当局，结果不得不移居他处？新马沦陷期间，当时几位热心社会工作的作家或抗日志士如：郁达夫、王君实、饶百迎、李词佣、萧扬、许梅玉等，不是由于太关心社会变动的问题的话，很可能不会成为日寇淫威下的殉难者。

创作水平与价值

经常听到人家这么问道：“马华文学的素质，果真那么低劣？马华文学的创作水平，果真那么低落吗？”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得妥贴。

本地的华文文学竟变成受讥评的对象，而讥评者纯凭臆测便抨击它不入流、不屑一顾，谁听了会坦然呢？

有一次，跟一位喜欢抨击马华文学作品的新交提到吴仲青、林参天和殷枝阳（金枝芒、乳婴）的小说创作；陈南（陈如旧、东方丙丁）和李润湖的杂文；王君实、田坚和叶冠复的散文；静海、李蕴朗和刘思的诗歌；陈炼青和张天白（丘康）的文艺评论；叶尼（吴天）和孙流冰的戏剧；紫焰的报告文学……等文艺的作家及作品的时候，他却不甚了了，答非所问。试想：他连这些有相当的代表性的马华写作人都不认识，还有什么资格把本地的华文创作贬得一文不值呢！

个人始终不明白，为何总有一些人情愿自绝于最宏富的文学宝库，却老爱随口抨击马华文学作品充其量只有高中程度。

马华文学作品已然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影响了社会，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作用。因为它能够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帮助大家认识一种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律和具体面貌，所以从马华文学的内容，你不难窥见马新社会生活的变革和发展。

不论战前、沦陷期、战后和独立建国的几个重要阶段，数以千计的文艺工作者都先后完成了每个阶段的时代使命。他们把自己所认识的社会生活，和个人所产生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传送给读者。本来嘛，从社会的意识上，谁都承认本地文艺发展的重要性。若要了解典型环境、时代演进变化的状况，又想跟作者交流思想感情，你怎能不阅读马华文学作品呢？若要了解马新各族人民现实社会生活的缩影，丰富自己生活经验，扩大生活的视野和眼界，甚而吸取历史的教训，你能不翻阅马华文学著作吗？

唯有多阅读马华文艺作品，我们才了解过去的社会现象是怎么回事儿。比方从文学作品中听到了50年代中大伙儿高喊“默迪卡”的呼声，你自然感到了当年争取独立的同胞们脉搏的跳动！

话说回来，我们绝不否认在马华文学作品中，成功之作少之又少；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创作是罕见的。早期写作人的作品只是粗线条式的勾勒，并非精雕细琢；他们描写事物，抒发情怀，不追求纤细的技巧；驾驭语言，选取题材，也只是尽力昭现生活的状貌罢了。然而，它却传递出凛然正气；这是我们所乐于接受的。

个人始终对战前的马华写作者存着一份敬意，因为他们为拓展马华新文学所作的奉献和牺牲，委实太大了！偶尔翻阅那两三套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发现多少写作者对时势寄以感慨，表现出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他们不断地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反映出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愿望和要求，并提出与大众的权益有关的重大问题。

许是当年的文艺工作者，把政治文化革命的使命比文学使命看得更重，加上要掀起抗战文艺运动，因而未能精心构思、艺术加工，对生活的材料缺少提炼、融汇，终于无法通过形象有艺术概括，把现实生活加以典型化，变成未臻于完美的作品。

严格来说，我们的马华文学，在艺术创作上失败的多，技巧达到了化境的少，必传之作简直是“凤毛麟角”。此外，马华文学作

品还欠缺一定的文学风格，这包括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和阶级风格。因此，不容易找出它一些显著的特征。

写到这里，不由地联想到已故作家曹聚仁在《文思》中的《文艺谈——（三）作者与社会》里写着：“曾经有人讨论过伟大作品不能产生的原因，原因本来不只是一种；畸形的社会，使作者不能从容去写作，也是主因之一。资本主义的社会，把作者和他们的作品，都当作商品看待，那态度是非常冷酷的。……在不合理的社会组织中，市场上所需求的商品，并不是作品，伟大作品自然无法产生了。”——马华文学的佳作少，一路来的文学工作者是不是也受到同样的际遇？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建立自己的文学

马华新文学的发展已有65年，这历史是短浅的。

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艺术，马华文学谈不上有悠久的文学传统；随着国家的成立，我们需要建设自己的文学——文学也独立啦！

一般的文艺工作者，都会向外国寻找理想的创作方向，选择作家及作品作为学习和仿效的对象；于是，文学流派遂愈来愈多起来。

这原本不是什么坏现象；然而，令人不免有点疑惑的，是今日的文艺青年似乎缺少了创作的基本精神，不是文过其实，就是爱唱低调，不愿作客观的、本质的反映；不是一味要片面追求形式之美，就是其描写多是停止在事物精神以外的物相上，不能充分而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有的写作者在描写人类的心理世界时，不是描写人生的虚无，就是尽量暴露人类的罪恶行为，并过份的描述性爱情形，几乎完全忽略了理性与善良的一面。这类时髦的文学产物，也许能够吸引有闲阶级的读者阅读，但它不是属于大众性的读物，自然鼓

不起一股强烈的新思潮来。——顺此，我们也要向台湾的作家赵知悌看齐：“要求文学的创作应该大步往社会写实的路上踏进”！

（《文学，休走》序中云）

今后，马华文学仍然在孤立中走着曲折迂回的小路；马华文学创作，继续在演变着。

为了别让时代的波涛卷退，所有的文学工作者务须特别严格地要求自己，深入生活，积累素材，提炼主题，不落窠臼；不间断地提高艺术概括的能力和表现生活的能力，不再迷信形式主义那一套。我们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但绝不偏废艺术技巧的提升；而“重要的艺术技巧问题，是要依赖作者人生观的深度，和他包罗生活现象的广度，来解决的”。

读者有理由要求本地的写作人拿出来的是“糖”，而不是“甜水”；将“甜水”提炼成“糖”的本领，是所有的握笔者所应当学习而掌握到的。——举凡文学作品的优劣，无不视写作人对现实生活理解的深浅，以及艺术概括力的高低而定；唯有等到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马华文学作品方能达到另一个相当的创作水平。

稿于1985年3月25日

◎原载于1985年6月2日《南洋商报·文星》星期副刊

亚洲华文作家的写作方向

盼望又盼望，期待又期待，亚洲的华文作家终于有幸了，第一次亚华作家会谈已于1981年12月在台北隆重地召开，参加者多达3百余人。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华文作家（马华作家和新华作家）也有多名受邀出席，他们归来后，有几位撰文盛赞那一次的作家会十分成功，收获不小，而且表示对今后的“亚洲作家会议”寄望更大！

随着亚华作家总会的成立，《亚洲华文作家杂志》出版了，至少已有六期在新马市场销售，一般的反应都相当良好，当地的一些写作人也给予热烈的支持；写作投稿之外，还大力地把《亚洲华文作家杂志》推介给亲友们。

容纳在这一份冠以“亚华作家”的文艺杂志里的作品，果尔包括了台湾、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及印尼等地的华文写作人的得意之作，这对亚洲华文作家的文学交流工作，着实已做了最具体而有效的表现。同文同语同种的作家有了共同的组织（总会）之后，加强了联系，培养了情谊，彼此之间最好也有共同的写作方向，发挥一定的文学力量，使华文文学作品在国际文坛上光芒万丈。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文学，都具有各自的特色，马华文学也不能例外。这种文艺特色，是由一个区域的社会、文化、历史和环境形成的。在新马，几个世纪以来，多元种族和睦相处，文化交流，终于产生了一种特有的“马来西亚化”的生活形态；综合了中、巫、印和西欧4种主要文化自然融汇贯通，而所谓“马来西亚文化”便产生了。这么一来，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已不是单纯的中华文化，

而是“马化”的中华文化了。

文学是文化中主要的一环，因此，马华文学必然与亚洲其它地区的华文文学有所迥异，至少在内容和文学所特具的色彩不太相同。我们同意马华文学的创作水准跟主流国的华文作品的水准有一段距离，然而，马华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是其它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中所缺少的，至少，当地的坚实内容和朴实的风格是可骄人的地方。有一位从香港移居马来西亚廿余年的小说家曾表示，他来马多年，仍然不能好好地反映新马社会的精神风貌，倒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青年作家把它给描绘下来了。从这一点看来，文笔不比主流国华文作家的马华写作人，大可不必自卑畏缩，只要发奋图强，勤勉学习创作，多向其他亚洲作家看齐、请教和观摩，必然可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有机会出席亚华作家会议的马华作家，你们是有福了，多方面学习之后，自然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向。

过去，前往台湾高等学府深造的新马学生，为数不少；在良师益友的提携之下，在台湾文学界享有美誉的马华青年作家也有好多位，可惜的是，他们有的学成不归，定居外地。所归来的，又有一部分自视太高，不能与当地的马华作家打成一片，共同推动文运的发展。一句话，留学归来的优秀写作人，多年来都不易影响当地写作人，更遑论与确立写作方向。加上一路来，亚洲各地的华文作家鲜少联络交往；既然彼此的时代使命不同，那就更难确立共同的写作方向了。

有些写作人喜欢强调华文文学的“主流”与“支流”等问题；过去也曾在吉隆坡的一份文艺杂志上争论过，一般本地作者对“回归到主流”的问题不感兴趣。若“支流”有了蓬勃的发展，回归不回归到主流去都是次要又次要的问题，又何必加重其他地区华文作者的心理负担？——我们有意确立写作方向，也毋须为附庸“主流”而伤脑筋吧。

大体上来说，主流国的文学，值得学习的地方是无穷无尽的，马华作家自会向优异的文学作品下一番苦功去研究，力求进益。实际上，多年来本地的文学爱好者，都以主流国的上乘作品作为第一选择哩！不少的马华作家，都十分愿意从那些佳作中学习，且已提升了各自的创作水准和表现手法。

已有60余年发展史的马华文学，在选择创作题材方面是无可厚非的；绝大部分的马华作家也是严肃的，各自尽了能力，负起时代使命，以敏锐的观察、细密的感性，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以期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并表达新马人民的心声。为了确立更明确的写作方向，我们非常常“自省”和“自觉”不可，绝不能忽略生活实践和社会参与，多体验人情动态，并具有人性的经验，然后才能扩大传统的领域，摆脱陈旧的题材内容，创作更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

我们正在寻根的当儿，请别忘记先让自身的枝叶繁茂；否则，枝叶枯凋了，根又怎能深入黑土呢？

1985年9月24日·马来西亚黄梨乡

◎原载于1985年12月第7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台北）



左起：端木虹、白岩、陈泽波、唐彭、艾梦、方北方、孟沙、戴小华、张发、冰谷、马峇、伍良之（1988年4月14日·吉隆坡）。

如何推展马华儿童文学

书永远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读书可以自娱，使人渊博，帮助我们应付环境，解决困难，供给思想的材料。

书本在儿童的天地里，也占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辅助儿童最有效的东西，具有启迪纯洁心灵的作用。若能引导儿童进入文学的领域，使阅读儿童文学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将会终生受用。任何事物都不能取代读书，包括电影、电视、收音机及录音机在内。为了让阅读成为孩子生活中的一部份，父母应当尽早培养儿女的阅读习惯。在家庭中，替儿童安排读书的节目——将阅读与生活打成一片的家庭，那幸福将是恒久的。孩子们有了驾轻就熟的阅读能力，就等于拥有了一把锁匙，可以打开另一扇门，进入一个充满童话的美妙世界里，自得其乐。

儿童除了在学校研读书本外，尚需要接触儿童文学，因为儿童的内心世界，是童话的世界；儿童文学对儿童教育会直接的产生积极的影响。许多先进文明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幼童时期的教育，大量提供健康的儿童读物以满足儿童强烈的求知欲。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整个人生心理特质，多半已在3岁的幼稚期间就形成了。儿童在4岁至9岁时期，最喜爱听故事和童话；故事与童话就成为他们的恩物。在这个时候，他们感到四周的环境与事物，都是神秘而有趣的，故此，他对一般的故事及童话都感到有趣。他们不仅喜欢听，而且还不断地求了解——要追出故事的结果来。从这些故事和童话，儿童便在不知不觉中，奠定了最基本的、最理想的人生观。

缺乏阅读环境

一个儿童由开始懂得人事起，到成年为止，在这段时间，都是故事和童话的热爱者；然而，他们由于年龄的关系，对于故事的性质却有不同的喜欢和选择。父母在子女尚未进学校念书之前，读一些简易而有图画的书给幼童听，讲些情调优美的童话给他们听。这种教育方法是有效的，但故事的内容却要经过慎重的选择。凡是神怪色彩过重的故事，神出鬼没的恐怖故事，虚伪的儿童故事和令儿童毛骨悚然、提心吊胆的侦探故事，都不宜介绍给他们，因为它不但不能助长儿童思想和情绪的正常发展，反而使儿童养成忧虑、恐惧等不正常的情绪，恰足以危害了他们纯洁无疵的心灵，等到儿童较大一点的时候，应该讲些科学故事给他们听，目的在于灌输知识、启发智慧，并增进其好奇心。

在我国的社会家庭，阅读的气氛不算良好，尤其是在乡村，更谈不上有什么阅读环境。

马六甲州华校督学王生伟先生，曾于今年11月初在一个集会上披露：教育局在1978年度费了4个月的时间去推广学生阅读运动，可是所获得的反应并不积极。在调查统计中，他发现许多学生阅读课外的读物，只有两本而已，这是令人失望的。

王督学呼吁华校校长和教师不但要特别关注学生的阅读风气，同时也应鼓励他们阅读有益的书报及杂志，以增进新知识，充实己身。他表示，在不妨碍学生的课业情况下，应当鼓励他们多阅读课外读物。

本邦缺乏阅读的环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希望做父母的，也尽量在家庭里缔造阅读的环境，经常买各种适当程度的儿童文学给子女们。开始的阶段，父母还应当好好的指导幼童，激发他的兴趣，使他自小就养成阅读的习惯。

必须积极的发展

儿童文学在教育发展中，是那么的重要与需要的。

可惜在我国，却有不少的教师和家长往往忽略了它——未能对儿童辅以良好读物的教育，鼓励他们阅读它。

所谓儿童文学，就是表现儿童生活、批评儿童生活和创造儿童生活的儿童读物。若能指导儿童欣赏这种文学，就可以培养他适当的休闲生活，增进他身心的健康。

儿童文学的范围极广，举凡散文、戏剧、韵文和图书四类都是；而每一类还包括数种体裁在内。童话、故事、寓言、小说、神话、游记、传记、笑话和日记等，都属于散文类；歌剧和话剧属于戏剧类；而连环图和故事画等，则属于图画类，事实上，它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教育儿童的重大任务，一路走来，它却常被人们忽略了。

外国的作家，甚至是一流作家，都愿意为儿童写作，好像马克吐温、狄更斯、萨克莱、勃朗宁……等等都是例子。而安徒生、卡洛索、爱罗先珂等名家，为了满足儿童好奇的心理，启导儿童走向正确的人生途径，甚至将其毕生的精力献给年幼的一代，为他们创作优秀的儿童文学。

许多西方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其故事是活动性的，既有动作、情节，又有内容及趣味，所以能满足儿童好奇心理，富于想像和好动的天性。

见贤思齐，本邦的出版界和写作人为儿童提供了些什么精神粮食呢？

根据1976年统计资料显示：马来西亚共有5464间学校，其中4344间是小学，共有小学生159万3千人；尚未入学和失学的儿童，也是数以万计。据悉：我们“语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迄今只出版了2百余种适合儿童阅读的儿童文学作品(这包括课本在内,唯华文版本几乎付之阙如)。全国有这么许多学童,而官方出版的儿童读物数量不多,加上在华校的学生未必都能接受得来,故此,在现阶段中,我国的儿童文学是必须积极加以发展的。

优良读物贫乏

在马华文学的领域里,儿童文学的“地位”被肯定下来,这还是最近3、5年的事吧。

过去,虽然也有人在关注和写作儿童文学,可是却鲜少有广泛的讨论,而且尚未有具体的推动表现。今后,在群策群力的推广之下,或许有些成绩贡献出来,这是众人所引颈而望的。

我们的社会,是个商业社会,经济稳定,百业欣荣,然而文学事业却不景气,阅读风气相应的衰落。儿童文学仅仅属于文学中的一小环,整个马华文学既已受到漠视,儿童文学自然更不受重视了。

近三几年来,我国的华文文坛比较有点生气,但距离蓬勃阶段尚远,至于儿童文学方面的发展,仍然是乏善可陈;若以台湾、香港及新加坡方面比之,那真是天壤之别,不可望其项背。

到目前为止,本地除了出版三几种少年儿童期刊之外,似未有健全的出版社,有系统的印行一系列有教育意义的儿童文学丛书,常见的儿童文丛,也多是将学生作品编汇成书罢了,要找到一些像香港出版的《新苗丛书》(新型少年儿童读物)中的《路边草》《小当家》等集子,或像《莎莎的世界》那一类的儿童文学,是难上加难的事。

撇开台、港方面的蓬勃气象不提,邻国新加坡近4、5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也有骄人的地方,出色的近期性儿童杂志《新加坡儿

童》及《欢乐儿童》，销量惊人；于1974、75年间出版的全国儿童读物创作比赛优胜作品《我是一个小童军》等7本专集，和《下雨天》等10册《儿童补充的读物丛书》，以及《24孝的故事》等儿童读物……都印刷精美，文图并茂，内容不俗。

在本邦印行的儿童读物，有如凤毛麟角，少得可怜；而具有本地色彩，适合我国社会需求的儿童读物，可说是绝无仅有。如果单靠本地供应的儿童期刊及书籍来阅读的话，我们的儿童必有精神粮食不足的恐慌。

在本邦的市面上，常见到的儿童读物，绝大多数是来自港台的，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然而属于健康的儿童文学却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书刊之题材，不外是旧材料中翻翻炒炒。经过偷龙转凤的手法改编的儿童读物，每每都是陈腐、平凡、乏力和单调的货色，文学不明确，文句粗鄙，错别字不少，其内容一味强调神奇的武功和个人英雄，完全不合时代背景，价格方面却贵得令人难以置信。

令人更不敢领教的，是一般连环图的少年儿童读物，这些所谓《超级猛书》《新潮漫画》，书名《神龙剑客》《神艇飞天侠》《发光隐形怪》《大灾难》等蛮有吸引力，内容尽是一些胡天胡地、出神入化，渲染超人鬼怪，还加上色情的毒素。儿童与这类连环图接触之后，无形中便会戕害身心，脑海中存有各种歪念头，和虚荣心在作祟，尤有进者，便是模仿书中男女主角的所作所为，以身试法，结果断送了大好的前途。

我们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也发现了为数可观的本地儿童丛书；这些书默默中大量印行，充塞小学图书馆的读物，占了天时地利的方便，不愁没有销路。只要稍微翻看一下，便知晓那是书商盈利的捷径之一，难怪过去有人指出：“商人们谁也想走最简便的赚钱捷径；如果让纯商人来搞儿童书刊出版，难免又要走上翻翻炒炒的老路了。”——是的，这类儿童读物是东抄西录，大炒冷饭，缺少本

地色彩，并不适合本地社会需求的课外书，定价又高到离谱，唯一可取的，是它还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大马儿童读物概况

我国副首相马哈地医生于两年前（1976年7月27日），在首都语文出版局为儿童读物展览会暨研讨会主持开幕时，发表谈话说：所展出的儿童读物不但种类甚多，同时也有价值，适合与配合国家的愿望与利益。阅读是知识的锁匙，也是精神与思想的塑造者。——由这点，可见本邦马来儿童文学方面的进展是相当美满的。

较后，马哈地医生建议全国书籍发展局恢复活动，成为儿童书籍的质素与价格的监督人。他认为这是需要的，因为目前有出版商在出版某些儿童书本的时候，只顾盈利。

当时，有的马来报章也在社论中指出：“我们现时不但面对书籍的缺乏，难以应付在校和幼稚园的儿童的需求（小学至初中3年学生人数总共逾2百万人），同时也面对书内的语文，讲述技术和道德等问题。目前出版的一部分书籍，不论是连环图书、故事书、翻译书本或其他书籍，其文法与内容均令我们担忧。”

——从这段马来报的社论看来，马来儿童文学也自有其缺点存在，亟需改善。

记得在1975年9月间，本邦执政党领袖之一曾在马六甲等地，将一批不良的连环书当众焚烧，宣告“反不良连环图书运动”开始，跟着在州内各地贴海报、发文告、做访问及举行座谈会，宣传不良连环图书对儿童的危害程度，促请政府当局和社会人士对这问题予以正视。

随后，当局禁止了许多不良读物的入口与发售，各地学校和家

长们，也纷纷禁止学生及子女们阅读那些不良的读物。——然而，取缔与禁止绝不是尽善尽美的措施，那只有消极的意义；因为在这之后，所留下的“真空”，又是一个新出现的严重问题。积极的做法应该是：我们为年幼的一代提供些优良的儿童读物，譬如文化团体和出版社印行一些健康的书刊，每一个家庭也应当为自己的下一代选购一些优良的儿童书籍……否则空谈取缔与禁止，是没有多大裨益的。

试想，当众焚烧连环书，宣告“反不良连环图书运动”，不是已整整过了3年吗？今日的儿童文学又有了些什么变化与改善呢？这点是多少令人失望的，因为除了增加两三种儿童期刊外，其它的对各科有辅助的能启发儿童智慧的儿童文学作品，依然少若凤毛麟角。而一些改头换面的连环画书，近月来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那些换汤不换药的《超级猛书》和《新潮连环书》，不是又在市面涌现么？取缔与禁止这些不良“毒物”（读物）的措施，仍旧不能松弛的。

儿童书刊不发达原因

儿童文学未能在我国普遍的推广与发展，个中的因素很多；最大原因是由于本邦是一个商业社会，在商言商，赚钱第一，而搞儿童出版物和推动文娱一样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为了找出问题的症结，我们试把造成本邦儿童文学（华文）不发达的原因略述如下：

本邦的写作人为数不少，其中从事教育工作者至少在半数以上，他们几乎每天都跟儿童打成一片，深悉其心理，寻找儿童文学的题

材也最便捷，可是他们很少关心儿童读物问题，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者更是少得可怜。有的写作人以为写小孩子的读物没什么意义，是小儿科的东西，因而漠视它，提不起兴趣来编写它。

在高度现代化与商业化的现实社会，物质生活重于一切，文学创作本已不讨人喜欢，新书也鲜少人买，更遑论儿童文学了。今天人们过分重视现实，讲求实用，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会考及格，成绩优异，能升上中学，所以天天督促孩子专攻会考科目，从不鼓励他们看课外读物。儿童文学成为“冷门货”，肯印行它的出版社自然锐减了。

教师们希望班上学生会考成绩的巴仙率高，希望儿童把自己所教的学科搞起来，那些所谓儿童文学与考试无关，加上华校学生要学三种语文也的确不容易；校课一多，老师极少开导儿童，久而久之，学童没有阅读的习惯，班级图书馆便如同虚设了。

搞出版业最困难的问题是发行及销路。现代的社会，一般人所热烈追求的是物质生活，父母也忘记了儿童文学是子女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儿童读物的销路原本就狭窄，又得不到家长的垂青；销路不佳的书刊，当然没有出版社愿意印行了。

出版儿童文学的作品的利润菲薄，而印刷成本却日益涨升。儿童读物需要大量的彩色插图，只是单色的插图，缺乏吸引力；为了美观出色，造成其成本较一般书籍来得昂贵。成本贵，定价相应的提高，一般家长即使有心支持，也不可能花太多钱替子女购买大量的儿童读物。如果没有大量的销路，出版社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在本地，一个崇高读书风气的社会尚未建立起来，而被誉为文化摇篮、知识温床的学校，也几乎培养不出一一种正确而浓厚的读书风气。读书风气普遍低落，分散儿童注意力的事物却太多了，譬如电视、电影和收音机，无不紧紧地吸引住儿童的注意力。尤其是电视节目，更是儿童读书活动的劲敌。

有一部分写作人决心写了一些文学作品，也不易公诸于世，因为很少有出版商愿意出版本地的儿童文学作品，目前可供发表（尤其是连载万言以上的长稿）的报纸副刊或儿童杂志，委实太少了。

本地创作的一般儿童文学作品，由于水准不高，内容不充实，缺乏现实感，不能反映儿童的生活，所以无法切合儿童阅读的能力与兴趣，对儿童的吸引力不大，甚至受到轻视。

以上所述，是我国华文儿童文学停滞不前的症结。

推广工作靠群体

良好的儿童文学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与价值，它既能启发儿童的心灵，丰富儿童的想像力，又能培养儿童的品德，增加其知识，发扬其亲善和爱国精神。故此，积极的发展与推广儿童文学，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推广儿童文学的策略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我国有4百万的华裔，过去鲜见有文化机关来出版华文书刊。我们应该有一个以上的文化机关，来负责推动、编写及出版儿童书籍，若由有代表性的文艺团体，联同印刷商、画家和书商，共同负起这方面的重大使命，提供出版条件，让本地文艺工作者去拓荒与开辟——有计划的出版各种儿童书，以期能刺激和鼓励更多写作人来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所有的儿童书籍，重于推介，不重牟利，而社会人士应该群起响应和热烈的支持。

任何文化工作者都有责任协助儿童文学的发展，这似乎是义不容辞的事。我们也寄望董教总筹募一笔出版基金，最好是创立一个“儿童读物出版基金”，成立一个包括编写、翻译和绘画等优秀人材的编委会，专门负责提供儿童文学作品，俾能长期的、有计划有

系统地为年幼的一代服务。

(二) 我们说过，能够辛勤地撰写儿童文学的本地作者少之又少。儿童文学的价值既然已肯定下来，就应该打消不屑写儿童读物的念头，吁请写作人向西方和港台作家看齐是有必要的；千万别以为替儿童撰写文学作品，便是有碍身分。

提供足够的精神粮食，是使儿童养成阅读习惯的首要条件。请别以为提供儿童作品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实，它同样的需要高度的创作技巧，辛勤的工作和丰富的知识。

30年代的中国作家，便有了卓见，愿意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年幼的一代写东西，譬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叶绍钧的《稻草人》，鲁迅和夏丏尊分别翻译的《表》和《爱的教育》就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开明书局的确“开明”，为一些著名作家出版了好多儿童文学作品，致力推广儿童文学。

本地的写作人理应关照小读者，多撰写一些反映我国现实情况，具有本地色彩，内容新颖，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让我们的儿童有更多、更丰富的精神粮食。我们应该承认：孩子们是世界上最好的读者。

(三) 举办儿童读物创作比赛。在本地，马华文学是不受人重视的，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更遭人漠视。

在这种缺乏鼓励、自生自灭的情况下，若由三两个文化机构和文艺社团，每年主办儿童文学征文比赛，必能发掘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者，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优厚奖金的鼓励下，产生了佳作，本地便不愁没有高水准的儿童文学可出版。大家都抱着“服务儿童”的崇高目的，本地的商业机构也应该提出款项来支持这项深具意义的活动。

本邦有过不少的文艺创作比赛，但多未把优胜作品汇集出版；这种做法是不够的。设法把征文的佳作印成集子，儿童便有机会买

到一本新的好读物。通过征文比赛和印行优胜作品，自然激起了一些写作人的兴趣，兴起撰写儿童文学的热潮。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鼓励，对文艺新秀的影响力是极大的。这也推广儿童文学的原动力。

（四）报章增加“儿童文学”版位。推广写马华文学是本地报章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也可以从报纸上读到一些儿童文学作品，有的是成年人撰写的童话、寓言、神话和儿童小说等，有的则是属于儿童的作品。——我们可别轻视那些学生习作，因为其内容有生活气息，所反映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往往不是我们大人所能描绘得来的；孩子们的纯洁天真总是可爱的。这也就是儿童喜欢阅读儿童创作的缘故。

如果报馆编者能够拨出多一些儿童副刊版，让大家投稿，对儿童的鼓励写作和培养阅读兴趣，必然有其影响作用。年幼的一代很快就成长了，这些习作者往往就是马华文坛的接班人，也可能是未来儿童文学的领导人。

另一方面，有志于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写作人，也可以在儿童文学副刊版发表童话及寓言等作品，不致于有“无家可归”之感。

我们希望报章扩大或增加这类属于儿童的副刊，而且编得更精彩，更适合他们的胃口！这么一来，它对于培养儿童阅读的兴趣，必然会起了更积极的作用。为马华文学的前途作长远计，培养下一代的儿童阅读风气，也是当前要务。

（五）儿童文学应列为马华文学的一部分，就如同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文学的一环一样；唯有这样，儿童文学的地位才能提高，写作人才有更大的热忱去创作。

我们再次强调：儿童文学绝不是小儿科。叶圣陶写《稻草人》，张天翼创作《巧克力》，张乐平著《三毛流浪记》……这些名家也偶尔写了这几本儿童文学作品，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他们的“笔向”是正确的，值得得后人学习。

除了本身加紧创作之外，也该尽量将一些富于趣味性和教育性的儿童读物，由巫、英文翻译成中文予以发表，或印成集子。

西方优美的儿童文学，应该包括儿童故事、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剧本、儿童游记、儿童笑话、儿童谜语及童谣等。

(六) 社团和政府应广设图书馆，多购买健康书刊，公共图书馆应设有儿童图书服务——借书给15岁以下的小读者。儿童图书服务的藏书，主要的应有关科学、游戏、娱乐、名人传记、童话和小说；以及一些适合6岁以下儿童的图画书（非连环图画）。

我国的乡村和新村不计其数，应该设立地方性图书馆，因为村童较难买到适宜的儿童书刊。

在这些图书馆里，可举办《儿童书刊展览会》，让公众人士携带子女前来参观，加强对儿童文学的认识，并激起儿童阅读的兴趣。

提高作品素质

(七) 彻底取缔不良读物，矫正一般儿童的读书态度。父母除了要照顾儿童日常的生活、饮食起居，给予恰当的物质享受之外，也得关注儿女们的精神生活；经常购买一些良好的儿童书刊，指导他们阅读，从而养成阅读的习惯和培养正确的人生观。

目下仍有不少含有毒素的连环图，充斥国内各地的市场。儿童的思想单纯，看了这些不良读物，不仅浪费时间，还影响了身心及学业的进展，甚而腐化儿童的思想，马华社会过去曾赞同极力取缔这类不良读物，以免国民（尤其是儿童）受其毒害。现时仍须不断向新潮连环图书《超级猛书》宣战，彻底的扑灭它。

师长有责任指导儿童正确的读书观念，启发儿童的正确思想，使他们了解阅读课外书的重要性。先矫正了儿童的读书态度，然后

他们才会有正确的读书观念，竖立一个严明的读书目标。良好的读书风气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八) 出版社或出版商应当具有远见，以薄利多销的营业方针去对抗港台的舶来品。不必太讲究装璜精美，以免售价过高。

搞儿童文学书籍的出版商，应以“服务儿童”第一的傻劲来干出版工作，任何时刻都该有多少牺牲的精神，不为发行或销量问题而失意或退缩。

一个健全的儿童文学出版社，只要作品有一定的水准，加上售价廉宜，适合儿童的购买能力，同时发行工作做得严密完善，绝不致于亏蚀的。据说邻国的少年儿童刊物《新加坡儿童》，每期销数高达十万份；其他的姐妹刊《欢乐儿童》和《少年月刊》已卖完数万份。他们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本地出版商对儿童书刊的出版及发行，应该深具信心。全马有千计的华文小学，每间学校每年都有固定的图书经费，可以年年添置新的图书。贤明的教育局经已明文规定：凡学校、图书馆欲购买本地出版的儿童书籍，不必向当局申请批准。而来自外国的儿童读物，则须申请获准后，才可购买。这项新条例对于本地出版商来说，是个喜讯。谁说本邦的儿童书刊出版事业的前途，准是黯淡的？

(九) 提高本地儿童文学的素质，纠正现有的一些缺点，采用简体字排印，甚至注上汉语拼音，以便学习汉字的读音。这是出版业进步的优点，值得学习。

作者本身应当不断的提高创作的水准，使内容更结实，更具现实感，更能反映生活。过去本地印行的儿童文学作品，题材略嫌陈旧和不合时宜；譬如《神灯》《白雪公主》《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等等儿童书籍，都不值得翻翻炒炒，改编改写，传播给年幼的一代。

儿童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社会将来的接班人，必须

是体魄健全、知识丰富、头脑敏捷的青年人。假如现在就让他们沉迷在神仙幻境里，醉心在王子与公主的故事中，这么一来，他们永远也成不了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有志气、有骨气和勤劳苦干的人。因此，写作人不要再写王子、公主和神仙一类虚幻的故事；而必须去写真人真事的实际生活的故事。在自己的作品里，建立起正确积极的人生观，树立起伟大人格的风范，以便今日的儿童去仰慕、去学习。同时，还要描绘本邦的建国精神、各民族的和谐相处，人民刻苦耐劳和共建邦国的思想内容。

由于阅读的对象是儿童，作者只要循着现实述描的手法，以上述的现实生活为题材，为我们的儿童创作真实和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华文学校的学生须要学习三种语文，编写儿童作品最好依照教学纲要，以各年级不同的程度来编写，不是以神奇来挑逗兴趣，而是把各科化成有趣读物，图文并茂；中年级以下的儿童，都喜欢有鲜明的彩色插图。

（十）儿童文学读物十分讲究“图文并茂”，有时书中的图画比文字更重要哩。若是缺少了美而实的插图，那本书就像花儿掉落了叶子，对儿童的吸引力大减了。所以，写作人必须得到画家或美术工作者的支持与合作，缺一不可。在推广儿童文学方面，画家是写作人的得力搭档。

（十一）学校多出版壁报，教师诱导学生阅读与写作。

校内应常推行文艺活动，最好是成立华文学会，定期出版壁报，主办诗歌朗诵会，油印健康益智的故事，分派给学生们当课外读物阅读，以激起他们对文学的兴趣。

将学生的优秀作文，寄给报章的《儿童园地》《学生》或《儿童天地》之类的副刊发表，鼓励儿童投稿。等到一段期间，可以将儿童的佳作编汇成书，这比给儿童奖金的鼓励更大，因为儿童有自己的作品刊登或收进集子里，是他最值得高兴的事！有的华文小学

已出版过学生选集，发行后销路奇佳，还再版过呢。

(十二) 学校设立图书馆的目的是鼓励儿童多看课外书，培养阅读的良好风气。父母也应该为子女购买一个小书橱。

学校当局应每年设法采购适合儿童阅读的新书籍，使它不断的充实起来。在图书馆里，可以设阅览室，让学生下课时能随意翻阅自己所喜爱的读物；平日也该让学生借图书回家阅读，藉以激发儿童阅读的兴趣，养成好的阅读习惯，进而打好将来写作的基础。

做父母的为子女提供一个书橱，并按月购买书刊让他保管。儿童拥有了自己的书橱，这个小“图书馆”由他亲自管理；在书的世界里，他自然会有了狂热爱书的趋向，将终身与书结缘。

由于人类正面对科技的高速进展，文学的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有时可利用科技来发扬儿童文学。有意义的儿童文学，不妨先通过电视机和收音机等更容易被儿童所接受的传播媒介，比如搬上萤光幕的《鲁滨逊漂流记》，让儿童看了先有个印象，将来见到《鲁滨逊漂流记》译本的时候，他一定会静下细心地读下去。

结语

为了挽救本邦华文儿童读物的奇缺，充实儿童文学的内涵，今后需要致力推动的地方多的是。与如何推广儿童文学有关的问题太多了，而培养国民阅读的兴趣，必需自儿童时期做起，每个父母都得充分的明了这一点。

阅读可以使儿童的心灵长出绿树，不看书只迷上电视节目，很可能使他小小的心灵沙漠化了。儿童是人类的春天，我们要切切实实的负起教导下一代的教育责任，时常提供健康的精神粮食，满足他善于幻想的心理，憧憬着美好的将来，描绘着美丽的远景，从而

播下了改造和美化世界的种子。

我们最怕儿童这么问道：“你们大人，为什么当要写4个号码（万字票）的时候，才想到要借支笔？……”

如果我们是个写作人，能不为此深思而惭愧么？

稿于1978年·黄梨镇凯旋园

◎原载于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出版《文学研讨会论文集》（1981）



坐者左起：苏群、唐林夫妇、马汉夫人、蓝钦然。

后排左起：汤学尔、马峇夫妇、翻腾、欣荣、马汉、高秀、李拾荒
（1995年12月24日·新山士乃）。

教师、文学与马华作品

小引

在马华文学的发展史上，一般来说，参与耕耘或拓荒的文艺工作者，初为传教士、报人、领事、逃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士或政治失意者，继而是为数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和教师；蒙他们大力的推动与发展，到了30年代，马华新文学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表现。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远溯到1815年左右的梁发以为例子；跟着，名报人叶季允、领事左秉隆、黄遵宪等，他们都给本地旧文学增添了一些彩笔。然后，爱国及革命人士丘菽园、黄乃裳、尤列、陈楚楠、居正、田桐、胡汉民等等，他们在办报鼓吹革命的同时，对新马早期的旧文学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一路来，搞马华文学史料的工作者，多偏重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马华新文学的研究，极少述及1919年以前的马华旧文学。而笔者稍后所提的，也是以本地新文学为对象。——据知：马来亚最早的华文学校是创立于1920年的位于檳城东北的中华A校（华小）和位于近打的益智学校。到了20年代末，新马的华校才普遍建立，自此，新马才有较多的教师在各地出现。

教师催生马华文学

谈到教师与文学，要是我们指出：

如果没有教师，马华新文学将黯然失色，甚且呈现衰败现象，因为比较有创作时间的教师兼写作人，在马华作家中占了几近一半。

以上。

如果没有了教师，缺少他们在报刊杂志上耕耘，现存的马华文学的宝库必将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很可能连现有的战前或战后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也无法编纂出来呢？

如果不是得到教师兼写作者的培养、指导及扶持，现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不一定会走上文艺的道路而有所成的。

如果不是有教师兼作家，在作品中暴露马华教育界的黑暗面，当时的好些丑恶现象和歪风，就不可能及时改善或制止下来。马华文学也无法达到一定的教育目标。

如果不是有这么多的教师兼文人，在课余勤于创作和参与报刊杂志的出版工作，数十年来的马华文学发展经过，将减少许多可大书特书的事迹。

像这样的说法，相信没有人会大表反对吧。

马华教育工作者催生了马华文学，是可信的事实。

而早期，最有分量且是马华文坛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浓烟》，便是由当年的教师林参天撰写30年代初期的马华教育界的力作。

首部长篇写教育生活实相

也许有些新生代的读者会对《浓烟》和其作者林参天发生兴趣，这里不妨略述一二。

原籍浙江，于1904年诞生的林参天，在1927年南来，先后在华小执教与长校约37个年头，历任吉隆坡培才小学校长，于1964年退休；1972年11月6日在吉隆坡辞世，终于69岁。

林氏是著名的小说家暨教育家，一生作育英才，桃李满天下，重要的著作有长篇小说《浓烟》、《热瘴》，短篇小说集《余哀》

等。从30年代第一个年头开始便活跃于本地文学界，他的代表作《浓烟》，全书共有20章，分为6部分，内容是广泛的描写20年代半期到30年代初期的马来亚教育界的黑暗现象。小说的故事是在北马“啼儿国”的一间华学校里展开。林参天在书中提出了好多关于教育的问题，所以出版后受到文教界人士的重视。当时首号评论家张天白曾在《星洲日报·晨星》副刊发表书评，郑重地介绍了这部小说。

较少为人所知的，是林参天的《浓烟》乃系以他的好友谭云山（也是马华作家暨教育家）当教师的遭遇而找到了小说人物与灵感，从而暴露更多侨教的阴暗面。——谭云山（1901~1983年）于1924年南来新加坡，曾任工商学校教席。早在1925年10月，就主编了叻报的《星光》副刊。由于在教育界服务碰到了“挫折”，后又得到曾圣提的推荐，终于离星到了印度，时为1928年。谭氏较后担任印度国际大学教授和印度中国学院院长。

马华作家林参天在《浓烟》一书中，写下诗人兼教育工作者谭云山的教书故事，这不是很有趣的一回事么？

谭云山对此事似乎也颇感快慰；1959年8月1日于印度国际大学中学学院写下了《附（浓烟）题句（有跋）》“谁是毛振东？书中主人翁；更名又换姓，立意在大同。”

谭氏写道：“……采用通俗文艺小说体裁，描写南洋华侨教育生活实相，并提出若干严重问题，以供热心从事南洋华侨教育工作者探讨，用意深远，文笔畅达，可作故事小说读，亦可作教育论文读。”“此书于1935年8月20日写完，于1936年7月茅盾、傅东华等领导中国文学社出版作为‘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生活书店总经售。出版后，曾在中国文坛轰动一时，公认为反映海外华侨教育生活之唯一巨著。……书中故事，却以余为主角，化名‘毛振东’。读完之后，不禁赧然失笑。其实所叙若干内幕情节，余当时亦在‘深烟’笼罩之中，尚未知也。因随笔题书四句如上，略志感想。……”

后来的马华写作人，许是受到这部马华最早的一本长篇小说的影响，以马星华校生活实相为题材，写下了为数甚多的教育小说、散文及诗歌等作品。例如：絮絮的短篇小说《学府风光》（1951年5月·南洋商报出版）和《坎咪之死》（1958年1月·青年书局出版，内收有关教师的短篇创作《教师节》）、王天的《侨众小学游艺会的上演》、方北方的《教书先生》、曾吟的《黄校长的周末》、梦平的《顽童这一家》、谢克的《为了下一代》、黄炳炎的《学生王子》、马阳的《大学生割胶》、征雁的《黄校长》、易草舒的《校长的女儿》、马汉的《早春》、高秀的《如此教师》、林华的《三月师表》、姜衍（田流）的《一学期》、集文的《师生之间》、马戎（梦平）的《童恨》、吴示羊的《放下书包》、紫云的《冯老师》、罗林的《一校之长》、苗秀的《人畜之间》。）

以上，所举例的只是针对马华小说涉及华教与师生的题材之篇名，而且只提到1970年罢了；至于其他文体有关马华教育界的描写作品全未谈到，而且所提的马华教育小说也仅是挂一漏万。一句话：过去的马华写作人写下的有关本地教育圈的文学作品，可谓丰收；尤其是参与笔耕的教师，他们多已自我完成了使命感。

就以笔者现居的柔佛州来说，资深马华作家如林潮、马汉、年红、梦平、高秀、梁志庆、艾芸、刘祺裕、文戈、芸亦尘、郑祖、翻腾、艾斯、集文、方理等，无不都是教育工作者。相信别州也大致相同；由此可见，教师撑顶了马华文学的半边天。

师生相传文学薪火

教师本身醉心于写作，也培养了一些年轻学生走上文学的道路，这种例子很多，据我们所知，吴仲青与陈白影、林鲁生与王葛、韦

晕与光华、吴华及史立桓、菲特与陈凡、谢克及杜红、王梅窗与周粲、李建与尤今、谢倬荣与葛凡、白荷与张曦娜、刘思与原甸、谢冰莹与梁园及陈孟、李过与马阳、邱新民与李过等，他们都有师生关系，甚且前者是后者的文学启蒙导师哩！老中青代代相承，师生传薪，马华文学之火才得以燃烧得更高更亮，万古长明！

有人认为，马华教育界的题材早已被写完、写滥，今后的写作人不宜再向这方面去挖掘题材。记得一两年前，新华文学界的一位撰写一年文坛总结文章的作家表示，长此写教育圈文章的文艺工作者，是没有出息的做法……

我们不能同意这位文评家的看法。

就以今年（1990年）的春季来说吧，笔者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文艺城》（1990年3月18日）副刊上读了葛凡的《陈老师卖书》（小小说）；在这篇小说中虽则轻描淡写的叙述，但却击中要害地反映了新华双语政策长期实施以来的某些偏差……。约于今年3月间出版的张挥小小说《45·45会议机密》，校园生活与学生心声，也成了新华作家张挥近年来创作时出现率最高的题材，莘莘学子在承受不同程度压力时的不同反应、现代教育体制下学生家长的态度、校园内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各种丑态，以及外在的社会风气等，作者都做了适当的反映与表达。

反观我们的马华文学界，像葛凡与张挥（他俩都是新华教师），能写这么优秀的教育小说的作家年来几近罕见。如果能写出具有新意、内容与技巧兼优的教育作品，我们怎能“先入为主”的低估它的意义呢？

1990年4月5日稿于万邦图书室

◎刊登于第5本《教育天地》（1990年5月）

小说蹊径寻宫门

引言

朋友们：我喜爱故事，也喜欢小说；你们也不例外吧？

是的，我们都爱好听故事，也学习编造故事。

人类莫不爱听故事的，故事对我们有着无比强烈的吸引力。爱听故事可说是人的天性，不特是小孩子，连大人，甚而国王，也都喜爱故事。

可不是么，著名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就是这样来的。——《一千零一夜》这书名的由来，是说古代阿拉伯有位国王，叫萨里雅尔王，生性荒淫暴戾，每晚要选一位新王后，陪他过了一夜，在第二天早上，就要将这王后杀掉。到了晚上，这位暴君又选一位美女为新王后。因此，百姓深以为苦，敢怒不敢言。

这么一来，不知有多少良家美女，在萨里雅尔王一夜蹂躏之后就白白的给牺牲了。这件事，让宰相的女儿萨娜莎德听见了，她于心不忍，便自告奋勇的要嫁给国王。她的父母都因她的决定而伤心。萨娜莎德嫁过去了，在洞房之夜，她讲述一个故事给国王听；这个故事讲了整个夜晚，讲到紧要关头的时刻，天已经亮了。萨娜莎德故意停止不讲下去，催促国王杀她。

然而，国王为了听这个动人故事的下文，不肯运手杀萨娜莎德，叫她到第二天晚上再继续讲下去。宰相的女儿就用这个妙法，将她的故事讲了一夜又一夜，讲完了一个，又紧接着再讲第二个——控制着国王的兴趣；并且使萨里雅尔王渐渐地对自己发生了真爱情。她就这样的为国王一共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不忍再杀她，便废除了一夜换一个王后的制度，正式与萨娜莎德成婚，白首偕老。这就

是《一千零一夜》这个书名的由来。这也说明了没有人是不爱听故事的。

当然，故事要讲得动人，引人入胜，人们才爱听。要是你编写故事，读者读着一直要追问“后来怎么样了？”，这就证明你的故事蛮有吸引力。

许多爱好文艺的朋友小时候都爱听故事，稍大后喜欢看故事书，后来又变成“小说迷”。

而我呢？我少年时候就是标准的“小说迷”。

小说是什么？——有人说：小说就是讲故事。小说的基本面就是讲故事。故事是小说的直接母体。……是的，“小说都包含一个故事，但故事并不就是小说，至少不是好小说。同样，知道故事，只能说明我们读过了这部小说，而还不足以表明我们善于进行艺术欣赏”。

童少年时代，你我都沉迷于鲁滨逊单独生活在孤岛上的故事，也跟随爱丽思漫游了奇境，还到金银岛上寻宝藏……同时，看过神灯之后，你我还遇见那个卖火柴的女孩子……

初中时代，你我都沉迷于一百零八条好汉，由于无处容身，被迫上梁山的故事；同时，也沉湎于唐僧往西天取经，孙悟空大闹天空的故事中；对张君瑞吟诗挑逗崔莺莺感到有趣，也对红娘带信和拉线拍手喝彩……

高中时代，你我都沉迷于吉诃德勇救“公主”和斗风车的故事而发出笑声；也对《块肉余生录》一书中的坏人只是一时得意，最后终不免败亡而叫好；此外，也同时对黛玉的小心眼、宝钗的假惺惺、熙凤的泼辣自私……等等，有了初步的印象。

在不知不觉中，迷看小说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许许多多引人入胜的故事，让我们度过多少欢乐的时光！

在中外文学名著中，我们似乎看见了生动和鲜明的生活图画；

小说家把一批批的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所以常常使得读者如闻其声，比如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施耐庵笔下的鲁智深、林冲和武松等等；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等等……这些小说人物的形象鲜明，活跃纸上。一般来说，优秀的文学作品，作者对书中人物的描写和结构都是成功的。譬如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作者描写安娜终于在佛隆斯基的恳求下屈服，做了他的情妇，后来引起了她的丈夫卡列宁的疑心……故事的发展，前后勾联，一步紧一步。我们佩服这位著名的小说家善于运用变化错综的手法，避免平铺直叙；我们也钦佩作者具有那种使读者悬疑，不断逗引其好奇心的原始才具。

等到我们由爱听故事、喜欢课外书到学习写点小说，才慢慢地了解到过去所沉迷的“小说”，除了故事离奇曲折，怪诞不经，悱恻缠绵之外，它还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于文学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它具有思想认识的意义，能够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这么一来，它也帮助读者认识一种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律和具体面貌。例如我们欣赏鲁迅的小说作品，作者也为读者描写了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小人物，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他们都受到长期的剥削与摧毁，可是他们仍痛苦地摸索着自己反抗的道路。

多阅读一些好小说，你可以发现到优秀的小说作家对人类生活的具象的描写，能给予读者以教育和鼓舞。作者把人类的高贵品质，活现在纸上，因此，好作品给予我们的精神滋养，也不可漠视。

欣赏了大量的小说作品，你可算摸到了研究文学的门槛，你还得多方面的学习和磨练，才能敲开小说创作的大门。

爱读小说诱发写作欲

所谓创作兴趣，大半是从阅读中慢慢培养起来的。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一个好吃或贪嘴的人，很自然的，他在饱享口福之后，也想烧几盘小菜让他人尝一尝。

喜欢阅读的人，常具有比较丰沛的想像力，加上他多体验一些现实生活，很自然的，他内心就有一股创作冲动。——所谓“创作冲动”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写作者在对生活进行反复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为某些人物或事件所吸引、所触动，受到启发，然后从中领悟到生活的某种意义，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和激情。要是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仅仅满足于接触某些表面的生活现象，那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作冲动的。

热爱生活，又爱好阅读的人，跟写作最有缘分，他们常把阅读作为一种娱乐和消遣。创作是快乐的，你可以把自己心中所要说的话，或所感受到的情绪，一一和盘托出，能够一吐为快，要是因此而更引起别人的共鸣，那自然是人生乐事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家巴金说过：“我第一次拿起笔写小说，只是因为我有话讲不出来，有感情没法渲泄，有爱憎必须倾吐。我把写作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写就没法安顿我那颗痛苦的心……”这就是写小说的原动力。

这么一来，你就可以把自个儿认识的社会生活，以及自己所产生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传染给读者，从而跟读者交流思想和感情。

小说的特质与结构

有些开始学习写小说的年轻朋友，喜欢找些有关文学理论和小说作法的书来阅读。

我个人是不大赞同才开始练习写作的朋友读太多文学理论的书，因为这样反而会被许多中西不同的说法弄得含含糊糊，不晓得要跟谁去，遵循那一派的理论才是正确之途。由内容到形式，几乎没有一定的法则可绳。有些文学评论者和小说作家的意见或看法，竟然不相同，甚至大有出入，而且是站在恰恰相反的地位，你教初学者何去何从呢！

不久之前，我读了英国当代伟大的小说家佛斯特（E. M. Forster）的一本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小说面面观》，在这本名著里，佛斯特也分9章，就小说的7个层面来分析探讨罢了。这7个层面，就是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图式和节奏。

今天，主办当局邀我来讲《小说创作入门》，由于个人对小说创作的认识不深，读书不多，而且时间有限，所以，只能讲有关小说的若干问题和一般的规律。要是有什么不妥或者讲错的地方，敬请大家包涵与指教！

首先，我要指出：我不同意说创作的技巧可以归纳为若干“规则”，熟习了这些“规则”，就有办法创造出有技巧高的小说作品。开始步向小说之门的朋友，请不要把技巧问题孤立起来看，因而以为技巧问题可以依赖那一条一条的规则加以解决。文学必须以向上的积极的健康的去影响读者的精神面貌。随着时代的进展，有抱负的写作者必需有更大的勇气，在突破和创新方面作出一番贡献。

在一些文学词典里，我们理解了小说是文学的一大类别；以对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具体描绘去反映社会生活为其基本特征。小说不受时间、空间和其人其事的限制，可以借助于虚构和想像，兼用人物的语言和叙述人的语言，运用叙述和描写等各种表现手法，多方面地、深入细致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表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充分展示社会生活。小说的艺术结构是受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环境、矛盾冲突的制约的。脱离具体内容的描象的艺术结构

是不存在的。根据一部小说的篇幅长短、容量大小、人物多寡、情节繁简，可分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等。

有人把2万字以下的小说，定为短篇，2万至10万字的小说，定为中篇；10万字以上的小说，则定为长篇。也有人说，超过15万字的小说，才可被列为长篇小说。名家爱伦坡却认定短篇小说是“阅读时需半点钟至一两个钟头的散体记叙文”。中国作家高尔纯说：

“如果把短篇小说比作故事的‘亲生儿’，那它又可称作中长篇小说的‘孪生姐妹’。它们之间的相貌更加相似。……短篇小说在结构要素上与中长篇小说完全相同，但在人物、事件、环境三要素构成量上存在着显著差别，并由此决定了它们在结构方式上也不尽相同。……”

初学写小说者，最好是多练习短篇小说。外国人多认为短篇小说只有2千到8千字的篇幅，但它是一种紧凑的文学形式。也有人说它是一种较高形式的文学艺术。篇幅和容量比较短小的短篇小说，却显得人物更集中，情节单纯，结构紧凑；它留给读者自己思考和解答的地方，竟比中、长篇小说多得多哩！

短篇小说的开端，必须明快有力，好比一枝矛直刺读者的心窝，尽快抓住对方的注意，直到读者阅完为止。就是因为短篇小说的篇幅短小，所以更应当凝炼集中，用最简单的语言，写出最丰富的内容，给读者留有充分的想像和思考的余地；这便是一切一流短篇小说艺术结构的共同特色吧。

由于短篇小说的特点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所以它的结构必须十分严谨，场面必须高度集中。初学写小说的青少年朋友，喜欢对人物的境况、故事的场面背景和天气等，做了过份详细的描述，这是很不必要的文墨浪费，因为短篇的篇幅和容量相当短小，作者对文字的使用应当节省或吝惜；不论是多么有趣的事物，也不管怎样美妙的语句，只要它跟题旨毫无关系，都应该一

一舍弃的。同时，凡是可由小说人物自行表达的，作者就不宜加以说明，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早川博士就说过这么一句话：“越是高级的艺术，留给读者自己去下结论的地方也越多；只有那些低级的艺术，才须要处处加上接语和结论。”

接着，我又要引用高尔纯针对短篇小说所发表的高见——他说过：“短篇小说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主题和题材两个方面，但作为形象结构的内容主要是指题材而言的。短篇小说的结构，就是作家依据主题表达的需要，对题材三要素，即人物、情节和环境进行有机组织和安排的形式。较之其它文艺样式，短篇小说的结构要素和结构方式都有它的特殊性，这是形成短篇小说特性和特殊艺术表现功能的内在依据；短篇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创作规律，都和三要素在结构中所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动紧密联系着。……”

短篇小说是一种较高形式的文学艺术；它的形式是多变性的。有人统计过，短篇小说的形式就有6百种以上。编造小说是属于创作活动；小说创作贵乎创新。中国当代小说家王蒙谈创作时说：写小说要善于翻旧变新，要时时翻旧求突破，变法图新。写短篇最有可能锻炼这种翻与变的眼光、这种趣味和这种技巧。长篇总带有某种包罗万象的味道，人物、情节、环境、叙述、描写、抒情，总是要都有一些，当然各种不同的长篇会有各自的侧重点、特点。而短篇轻巧灵活，名取其便，彼此拉开的距离可以更大。……

从事任何文艺创作都必须历经磨练，耐得住寂寞，不怕失败，一往无前；不仅要深入生活，静默观察，积累素材，选取题材，提炼主题，精心构思，还要谋篇布局，句斟字酌，反复修改，精雕细刻。唯有付出了艰苦的精神劳动的写作者，才能够完成佳作。

一个坚持现实主义写真实原则的写作者，他必需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随时把生活经验的素材加以综合、改造和发展。这样的一系列的加工，才有可能成为作品的题材；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构

思。指导写作者的构思过程的，使他在现实中所拣取的、要用艺术手段来夸张，是写作者本身的世界观。不论中外古今，也唯有那具有正确的世界观的作家，才能够使他在现实中所拣取的题材，反映了现实的本质，进而在“典型的环境”中表现“典型的人物”。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提高作者本身思想水平的重要性。要是作者的思想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他所犯的错误，是不可能单靠“提高技巧”去解决的。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变化是何等的迅速而且复杂；思想平庸的作者，每每无法在其中看出“头绪”来。这样的话，他就会觉得材料太多，却不知从何处下手；那么，他又怎能“提炼”小说材料呢！在小说创作中，材料的“组织”是属于表现手法，与技巧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材料的“提炼”，却应当从提高思想水平，继续深入生活来求得解决，只是乞灵于技巧，是于事无补的。——因此，跟年轻朋友讨论小说创作的时候，我常强调应当从提高思想水平和深入生活，来解决小说若干问题，请勿相信技巧是“万灵药”。

我们无意贬低别人在表现手法追求创新的努力；同时，也深悉19世纪小说家所惯用的表现手法已然无法完全适应表现我们目前的生活。而现实生活正需要新颖的手法来表现，以便在艺术形式上作出重大的突破。不过，我们也要说出许多人一致的信念：“只有真的才是美的和善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毕竟不是小说创作的最根本问题。——是的，爱好写作者应该更积极的从生活中探索真理，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感情去感受，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这使他们的作品留下鲜明的创作个性。

我们回头再提一提“构思”。在所谓构思的过程中，一般的经验好像是故事的情节，跟人物的形象在同个时候出现，同个时候发展，直到成熟为止。事实上，首先出现应是人物，其次才是故事；

不过，由于人物形象的出现不能跟故事（也就是人物的活动）联在一起，所以，我们会觉得它们是同时出现的。在构思的过程中，你先有了一两个呼之欲出的人物，之后才组织起故事来的。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行动来表现。小说里头的故事，不一定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的直接经验，然而小说中的人物，却不能不是作者本身经验的产物。于是，你需要依赖想像，去发现动机，然后才能描摹人物的心理过程。这说明了想像力的重要性。

俄国小说家杜斯妥也夫斯基本身从未犯过罪，但他在名著《罪与罚》里头，却详尽而深的描写主角之一以残忍而狡黠的手段杀害了两个女人。固然作者曾经直接听过谋杀犯的供词，事实上没有一个杀人犯对自己犯罪的供述能如他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确切明白。另一个著名的小说家，法国的左拉，他虽然没有当过矿工，然而在一部作品中，却对矿工心理刻画的忠实程度很像他曾干过开矿这一行。还有许许多多享誉世界的文坛的小说家，对他们所刻画的人物，都不见得有机会可亲自体验，然而，他们的小说创作连现代的心理学家都为之叹服不已。原因无他，答案是：作家的想像。

立志从事创作的人，应该随时把握自己的想像，尽可能靠多写来磨练想像。想像力是所有写作者从事创造的自然工具。想像创造内心意象；要是缺少想像力，谁都不能编写出成功的小说来。

篇幅和容量介于长篇小说之间的中篇小说，通常是撷取主人公一个时期或某个阶段生活的典型事件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部分；因此，故事情节完整，线索比较单一，矛盾斗争不像长篇小说那样的复杂，人物也比较少。

至于长篇小说作品，除了主要故事之外，还包括好些小故事或插曲；这些全都是为了表现次要人物的性格而安排的。那些次要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正同主要人物和他的故事一样，是为作品的主题思

想服务的。

最近几年来，篇幅比短篇小说更短，少则几百字，至多是千余字的小小说，它也称为“微型小说”，正受到读者和作者的普遍欢迎，看来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小小说的情节单一，人物只有三两个，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形象地说明一个简单道理罢了。

我们读外国的文学理论，了解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相信人物描写是小说技巧的最重要因素；另一些则相信冲突（Conflict）才是顶重要的。他们强调：冲突能引现一个人的性格，不论这个小说人物是真实的或虚拟的。在小说创作中，我们所熟悉的三种冲突是：人对人、人对自己和人对自然。

在我们创作的小说中，至少得含有其中的两种冲突，而且冲突必须强烈。有关的其他的技巧因素，比如性格、悬疑、情绪，也都发源于冲突。可以说，它们是由冲突所造成的自然后果。

当前的中国作家，多半会同意和接受这样的理论：短篇小说的结构点只有一个单纯的事实，就是一个集中的矛盾冲突，而且，这一矛盾冲突本身蕴藏着丰富的主题能量。鲁迅的短篇《药》、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和陆文夫的《围墙》等，这些中国短篇小说，它们的结构点都是这样的。

而中，长篇小说的结构点，则往往由几个事实，也即是数个矛盾冲突组成的。例如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故事围绕着明清变动时期的社会斗争，由此展开了六组的矛盾冲突。

创作实践前后

凡是成功的文学作品，不论是长篇、中篇、短篇，或是微型小说，都不是轻易就可创作的；作者笔下的小说人物的胚胎，在他心

里头孕育的时间，远远的超过了他执笔写稿和修改的工作日。任何优秀的作品，都必需具备正确的主题，动人的情节，丰饶的词藻、紧凑的结构、高明的技巧、和独特的风格等等。这是作者坚持进行艺术的实践和探求，才获得的成果。

有一位叫辛格的美国作家就说过：“要想把短篇小说写得成功，可不是一蹴可就的事。写短篇需要更多的天分与经验；在短短的篇幅中，要写得出一点名堂来，谈何容易！”

学写小说，既然是我们自愿的爱好选择和兴趣之一，而且已开始学写了，更不应该半途而废；做个“逃兵”。

写作，可以使我们的人生更富有色彩；这倒不是为了受名利所惑。英国诗人济慈曾说过：“在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中，良好的写作仅次于良好的行为。”——而我们认为，写作也是行为的一部分，两者不宜分隔；从观察人生，发掘人生，体验人生，进而通过写作来表现人生，它不是使我们活得更有意义的“行为”么？

因此，作为一个写作者，应当坚强果断，成难不屈，勤勤恳恳，不断地充实自己，具备写小说应有的修养，和掌握艺术创用的主要原则。——除了上面所提过的提高思想水平、深入生活，挖掘题材、力求创新、培养想像力、构思的过程、写活人物、突出主题思想和小说技巧等；此外，我们还得注意其它的小说的层面。

王蒙在《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一论文中指出：作为一个短篇小说作者，他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是有四，第一点是观察力（王蒙也称它为发现力）；第二是感受力，第三点是想像力；第四点是表现力。

针对观察力，王蒙指的是“从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发现其所有的惊心动魄的或感人肺腑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是从一些细枝末节当中，发现那些具有重大的有时代意义的事物的一种能力。从这些很细小的事物里能够感受时代的脉搏，能够看到社会生活，

能够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征兆”。

感受力指的是什么呢？王蒙说：“一个指的是感觉，对生活有非常敏锐的非常丰富的感觉；一个指的是感情，对生活有火热的感情。”他强调：丧失了对生活的感情，丧失了对人民的感情，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

上面，我曾提过想像力的重要性。王蒙则认为：一个短篇小说作家，他的想像力，就是他对他的感觉、印象、思维，以及他所掌握的社会生活、事件、人物各种的关系，进行新的排列组合的能力。作家的想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生活里各种因素里边，改变其中一两个因素，就会产生一种新的面貌，一种奇观。这种改变，我们可以称之为探索生活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一个小说家所应该具有的想像力。

至于列为第四点的表现力，王蒙说：表现力的问题是非常复杂高深的问题；他只想从两方面——那就是语言和结构，简单地说一下。文学不管是表达我们的感情还是表达社会生活，主要靠的是语言。作为一个作家来说，语言应当是很丰富的，他能够吸收各式各样的语言和书面语言，包括方言、职业语言、翻译语言，还有近代科学技术的语言，往往吸收进来就会非常丰富。但是，一个真正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他往往不过多地用这些语言。他之所以会用语言，就在于他能用一些最普通的语言来发挥它最大的效力和潜力。

根据王蒙的说法，结构也是构成表现力的重要的部分。一般地说结构，往往是指情节的安排。

以上是王蒙的一些高见。针对语言，大家的看法是：文艺是用语言表现的艺术。语言是文学作品艺术地再现现实的工具。作品中的语言，可以大体上分为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两个部分。学写小说者，在运用辞藻方面，必须下一番苦功，将自己的文学不断的修饰与琢磨，以期没有一个字是不精当合适的，提炼到字字珠玑的纯净

境界。

有人把文学叫做“语言的艺术”，那是因为文学作品塑造艺术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描绘具有无限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色，作者所运用的基本手段是语言。

文学是人学；文学要表达的是人的思想、情感和心理状态。语言是体现人的性格的重要特征，因此小说家有必要尽量写好人物的语言；同时在人物的对话中，表现出他的生活经历和文化教养的特点。一部优秀的小说，人物一上场，作者只写三言两语，几句对话，显示个性，便使人觉得“如闻其声，如见其形”。难怪有人说：在小说中，最能创造直接感觉的，莫如一段好的对话。那些对话，很可能成为小说中最主动、最感人的部分。是的，“对话是小说技巧中最有用的工具”；我们应该尽可能利用它，使自己的小说人物格外生动。

苏联作家高尔基尤其重视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和对话；他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他非常钦佩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两位伟大作家驾驭人物语言和对话的高超才能。高尔基举出《战争与和平》中人物的例子，来说明托尔斯泰具备了语言艺术的才能。我们读《红楼梦》和《边城》，不能不佩服曹雪芹和沈从文在处理对话方面也很成功。他们不仅通过对话引人入胜，而且由此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展示出思想状态以及环境氛围等等。

至于在作品中，出现过多的方言、俗语的问题，作者大量的采用，理由之一是要使他的小说作品富有地方色彩。我们固然赞成作品有地方色彩，然而，地方色彩的获得不能单凭方言、俗语，而要通过典型的风土人情描写，来创造特殊的气氛。文学语言虽则不排斥部分的方言乃至俗语，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一切方言俗语都可成为文学语言。而那些已被采纳为文学语言的方言或俗语，必然是公认为最新鲜、生动、简练而意义深长的，还常经过加工，对于丰富

文学语言才有好处。

在创作实践之前，我们就应该先仔细地思考小说故事的结局。故事的结局每每是故事最重要的部分。在考虑结局的同时，我们必须特别考虑到高潮问题。

所谓高潮，是指故事发展的最高峰，也就是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那一点。我们下笔之前，以高潮为主的思考过程对作者大有帮助，因为它为你立下了目标，使你有了故事发展的方向，避免写到中途而不知怎样继写下去。同时它使你的主题观念趋于明朗。——每一则故事都必然具有主题（不论是基本主题或永恒主题）；作者具有主题意识，便可使自己比较简易地写下去，因为它赋给故事以发展的方向和统一性。

美国当代作家 JEAN C. CLARK 就说过：“要是你在开始写作前，先思考高潮和主题的话，你会发现你写的是完整的小说而非断片。”有人爱问小说的开端、中间和结束三个阶段的长度比例问题。这并没有一定的规则。有位美国小说家指示我们：大概说来，在一篇长达16页的小说里头，开端可占4页，中间阶段占一页或一页半。在前4页你必须把问题完全交代明白，然后主角开始解决此问题，而故事便进入通往高潮的中间阶段；在高潮之后就是结束阶段。

一则优秀的短篇小说，应有它必然的开端和情节开展的一定时间及地点。它的开头，有时竟修改了20几次才作最后的决定。许多已成名的小说家的一则小说，也改定上4、5次，这并不算什么。修伍·安德森以为每一则短篇小说最好能修改7次。百万字以上的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也修改过许多次，删除好些部分，然后又重抄七次。据说，托尔斯泰对自己的作品，连一个字也不肯马虎，有时半夜里爬起来，打电话到报馆的排字房，请排字工友改一个字。要是远的出版社，他就打电报去联络。从这几位大文豪的认真态度看来，初学者更不应该为了重写、改字或抄写自己的小说原稿，而

口出怨言或不胜其烦的。

谈到练习写作前应有的修养，我们认为，编写小说应具有一定的素养和见识，慢慢地培养正确的世界观，增加丰富的生活经验，广博的文学和科学知识，再加上坚实的文学基础与熟练的艺术技巧等。——以前在这里编过《蕉风月刊》的小说家黄思骋就讲过：“一个不读别家小说的小说作家，我认为他很难称为一个小说家。”我们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多读小说，才可以增进间接经验。

关于这一点，我们又得向托尔斯泰学习，他已经是个大作家了，竟然还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把晚辈契诃夫的全集读过两遍。

你喜欢写作，你便有创作选择的自由，谁也没法约束你或干预你的。每个人可以采取他所喜爱的艺术表现手法，也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手法，而不应该把自己的审美趣味强加于人。只要我们把他的作品建立在完全熟悉的环境上，只要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广，跟整个社会生活联在一起。简单的说，只要你的小说是来自生活，而且能够把握那一宗生活事件，挖掘新意，你所完成的作品，便具备了作者的真诚，至少已再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形象。

小结

朋友们：由于个人所知有限，又缺少理论的修养和经验，所以谈了这么多，却没有特别新鲜的地方，充其量，只不过是把以前的名家宝贵的创作经验和大家公认的定论，加以归纳、加以诠释给文友参考罢了。花费了众人不少宝贵的时间，这是我要表示歉意的地方。

也因此，上面所提过的一些小说层面和艺术创作的主要原则，不一定就可供初学写小说的朋友敲开小说的大门。有好些早已有了

相当写作水平的朋友，是不难找到“窍门”的。

已然走过几道铁栅门或铁门，而昂然走进小说创作之门的文友们，既然已登堂入室，就该有抱负，做个创新的闯将；千万不要随意的从后门开溜出去——做个“文艺逃兵”。你应该常常在想：你正在思考什么，开拓什么，今后将会写些什么？

过去，本地的“文艺逃兵”太多啦！今天，我们的马华文坛正需要一批生力军；不久之后，就可加强小说家的阵容，为提高马华小说的地位而尽心尽力。

临末，愿大家紧记住：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主要的艺术技巧问题，端赖作者人生观的深度，和他包罗生活现象的广度才能解决。每个写作人都有必要寻找自己独特的立意、取材、角度和手法等，力求有某种新意，不落窠臼，才可望建立自己的风格。我谨以此与大家共勉！谢谢！

脱稿于1987年7月18日下午3时

◎刊登于大马南洋商报新闻版（1987年8月24日～27日，4天刊毕）

（注）主要的参考资料：——

1. 文学词典（孙家富，张广明主编）
2. 写作浅谈（上、下册·欧斯金编）
3. 短篇小说结构理论与技巧（高尔纯著）
4. 文学欣赏漫谈（吴野著）
5. 王蒙谈创作（王蒙著）
6. 小说面面观（佛斯特著，李文彬译）
7. 文艺技巧论（王梦鸥著）
8. 文学初步（巴人著）
9. 小说艺术谈（张德林著）
10. 文学沉思录（王元化著）
11. 小说修辞学（【美】韦恩·布斯著，付礼军译）

12. 文学欣赏 (谢冰莹编著)
13. 小说作法十讲 (李辉英著)
14. 谈小说创作 (徐速等著)
15. 文学风格七讲 (吴功正著)
16. 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说 (陈慧著)



主持人：施远（左）与主讲人马峇（1987年7月26日·吉隆坡）



主持人：李宗舜，主讲人王振科（左）、马峇（1993年8月30日·吉隆坡）

浅谈马新中学课本 录用的马华文学作品

马华文学植根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约有66年了，然而，却得不到应有的关心与扶持。

常听说，马华文学作品不受重视，甚至被认为是不屑一顾的；只达到“高中生程度”的本地产品，自然也没有被编进中学教科书的价值……像这种说法，谁会同意呢！

一路来，在本地出版的中学课本，鲜少采用马华文学作品，这是事实。有不少马华作家曾为此而不平，啧有烦言，希望负责编选中学中文课本的编辑，能够增加巴仙率——尽量采用适合教学的马华文学作品！

本地的文学作品，最能反映本国的现实生活、社会意识，进而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我们热爱自己的乡土，怎能不通过马华文学作品来培养纯洁的国家意识？况且，让中学生阅读本地产物，最能产生亲切感和真实感。

替出版社编选中文教科书，绝非是简易的一件事；也许我们也非议过一些编辑对马华文学作品存有成见，不愿费时间多选几篇佳作，让中学生对本地作品加强认识，从而推广马华文学。不过，据一两位态度诚恳、办事认真的主编说：适合采用在中学课本的马华文学作品，实在少之又少；这跟创作水平并非直接的关系。通常被选的文章多能独标一格；内容不落巢臼，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从我国采用的3、4种中学华文课本，我们找到了好几篇马华写

作人的作品，那是精选出来的。同时，也从邻国新加坡的中学华文课本里，抄录了一部份马华写作人的佳作篇名。如果有机会找到这数十篇名作来阅读，当可晓得它们之所以入选为中学课文，自有其价值和可读性，所谓侥幸的作者是不多的。

在马来西亚中学的华文课本里，收录的马华文学作品约有：海滨黄昏（温梓川）、伦敦的社会相（黄润岳）、椰加达之恋（王秀南）、田园都市吉隆坡（逸名）、婆罗洲的“一日四季”（郑子瑜）、马六甲的竹叶图（郑子瑜）、新加坡素描（邹劳）、谈榴槾（李冰人）、麻河之恋（林潮）、马来亚独立前景（陈昌豪）、马来亚诞生（文勤，即陈玉水）、民族英雄汉都亚（鲁白野）、论南洋的研究（南洋商报·社论）、林谋盛烈士传（郑子瑜）、西子湖滨（连士升）、槟城的瀑布花园（桂馥）、谈青年的修养（王宓文）、马来亚建国史序（许云樵）、给新青年自序（连士升）、马六甲游记（郁达夫）、婆罗洲华族英灵记（郑子瑜）、提高与普及（南洋商报·社论）、麻坡烈士行（李冰人）、马来亚行旅（七绝四首·丘菽园）、马来亚的经济（星洲日报·社论）、马来亚文艺的特性（连士升）、寮国的风光（林英强）、“海上行车”记（郑子瑜）、忆瑞士（庄泽宣）、培养马来亚的意识（南洋商报·社论）、新加坡素描（连士升）、马来亚联合邦记游（郑子瑜）、中国古书中的马来亚（佚名）、谈爱山庐梦影（凌叔华）、槟城三宿记（郁达夫）、谈黄公度的南游诗（郑子瑜）、晨雾里的丹绒（李冰人）、马六甲海滨公园素描（乃铮）、马来“班顿”与“莎雅尔”（静星）、柔佛王宫游记（王志成）、胡姬（萧遥天）、马来亚之歌（薛洛）、我爱马来亚（姚拓·新诗）、太平山游记（谢冰莹）、在我们的国土上（金轮）、谈马来亚的历史（鲁白野）、热带三友

(吴进)、马来渔船的下水礼(曾铁忱)、孕妇岛的传说(佚名)、兄弟民族的情谊(佚名)、咱们的家乡(海郎·新诗)、稻田(比翼,即苗芒)、公主和青蛙(李真译)、默迪卡体育场(佚名)、从加尔各答到新加坡(李汝琳)、不践泥土的奇花(佚名)、沸腾着的云南园(以今)、拉让江的细诉(郑子瑜)、南洋之美(玛戈)、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方修)、克什美尔的风光(连士升)、牵牛花开了(李蕴郎)、跳“珑玲”(米军·新诗)、鹅江浪(吴岸·新诗)、四时都是夏(罗靖华)、槟城的极乐寺(邝国祥)。

在新加坡中学的华文课本里,收录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品约有(非全部)以下篇章。

新旧问题(林克谔,即林稚生)、冲出恶环境的重围(黎生,即庄力生)、柔佛之夜(林仙峤)、生之礼赞(丘絮絮)、沙漠田的献诗(谭云山)、增进种族情谊的新年(梅井)、稻田(周燦)、牵牛花(李蕴郎)、新加坡河畔(连奇)、马来亚渔船下水礼(曾铁忱)、没有忧郁(苗芒)、热带三友(吴进)、陷阱(杏影)、七里香(王葛)、王家山史话(黄今英)、一张无形的贺年片(李吟)、峇里——诗之岛(佚名)、沸腾着的云南园(以今)、马来族的手工艺品(佚名)、峇迪布的制作(佚名)、新加坡多元文化(邹豹君)、新加坡的海港、落叶(佚名)、新蒿里曲(钟祺)、新加坡颂(佚名)、要熬得住寂寞(连士升)、在木廊里(萧村)、铜锣声中(苗芒)、我国需要更多技术工人(社论)、扫落叶的人(周燦)、白手成家的“头家”(吴进,即杜运燮)、一天到晚排队(吴绍葆)、伊班人的长屋(李汝琳)、街戏(蔡欣)、翻种(化米·卡辛——大马马来作家译作)、培养乡土气息(连士升)、舐童(佚名)、春到人间(连士升)、趁年轻的时候(杏影)、静静

的新加坡河（黄今英）、槟威渡轮（佚名）、椰树（陈世能）、芭蕉（王葛）、落叶（佚名）、新柔长堤（佚名）、个人与社会（黎升）、苦恼与幸福（杏影）、静静的星洲河（呢喃，即李今艺）、寂寞·渔港（铁亢）、晨（佚名）、槟城三宿记（郁达夫）、椰树（以今）……等等。

据马岑君在《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一书中说（详见页46《郑子瑜‘东都习讲录’》），有文章被编进新马的华文中学课本的马华写作人，尚有（除上述的作者之外）：沈思中、左秉隆、杨嘉、李钟钰、燕归来（邱然）等，可惜一时未能引录到他们的作品篇名。

从以上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足见马华作家郑子瑜和连士升的文章，最受新马中学课本编选者的欢迎，最少已有8篇作品被编入教科书里。已有3篇作品被录用的作者，他们是杏影（杨守默）、李冰人和苗芒等。有2篇作品被录用的作者，他们是吴进、郁达夫、以今、鲁白野、王葛、黎升、李汝琳、周槃、黄今英等。——郁达夫的《槟城三宿记》、吴进的《热带三友》（已有三种版本录用），以今的《沸腾着的云南园》（也有3种版本选入）、李蕴郎的《牵牛花开了》、杏影的《趁年轻的时候》……等作者的佳作，最少分别出现在两种不同的中学课本里。

阅读上面数十篇当选的马华文学作品，以散文、小品或随笔居多，其次是说明的短论、游记、诗歌、社论、传说和传记等。大体上来说，其优点是多半的作者善于选取题材，精心构思，句斟字酌，技巧娴熟，感物咏志，剖切中理，切中时弊，而且易于引起读者的感情共鸣。

然而，被录取的文章，也有一些不仅不能扣人心弦，毫无新意可言，而且意境不高超，更非清奇典雅之作，所以无法令人折服、

叹为观止。因此，它是否是马华文学作品中的精品，是令人怀疑的。故而，我们寄望今后有关的编辑，将打破成例、网罗宏富，更加慎重地进行编选中学课文的工作，经之营之，方能处理得较为理想。

稿于1985年4月22日

◎原载于1985年7月12日第1427期《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左起：唐林、禿橡、姚拓（教科书编纂家）、马峇
（1988年12月10日·吉隆坡）

《新课程纲要》 欢迎马华文学作品

1987年大量选用本地作品

一路来，一般人都不太看好马华文学作品，认为本地的华文作品水平不高，所谓“经典之作”更是稀有。再加上有关中学“华文科”的精选教材，都力求配合已定下的教学目标，包括（一）培养学生热爱本邦效忠本邦的精神。（二）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及本邦各民族和谐共处、互助合作的精神。……课本选材的标准还包括（一）叙述马来西亚风土人情及文物者。（二）适合马来西亚环境而发扬立国精神者……

由于这数个因素的关系，在1986年之前，有机缘获选编为中学教材的马华作品奇少；有幸获选的马华写作人无不为之雀跃，视为是项荣耀与开怀的喜事！

大约在12年前，我曾力图多搜集有关的资料，后来（1985年4月间）不揣浅薄地写下《浅谈马新中学课本录用的马华文学作品》（以邱子浩为署名刊载于1985年7月12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当时，我着实没料到就在翌年——马来西亚教育部于1986年颁布了《中学华文课程纲要》，本地的出版社必须遵照《课程纲要》中所规定的一切项目来重编国民中学所采用的华文课本，各教材的内容应注重：

（一）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尊重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以达致国民团结的目标。（二）加强学生听、说、读、写的语

文训练，使学生能应用正确的华文来表情达意、叙事说理，以应付日常生活上及日后工作上的需要。

这么一来，本地的中学课本编纂者，在选材方面也得遵照下列的规定：

①有关国民团结的；②有关国家社会的；③有关科学工艺的；④有关语言文学的；⑤有关自然的。

这回的开放，对马华文学作品大大受用，甚至可说是本地的华文作品首次受到重视，因为好多马华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小品文与诗歌）的题材都具备上述的特质，适合有关的编委会的挑选而辑录在中学的华文读本里。在多个版本的华文教材，有一半的课文是选自本地写作者的著作，有多位马华作家的“作者生平”或玉照出现在上述课本内，这是他们以往所难圆的梦，如今却落实啦！在“作者介绍”中，略述作者生平事迹，重要著述和文章风格，这无疑地也提高了本地作家的社会地位；若是他们有了些许的满足感，也是自然现象吧！

获选作品面面观

好多年来，我曾试图多方面蒐集资料，为过去所写的《浅谈马新中学课本录用的马华文学作品》做些增补的工作，然而至今所掌握的资料仍旧有限（主因是柔佛州各中学所采用的华文课本只限定三几个版本罢了，另有一些版本却只在中、北马发行和采用，不易购买到），因此迟迟未动笔。

现时所简介或提到的篇名与作者，挂一漏万；希请读友包涵，并祈盼指正为幸！

（一）由吉隆坡泛马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预备班》（五联

出版社，曾松华编，1987年出版），中学预备班课本，所选用的马华文学作品计有：

①纪青《促进全民团结》（议论文）。②金轮（姚拓）《在我们的国土上》（记叙文）。③海郎《咱们的家乡》（韵文）。④梅井《大桥跨过了檳威海峡》（记叙文）。⑤梅淑贞《参观峇迪工场》（记叙文）。⑥逸名《马来新文学的创始者——阿都拉》（记叙文）。⑦年红《互助合作带来更大成就》（说明文）。⑧符气南《福隆港高原》（记叙文）。⑨逸名《马来班顿选》（韵文）。⑩嘉应子（李锦宗）《藤球》（记叙文）。⑪余寿浩《沙巴的神山》（记叙文）。⑫文勤（陈玉水）《马来亚国的诞生》（记叙文）⑬柳梦（碧澄）译《在彭亨州的森林里》（记叙文）。⑭纪青《进入文明社会的原住民》（记叙文）。⑮逸名译《罌粟花》（韵文）。⑯张子深《模范甘榜》（记叙文）。——全文共有30篇课文，至少选用16篇马华文学作品（包括译作）。

（二）由吉隆坡雅景出版社出版的《华文·预备班》（碧澄编，1987年出版），中学预备班课本，所选用的马华文学作品计有：

①黎编文《同心协力，重振雄风》（记叙文）。②吴岸《达邦树礼赞》（韵文）。③杨夷译《榕树的故事》（记叙文）。④逸名《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的渔民》（记叙文）。⑤金轮《在我们的国土上》。⑥逸名《檳城大桥》（记叙文）。⑦黎编文《积极发展农业》（说明文）。⑧碧澄《蛙鸣》（记叙文）。⑨慧适《橡实爆裂的时节》（记叙文）。⑩佚名《砂劳越的伊班族》（记叙文）。⑪梅井《峇峇与娘惹》（记叙文）。⑫黎编文《保护森林》（议论文）。⑬逸名《29周年国庆》（记叙文）。⑭逸名《亲善号渡轮正式启航》（记叙文）。⑮林潮《麻河之恋》（记叙文）。⑯游国文《椰浆粉加工制造业》（记叙文）。⑰流芳（陈孟）《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记叙文）。——这部课本共有30篇课文，至少选用马华

文学作品17篇（包括译文）。

（三）由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预备班》（郑良树编选，五联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学预备班课本，所选用的马华文学作品计有：

①文勤《马来亚的诞生》。②逸名《田园都市吉隆坡》。③年红《甘吉儿的故事》。④梅井《弄迎舞和班顿》。⑤楼文牧（鲁白野）《马来班顿五首》。⑥萧遥天《槟城的山水》。⑦逸名《砂劳越的长屋》。⑧郑百年（郑良树）《丹绒加弄的农业计划》。⑨郑百年《国家博物馆参观记》。⑩梅井《蜡染的艺术生命》。⑪张子深《模范甘榜》。⑫黄润岳《古城马六甲》。⑬原上草《书摊》。⑭堂勇译《一列村店》。⑮陈慧桦《重游王城》。⑯年红《韩都亚英雄奖章得奖人——陈胜泉》。⑰谢冰莹《太平山游记》。——全书共收30篇课文，至少选用17篇马华文学作品（包括译作）。

（四）由马来西亚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中一》（五联出版社，1987年出版），初中一年级课本，所录用的马华文学作品（包括译作）计有：

①逸名《默迪卡体育场》（记叙文）。②梅井《马来浮脚楼》（说明文）。③张子深《模范甘榜》（记叙文）。④黄润岳《古城马六甲》（记叙文）。⑤楼文牧（鲁白野）《马来亚四行诗选》（民歌·属于新诗体裁）。⑥林潮《麻河之恋》（记叙文，带有浓厚的抒情意味）。⑦水黑《吉打的稻农》（说明文）。⑧梅井《弄迎舞和班顿》（记叙文）。⑨梅井译《蒸煮的香蕉——默君》（短篇小说，属于记叙文的体裁）。⑩海郎《咱们的家乡》（新诗）。⑪柯金德《南海天堂刁曼岛》（记叙文）。⑫年红《互助合作带来更好的成就》（说明文）。⑬梅淑贞《景色宜人的金马崙高原》（记叙文）。⑭逸名《砂劳越的海达雅族》（记叙文）。⑮马崙《雪兰莪滨海区的渔村》（记叙文）。——全书共收30篇课文，至少选用15

篇马华文学作品。

(五) 由泛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中一》(五联出版社, 1987年出版)。初中一年级课本, 所录用的马华文学作品(包括译作)计有:

①黄荣发《国民团结局》(说明文)。②梅井《相识而后能相爱》(议论文)。③年红《甘吉儿的故事》(属于民间传说的记叙文)。④薛洛(陈思明)《马来亚的黎明》(新诗, 属于韵文)。⑤李锦宗《勤劳的花朵开遍适耕庄》(记叙文, 兼有说明的成分)。⑥陈方(马汉)《金马岩高原》(记叙文)。⑦梅井《弄迎舞和班顿》(说明文)。⑧林仙峤《新山之夜》(游记, 属于记叙文)。⑨马岩《雪兰莪滨海区渔村巡礼》(记叙文, 兼有说明的成分)。⑩逸名译《阿都拉游记》(游记, 属于记叙文)。⑪逸名译《坟场的少女》(新诗, 属于韵文)。⑫黎升《冲出恶环境的重围》(议论文)。⑬李汝琳《伊班人的长屋》(记叙文)。⑭冰谷《橡实爆裂的季节》(记叙文)。⑮黄润岳《古城马六甲》(记叙文)。⑯张寒(张子深)《椰树》(说明文)。——全书共30篇课文, 至少选用16篇马华文学作品。

(六) 由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中一》(五联出版社, 郑良树编纂, 1987年出版), 初中一年级课本, 所录用的马华文学作品(包括译作)计有:

①金轮(姚拓)《在我们的国土上》(富有抒情性质的议论文)。②年红《开斋节》(说明文)。③张子深《国家动物园》(记叙文)。④疑云译《童年读书生活》(记叙文)。⑤连士升《论演讲》(议论文)。⑥姚拓《太平山与太平湖》(兼有游记、描写及抒情的记叙文)。⑦逸名《屠妖节》(说明文)⑧梦平(马岩)《摆渡老人》(兼有小说体的记叙文)。⑨黄润岳《油棕园游记》(记叙文)。⑩梁志庆《怀念丰盛港》(兼有描写手法的记叙文)。⑪

梅井《舞狮》（说明文）。⑬韦晕《邦咯岛》（记叙文）。⑭优青（郭隆生）译《访客》（小说体的记叙文）。⑮方北方《在竹荫下》（杂有小部分说明文字的记叙文）。⑯古梅《金马岩山上》（记叙文）。⑰张寒（张子深）《诗情画意的波德申》（记叙文）。⑱慧适《小镇》（记叙文）。⑲余寿浩《沙巴的神山》（记叙文）。⑳温梓川《海滨黄昏》（新诗）。㉑马摩西《宗教司搬家》（记叙文）。——全书共30篇课文，至少选用20篇马华文学作品，占3分之2。

此外，附在课文后面的“阅读练习”诗文，至少录用了9位马华作家的作品。即：①薛洛《马来西亚的黎明》。②田流剧作《遗产问题》。③慧适《青云亭的怀念》。④何乃健《橡籽爆裂了》。⑤林潮《桥和路》。⑥难先《东姑的苦学精神》。⑦游牧《萤》。⑧田思《打开你的心窗吧》。⑨曲梵之（朱进兴）《年轻与文学》等。编纂者郑良树大量采用了本地文学作品，在多种课本中乃居冠呢！

（七）由吉隆坡雅景出版社出版的《华文·中一》（碧澄编，1987年出版），初中一年级课本，所录用的马华文学作品计有：

①黎编文《分工合作、互惠互利和团结》（记叙文）。②慧适《稻田是大海》（记叙文）。③逸名《沙巴神山国家公园》（记叙文）。④碧澄《天桥上》（记叙文）。⑤秃橡《十二条石》（韵文）。⑥忧草《胶林的颂歌》（记叙文）。⑦田舟《问山》（韵文）。⑧黎编文《为国增光》（记叙文）。⑨佚名《石隆门的“水怪”》（记叙文）。⑩符虎《参加峇迪布制造厂》（记叙文）。⑪周美馨《吉隆坡的农民市集》。⑫卢有明（梦虹）《神安池旧皇宫》（记叙文）。⑬梁志庆《做人须学豆腐》（议论文）。⑭逸名《马来西亚遍地黄金》（记叙文）。⑮艾斯《蜡烛的话》（记叙文）。⑯王观新《世界第一架自动切黄梨机》（记叙文）。⑰孟沙《推动

剧运》(议论文)。(18)逸名《第五个马来西亚计划》(记叙文)。
(19)张宛儿《古晋》(记叙文)。——全书共30篇课文,至少选用19篇马华文学作品,占63.3%。

(八)由马来亚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中二》(五联出版社,编者陈宝音,1989年出版),初中二年级课本,所录用的马华文学作品计有:

①陈昌豪《马来亚独立前景》(记叙文)。②佚名《电脑》(说明文)。③曾铁忱《马来渔船的下水礼》(记叙文)。④李冰人《谈榴槿》(记叙文)。⑤燕归来《新绿》(新诗)。⑥新君《欢度嘉年华节》(记叙文)。⑦陈毓平《睦邻计划的新概念》(说明文)。⑧梅井《增进种族情谊的传统节日》(说明文)。⑨梅国民《保护我国的大海龟》(记叙文)。⑩尚思《充满神话的浮罗交怡》(记叙文)。⑪黄俊贤《沙巴可可园巡礼》(记叙文)。⑫逸名《在胶林里饲养绵羊》(记叙文)。⑬于行(纪青)《谈中庸》(说明文)。⑭文苏《稻草画能手珊苏丁》(记叙文)。⑮田思《燕洞去来》(记叙文)。——本书共30篇课文,其中一半(15篇)是出自马华写作人的手笔。

此外,附在课文后面的“阅读练习”诗文,至少也有11篇是属于马华及新华写作者的作品,即:①梅井的《放风筝》。②郭瑞洁的《榴槿》。③适民的《晚风》。④田思的《竹廊》。⑤菊凡的《我的伯父》。⑥熊汉华的《山打根西必洛人猿中心》。⑦彭永兴的《保护海龟·游客有责》。⑧徐秀的《关丹的海滩》。⑨温良的《毒品的阴影》。⑩马崙的《琴韵歌声》。⑪郑辉的《大陀螺比赛》。

(九)由吉隆坡雅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华文·中二》(黎煜才编,1989年出版),初中二年级课本,所选用的马华文学作品计有:

①振航《达雅节访伊班长屋》(记叙文)。②黎编文《沙巴丰

收节庆典》（记叙文）。③端木虹《汉都亚井》（韵文）。④年红《一把大雨伞》（记叙文）。⑤文征《奔驰以外》（记叙文）。⑥黎编文《提防火患》（记叙文）。⑦何乃健《来了，晨！》（韵文）。⑧梅井《纱笼》（说明文）。⑨林炳祥《汉字的故事》（说明文）。⑩田思《燕洞去来》（记叙文）。⑪黎编文《毒贩无孔不入》（说明文）。⑫梦平（马峇）《哥打丁宜瀑布记游》（记叙文）。⑬洛深（碧澄）《昆虫学家法布尔》（记叙文）。⑭梁放《丹绒波上一点白》（记叙文）。⑮佚名《橡胶生产的新方法》（说明文）。——全书共有30篇课文，其中有一半（15篇）是属于马华写作人的作品。

此外，附有课文后面的“阅读练习”诗文，至少也有6篇是属于马华及新华写作者的作品，即：①节自梅井《马来亚风情画》。②节自郭北《一条街的山城》。③节自醉梦斋《马江桥留足迹》。④文恺《蜜蜂》。⑤节自马峇《拉让江上的见闻》。⑥节录自田流独幕剧《这个家》。

增补的零星资料

自从新《课程纲要》推行后，大马各国民中学或国民型中学所采用的《华文课本》，我一直无缘悉数遍览，因此未能简介所有作者及其选作篇名；谨在此，希请被挂漏的马华作家曲谅！

上述的作家群中，有些实系中国作家，比如郭嵩焘、李钟珏、左秉隆、黄遵宪、郁达夫、谢冰莹、燕归来等名家，可是他们都曾经在新马居留过，而且以本地题材写下出色的诗文，既然已获选编入课本里，就暂且视它们为“马华作品”吧。

以前撰文时，所挂漏的一些已编进本地中学或适合本地中学采

用的华文课本的作品，顺此增补如次：

新加坡洪家花园记（郭嵩焘）、新加坡风土记（李钟珏）、新加坡吟（左秉隆）、新加坡杂诗（黄遵宪）、送女弟（黄遵宪）、七绝四首（丘菽园）、槟城游记（郁达夫）、巴刹与南洋社会（连士升）、锡兰——哥伦坡、堪提（沈思中）、释南洋（许云樵）、新绿（燕归来）、从马来民歌到印尼民歌（佚名）、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郑子瑜）、李清照的身世之谜（芝青，1955年香港大公书局版）、香港风景线（连士升，1955年香港大公书局版）、新加坡的雨（毛永清）、一小点（梁文福）、戏尾（黄叔麟）、潮来的时候（杨嘉）、马来民族的舞蹈艺术（梅井）……等。

除了上述所提的中学课本之外，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编印，大马各独立中学所采用的华文课本，也选用一些马华文学作品，例如：吴岸的《鹅江浪》、高青的《献歌》（初二上册课本）、梁志庆的《根》（初二下册）和《峇迪布》（初三下册）……等多位马华作家的大作也被编选入此套中学课本。

提高本地作家地位

此外，我们也获悉：云里风的短篇小说被编入大马师训学院的教材里。梁放的作品除了被编入中学教科书，也获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中文系采用为教材。郑万城（南集）的论文《九十年代的报业竞争》，被编入大马教育部的华文中四课本。李寿章（难明）的《树胶颂》、梁志庆的《我国的峇迪布》（华文·预备班，马来亚教育供应社版）和《垦荒的人》（初中二，大马出版供应社版）……等等，未能在此详录。

目前，已有这么多位马华作家所创作的这么多篇本地文学作品，

成为当地中学的华文教材，数以万计的中学生熟识了他们的生平事略。昔非今比，今日的本地写作人的地位，谁说不是已日益提高了么？

1997年2月9日（丁丑年初三晚）完稿



前排左起：年红、萧依钊、云里风、戴小华、梅淑贞、马峇。

后排左起：小黑、王祖安、梁志庆、李天葆、高秀、何乃健、唐林

（1995年9月3日·吉隆坡）

大马华文报章应重视马华文学

主催者的话

本篇笔谈，乃由吉隆坡小说家潘友来（现任《中国报》总编辑）主催，于1979年3月间函邀笔者、温任平、雅波及菊凡4位文友参加。年轻有为的潘友来在“开场白”中写道：

“马华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依赖我国华文报章的‘支撑’，几十年前如此，几十年后的今天也一样。那么，当前华文报章在这方面所表现的‘关心’是否足够呢？”

我们且来听听四位我国作家对此的意见，他们是（一）梦平；（二）温任平；（三）雅波；（四）菊凡。笔者仅略提项，希望这4位作家针对它们谈谈，即：

（一）站在一个文学工作者的立场，看现有我国华文报在‘文学’的表现。（二）您所看到的报章和文学存有的‘紧密关系’。

（三）您认为报章在这方面应该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四）以您的观点，您认为华文报应该如何去加强这方面的努力？”

以下的笔谈，是当年（那年代正值马华文艺低潮期）有感而发的（其他3位文友的笔谈，恕未附录）：

战前新马报章贡献大

文学是文化建设中顶重要的一环，而文学活动即是人类文化的一层。文学也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

文学的内在精神是不朽的；若要了解一个国家过去的时代，我们不能不先了解其文学。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外来学者，在他们研究马新文化时，先从文学作品着手的原因所在。

翻阅已出版的两套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大系》（10册）和《新马华文文学大系》（8册），以及《马华文学史话》（苗秀著）和《马华新文学史稿》（方修著）、《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方修著）等书，我们不能不敬佩过去的文艺工作者，曾充分地把握着历史的动脉，奉献了各自的热忱与智慧，为马新文化结下了这么丰硕的果实。

本地华裔社会孕育了马华文学，而报章杂志让它顺利地诞生下来，尤其是早期的华文报馆，它对于马华文学的奠基及发展，居功厥伟。那些报章对于文学界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文史家已给它们记下大功：

——名小说家苗秀说：“从一开始，马华文艺创作活动，就以报纸的文艺副刊为骨干的，各个文艺发展时期，都不外以几个大报的文艺副刊为中心，如果我们说这些报纸的副刊代表了整个马华文坛，也不算过分的。早期的马华文学——从1925年第一个纯文艺刊物《南风》发刊至1931年这一段时期——经常出现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借星马各大报的版位刊行，像新加坡方面的《星光》、《浩泽》、《荒岛》、《绿漪》、《奠基》，以及檳城方面的《荔》、《八月》、《夏天》等都是，对于推动马华文艺运动，尽过不少的力量。1931年以后，这一类由文艺青年组合创办的同人文艺刊物很少见了。马华文艺的活动范围开始局限于各大报自设的文艺副刊，像南洋商报的《狮声》和星洲日报的《晨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见《马华文学史话》页5）

著名文学史家方修说：“可以说，早期当地的一些华文报，对于马华新文学的发展，是有其一定程度的贡献的；只是没有像中国

的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等，对于新文学、新思想的推动、鼓励、抱着那么积极的态度吧了。（见《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页5）

70年代中令人叹息

从史料，获悉早在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期（1920年至1925年7月），当时的本地报馆便已极重视文艺副刊了。然而经过了漫长的50余年后，今日西马报章的文艺副刊显然是没有多大进步的；有的报馆只辟设了《歌潮》、《歌讯》之类的娱乐副刊，对于发扬真正文化的文艺副刊却付之阙如，这怎不令人失望呢？

有价值的文艺副刊，有时并不是普遍读者喜爱而接受得来的，这跟本地华文水准低落有关。可是为了整个文化事业，为了发扬文学，一家肯负起使命的报馆，是不会完全漠视文化的，纵使每月要付出一笔可观的稿酬也在所不惜的。否则，那是纯商业性或纯娱乐性的报章，不屑一顾。

最近5、6年（1973~1978年）来，有些辟了文艺副刊的报馆，也会令人叹息的，因为所刊出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品太多了。听说那是最受年轻人欢迎而带有新潮韵味的创作，但个人对它却毫无兴味。

文艺园丁的胸襟

我们不欢迎逃避现实、专写灰黄或病态内容，却只一味讲究艺术技巧的作品，故此恳望身为文艺园丁的编辑先生们，在极可贵的版位里，选刊内容坚实、文学技巧不俗的创作。也唯有这样，报馆

副刊和主编的名字，才能登录在文学史上，而作者是仰仗他们引出来与读者见面的，可以说，没有高明的文艺副刊编辑，他主编的园地，也冒不出优秀杰出的写作人材。

大体上来说，过去那些由文艺作家所主编的副刊，都以自己的文艺观来取舍文稿，比较开放的编辑并不多见，我们在要求报馆增设文艺副刊的同时，也寄望文艺园丁的胸襟廓大！

1979年4月29日刊登于第512期《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



前排左起：陈雪风、吴天才、云里风、拿督斯里张德麟、陈应德、李忆蓀、永乐多斯。

后排左起：马峇、梁志庆、唐林、小黑、陈政欣、张发、马汉
(1996年4月7日·吉隆坡)

我对国家文化的看法

个人认为，全国15华团领导机构于去年（1984）4月间向当局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的四大原则，最为可取。有关的四大原则是：①我国各族文化的优秀因素是国家文化的基础；②科学、民主、法治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③共同文化价值观应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和④国家文化应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来建设。——这四大原则不是比文青体育部的三项原则更具意义吗？因为前者正确地处理了各族之间的平等关系，提出以民主协商来建设全国文化；并且亦正确地解决了文化内容与形式问题，提出建设国家文化的指导思想。——令人惋惜的是，文青体育部长竟以国家文化政策是无可妥协的，和它将导致文化多元主义与平行文化等理由而加以拒绝。

现行的国家文化政策，已然把马来文化和回教提升到特殊的地位；渐渐地，缺少了一套强有力的建设国家文化的指导思想，不易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以促进国民的团结。

在一个多元民族的社会，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调和是十分重要的。吸收了各族优异的文化元素，它自然地形成马来西亚文化。既然国家文化是基于民主平等的原则，那么，我们坚信唯有融合各民族文化的精神，才能产生具有多元色彩而为各族所接受的国家文化。

文化建设是一项长远的工作，任何国家文化，都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而形成，不是由创造而来的。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国家文化的建设，绝不可忽略各民族人民的愿望与感受；华人文化，不应该被排除在国家文化之外。以往，在实施政策时的一些偏差，是极需匡正的。所有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应以互相尊重的态度来处

理，将有利于提高人民精神素质的文化成分，摄入国家文化中。

一个真正的国家文化，必需经过长时期，甚至于数百年的多元文化自由交流和融汇贯通的情况下，逐渐产生的。今日所采用的任何手段去塑造的国家文化，自以为是某一族的文化特征，都不一定能长久的代表真正的国家文化。

今后，不仅要关注国家文化的塑造，而且必须积极参与；除了争取华人文化的合理地位外，还得检讨华人文化与革新等问题。维护文化是人人的天责，大家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创造具有民族风格和马来西亚色彩的新文化，使国家文化的内容丰富起来。

稿于1985年10月

◎本篇笔谈，由太平作家雅波策划，参加者计有云里风、江上舟、方昂、年红、刘祺裕、海凡、翻腾（7位同伴的文稿，恕未附录于此）和我共8位，刊登于第89期《星洲日报·文化》副刊（1985年12月14日）



左起：拿督斯里安华、马峇、郭洙镇（高青）、姚拓
（1988年9月16日·吉隆坡）

营火照亮华文文艺前景

世华作家大聚会

两年前（1983年1月），新加坡文坛曾有过不朽的盛事——第1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在新加坡盛大举行，圆满结束；那是思与情的交流，灵与智的相会，备受赞誉。

今年正月间（4日至7日），第2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又在新加坡，一连举行4天，八方风雨再度会星洲，艺文缤纷的盛景又重现，备受各方瞩目。这回的主办者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与联合晚报；联同文艺营一起举行的是“金狮文学奖”颁奖礼，地点在阿波罗酒店十八楼的水晶厅。阿波罗也是这次文艺营的赞助者。

主办当局为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提供一个难得的大聚会，参加的著名作家，包括来自中国的萧乾、姚雪垠、秦牧和文洁若；美国的张系国和刘绍铭；台湾的痖弦和三毛；香港的余光中和钟玲，以及马来西亚两大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代表朱自存（先出席，后由陈雪风代替）和陈基球等。无法前来出席的两位是台湾的高信疆和香港的小思。

文艺营举行期间，作家们发表了专题演讲和主持座谈会；专题演讲包括萧乾的《谈文艺交流》（主持黎德源）、姚雪垠的《历史小说与历史》（主持：林徐典）、刘绍铭的《海外华文作品与本土认同》（主持：淡莹）、张系国的《科幻小说与欧威尔经验》等。座谈会包括话题《进一步谈文艺交流》，由黎德源主持，主讲者计有：文洁若、余光中、张系国、两文艺团体代表王润华、杜诚、大马报社代表陈雪风、陈基球、联合早报代表刘培芳等。另一个座谈会话题是《文艺副刊的走向》，由黄彬华主持，主讲者计有“秦牧、

痾弦、刘绍铭、钟玲、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代表陈雪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代表陈基球、新加坡联合晚报代表杜南发等。

此外，为了让当地青少年认识华文文艺，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准，主办当局特地安排了3个“工作坊”，由参加文艺营的作家主持；小说和报道文学组由萧乾、张系国、钟玲和文洁若主持；诗歌和散文组的主持者，是余光中、痾弦、秦牧和三毛；出席者是当地的文艺青年、大专学生、高中生及青少年记者。这个新鲜、活泼的交流形式，旨在推广新华的文艺活动。

在文艺营的团幕礼（7日晚）上，主办当局举行了“文学之夜”，让爱好文学的人士参加；数百名文人雅士，使欢乐狮城添姿彩。

营火燃烧，火花点点；文艺营闭幕了，不料营外仍有“营”——9日晚上，由联合早报和晚报与五月诗社联合主办的“散文诗歌之夜”也紧接着推出了。饮誉国际的诗人余光中和痾弦留下来，协助主办的负责人悉力搞好“散文诗歌之夜”的朗诵工作；著名散文作家秦牧也出席发表演说，讲题是《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风貌》。

这个难得的国际性的华文作家的盛会，意义重大，振奋人心，已然为华文文艺界带来一些激励作用，探索了新路，继而全力发展文艺，大家预期文艺种子可在当地开花结果。

“国际华文文艺营暨金狮奖颁奖典礼”工委会主席钟文苓说：“我们决定每两年举办一次文艺营及金狮奖，就是为了鼓励本地华文文艺写作风气和提高作品水平。……这次文艺营的举行，对本地华文写作界肯定具有一定的鼓舞作用。”——是的，这回来自海外的十位名作家，在新加坡汇集一堂，躬临盛会，交换创作心得，讨论诗艺文章，必然将会激发新华写作人（也影响到马华文艺工作者），以更大的热忱和加倍的积极态度来从事文学创作，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难产生的了。这类具有多方面意义的国际文艺营，值得有关报社长期地主办下去！在未来的岁月里，可望把商业味极浓

的岛国转变成文化气息芳香的国家。

有利于新华文艺发展

新加坡第二副总理王鼎昌，在为第2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开幕时的致词，也是令文艺工作者兴奋的。

王副总理建议，设立一个全国性文艺基金，由报馆、文艺团体、写作人及宗乡会馆协助展开筹募基金工作，而政府则可考虑从文化基金中，拨款资助这些活动。他表示，新华文艺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他坚信，新加坡各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在今后15年的文化工作纲领下，将会大放光芒。

王副总理也强调，文艺发展的兴衰，决定于客观的环境与条件，同时，也决定于作家的努力，而新加坡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将有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政府新一代领袖所描绘的新加坡前景，将使得当地的文化艺术百花齐放。

他建议，新加坡每年举行一个文艺节，作为每年文艺活动的高潮。文艺节的活动，可通过多姿多采的方式举行，同时表扬一年来最优秀的作家，邀请外国的作家为年轻一代讲述他们的创作经验。

是的，以王副总理的身分来倡议举办文艺节，相信势必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支持，再加上今后的建国重点是放在塑造一个更有教养的社会，大家应可预期，文艺在今后的新加坡自有更良好的发展环境。盼望一个文艺春天的到来，那不是—个空幻的美梦吧。

上述王鼎昌副总理的建议，经被认为是为当地华文文艺注射了强心剂。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长王润华对王副总理的演词感到非常高兴，他说：全国性的文艺基金如能设立，不仅对爱好写作人士是一种鼓舞，同时可以更进一步的推广文艺活动，而青年一代也将对

新华文艺充满信心。

王润华指出，几年来，新华文艺界出现一股低潮，这项建议将有助于把文艺活动之火重新点燃，使它更炽烈、更耀眼。他也希望报馆和宗乡会馆能够响应王副总理的建议，把华文文艺推向另一个高峰。

新加坡国大中文系高级讲师陈荣照建议，文化界、报界和宗乡团体组织一个委员会，共同负起推广文艺活动的任务。他语重心长地说：“只有实际的去推行，而不是纸上谈兵，我们的文艺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广。”

若是果真能借到政府的“东风”，新华文艺必然将有令人满意的成果。

文艺交流纵横谈

在第2届国际华文文艺营的节目中《谈文艺交流》是最重要的一项专题演讲；《进一步谈文艺交流》，则是主要的座谈会之一。

文学家萧乾在发表《中国与新加坡文艺交流的前景》专题演讲上认为，新加坡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名著，是大有可为的。新加坡由于地理因素，与外界接触广泛而迅速，因此，在翻译一些外国作品上是相当顺手的。

萧乾说，中国与新加坡的华文作家，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点——都用方块字来表达各自的思想感情及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同时在文学史上，两国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在文学方面，两国可说是“同多于异”。他极力赞同新中在文学上加强交流；他坚信这种交流对于促进两国的文学事业，提高写作的质量方面，是大有裨益的。

另一方面，萧乾也介绍刚在汕头大学设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它目前已被鼓励以新马华文文艺作品为研究重点。他说，研究中心负责人陈贤茂希望能用客座教授的方式，聘请新马学者去讲学，并希望在汕头大学举办一次华文文艺营。他们也计划出版一些丛书。

11位华文作家和文艺团体代表，在“进一步谈文艺交流”座谈会上，各自抒发了宝贵的意见；萧乾夫人——文洁若提出了文学交流的几个方式，包括互相访问，像中日之间民间团体的来往便很频繁。虽说新中也有互访，然而这不如作家私交以及互访来得亲切而有意；她相信新中作家未来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姚雪垠建议应该有个类似诺贝尔之类的华文文艺奖，以鼓励华文的写作者；新加坡和香港是最理想的两个地点。大家相信钱的问题，是可以在世界各地的热心华裔人士支持下而筹获的。

姚雪垠将把第2届金狮奖的小说作品，选带到北京，出版单行本，也让中国青年尝尝新加坡的“地方菜”；这对新华写作人来说，也是一种鼓励。——来自台湾的“副刊王”痖弦也有意把这回金狮奖得奖作品带回台湾，出版《新加坡文学专集》，这该是促进各国华文文艺交流最具体和最实际的表现哩！

秦牧则认为，东西方文学应该互相取长补短，不过华文文学应该先在内部大量交流，进一步才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去。他也建议把华文文学大量翻译成外文，传到世界各地去。

营火永不熄灭

这次文艺营，座谈会方面收获最大的该是《作家与作家对话》，出席者都一一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具体建议，为新华写作人提供了

一个今后该走的方向。

文艺营工委主席钟文苓说，联合报计划在来届的文艺营中，扩大参加者的阵容，除了金狮奖的评审委员外，也会邀请其他的作家参与。下一届（第3届）的国际华文文艺营，预料是在1986年举行。

呵，文艺营结束了，营火却永不熄灭！许多文艺爱好者会把火种传播开去，使文艺的火把在狮岛各个角落不断地发光发热；新华文学艺术建设的远景，已清晰可见。从第1届到第2届莅临的海外作家，已把无数的文艺种子抖落在狮岛，它自有萌芽、茁壮成长的一天！

1985年7月15日追记于柔南望莱镇

1985年10月刊登于大马《写作人季刊》



后排左起：叶钟铃、甄供、艾青、高瑛夫妇、方北方、萧乾、陈雪风。蹲者：莫河、彦火、马峇、烈浦（1983年1月14日·新加坡）。

进行应有的与严肃的省思

春天的趯声响啦，丙寅年即将莅临；春原是带来欢乐的气息，然而今年，有多少人是真心地迎接新年？

多月来，市况不好，百业萧条，经济不景气；这时候，除了富裕人家和孩童之外，谁还有心情大事庆祝新年？

现时，我没有欢乐，却有哀思；没有向往，却有感怀，甚且叹息起来。

1986年元旦后的第3天，到邻国逛书城，同时与文友约晤畅叙。文友展读由我携赠的新年特刊，那篇长约3万字的《1985年的马华文坛》吸引了他。

好一会，他的视线才从报纸上移注着我说：

“你们在1985年，全马各地举行了这么多文艺活动，包括文艺营、写作讲习班、文艺讲座、专题演讲、文艺创作比赛、文学出版基金、文学奖、诗歌朗诵和个别文艺组的活动等等，怎么能够说‘马华文坛是沉寂的’？”

我淡笑一下，没出声。他又紧接着说：

你瞧：在马来西亚，1985年出版的文艺书籍便有几十本；不是吗？出版的散文集有22本、小说集有15本、诗集10本、别集4本、合集4本、儿童文学4本，还有其他的书籍共有14本。这是多么可观的数目呀！

我轻声道：“我略略算过了，去年所出版的马华文艺书籍，约有73部。”

跟着，这位热诚的文友要我对整个文坛作个不客气的批评。我表示：要大胆地批评人家的单行本，恕我无法办到，因为最少有三

分之一的书我没翻阅过，妄下评语是不公平的事。

然而，他还是不放过我——非要我总评几句话不可。于是，我寻思再三，才把自己的一点浅见吐露出来。为了交代得比较清楚，我不妨重组后将它写下来：

在过去的1年（1985）里，马华文学事业没有停滞，虽然全国的经济持续的萎缩，失业的浪潮不断地冲击，文艺书籍更难销了，可幸的是马华文艺仍然正常地、多样化地发展着。

马华的报刊原有不少可贵的园地，然而可惜的是长期让外人占据了：有的报社为了免付稿费，便一味采取“剪刀与浆糊政策”，所刊登的作品多转载自港台的报刊。有的却付了重金，从港台等地买来了大量的武侠与科幻小说及畸恋神怪等所谓猛稿，这么一来，可供本地人投稿的版位便少得可怜了。

一般的说来，目前供青少年投稿的文艺园地已显著的增多，反而是写有一定水准的老中青作家，他们的作品苦于没有足够的副刊可发表。有不少的作者，正如中国作家王蒙所说的：“创作不是从生活出发，喜欢看行情，投其所好”，“喜欢揣摩一个刊物的特点，探编辑的口味”。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作品，不免是属于生编硬造，缺少生命力的文稿。

在类似青年园地的副刊投稿，薄具成就的新秀，虽然已日见增加，不过，他们还不太可能把马华文学创作的水准提高起来，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绝大部分的年轻作者未能深入生活，倾听活生生的现实的叹息，设法去深的开掘、深的概括和深的感受。因此，他们不能在生活中发现文学，又无法在文学里发现生活。可喜的是，年轻人多能振奋精神，勇敢实践，故此，殷切盼望他们在反映现实与艺术创新方面各自作着更认真的努力。

许是文学作品受到稿费菲薄的影响，有些写作人已宁愿“签约”卖文为活，只求报社采用而有优厚的稿酬，不在乎内容或水平如何。

这么一来，原写有一定高水准作品的马华写作人，又减少产量了，出现在报刊上的必传之作，显然奇少；堪称呕心沥血、传诵一时的杰作，也今非昔比了。写作人不能把自己的热情和思想的果实献给读者，自然难以产生激动人心的有份量的作品。马华文学事业未能迅猛地发展起来，这也是一大因素吧。

跟前一两年一样，1985年写专栏的作者还是遍布于文艺副刊和综合性副刊各角落，以嬉笑怒骂者居半；但严格说起来，长期写得好、淋漓尽致、斐然成章的，充其量也不上6家吧。已出版专集的《松柏书系》的作家们，是公认的较有代表性的几位。

由于国内各地常举行文艺座谈会，所以发表在报刊上的讲稿或专论也较多；大体上来说，当前的马华作家的论述文章已能意到笔随，涉及面也较广阔了。著名小说家方北方的多篇书评理论，颇引人瞩目。文章气魄的雄伟，还是由方北方、韦晕和原上草等老作家领先。

今日的文坛，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专题演讲的作家多，惜乎宏论有，行动少，创作无。作家绝对不能沦为“坐家”，如果不是由于创作的生命枯竭的话，谁都不能“述而不作”吧！

一句话：在新的一个年头里，我们有必要对当前的创作情况，进行应有的与严肃的反省！

“爆竹二三声人间改岁，梅花四五点天下皆春。”

噢，哪有爆竹，哪有梅花？

“金虎一啸除旧岁，宏业大展迎财源”。

——又是崭新的一年啦！虽然听不到虎啸声，穷文人也与“财源”无缘，不过，半岛上还是有猛虎存在的，写作人不妨向创作的题“材”（财）源头挖掘下去，必有预期的收获吧。

临末，谨在此谢谢寄赠贺年卡的文友们！由于笔者带孝在身（先慈辞世未足一年，邱府按照传统习俗至少带孝一年），所以破例地

没呈寄红彤彤的拜年卡，祈请原谅！一年很快又将溜逝的；让来年这时刻，我趁早向大家拜年，并有机会交换文坛现状的新意见。我期待着！

1986年2月21日刊登于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新春漫话〉特辑》副刊



第1届东合华文文艺营在新加坡举行，5国代表作家参加，开幕典礼后合影，前排左5何家良、左8柳北岸、左9骆明、左10是马峇（1988年12月21日·新加坡）。

《新亚少儿文学丛书》总序

此时此地，若要达到建立书香社会，那还是个长远的目标；有待社会各阶层的有心人士共同努力，才可望实现。

从多方面来看，新马的少年儿童文学并不蓬勃；要是跟中国、台湾或香港等地区的飞跃情况比较，本地的少年儿童文学，可说只越过了拓荒时期罢了。——据说在中国，中央与各省都成立了专业的少儿出版社，每年印行种类繁多的少儿读物。在台湾的书店，多数有为年幼的一代辟设儿童部门，而且布置得很好。试想，他们为当地的少儿读者贡献了多少的心力！

儿童文学未能在新马普遍的拓展与推广，个中的因素甚多；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本地是个商业社会，在商言商，赚钱第一。而搞儿童出版物与推动文学一样，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在高度现代化和商业化的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重于一切；文学作品原已不是普遍受人欢迎，鲜少人愿买本地成人著作，更遑论少儿文学读物了。——今天，人们过分重视现实，讲求实用，父母都盼望自己的子女能在会考科目中获得优异成绩，挤入名校；加上一般的学生要学好多种语文也着实不容易。于是，师长天天督促孩子专攻会考科目，死啃教科书和会考参考书成为学生念书的惟一途径，自然不鼓励他们多看课外读物。这么一来，少儿文学书籍成为“冷门货”，肯印行它的出版社必然锐减了。

现代的社会，一般人所热烈追求的是物质生活，父母也常忘了儿童文学读物是子女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多接触良好的读物，即是参与有益身心发展的消闲活动。阅读课外书也是日常生活

的必修科；多阅读少儿文学作品，对于成长中的少年儿童有着启发的作用，同时能丰富知识、开拓视野，还有益于身心健康，并打下语文修养的基础。此外，选读良好的课外读物，往往是一种自我教育的开始。

在写作人本身方面，我们总觉得当前在主观上的努力不够；新马的儿童文学家，来来去去只是那3、50位罢了。有些本地作家，甚且把儿童文学看作是“小儿科”，不值得一试（写）似的。我们恳盼有更多的本地作家，愿意花些精力及时间在少儿文学创作上，写出具有本地色彩、有想像力及文学性的少儿读物。

出版少年儿童文学读物，是有一定意义、有使命、有目标的教学工作之一。出版商或工商团体理应大力鼓励当地的少儿文学作家，更积极地进行儿童文学的创作，双方合作出版更多有价值的本地少儿文学读物，进而推介到校园去销售。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尝试出版这套《新亚少儿文学丛书》，期望能多为较高龄的儿童或少年们提供一些读物，启发他们的知性和感性等方面的潜能，充实生活的内涵。要是多方面能够配合与合作的话，今后本地的儿童文学运动必能热烈地展开。我们只能在此略尽绵力；大伙儿统筹奋勇地进军，坚强地走下去，当能创下集体丰硕的成果。我们期盼着。

附记

关于6本书的内容

由马峇主编的《新亚少儿文学丛书》（共6本），从1993年7月至1994年9月分别出版，各书依序为：

①小青树（中篇小说·丘岷著）

- ②那点水的蜻蜓（童诗·陈文浩著）
- ③到山芭度假（生活故事·梦平著）
- ④童年的梦（新诗·莎琳著）
- ⑤好日子会来（短篇小说·马峇著）
- ⑥新马岛屿风光和传说（旅游故事·龙琦著）

6本书的内容简介如下：

1. 中篇小说《小青树》（丘岷著）

世界各国，几乎在争取独立建国的拓展时期，都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才有辉煌的成绩表现出来；新兴的新加坡共和国也不例外。

这部中篇小说，是写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勾勒出新兴国家建国初期（十年）群体勇猛战斗的精神面貌，既有历史的轨迹可寻，也描绘了绝大部分爱国人士艰辛的侧影。多年前，本书曾获得已故新华文学家赵戎的肯定与评介。作者考虑再三后，决意让它保留原貌出版为单行本——呈献在年轻一代的读者面前，同时也让较年长的读友重温旧梦，并进一层了解“一棵树的成长是须要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练的”。

2. 诗集《那点水的蜻蜓》（陈文浩著）

这是一本多格式的综合童诗集，有童谣、有童诗、有童言、有大人心态的童诗，也有儿童心态的童诗；可是看起来并没有很明显的分野，但主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是儿童化，避免故作天真的取悦格调，因为在文化艺术上，我们和儿童是平等的，他们对优美的文学言语照样有鉴赏的能力。

这是陈文浩的首部童诗集，他写诗，也作画，一路来，他都主张诗画并重，所以喜欢在画里题上自己的诗，也替自己的诗作插图，他以很写实而又简明的手法，写出这一集清新可爱的插图。

他从各个角度去诠释各种孩子的心态和思想感受，他一方面告

诉大人们如何去表达对孩子们的期望和勉励，另一方面也剖析了孩子们在各种环境里的无助和被忽略的心态，这种表达是有助于父母亲对孩子们的心态和思想感受的认识，也是这本童诗集的存在价值。

3. 生活故事集《到山芭度假》（梦平著）

孩童有着世界上最可爱最纯洁的心灵。然而，在今日的社会，成年人的自私、愚昧和贪欲，每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少年儿童们，使新一代的心灵也不尽然单纯，甚而有着不正确的思想意识。

本书所收集的14个短篇小说，内容广泛，作者通过一个个生活故事，用心良苦地引导、启示少年儿童，加强少年儿童的认知，约束自己的行为，建立健全平衡的心理，培养高尚的情操。作者苦心孤诣，旨在通过此书，提升新一代的品行素质。

4. 新诗集《童年的梦》（莎琳著）

年青写作者莎琳，以她轻灵巧思的笔触，为周围的所见所闻写下个人的愿望与感怀，也注入了少许淡淡的哀愁；不屈的意念始终隐现在她的咏物篇章。为少儿写的一些童诗，令人读后意志昂扬。谁说落实人生的理想，不是一场恒久的挑战？作者那积极性的思想和哲理性的感怀，足以启示少年儿童向上向善；在需要不断鼓舞激励的学途上，像这样的专集，正适宜与你为伴。

5. 教育小说集《好日子会来》（马卷著）

今日的社会，孩子们的世界是广阔的，但他们的心灵却不一定是单纯的。在学校里，少儿接受了不少的道德价值观，灌输了好些正确的理念，以作为思想发展成熟的基础。在这本课外读物里，由于作者是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所以有关少儿生活的选材严谨，故事内容生动感人，洋溢着童真与童趣，且寄寓着一定的教育意义，有助于启发少儿的创造力和辨识力，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并激发起

他们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的意志。

6. 旅游故事集《新马岛屿风光和传说》（龙琦著）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领土，不是在岛屿就是在半岛上面。这不少的岛屿，宛如一块块浮在绿波中的翡翠。千百年来，本地民间流传着许多动人的岛屿故事，那是祖先对大自然的奇奥壮丽的遐想。——龙琦在20年间，不断地搜集有关岛屿的传说、神话或掌故。从这些传说中，您可以体会到前人的智慧，仍然闪闪地发出美丽的光芒。在生活的海洋中，我们必须像绿岛一样，在风浪里稳实坚定地屹立。

1995年8月23日·辅莱楼



左起：年红、马汉、马峇、朵拉、黄戈二、丘梅。

站立者：李天葆、章钦（1995年10月12日·吉隆坡）

两套儿童文学丛书与我

(一)

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史料的整理工作之外，我对少年儿童文学写作方面，也有相当的兴趣，因为我关爱所有的孩子，大半生朝夕与一大群儿童为伴。大约于1973年开始创作少儿文学作品。

初期完成的《新马岛屿的故事》和《猎人底话》，分别荣获新加坡教育部主办的“1973~1974年儿童读物征文比赛”的书本组入选奖（由教育出版社出版为单行本）和文章组亚军奖（收入合集《美丽的心》，于1974年出版）。

较后，我比较侧重于新、马民间故事的编写，不过，直到1989年4月，才有机会由新加坡胜友书局出版了《新马山峦的故事》一书。

约莫在70年代末期，我曾经数次努力主编“儿童文学丛书”之类的个人专集，邀请了至少3位马华著名儿童文学家助阵，十本文稿已打字校稿，插图也配合上说明文字，结果呢？却“胎死腹中”，连原稿或剪稿也无法奉还给作者，这是多年来一直令我内心不安的地方！由此，也足见要完成一套比较像样的“少儿文学丛书”，有时并不是一件顺利的事，而我的能力有限也是个主因。

(二)

几近二十年以来，我一直设法实现这个小愿望、谋求满足自己的欲望，终于机缘来啦！——1993至94年间，由我筹划主编的《新

亚少儿文学丛书》（共6本）成功出版了。这套丛书依次为：①小青树（中篇小说·丘岷著）；②那点水的蜻蜓（童诗·陈文浩著）；③到山芭度假（生活故事·梦平著）；④童年的梦（新诗·莎琳著）；⑤好日子会来（短篇小说·马岌著）；⑥新马岛屿风光和传说（旅游故事·龙琦著）。——这6本少儿文学作品，总共约640页。

有机缘让上述的6本专集，列入《新亚少儿文学丛书》里，虽则距离自己的目标尚远，然而总算实现了宿愿，内心的快慰自不在话下！

这套《新亚少儿文学丛书》，在新、马二地发行之，销路还蛮好的；其中梦平著《到山芭度假》，和马岌著《好日子会来》这两本教育小说，还幸而有机会再版，使我们对这类少儿文学的出版工作增添了信心。

（三）

1996年8月杪，我在社长杨天助先生的同意，和主任罗兆德兄支持与协助之下，决意主编新的一套丛书——《新亚青少年文学丛书》。第1、2种《复活少年心》（梦平著）、《童园牧歌》（莎琳编选），已于1997年初相继问世。

我在《新亚青少年文学丛书》总序中写道：——

我们都了解，健康的课外读物在青少年的天地，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辅导青少年最有效的东西，具有启迪纯洁心灵的作用。

为年轻一代提供一些健康的课外读物，这是蛮有意义的工作。大家几乎都知道：本地的读书风气普遍的低落，本地出版的青少年丛书奇少，尤其是具有地方色彩，适合新马社会需求的青少年文学

专集，有如凤毛麟角。

为了尽一点心力来协助推动青少年文学，本社决定出版这套《新亚青少年文学丛书》，比较适合于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学生阅读。不论在教育小说、生活故事、短篇故事、诗歌、乡土历史、人物掌故及风土介绍等等，都极具可读性。

在1993年至1995年间所出版的一套6册的“新亚少儿文学丛书”，承蒙读友们的支持，使本社有勇气继续出版另一套6册的《新亚青少年文学丛书》，恳请文教界的先进，随时予以匡正，谨此致意——谢谢大家！

1997年1月14日·净莲园



新加坡新亚出版社社长杨天助、出版组华文主任罗肇德、主编马峇
(1997年1月9日·新加坡)

参加最多文艺活动的一年

(1988)

“时间过得很快……”

年前，在朋友开的一间茶室，他那10岁余开始念5年级的女儿告诉我：

“我们的校长讲话的时候很好笑，每次周会时，校长一上台，第一句话总是说：时间过得很快！……”

此刻，我忽地也有此感慨：

“时间过得很快，又是春节时刻啦！”

在很快就已成为过去的一年（1988年）里，很多时候，我的心在剧跳，那是由于兴奋、不安与愧疚使然。

总的来说，我是兴奋居多，原因是——

1.1 我有幸会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和汉学家，与他们相见欢。他们都表示马华文学将丰富国际华文文学和知识宝库。

1.2 我听到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探讨与研究，应该首先在东南亚国家进行，才能有力地唤醒该地区人民对这方面的重视、关怀，并能更准确、更深刻地向外国传达这里的研究成果。”（出席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学者、作家都有此同感）。“在新马两地，华人作家人数之多，素质之优秀，可称东南亚之冠。”（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周策纵教授表示）。“华文文艺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当我们在强调东方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时，华文文艺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尤其是在教育与社会方面。……东合各国都是多元文化的国家，华文文艺若能健康的发展，对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会有一定

的影响。”（新加坡何家良高级政务次长说）。

1.3 我接触了更多的马来作家，尤其是新生代的马来作家和淡米尔作家；虽然我们所使用的创作语文不同，然而我们为建设马来西亚文化的努力与目标是一致的。大家交换意见之际，显得是多么的亲善友爱！（这是我过去所未经历过的）。

1.4 我探听了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及顾彬教授在德国大学担任汉学教授，如何引领学生将华文作品译为德文介绍给德国社会的情形。——他们爱护华文之心是何等真诚！

1.5 我目睹了我国的成功商人出钱出力，破题儿第一遭联办“源头活水文学之夜”，表扬3位资深的马华老作家（韦舜、方北方及原上草），另一方面也为文学节筹募基金。加上社会贤达和文化新闻界人士大力支持，共襄盛举。

.....

.....

以往，我所有的许多存疑、不信、假想和低估等，都随着参加多项文艺活动而逐渐消除了。

是嘛，我是够幸运的了，在1988年里，有幸受邀出席或列席，又能腾出时间参加绝大部分的座谈会及会议，让我亲身参与在国内外举行的各族和国际的文学交流；我怎能淡忘——

2.1 第3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于4月11日至15日，在首都吉隆坡召开，出席的11个地区的华文作家代表百余人。

2.2 第2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于8月15日至18日，在新加坡哥德学院举行，各国代表50余名。

2.3 各民族作家之夜，于9月16日晚在首都语文出版局举行，同时邀请教育部长安华依布拉欣为两部翻译新书《这一代》和《各民族诗歌选集》主持推介礼。

2.4 大马作协柔佛州联络委员会，于11月8日在新山成立。

2.5 源头活水之夜，于11月26日在吉隆坡联邦酒店举行，让数百位出席者都表示：“马华文学，我为你而歌！”

2.6 各族文学交流会，于12月10日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翻译的马华诗选《拾凌》同时举行发售礼，邀请教育部长安华主持。

2.7 各族作家生活营，于12月10日下午及11日在福隆港举行，华巫印三大民族作家融洽地住在一起，深入的研讨文学问题。

2.8 第1届东合华文作家会议，于12月21日至24日在新加坡金门会馆举行，参加者约50人，来自东合各国。

上述数个会议及生活营，我有幸都一一参加，这该是有生以来受邀出席最多文艺活动的一年。这并不是好现象吧！

我同意一位文友所说的：“如果一个写作人只搞文艺活动而不去创作，那简直是本末倒置；他也可说不是写作人，而是‘文艺活动家’了！马华文坛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写出杰作而又能推行文艺活动的人才。”

很不该的在1988年里，我几乎成为“文艺活动家”；于是我底心在剧跳之后，不免泛上了忐忑与愧疚的愁恼！

在春节之后，我能够不鞭策自己么？

刊登于1989年2月21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新春漫话特辑〉》



左起：端木红、寒川、杜诚、伍良之、孟沙、骆明、韦晕、梦平
(1988年12月22日·新加坡)

《新马华文作家群像》

——作者的话

(一)

无可否认，华文文学正是一个民族风貌的结晶，其思想、感情、生活、形态、知识及艺术等的完备体现，成为代表国家多元文化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华文文学今天的成就与地位，也毋庸讳言，是由一株石缝里的小草，几经挣扎，在孤寂中默默萌芽茁壮，成长而来。从战前以迄现在，新马华族文学，根本就是在先贤所开辟出来的道路上，迂回曲折地缓慢前进，在华族社会中，不曾受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任何民族所形成的社会里头，作家理应享有不容抹煞的地位。因为，他们是理想的创造者，他们是时代的歌手，他们是历史的代言人。至少，他们展示了人类智慧的一面，献出了一己的灵性与巧思，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

新马华文新文学自开天辟地之后64年期间，无数可敬的写作人，抱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不管环境多恶劣，只顾默默工作。在黝黯的黑夜中，他们勇敢地点燃一堆堆的篝火，前仆后继，要光和热永远流传下去，这是何等赚人热泪的事实！

无论如何，一部收集所有华文写作人资料的著作的出版，深信应该得到同情与支持。笔者鼓起了最大的勇气，不自量力地承担了这份工作。在诸位鼎力协助之下，《马华写作人剪影》终于80年初跟大家见面。

《马华写作人剪影》一书的后记中，笔者渴慕地写道：“如果

今后能够得到各地作者的合作，和读者群的支持，本书的《续篇》是可望编撰而问世的。”

(二)

这部《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就是结合已经增订的《马华写作者剪影》跟两年多以来笔者日以继夜赶写的续集编成的，收罗的作家由原有2百位增加到505位，而沧海遗珠，在所难免，这必须归咎于太多的客观因素。

我始终保持这样的信念：即使用最狭隘的眼光来看，这些珍贵的资料中，不无表扬了一些足为楷模的创作经验，对年轻一辈的华文文学爱好者，或多或少，起着策励的作用。况且，深入了解一部作品或一篇名作之前，如能先行知晓该作者生平和一鳞半爪，必有裨益。因为，作品跟作者本身的际遇及其生活环境的变动，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掌握了作者个人的一些线索，则不难增加欣赏其作品的条件；体会作者当时的创作动机，就更容易理解作品内容所包涵的中心思想。

其次，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学习处理这一项史料工作的出发点，绝非为了所谓“情感的捧场”那么简单。事实上，工作一开始，许多始料不及的障碍，如影随形地逐一出现，使人手足无措，甚至冷嘲热讥，纷至沓来，差不多到了掷笔兴叹的地步。但是，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我咬紧牙根坚持到底，确信一个完整的新马华文文学形象的塑造，是刻不容缓，而且意义重大的。假如笔者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了这本书，使许许多多外来以及后来对新马华文文学欲窥究竟的朋友们得以“免疫”，则一切愁苦，将在顷刻间烟消云散，一切负荷与压力，都已有了代价。

发掘已故世及中途离去的早期写作人的生平事迹，依然是十分棘手的考据工作。要想获取第一手的翔实资料，殊非易举，只能从零星散佚的史料中，广为搜集，全面整理，务求详尽。个人能力毕竟有限，在这方面，很幸运得到写作界不少朋友的支持帮忙，口传笔述，解决了不少问题；曾在新马从事文艺工作而现在迁居他处的写作人也热烈响应，间接提供了许多难得的资料，使许多片断得以连结起来。

在采访当代写作人方面，承蒙写作界朋友们的相互引荐，使我有份机缘跟4百余位新马华文作家取得联络，获益匪浅。遗憾的是，有极少数写作人，真人不愿露相，态度过于谦逊，坚持不求“闻达”，不逐“名利”，有的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写作人或作家，有的不肯以真面目示人，有的自称“傲骨天成，未惯媚世”，希望保持一贯“不出名”的宗旨。对于这些“世外高人”，我们当然不能过份强人之所难，而不便考究其为“何许人也”。这么一来，编撰工作就有了未臻完善的缺点。为了整体着想，我采取了在个别的介绍中，顺笔提及，旁征博引的方式，这可能破坏通篇的专一与完整，足堪诟病，如首集所犯者然，但这也是不得已的，尚希读者亮察。

差堪告慰的是所有505位写作人中，只张叔耐、拓哥、陈炼青、丘士珍、陈南、莹姿、冯蕉衣、殷枝阳、夏霖、陈全及铁戈11位缺少照片。他们多数是早期作家，或已故世，或已他往，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功绩，后人一定不会忘怀。

(三)

续编总共介绍了305位写作人，依年代分为7辑：

①战前殖民号龙舟的划桨人（1919~42，共48名）

②光复号登陆艇上的战士 (1945~49, 共25名)

③波澜壮阔自由轮上的水手群 (1950~59, 共77名)

④新加坡独立舰新阵容 (1960~69, 共36名)

⑤马来西亚艘上生力军 (1960~69, 共50名)

⑥新华后浪飞舫之精英 (1970~81, 共26名)

⑦马华破冰船上新锐 (1970~81, 共43名)

这样的分法, 自觉比较妥当。新马华裔同胞在60余年间, 在政治上经由殖民、光复到争取自主, 两国又由独立合并到各自为政, 分别兴邦建国, 其间波折, 可以说是血泪交织。所幸, 在这样的困境中, 写作人并不曾放弃他们的社会责任, 使我华文文学仍然放射异彩。时代的号角, 永远在我们记忆中响彻云天!

未来依然是一片浩瀚无边的大海洋, 有风平浪静的美妙时刻, 不无难以预测的惊涛骇浪。水, 可以载舟, 也可以覆舟。我们遨游在顺境中, 诚然可喜, 即使天气突变, 也要准备着乘长风, 破万里浪。先辈为我们立下了榜样, 如果我们随时自告泄气, 那才不配称为“写作人”。这本书, 是不是也提示了这一点?

上述的第①辑, 曾以《战前马华作家搜访录》为题, 自1981年8月21日至82年5月23日止, 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甄供主编)连载。第②辑以《战后40年代马华作家群观》为题, 由1981年8月28日开始, 连载于柯金德主编的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商余》版, 以迄同年的10月2日止。其余各辑, 分别以《50年代新马作家行列》为题, 自82年2月19日开始连载于新加坡南洋商报《写作人》副刊(孟毅主编), 共发表29九篇。《50年代文坛人物志》, 81年12月13日至83年6月26日, 在檳城星报日报《文艺公园》副刊(方北方主编)陆续登出29篇。《50年代马华作家行列》, 自83年7月6日至同年8月26日, 在大马南洋商报《商余》副刊连载36篇。《60年代马华诗人概观》, 82年1月6日至4月4日在吉隆坡马来亚通

报《文风》副刊（原上草主编）连载18篇。《60年代大马写作人浮雕》自82年5月13日至同年8月21日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商余》副刊发表39篇。《70年代新华作家丰采》，82年6月1日至9月1日在新加坡《奋斗报》（周维介主编）第161期至164期，刊登16篇。《后浪（70—81）掀起新丰采》，由82年6月16日至83年1月19日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连载69篇。另有50篇，以《文坛人物志》为题，发表于新加坡月刊《新苑》版（黎达材主编）。

这些简介文字在刊登之后，幸蒙多位有关作家及其他人士来信指正，使我有机会进行修正补漏，衷心感激。相信这么一来，所提供的史料，将会更加翔实和完善。在《马华写作人剪影》里，有些事件实得诸传闻，不免有以讹传讹之虞；收在这里的“修订本”，谬误之处已尽可能更正，并增添若干新的资料。由于搜集到更多的资料，我甚至进行重写，使以新面目出现，这种情形，大概占了20余篇。鉴于笔者乃以个人能力进行此项艰巨工作，难免力有不逮，本书容有流于浮浅之处，或因疏忽造成的错失，一并在此告罪。倘蒙诸位同舟共济的朋友们，不吝惠予教益，指出不当或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实感庆幸。

（四）

因为有千字左右的局限，对于生平多姿多采的一些重要写作人的介绍，不免有不能畅所欲言之概，这是本书的另一个缺点。也由于这种限制，对好几位南来的中国作家，我们的着眼点史只能放在他们居留新马从事文艺活动的情况，而放弃其他无关的事迹。

在所有推荐的写作人中，不乏所写绝大部分非文学类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文采斐然，就是放在文学类别中，也毫不逊色，所以

不否定他们的文学地位。

本书提到的年轻一代写作人，数目可观，对他们的重视，将起着激励的作用，对他们寄予厚望，因为未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重任，全靠他们的毅力与勇气去承担。

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中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朱光潜先生，在其《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一文中，这样结尾：“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朋友，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那和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

这是适合于每一个时代的青年，一位哲人所抒发出来的最永恒最美丽的声音。

(五)

笔者担任教职，以5、6年的课余零碎时间，完成本书编撰工作，到此总算告一段落。在这些宝贵的光阴中，有不少是耗在争取本书的出版方面。我多方求助，到处奔跑，甚至于去扣团体的门，结果总是一波三折，失望而归。这种情形，不知何时才获改善？

在这样坎坷的道路上，在尝尽苦头之后，唯一感到慰藉的是，朋友们的热心协助和鼓励，使我信心倍增。

对于多位深具谦光之道的前辈作家的指点和教诲，我在此致以万二分的谢忱及无限祝颂。

特别要提到的是新加坡的李拾荒、秦林、烈浦、张金福、杨为人、黄惜阴、张礼明及林方等，东马的刘子政和黄任芳，北马的萧

遥天和方北方，中马的李锦宗，旅居印尼的庄延波，以及海外的刘柳、原甸诸先生女士，他们的隆情高谊，令我难忘！

1983年9月16日



林徐典、马崧、马汉、杨松年、王润华（1988年12月24日·新加坡）



陈育青（右）与主讲人马崧（1987年9月19日·新山）

《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后记

无可否认，自60年代初期以还，在三几位辛勤的前辈作家开拓、埋头探索之下，对马华文学史料的研究与编纂，已迈出可喜的一步；到了7、80年代，有较多的写作人更深入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提供了有专门研究用途的史料读物，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文运是如何向前发展的梗概。

在中国，专门研究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史料读物可算是相当丰富了。可是文评家马良春在1984年12月号《文艺报》上，撰文呼吁加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马氏的这项建议，在新马文艺界是更加迫切而必需的，不是么？——以当前的新马“史料学”情况看来，本地的文学史料研究，并未获得理想的成果。由于资料和工具书都未臻完备，所以今后仍有待写作群的集体努力，多方调查，分析研究，方能有更大的发展和丰富的研究成绩可言。

广义的网罗写作群

所谓“文坛”，原是指文学界。

然而，在这部《扫描》里所简介的“人物”，可说是相当广义的。

从1825年直到1990年，虽然度过了悠悠的165年，可是其中活跃期（1919～1990）仅约71年罢了；在此漫长期间，除了将写作人相当有价值的文学劳作加以表扬之外，其他在报界、学术界、艺术界、书画及出版界活跃过，并在写作方面有一定的或薄具成就者，都尽量作为记述的对象。许多时候，从文学扩及其它的文艺范畴，

着重对文化现实的关怀与探索。当然，下笔的着眼点仍然是一批批当代作家在新马从事现代文学（指1919年以后“新文学”）活动的情形和成绩。在简短的叙述中，笔者更乐意显现他们的高贵情操与德行，并披露他们的饱经风霜、历尽艰辛的史实。

在新马，文学的起源及发展，端赖当地的华文报社大力的扶助；要是得不到报章编者的培植，新马华文文学史必然是大半空白的。因此，多少早期的报人，目睹马华文艺这棵乔木，由萌芽而至茁长，他们是新马文学史的见证人，而且长期坚持他那份操持。笔者很乐意以这些文艺编辑为记述的对象，甚且有数位办报人，虽则不一定是飘浮文字海的诗人雅士，可是我们仍然把他当“文坛人物”看待——针对他为报章副刊尽一分力而简介一二。像这样兼容并包、博采众体的处理与介绍，必然显得琐碎杂乱。

与几位文友谈及这种“宁杂勿漏”的编撰法的时候，有的直劝我：如果选择得不够严格、有闻必录的话，难免造成杂碎，减少了代表性。后来，笔者还是执着于一隅之见：既然要让这部《扫描》与众不同，而且是属于词典之类的工具书，就需要具备其它书本所欠缺的资料，多简介好过挂一漏万。相信在本书中所简介而健在的写作人，过去即使写得较少，在90年代里也将有突破性的表现。我们对作家的前景展望，永远是看好的。美国学人葛浩文就说过：“任何一位作家，都有超越常人的荣誉感，都会珍惜自己的羽毛，当他发现到很多学者们注视着、重视着、并仔细地剖析他每一作品的时候，那么自己怎能不认真，又怎能不努力！”我们有逾千仍常执笔的新马文学工作者，自不会让大家失望吧！

归纳统一笔名及排列

在1983年之前，笔者曾为新马华文作家编写个人小传约达560位，每位介绍近千言，唯汇编收在《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年1月风云出版社）出版专集的只有505位。这回，有好些照旧稿送去打字——编入本书里；既已打了字，校对文稿时就很少再删减，例如：杜边、刘延陵、许杰、王莹、萧阳、普洛、易水、曾铁枕、长河、钟锡金……等等。绝不是特意侧重某些作家的缘故。在另一方面，在《群像》一书中有过千字的个别介绍的写作人，在《扫描》里所叙述的文学就锐减了。这也表明了前书仍有对照参考的“价值”。

介绍新马写作人，除了搜集资料不易是一大难题外，就是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化用了太多的笔名发表他的创作，比如归侨作家王啸平先生就拥有多个笔名，在王先生未提供珍贵的资料之前，笔者曾将陈真、洪英、叶冰、蒲克……等当作4位作家来介绍，经他于1988年10月4日来信后，始在排名中抽掉而保存“王啸平”——因为那4个笔名者是他另署的。同样的，要是不细心的话，也很可能把梅秀的其它笔名如墨黑、林秋、夏怀霜等当作4个不同的作家而分别简介。因此，在归纳他们的笔名时，委实花了不少的时间。虽则早在1987年，前后费了8个月的时间才编妥了这份名单，然而迄今仍然担心他们的笔名有重复的地方；但愿这类错误会减至最低的程度。

两地重要报章与文艺团体

由于新马作家或写作人在《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文艺副刊耕耘者众，而这两份大报后来都分别在新马二国出版，因此笔

者有必要在此略为交代，陈述一二，以免读者混淆不清。

《南洋商报》在新加坡发轫，创刊于1923年9月6日，跟新马读者见面。日军占领新马（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时停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南洋商报》于1945年9月8日恢复出版复刊第一号，直到1983年3月15日结束；从1983年3月16日起，新加坡南洋商报与新加坡星洲日报合并出版《南洋·星洲联合早报》，一纸风行。

马来亚联合邦从1957年8月31日起，宣告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了适应新环境，原址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从1962年8月起，分别在新加坡与吉隆坡两地出版。吉隆坡原有的办事处扩展成为完备的报社，负责编印和销售马来亚境内报份——由1962年8月31日，南洋商报正式在马来亚国都就地编印马来亚版。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从此竖起“新华文学”的旗帜（大马则仍然沿用“马华文学”的旧称）；作为一份民营的华文日报，要为两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民提供最佳的服务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于是双方努力改善，终于成为两份截然不同的报章。至于文艺副刊，在70年代以前，南洋商报的副刊是在新加坡编的。从1969年开始，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即以崭新的风格出现，是一份纯粹由大马人经营的华文日报，跟新加坡的南洋商报成为姐妹报章。1971年，报人朱自存出任大马南洋商报主编（较后升为总编辑），完成了副刊马化的任务——与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截然不同了。

《星洲日报》社址在新加坡罗敏申律，发刊于1929年1月15日；直到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前夕，星洲日报被迫停刊约3年半。新马光复后，1945年9月8日发行复版第一号。1962年至64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先后在吉隆坡、檳城及怡保各地办事处扩充设备。1966年7月7日在八打灵设立印刷厂，启用整版报纸电传设备——每晚将新加

坡编辑部完成了的报纸清样整版电传至吉隆坡印刷出版。1967年，该报社在吉隆坡成立编辑部；直到70年代初期，马、新两地报纸的编排与印刷才完全分家。从1983年3月16日起，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已经与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并成为《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从此，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名字在新加坡消失了；只有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仍然稳健地继续肩负着宣扬文化的重任。

顺此，也提到另一份不容忽视的《新明日报》。《新明日报》于1967年在新加坡创刊，于3月18日发刊，遍销新、马二国。直到70年代初期，该报在新、马（吉隆坡）分别成为两份同名不同组织机构而内容、副刊等也截然不同的报章。

由于易名的关系，笔者也有必要在这里指出：（一）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成立于1976年5月2日，约11年后，从1987年7月开始正式改为“新加坡华文作家协会”；（二）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在1978年7月29日举行成立大会，自1987年下半年起易名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三）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组织也相当庞大，阵容亦强。她的名称，于1991年3月初改为“新加坡文艺协会”。大马的霹雳文艺研究会和南马文艺研究会分别成立于1968年11月和1969年9月，以迄于今，已有21年的历史，不曾改过名，至今仍然会务鼎盛。

热望·致歉·感奋

本书编撰期间，由于本身所见不广、学识简陋，加上闻见不周，所以书中空疏寡实，容有挂漏与舛误之处，希请读友惠然见教，俾匡正讹误，得以拾遗补缺，不断改进。——已故曾圣提先生的夫人

陈可美女士，谢谢她曾来信指出《群像》中的曾华丁与曾玉羊的遗照对调错误，让《扫描》一书得以更正，甚感。多谢写作界前辈后进的支持与指教，让我偶尔也有机缘掌握到第一手丰富资料。

如果得不到文友的合作与支持，必然是难望有大成的。个人弩弱无能，加上资料搜集不易，故纸堆中，是挖掘资源的地方；采摘群书，是披沙拣金的宝藏地带。在本书中所简介的多位文学史料研究家，他们的著作多是个人参考的好料，给本书提供不少的帮助，厥功至伟；由于书目及篇章极多，这里未能一一列出所参考的详目，希请鉴谅！

多位写作界朋友、报刊编辑、作协或文艺研究会负责人热诚关怀，甚且表示了十二分的热望与无限的祝颂；数位文艺界的巨擘，都对后辈予以奖掖，我谨在此一并致谢。

文友们几乎都是坐言起行、为人敦厚、醇朴热心、品行高洁和气度宽宏的一群。我始终敬重不热中利禄、不追逐名利、不附庸权贵，却能保持风骨情操的作家或文人。在芸芸作者中，必有不露主角的隐世高人，我到处打听他的生平事迹，但“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李白文），因而使他感到厌烦。许是双方的看法不同，成就感在每个人心中形成不同的水平、不同的意义；有时候，我似在强人之难——未经他们同意就辑录了一些第二手资料，披露他们的生平事略；有时或许传闻失实，甚至不乏偏颇之处，诚盼骚人墨客俯察微衷，赐予曲谅！要是个人犯上固执成见、拘泥不化的毛病，自当自我鞭策和反省。

文学是民族文化中最珍贵和最严肃的一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始终愿意以一种崇敬、景仰的心态来照拂南来开荒拓垦的前辈作家和发扬光大的接棒人。

略尽菲薄心意

1987年初，自从斗胆地承担这份艰巨的工作之后，有如登山涉岭，深感是件沉重的负荷；几年间，所化费的精力时间确是不少。笔者才学不济、力不胜任，加上是自费出版，还得负责发行工作，怎能不殚精竭虑、困苦劳顿呢！差堪告慰者，是我还算蛮有信心，不至于知难而退。偶尔寻思，个人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只尽了一份菲薄的心意罢了。我一直想向先贤前辈思齐，他们为文学而呕心沥血的创作壮举，正是大家学习的楷模。

但愿通过了这众多文坛人物的简介，能看出新马华文文艺发展的历程，多少写作人长期处在自力更生、苦心经营的境地，以及某些作家的成就和重要作品的风貌。文艺工作者的道路尽管充满着崎岖与艰辛，经历过无数的曲折与磨难，然而毕竟已有这么多文艺作家在不同年代坚决地站稳立场，走过或继续在这条路上迈步；志业永垂，新马华文文坛是永远不会寂寞的！新马华文文学的价值，势必受到国际人士的评估与肯定，恒久的发扬光大！

临末，首先我要向题署封面的名满天下的书法家暨诗人潘受先生致谢！内人李舒贞、小女亮谕和京立分担校对工作，帮了不少的忙。设计封面和制稿的陈文浩、张荣超二先生、负责打字的周明芳、黄玲女士；始终在关怀我的林方、李拾荒、扬为人、邱新民、杨贵谊、林今达、李锦宗、碧澄、罗肇德等先生、前辈及学人，多谢他们的关照与协助。

马来文专家杨贵谊兄为本书起名“Waragam Penulis-Penulis Xin Ma 1825~1990”（Waragam 是他以 Wajah Ragam 两词语创作的缩语）；而书辉出版社则译为“Penerbit Pusrindah”（Pusrindah 一词是由他以 Pustaka Sri Indah 三词语的创语）。诗人兼语法学家彼岸兄则英译书名为“Chinese Writers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Profile”。多谢上述几位给予了我莫大的荣誉；古道可风，云天高谊，敢不拜嘉！

1991年2月27日·可冬小筑



韦晕、陈残云夫妇、马岩（1987年5月30日·新加坡）



江南、曾圣提、马岩、李锦宗、林玉蓉
（1981年11月25日·新加坡）

出版《新马文坛人物扫描》 的经过与感言

与我朝夕相对的《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原稿，终于印刷成书啦！此刻，我执笔的当儿，突我“如释重负”的感觉。

可以说，打从1977年开始搞新、马文艺史料工作以来，幸而得到近千位本地写作人填具表格支持，顺利地于1979年和1984年分别出版了《马华写作人剪影》和《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二书，又经过了约七年，才能够把各地写作人所提供的珍贵资料编撰为《新马文坛人物扫描》。

这部《扫描》，不仅比《群像》一书多了20余万言，而且所简介的写作人也多了6倍（3223名：505名）以上——全书内收自1825年至1990年间的3千2百余位文坛人物的生平小传，和约1千1百帧作者相片及约4百位作家的签名墨迹；由新加坡名诗人暨书法家潘受题字、名画家陈文浩设计封面。它除了介绍新马有卓著成绩的前驱文人，也简介了在报界、艺术界、学术界、书画界及歌艺界等擅于写各种文体的写作者。过去南来的中国作家、名士或艺术从业员，只要他有文章在本地见报者，也给予他们适当的定位。此外，也尽量简介已经成长起来的新马文学界新人；目的不外是在表扬各年代文业彪炳的新马华文作家，发扬文化与创作精神。今后年轻的一代或可思齐循路，在新马华文文坛上相继涌现，可望呈现更绚烂的文学风貌。

我编撰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提供比较真实可靠的资料，可成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使用的工具书，提高

一般读者的文学兴趣；并透过对过去165年来新马文坛人物的生平叙述，而介绍当地华文文艺界的风貌。简介在新马文化活动领域扮演过角色的大小人物，尤着重表扬其文学才能曾受普遍的称颂，而为文学史所载着，藉以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深入发展。为苦心创作、文业彪炳、名重当时的文艺工作者记述他们的生平事略，进而编印专集出版，当能垂诸久远，让下一代承继前人的写作精神，启发后人的文艺功能。

从被简介的多达3223位的大大小的华文文坛人物的生平事迹中，读者多少可瞥见现代的、当代的新马新、旧文学发生的背景、古典文学朝向现代文学的转变、新文学的性质、范围和发展线索，以及新的文学世纪的序幕。

稿于1991年10月6日

◎原载于1992年1月5日出版第85期《香港文学》



左起：尤今、孙爱玲、梦平、刘笔农（1988年12月24日·新加坡）。

《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修订综述

从事打杂工作

早在80年代的第2个年头，我就在一篇杂感《希请从事打杂工作》（1981年2月19日刊载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新春漫话〉特辑》）里写道：

——回顾1980年，在个人来说，着实是“不寻常”的一个年头。我们都是平凡不过的一个俗子，居然有机会让人家在报上来话长短，似乎是件可喜的事。这么回念一想，若是真的有人在搞暗箭伤人，或诬陷打击的勾当的话，我们是应该一笑置之的。时间最能证明一个人的心迹；在生命史上，那样的聚散无情，就让它成为无数微波中的一个泡沫的回忆吧。

——以往，我总觉得出现在报刊上的任何置疑的文学，身为一个写作者都应有答覆的必要或责任；然而在刚过去的这个年头里，我本人并未做到这一点，主要的原因是太忙碌了，加上有的作者似有成见，而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避免的“争执”（很可能是夹缠不清的歪论），何必煞费编者和读者的眼力哩！

——从事文史的编撰工作而有偏差或流于浮浅时，绝不宜护短，更不可溺爱；朋友们督促我、指示我、鞭策我，目的不外是使我不断的进步。故此，我极愿广纳众议，不拘泥于一家之说、一管之见。今后，敢请继续惠予更正，至深感企！

——替新马文艺界做这份打杂的工作，看似不难，其实是经纬万端。主动地跟几近3百位写作者通讯联络，经验告诉我：作家也是很难说的；处理这份作家评介的文史工作，是不容易千妥万当的，原因不外是有些优秀作家真人不露相，不愿因透露身世而“出名”

……而我所结识的文友不多，无法与各地的知名作家联络，恳请他们支持与指教。这是莫可如何的事。希望有关的作家曲谅为幸！

——为文学事业流下点点滴滴的汗，是值得骄傲的事。惭愧的是，直到今天，个人还不易从头绪纷繁的史料中整理出一个眉目来。主观的辛勤程度不够，文学理论的表达力尚弱，对于资料的应用也未必适当。

——在文艺圈内，“自为者多，为人者少”；而整理与研究文史的工作纯粹是“为人”，倾力创作则是“自为”的。当前，有许多文艺作品已使大马文艺园地增添出色的花朵，然而，护花、赏花和展览名花的干苦活的园丁却少得可怜。在赓续不断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是正迫切需要“为人”服务的研究生吗？

六年文事几番新

我一直没忘了16年前自己写过上述的话语；因此，在文艺的走廊上，我断断续续地为以前的三几部编著进行修订工作，老希望尽量减少过去书中所提供的错误与不确实的史料。

记得《新马文坛人物扫描》的稿样，是在1991年2月15日正式送去印刷厂，出版后，时光神速，不觉间，已飞逝整整6年的宝贵岁月！

6年来，新马文艺界蓬勃得多啦！新秀人材辈出，国内外的文学交流频密，创新手法也在跃进中。“文坛新人代旧人”这原是自然现象，然而在数年间，永别文学岗位的新马作家竟逾32位呐！老成凋谢的前辈作家例如柳北岸、李冰人、韦晕等固然令人哀悼，提早走完人生终站的壮年作家（例如商晚筠、叶明、端木虹等）最教人扼腕，实为新马文坛一大憾事！

因此，我在替《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做些修订工作的同时，常感触万千。我的宗贤邱新民教授生前常勉励患有癌症的夫人（刘瑜女士），挥毫写下“活着就是胜利”的座右铭。如今，邱教授夫妇已先后作故。这对文坛鸳鸯当年所鼓励的高足如君绍、谢克、叶斌等也早已是名家。

凡已“逝世就是失败”么？谁都不会同意这句话吧！我认定：举凡在文艺界有所奉献的写作者，不论他们是健在或已辞世，他们永远是胜利者。恒久活在读者心目中。我在此，为他们脱帽敬礼！

侧重永别者传略

在《新马文坛人物扫描》里头，所简介的文学家、作家、写作者、诗人、报人或新闻工作者多达3千2百余位，弄错或重复的地方似乎在所难免，目前已发现到或猥蒙高明人士指正的约有9位。那批走进历史永成追忆的文坛人物，有必要及时为他们增补几笔；至于数以千计的“胜利者”，来日方长，绝大部分等日后再为他们增添或详介吧！故此，在这里更正与增补者仅有78位罢了。

以下就是赶时整理修订的《文坛人物》资料（括弧内的列号及页数乃依据《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一书而附录的）：——

【艾 芜】（0013，页36）生于1904年。曾任四川省文联和四川省作协的名誉主席。约于80年代末期患冠心病和帕金森氏症，长期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留医。不幸于1992年12月6日病逝成都，享年88岁。

【白 梵】（0036，页39）=闻辛（2262，页334），原名雷锦荣。出生于吡叻怡保，1958年毕业于新加坡华侨中学，长期在新加坡

执教。于50年代末期发表不少的散文及杂文作品。

【陈白影】(0187, 页59) 1916年生, 1981年逝世。

【陈立训】(0242, 页65) 生于1914年, 1992年1月22日安息于砂劳越, 享寿78岁。

【陈铁凡】(0290, 页71)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前任副教授, 不幸于1992年1月26日在美国辞世。

【陈维龙】(0293, 页71) 生于1897年, 歿于1988年。

【陈振夏】(0327, 页76) 生于1911年, 歿于1987年。

【淡如】(0392, 页85) 原是柔佛州士乃人。生于1936年11月15日, 祖籍广东丰顺布新乡。原名郑赤琰。目前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 著作甚丰。

【丁史浪】(0426, 页89) 《扫描》一书中的简介文字错误(实为海蓝的生平事略)。而丁史浪, 乃30年代末期文艺青年, 祖籍福建。原在新加坡报社服务; 1941年初被调派到吉隆坡新国民日报当校对, 极少执笔写作。据说, 丁君喜欢读书, 爱读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 鉴别力甚强; 善谈理论, 擅长辩论。1941年12月间, 马来亚失守之前, 他逃难回到新加坡; 星洲沦陷时, 他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从此音讯全无。

【杜门】(0441, 页92) 本名杜连孙。于1992年6月27日辞世。

【杜沧白】(0446, 页93) 另署杜畏之。

【端木虹】(0456, 页94) 约于1994年6月退休(原任马六甲某华小校长)后, 举家迁居吉隆坡, 受聘为教科书编写与审订员。曾任大马华文作协秘书。于1996年11月6日因耳内生瘤, 在动手术后而昏迷不醒, 不幸于12月22日晚间七时半, 蒙主宠召, 文苑星沉。较新著作有诗集《坚守》(1991, 列为“90年代马华文学丛书⑥”)、《巨木和云烟》(1994年12月, 言论集, 184页)。

【关新艺】(0583, 页111) 不幸于1996年10月14晚间8时逝世。新

著有《数来宝·相声谐剧短剧》（1995年）。

【郭史翼】（0607，页114）1915年出生，1994年5月辞世。19岁南来印尼，在棉兰担任新中华报编辑，翌年升为总编辑。后又在苏东中学执教。2年后移居仰光，担任仰光日报总编辑4年；之后改任《重庆大公报》东南亚战区随军记者。战后定居在新加坡，为教育供应社编写教科书，兼编《南洋文摘》达14年。后任南洋大学先修班华文教师2年。曾应聘从1970年开始，出任新加坡星洲日报主笔，直至1980年才退休。

【海 蓝】30年代末期马华写作人，笔名海蓝。生平不详。他曾在吉隆坡任华侨体育会出版的壁报文艺版编辑。常在李蕴郎编的《文艺周刊》和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理论作品。据说，在马来亚沦陷期间，遭日军逮捕，结果死在牢中，时约20余岁。

根据方修的披露：“萧扬或署海蓝，原名林义平（？）。1938年崛起于马华文坛，初期在星中日报的文艺副刊《星河》发表短篇小说，后期从事理论批评，作品散见于星洲日报的《晨星》、吉隆坡新国民日报的《文艺》等副刊，英年早逝，未有文集问世。”

（详见《马华文学史补》）。

【韩槐准】（0626，页117）生于1892年，1970年10月2日病逝于北京。

【韩素音】（0630，页118）约于1915年生。目前定居在瑞士。父亲四川人，原籍广东梅县——先辈是在1660年移居四川皮县。她母亲是比利时的一名贵族。曾于60年代在南大担任兼职讲师，讲授现代亚洲文学，并在多个场合合作公开演讲。

【韩玉珍】（0632，页118）多少年来，几位文学史料工作者一直在“追踪”的韩玉珍——他到底是谁？然而，许多人都弄错了，直到1992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景山主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之后，韩玉珍的真实姓名及生平事略才公诸

于世：

“韩玉珍，新加坡作家，原名林君靖，祖籍河南，1937年生于马来亚檳城。钟灵中学毕业，后负笈中国，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学时期，即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写诗，投稿给杏影和姚紫编的副刊杂志发表，得到他们两人的奖掖。1955年以马芬、穆春迟笔名倡议“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号召马华作家扬弃“侨民”意义，以主人翁姿态创作具有马来亚地方特色的作品；并与冰梅等积极推动筹组“新加坡文艺写作者协会”。1963年受聘海外任华文日报总编辑。后从商。创作以写诗为主，兼写理论、杂文、政论。他以积极浪漫主义手法创作的两部长诗《茉莉公主》和《丹那苏布尔》，被公认为马华诗艺的两座里程碑。两部长诗都以马来民间传说和神话为题材，结构恢宏，情节动人，语言瑰奇，歌颂正义，鞭挞邪恶，诅咒黑暗，礼赞光明。《茉莉公主》长达7千3百多行，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诗歌创作中，也是罕见的鸿篇巨制。《茉莉公主》，1964年编入“云南园文艺丛书”，由新加坡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85年由香港上海书局出新版本，内收另外4部长诗《丹那苏布尔》、《金发的孩子》、《狂飚悲歌》、《撒旦的战争》等。

【贺 巾】（0684，页124）另署高静朗，原姓名林金泉。其他笔名计有：遄、遄泉、嘉、韦嘉、贺立、于琴、顾军、辛默等。林氏于1935年生于新加坡加冷河畔；在三山受小学教育，念过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曾任新加坡“丽的呼声”广播员和编剧，也当过乡村夜校教师。60年代以后，到印尼教书。70年代从事农畜业；80年代后，前往泰南谋生。目前已退休。从1951年开始写作，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计有：《青春曲》、《沈郁兰同学》、《我们渴望和平》、《尊严》、《小偷的故事》、《小茅屋》、《阳光与雾》、《兰兰》等。所出版的几种书，在当年都成为风行一时的

本地书籍。

【恒 之】(0692, 页125) 原是一位青年教师, 曾在吉打州班拉峇鲁任职。据说, 不幸于1985年因车祸英年早逝, 终年约29岁, 诚系文场憾事!

【胡浪曼】(0732, 页131) 又名胡桂浪。1909年出生在福建永定。属于胡文虎和胡文豹的家族。星洲日报创刊于1929年1月15日, 胡氏担任编辑。他是20年代末期新马著名的报人、编辑兼作家; 于1991年11月17日在新加坡辞世, 享寿82岁。

【胡铁君】(0734, 页131) 生于1909年, 歿于1967年2月26日。

【黄 崖】(0775, 页136) 从香港移居西马的著名小说家, 生于1932年5月12日(原籍福建厦门)。根据黄崖的孀妻章淑娟透露: 黄崖由于患上心脏病, 约于1987年之前便已移居泰国进行疗养; 在1991年杪; 因为病情发作, 入住曼谷一家医院。不幸于1992年1月3日在曼谷逝世。

【黄火若】新加坡第一代书画家暨诗人。1910年生于福建金门县。另号沙陀。诗文等多系自学。在60余年间, 共为海内外书写匾额一百余件。不幸于1994年9月6日早上7时45分因病在东岸医院逝世, 享年84岁。曾出版旧诗集《今是堂剩稿》。

【黄勛吾】(0876, 页149) 1906年生, 1980年逝世。

【纪 青】(0932, 页155) = 罗开道(1624, 页246) 以“于行”为笔名出版散文集《青黄集》(荣获福联会出版基金)、历任吉隆坡星洲日报新闻版/副刊编辑, 亦曾担任教科书编辑。现任星洲日报大马新闻组副编辑主任、《彩色槟榔屿》主要负责人。

【黎德源】(1113, 页177) 不幸于1995年1月23日凌晨, 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 享年54岁; 发引至阿裕尼路翡珑山火化。黎氏原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编辑顾问。

【李 过】(1124, 页178) = 高鲁(0527, 页105)

- 【李 凯】(1131, 页180) = 学民 (2553, 页376)。约于1936年生, 祖籍福建东山。毕业于新加坡中正中学 (1960)、新加坡中医学院 (1974)、中国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 获硕士学位 (1992)。原名李金龙, 常用李松为笔名。从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 已出版6部文学著作; 发表过童话、寓言、诗词、报告文学、短剧、散文等文学作品不下4百篇。
- 【李冰人】(1142, 页181) 战前曾肄业于上海法政学院。1975年获英国国家宗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约1975年旅居台湾, 任台北世界新闻专科学院15年, 亦曾兼任国立台北商专教授多年。另著有《自由中国揽胜诗纪》和《古诗观止》等书。不幸于1996年4月10日下午5时半魂归天国, 安息主怀; 安葬于麻坡峇吉里三一堂基督教坟场。
- 【李家耀】(1168, 页184) 1901年生, 不幸于1995年1月20日下午5时45分谢世, 享年95岁; 在吉隆坡蕉赖六里村政府火葬场焚化, 骨灰安奉在孝恩园。1995年3月出版《李家耀专集》, 内容将他以前8本画集综合收录, 并包括他人生哲学、个人年表、人事沧桑、记述游记的广识博闻、艺术结晶, 还有60多个未经发表的金石印章等等, 共1百余页。此专集由马艺术学院东方艺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钟瑜编辑。
- 【李禄祥】(1184, 页186) 笔名李真吾。毕业于台北师大海外新闻专修科 (非师大新闻系)。李君当年是以第一名最佳成绩毕业该科。当时, 怡保小说作家张逸萍也在师大肄业, 与李禄祥在同一屋檐下共住了几年。
- 【李绍茂】(1199, 页188) 1915年8月8日生, 1989年8月31日逝世。
- 【力 匡】(1250, 页196) 于1958南来新加坡, 长期在育英中学任教高中华文, 笔名有力匡、百木、康叔、枚建等。1927年生于广州, 中山大学毕业, 1952年移居香港。不幸于1991年12月24日

与世长辞，终年64岁。

【廖颂扬】（1309，页205）生于1902年，歿于1973年3月11日。

【林 汉】（1327，页207）生于1929年，歿于1988年12月19日。

【林建安】（1379，页214）1907年生，歿于1971年11月5日。

【林仙峤】（1421，页220）1899年生，1937年病逝，终年38岁。

【刘问渠】（1527，页234）檳城光华日报前任主笔。早年在中国新闻界任职，南来后曾在新加坡《益世报》服务。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担任檳城光华日报主笔。他是檳华女中前任校长林赋田女士令夫婿。不幸于1992年10月22日凌晨寿终正寝于私寓，享年积闰81岁，奉移至檳城峇都眼东福建公冢火葬场焚化。

【柳北岸】（1553，页237）新马早年电影业的大红人，一生充满传奇；年轻时在邵氏公司中文部任经理，与邵逸夫并肩打天下，写下许多电影剧本。原名蔡文玄，留下不少新诗佳作。他曾获东南亚最高荣誉文学奖。蔡老生死同日，享年90岁；于1995年1月6日晚9时46分病逝，遗体在翡珑山火化。遗下三子一女：蔡亮、蔡丹、蔡澜和蔡莹，都是文教影视界的大名人。

【洛 萍】（1638，页247）不幸于1995年4月13日逝世。陈振亚的遗孀桂承平，是位著名指画家，艺名江沙。

【骆宾路】（1643，页248）1935年1月26日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澄海。50年代初，另署木易、向天草、林龙、林之，在《人间》刊物发表小说作品。70年代定居香港。80年代初重新归队，辛勤笔耕至今，已出版的短篇小说有4部，较新的著作是《人与鼠》、《一幕难演的戏》和《她说蓝的是天空》（1996年1月）。杨君是香港作家协会会员，也是香港作家联合会永久会员。目前已返新定居。

【马 亚】（1663，页252）50年代中期优秀的马华女作家，笔名马亚、田沁等。原名李炎群，约于1933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于1955

年前往中国深造，毕业后曾在大学任教。1975年来香港定居，改用“华莎”等笔名发表散文随笔和寄简等作品。目前除了从事出版工作，也出任香港波士顿国际贸易公司董事。约于1994年下半年返星省亲。读她的散文《狮岛抒情》和《遥远的梦》等篇，获悉她离星23年后，也曾于1978年返星作客。香港高山图书公司替华莎出版了《留美学生家书》（1987年7月）、《访大陆的“走私王国”》（1990年）、《追求的脚步》（1990年7月）等书。——她在《追求的脚步》一书的《自序》里写道：“我一生的岁月大体可分为三截，一是从呱呱堕地到高中阶段，生机勃勃，充满对理想的憧憬、对未来的向往；二是从念大学到教大学，躬逢反右、反右倾、文化革命等运动，充满对政治的困惑、对现实的探索；最后一截大致是语文编辑和写作人生涯，充满对工作的热诚、对事业的执着……三个阶段在三个不同地域度过，一是长年如夏的赤道小岛，一是波涛汹涌的神州大陆，还有一个自然是繁华热闹的香港地了。”

【马 阳】（1664，页252）1938年10月25日诞生于居銮，1961年回中国。现居广州。较新的著作有：评论集《濠外诉评》（1991年6月）、诗集《椰花鸟》（1993年12月）等。1992年3月初，马阳夫妇返回柔佛古来母亲住处省亲，与几十位文友欢聚数日。

【濛 崖】（1704，页258）原名徐永贵。自1987年开始担任光华日报吡叻州采访主任，曾任吡叻记者俱乐部副主席。不幸于1993年4月14日下午1时英年早逝，享年仅36岁。

【粘春生】南马写作人。早年历任各华文报通讯员，常以“半僧”为笔名发表文章。原籍福建晋江，少年南来，历任峇株巴辖华团秘书数十年之久；亦历任社团名誉会长及顾问等要职。1992年11月9日晚上9时谢世，享寿积闰89岁。

【欧 曼】（1762，页267）=郑豪（2978，页444）。生于1944年

7月1日，祖籍海南琼东。原名欧振豪，后改为欧展豪，一署欧文豪。早年毕业新加坡育英中学，过后转入义安工艺学院就读，返马后，曾任马华瓜拉丁加奴区会执行秘书，也出任过马化合作社关丹分行经理。1978年10月由瓜拉丁加奴前来关丹，曾任关丹中华商会执行秘书，直至1982年离职。曾以柯曼为笔名，在《通报》开设专栏《关丹河畔》，发表了不少杂感小品文，也写过好多政论文章。约于90年代初成为古董商。

1996年9月4日晚间，欧曼在沙巴下南南的住家接了一通神秘电话后，留下字条表示要去斗亚兰收购古董，驾驶一辆白色古沙爬山车外出后告失踪，一去不回。根据1997年2月13日报载：哥打京那峇鲁警方证实，惨遭杀害死后弃尸深崖的古董商欧文豪尸体已被获寻，但由于当时无人认领，院方在完成剖验手术后已将死者的遗体埋葬。沙巴斗亚兰警方也已证实，神秘失踪4个多月的欧氏之尸体，是于去年11月23日斗亚兰哥打毛津甘榜娇附近约450尺的深崖内被当地村民发现，当时死者尸体身首异处，除了身体、头及脚之外，死者的断手仍未寻获。

【泡蒂】（1792，页271）=艾蒲（0009，页36）。在1956年左右，泡蒂还用过云仪、黄孟杜、方放、洛凡、放弃等笔名，作品收入丛刊《陷阱》和《星加坡之歌》（1957）等。

【彭松涛】（1803，页272）不幸于1996年9月14日辞世。

【秦牧】（1844，页277）当代中国文坛杰出的散文大师、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于1992年10月1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73岁。1995年12月7日在广州成立“广东秦牧创作研究会”之后，积极地展开各种活动；1996年8月出版了《秦牧创作研究特辑》。

【丘斌存】（1860，页279）生于1903年，另署邱国基、中尼、高基等。因此丘斌存=邱国基（1864，页279）。

- 【邱新民】（1889，页283）1914年10月27日生于新加坡和丰山，乳名邱岳，字子华。不幸于1995年9月20晚9时30分，因心脏衰竭逝世于家中，享年82岁。
- 【莎 笳】（1935，页289）50年代中期新华诗人·曾写戏剧，跟宋雅及桑妮，以宋李桑为笔名合著五幕剧《椰林夜歌》（1961）。不幸于1992年6月10日辞世。
- 【商晚筠】（1943，页290）原名黄莉莉，另署星期五等。1991年在台北出版236页的小说集《七色花水》。不幸于1995年6月21日下午12时34分，病逝在马大医院，享年43岁。遗作《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被收入《南洋文艺1995小说年选》定为书名。商晚筠是一位杂货商的女儿，这样的背景使她的早期小说充满了南洋乡土色彩，彰显北马华人的生存与生活上的诸多现象，她居住环境、家庭生计、爱情与婚姻、社会适应以及种族关系等，都很容易在她的作品中，发现具体的描述。
- 【沈 亭】（1952，页291）1915年1月1日出生于福建诏安县，长期在怡保教育界服务。常用笔名有：萧墙、北公、萧郎、云悝、安书客、牛亨等；1969年至73年之间发表了不少的杂文。著有：《沈亭回忆录》（1986年7月）等书。不幸于1991年7月8日逝世，终年76岁；遗体在怡保三宝洞火化。
- 【施祖贤】（1983，页295）1910年生，1990年6月4日在香港逝世。
- 【陶 焰】（2101，页310）生于1916年4月4日，歿于1994年3月13日，享寿78岁。
- 【王仲厚】（2214，页327）生于1889年，歿于1978年。
- 【韦 晕】（2223，页328）不幸于1996年6月1日凌晨2时30分逝世，享年83岁。安葬于关丹丹绒亚庇基督坟场。区氏又名上官瑩。1937年南来。另有“曹苓”等笔名。于1991年荣获吉隆坡与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颁发的第2届马华文学奖，1996年荣获亚细安文学

奖，亦曾经是星洲日报第2届花踪文学奖颁奖礼受表扬的前辈作家和颁奖人。

【翁翼】（2263，页334）生于1935年4月16日，1993年12月逝世。较新的著作有：翁翼美术论集（评论集，1991）、世界美术论稿（1994）。

【吴村】（2278，页337）1904年生，1971年12月16日因脑溢血在中国西安小寨医院逝世。

【吴德耀】（2297，页340）生于1916年12月8日，歿于1994年4月17日，终年78岁。新加坡海南会馆于1994年12月出版《海南一代哲人》（吴德耀教授纪念专辑），194页。

【吴静子】（2308，页342）约于1920年生，1991年11月30日晚间9时45分安息主怀，享年72岁。安葬于八打灵基督教坟场。

【吴体仁】（2320，页343）原籍江苏省崇明县，1980年辞世。

【谢松山】（2442，页360）生于1891年，1965年9月23日辞世。

【邢白婴】（2476，页364）原名刑定洲，生于1914年，歿于1992年6月初，享寿78岁。

【熊念光】新山写作人，生于1925年1月21日，祖籍广东梅县。其笔名有：司马海、泮坑熊等。熊氏在青年时代，工余时间喜欢写作和阅读书报，并经常投稿南洋商报副刊。不幸于1984年1月7日辞世，终年59岁。其哲嗣熊柔波，是南马著名新闻从业员，现任南洋商报新山办事处采访部记者，和柔南华文报从业员俱乐部主席。

【许杰】（2506，页369）不幸于1993年9月25日因突发脑溢血在沪逝世。1928年夏，他应吉隆坡益群日报社之邀，赴马就任该社总编辑。他的到来，为马华文化界带来了一股新风，这不仅是因为他撰写的一篇篇社论，都具现着进步的思想倾向，又相当切合南洋的社会现实，因而扩大了《益群日报》的销路和影响，更重

要的是，他还在该报创办了文艺副刊《枯岛》，有力地促进了马华文学运动的开展。

许杰主编《枯岛》副刊历时一年有余，共出刊58期，编登了新诗、小说、散文、剧本、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178篇，同时也发现和培植了一大批青年文学作者。

在寓居吉隆坡的日子里，许杰还先后写成散文集《椰子与榴梿》（1930年10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小说集《戏班》和文艺评论集《新兴文艺短论》3书。这些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南洋气息，反映了华族人民在马来半岛的生活和斗争情况。

【严元章】（2577，页379）生于广东四会县的书香世家，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195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取哲学博士。不幸于1996年7月23日，在香港博爱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7岁。著作有《教育论》（1984，教总于1988年又在吉隆坡印刷发行）、《中国教育思想源流》（1994年出版）。

【杨川】（2584，页380）=贝沙（0064，页43）。

【杨绿水】（2608，页385）生于1913年，歿于1977年1月8日。

【杨青峰】（2615，页385）1911年生，于1994年9月13日安息，世居83年。

【杨秋卿】（2617，页385）1954年在新加坡出生，祖籍潮州。不幸于1992年9月2日在新加坡伊丽莎白医院病逝，享年仅38岁。

【叶明珺】（2684，页396）崛起于70年代的马华诗人，笔名叶明，1955年生，彭亨直凉中学毕业。曾使用飘零人、叶凡等笔名在《当代文艺》上创作小说、诗及散文，之后停止创作前后约10年，当过书记、杂工和罗厘司机等。他在1987年前后，重提诗笔，参加星洲日报主办的端午节诗歌创作比赛并得奖。

1995年9月30日，他与诗人李宗舜2人出版诗合集《风的颜色》，

这也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另外，1995年8月由南洋商报丛书出版的南洋文艺1994诗年选——《三十三万个理由》，也收录了他的4篇作品。在1995年由台湾出版的《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陈大为主编）中，也收录了他的8首诗作。不幸于1995年10月6日早上6时因胃癌病逝，享年仅40岁。叶明留下遗孀王秋花及两名女儿。他的遗体在八打灵再也归源火场火化。

【一梦】（2705，页399）生于1905年，歿于1991年11月20日。

【莹姿】（2741，页406）不幸于1991年6月间逝世于北京。

【余寿浩】（2769，页410）生于1905年，1957年1月8日逝世。

【张匡人】（2899，页431）生于1906年，歿于1967年8月18日。

【赵泰】（2960，页441）1897年生，1965年7月3日因肝疾在新加坡辞世。

【郑秀民】（3012，页449）笔名肃明等。

【周洛峇】（3083，页460）=周峇（3066，页457），原名周绍海，原籍湖南益阳，1951年南来新加坡，从商。笔名有周峇、小亦、筱伦等。著作有散文集《跑蹚集》（1991年9月）、短篇小说集《绿色的梦》（1992年8月）、《周洛峇细说美发护发》（1994）。——《细说美发护发》一书共316页，于1996年2月在中国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

【周清渠】（3088，页460）约于1906年出生，擅写旧诗词；于1992年1月19日凌晨3时25分辞世，享寿86岁。

纵观以上78位文坛人物的修订简介，过去在《扫描》一书中重复的作者（当时未察觉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两个笔名）是：白梵（闻辛）、李过（高鲁）、李凯（学民）、纪青（罗开道）、欧曼（郑豪）、泡蒂（艾蒲）、丘斌存（邱国基）、杨川（贝沙）、周洛峇（周峇）等。有幸已获得高静朗、马亚等作家的函授、赠书及第一

手珍贵资料，也顺此推发出去。

临末，还是这句老话：多谢高明者与热心人士的支助和匡正！

1997年2月10日（丁丑年初四）完稿



左起：赵戎、张金燕、苗秀、梦平（1970年12月6日·笨珍海滨）



左起：谢白寒夫妇、彭松涛、马峇（1988年4月29日·新加坡）

笔航小说海州五载

我酷爱文学，喜欢学习写作，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方面，一爱上之后倏忽经已卅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学人游腾文海，也有幸出版了十余部长、中篇和短篇小说集；虽则自知写得没什么进步，可是，回顾过去对我总有一丝甜美的感受，说不定还能缅怀过去，鞭策未来哩！

于是，在《笔航小说海州五载》里头，概括了约15篇自序、后记等文字，至少表露了个人对小说创作的看法与走向。我愿接受任何善意的批评，并力图改进，才能跨前一步，是为“前记”。

各篇名称和写期依次如下：

- | | |
|--------------------------------|---------------------------|
| (一) 长堤·自序 | 1962年5月15日 |
| (二) 旱风·后记 | 1972年8月25日 |
| (三) 写在长篇《迟开的槟榔花》前面 | 1973年7年18日 |
| (四) 不碎的海浪·后记、再版小记 | 1975年11月19日
1976年2月28日 |
| (五) 贝壳之歌·后记 | 1977年2月17日 |
| (六) 山鹰·后记 | 1978年2月9日 |
| (七) 笔端所触及的
——《飞向子午线》代后记 | 1981年4月23日 |
| (八) 幸福的孩子·后记 | 1984年1月17日 |
| (九) 黄梨成熟时·后记 | 1984年7月27日 |
| (十) 慈颜·怀旧·小人物
——《静静的文津河》代后记 | 1985年11月17日 |
| (十一) 浮生三部曲·后记 | 1990年12月24日 |

- (十二) 幸运年·城乡人·活语言
——《城乡回旋曲》代后记 1991年10月6日
- (十三) 蒲菜山的情意结
——《笑傲山野》代后记 1994年3月30日
- (十四) 不幸与挣扎的一群
——《无根的花木》代后记 1995年2月19日

(一) 长堤·自序

雨果说：“你从苦地方来，如果还怀着怨恨的心，那你是真是值得可怜的。”我不甘于做一个值得可怜的人，因此，这些年来，对于笔，我始终怀着不可摇撼的迷信——当我拿起笔杆的时候，我总付出了自己的寄望与期盼！

在那四围疏落的槟榔园里，在那风雨斑剥的阔大门庭下，一切的荒漠自小便把我养成一个沉默寡欢的孩子。——感谢故事书，它是我感情上萦寄最深的友伴；它使我在真实上所欠缺的事物得到填补，它使我开拓了智慧的领域。因为求知欲方面的满足，我遂忘了许多生活意图上的欠缺；我幻想着故事中每一个离奇怪诞的情节，我也常在幻想中为之神往，为之默化。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思想终于支配了我，我辨识了许多的真与假，实与虚；我那颗跟随着爱丽丝由小白兔引领着漫游于仙境的心，从一个幻梦中的世界被带回到现实里来。从此，我失去了聆听雪姑的七位仙友的悦耳歌声的兴头——我已跨出了公主巫婆的童话的国度。

从那个时期起，我起始涉猎了一些中外文学创著，也在日常生活中多接触了一些人与事，更经历着生活的艰辛和沉重；在那里，

我看到人生的画面，与实际生活的形象——生活决不单调的，人与人之间交织着猜忌、歧异、矛盾、偏见……由于这种意识而形成了虚伪。于是，大多数的人都把虚伪做为崇拜的偶像，极端自私而见利忘义，整个社会的心理及形态也愈发畸形了。

这期间，我曾梦想做一位美化人生的工作者，减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排开一切人为的隔膜；兼之在酷爱文学的思想鼓动下，我居然斗胆地尝试着写作起来。就这么着，几年来，藉着课余或假日之暇，我写下自己周围的感情的痕迹。可是，我惭愧于自己见闻的寡陋，加之文学修养的粗浅，使我仅能反映这么浮浅的一些生活形象。

选收在这本集子里的6篇小说，就艺术的完整上说，都未免显得幼稚粗疏，在整理稿件的时候，我又抽不出很多时间来作细致的修饰。不过，这本集子在我个人，只把它当作《看见风的人》（与易草舒君合集）后的第二个写作的阶梯；我深信往后自己还会像在墙脚不断爬行的蜚蚰一样，有一股向前爬行的劲头；坚决地写下去！故此，愿以它来作为第二个学习的纪念，并比较往后的进步；同时，冀求抛砖引玉，企盼读者及文艺界先辈进的人士，予以教正。

关于我的习作，我有许多心爱的师友是应该提起的，他们给我以不同的扶持和勉励；我仅在此向他们以及所有关照我的友人，致以最衷诚的谢意与铭感。

1962年5月15日·序于马来亚文律巴列丁仔

（二）旱风·后记

月去岁来，不觉间，就过了十年。

在《长堤》（拙著）里写了那篇《自序》之后，一晃已整整十

个年头了。经过这么一个为期不短的时日，这次，才有机会为自己的集子补个《后记》，无论如何，这在我是一件殊堪欣幸的事吧。

尽管我们这个文坛的星辰显得黯淡，尽管目前的文艺界冷落萧条，出版业萎靡不振……一切沉寂得有几分像是沙漠，鲜有甘露与绿洲，亢旱无雨，蒸发出闷热的气息，薰炙逼人；然而，我们对文艺所抱着希望的信念始终不能动摇，同时，我们认为对一切消极是愚者的态度，不智之尤。故此，在这亢旱般的文艺季节里，我们设法克服了一些客观环境所存在的困难，决意印行《南马文丛》。

——《旱风》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了。

是的，“旱风不会给予人凉爽的感觉”，不可能在这文艺旱季里把热气送走；我只愿它能够在文坛的湖面荡起半圈涟漪。而相继前来的作者，会把精巧的创作瑰宝投入这原是平静的湖里，掀腾起来的美丽的浪花，漪欤盛哉。这么一来，不特文艺界将可呈现蓬勃热闹的气象，而且使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这也是我们所曷胜翘企的事。

任何事情或工作，都是苦乐参半的；写作也不例外。腾出了闲工夫，禁锢自个儿集中精神在斗室里熬过了无数个子夜，眼见一小叠方格子上面填满了墨迹，心头旋即止不住一阵喜悦，有时还使我心神俱醉呢。说真的，自从文学走入我的生命以来，也唯有在创作的时刻里，才是我真正感到充实的时候；而我过往的生命，在直觉上是近乎空白的。

文学是反映现实的人生。小说，是对人的描绘，对现实生活的忠实刻画；作者更应该以活生生的具有人物形象的语言文字，来反映我们这个多元种族、友爱合作的社会生活。由于我比较熟悉的是那些所谓生命卑微的小人物，所以，我描述的对象多是这一类的角色；但限于学力及表达技巧，他们在我安排之下，也许还不能达致一般艺术所具有的感染力，无法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不过，在“意

匠惨淡经营中”，我笔下那些小人物确曾在我意识中酝酿过一些时日，并且左右过我某个时期的思绪，甚而引起过悠远的愁郁。收集在这儿的8个短篇，我之所以把它们付梓，主要原因是那几位小说中的主角人物跟我格外亲切，其中有几位他们那凛然的生命的庄严与倔强，值得我为他们表彰。

文学，为我平淡的生活平添了无限情趣；写作，活跃了我的生命，扩大我的生活接触面，认识了社会众生相，体会了人生，找回了自我，不会变成一个失去灵性的躯壳，对于生活不致于茫然不知所向。此外，最教我喜慰的，是通过了文艺，让我交上了不少文友，他们多是义理充沛的血性中人。一路来，这些友好给我的关照与帮助，我将永铭诸心。

而这回《旱风》得以顺利面世，诸如张发、林扬二兄，黄崖先生和黄润岳校长等，都给予我不少的鼓励；大家的盛情，我藉此一并谨致谢忱！

1972年8月25日·志于廉价屋

（三）写在长篇《迟开的槟榔花》前面

60年代第3个年头的首个月份里，在我生活的曲线上，又出现了一个曲度，那艘颠簸的小汽船，鼓着浪涛，把我送到半岛东南隅的一个小渔村。

这时候，那强劲的东北季候风依然吹响着号角，呼呼地吹荡我的头发，也拂动我的衣衫，猎猎作响；而海却一个劲地用她深邃湛蓝的明眸谛视着我。堤岸上，那微微摇摆的树木群，宛如在向我低唤与欢迎哩！可是，我的心情却有几分沉重，甚而有几番孤零零的感觉。

在过往4年多的岁月里，我的生活是漂泊无定的，再加上好多青年人所遭遇到的苦恼，我都碰上了。每当我落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总免不了兴起一阵情绪的波动。我出生在荒芭里，而且在那里度过了18年，如今又到了寥落的所在，同样的跟故乡有一番落寞的景象，所不同的是，以前住在山芭里，现在却居留于靠海的渔乡。蛰居在这儿，我内心似乎萌生了一种灰黯的虚无感；这在一个年轻人来说，则多么的不适宜呀！

海滨，该是一种广阔胸襟的境界；在海天的大和谐中，每每会溶失了自己。于是，约莫两个月后，我就变得比较开朗了。同时，多年来一直伺机占有我，但让学校中繁重的功课阻挡的文艺女神，如今终于把我围困起来；从此，我仿佛找到了一丝可以作为生命的绝对可靠的凭藉物——我陶醉于文学，也拥抱了文学。在我精神生活的天地里，遂而充实了些。

在那不长不短的两个年头里，每晚，耳畔不断传来海的呼啸声；我利用公余之暇，坐在海风频送的板窗下，构想运笔学写一些东西。

夜潮在窗外呼唤，稍大的海风一拂来，土油灯的灯芯受了影响，长灯罩冒起了冲鼻的浓烟，薰人欲呕；若拉上板窗的话又太闷热，所以只好忍受着。灯烟，引起我的联想：所谓生命的真谛，乃是在蜡烛燃烧时所产生的光和热吧。我应该在晕黄的油灯下，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工作，才不会使自个儿的生命史页显得太空白。火烟，也唤起我对过去生活的回忆，让往昔的人事的重现带给我一份欢乐；于是，我每每想到在枳炉前面烘焙“枳饼”的父亲。噢，父亲也曾在枳炉的红炭上给我与兄弟烤番薯呢！然而如今，父亲离开我到了冥国，已整整3年半了，繁忙的学习生活似乎使我一直抽不出较长的时间来好好的缅怀他。

这么一感怀，父亲的音容又一直在我脑际映现，好久好久。——我原是多么怀念他呀！

我父亲一直在槟榔园钩了大约38年的槟榔子，许是勤苦艰难的工作，使他提早走尽人生的路程。我怎能忘得了他是我纪念生日的那一天离开世间的，从此我的生日有了两层“意义”！

在那段比较安静清闲的日子里，我不仅怀念父亲，而且也常追忆过去生命中难忘的史页，于是，往昔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或所感的形形色色，都一古脑儿重现于脑幕上。

文艺即是现实的反映，和人生的表现，而生活是文艺的母胎；那么，故乡里的一些人与事，何尝不是写作的材料，是那一个“历史阶段”的某种象征？我正可以利用这些素材，向过去的的生活取得滋养与灵感，以热炽的感情从事回忆中的事物之再现创造；这不是一项饶有意义的尝试么？况且，这也算是我纪念先父的一种做法吧。

拙著《迟开的槟榔花》，便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

纵然是享誉甚隆的作家，他们的第一部比较长的小说，也未必是成功或可印成书的作品，何况我学习写作的时间不长，文笔与技巧方面的修为十分差劲；故此，我从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智慧的凝聚物，通过这些复杂的艺术创造，可以将短暂变为永恒。也由于这个缘故，我极少跟别人提及自己写过这么一个比较长的故事，只把它当作是习作途中的一项技巧磨炼罢了。

这么一藏拙，不觉间就过了7年余。

70年代的第一个年杪，在偶然的一个机缘里，马华文艺界前辈作家赵戎先生，屈临小镇舍下晤叙。在谈话中，我不意提到自己曾写过《迟开的槟榔花》。赵先生真是古道热肠，立时声称可以帮我介绍与出版社，或可有机会印成单行本也说不定。

经过赵戎先生这么一提议及鼓励，我忽地又敝帚自珍了，而且决意在未成书之前，花一些时间对它审查与修饰一下，于是，我针对原稿中的字词、片语或句子，作了一番剔除与凝缩的小删节，可是也有一些是为了执着于自己的感情和当时的想法而保留下来。至

于它的内容或表现技巧，是否艺术地反映了人生，不是直接说明事物，或结合了地方色彩与写实主义，和描绘了时代面貌……那就有待读者予以严正的批评；我谨在此先致谢意！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我绝不同意文学只讲究华丽与奇特的外表，或远离现实社会的空想世界，仅具有独特与新颖的躯壳而已，不必在乎什么真实的灵魂。我想：倘若文学作品无法向某一个时代作若干程度的表达与交代的话，那么该作者创作的意识早已不正确了。颇斯乃特所说的：“文学是准据于时代的生活与思想的。”这话端的不错吧。

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已经独立16年了；大家有权分担与分享国家事物，“每一位公民都有占有一个生存的地位，每一位公民都有权享受马来西亚的阳光”。这是何等荣幸呵！

这部小说所描写的，仅限于各族人民在独立前夕蜕变中的思想及态度，和大家所致力建国与团结的情形。由于当年大家的国家意识或爱国精神的观念，没有今天这么强烈，所以拙小说的主题似乎不能站在时代的最前端，而是跟在时代的后头。不过，我已尽力表达建国的重要性——在独立建国的大前提下，有些愿望，甚而连爱情，都应该克己放弃的。同时一种归属感，更加需要。此外，还指出了由于不同的种族起源、文化与宗教，以及英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所造成的“民族间鸿沟”，亟待弥补。

独立后这些年来，客观环境已然又起了急激的变化，而且有些价值变易不居了。在目前重建社会时期，何尝不也是一个迎合挑战的年代么？因此，拙小说中所强调的某些问题，仍然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在一个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各族之间委实永远需要培养亲善、合作与谅解的精神；这对于建立一个团结与进步的国家，是顶大的“资本”呀！

我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而且约有一半的国民是年轻人，他们

是在18岁以下的年龄。如果这部小说，能够让他们看到独立史推移的痕迹，或找到建国历史的一鳞半爪，从而继续实现上一代未竟的愿望与理想，相信主要的三条坚刚的手臂，是会更坚强紧握在一起的。

临末，凡是由于这部小说的出版而让我麻烦过的亲友，诸如：蔡淡、陈荣庆、赵戎、张维平等先生，好友马汉、罗耀钦、陈成发、陈日新等兄，以及内人李舒贞等等，他们的热诚鼓励和帮助，使我殊深纫感，藉此敬致谢忱！

写于1973年7月18日

（四）不碎的海浪·后记

好多年前，读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岩石》，他这么写道：

“你曾否看见海边一块灰色老石？——明媚的春日，在涨潮的时候，四面冲来的海浪打在它上面，碎了（激浪打击它，玩弄它，爱抚它），还把闪烁的泡沫的碎珠泼洒在它那长满海苔的头上。岩石还是一样的；可是，它的阴沉的外貌现出灿烂的喜色。”

有一回，在奔艾海滩，静静地谛视南中国海的波涛时，我想起海涅写的“海浪喧腾着它们永久的嘈声”这个诗句，突地觉得海浪并不像屠格涅夫所说的真的“碎了”；从表面上看来，海浪是碎了，事实上，它一退下来，又汇合了新的一股劲道往前冲击，所谓后浪推前浪便是这个道理。倘若海浪果真一击即碎的话，阴沉的岩石怎能“外貌现出灿烂的喜色”呢？

徘徊在此时此地的文艺海滩上，那是寂寞无比的；眼前的景象，则是荒凉的。差幸这里的沙滩洁白，一望无垠的向远处伸延着；前方是一片翠黛敷满金鳞的大海，海水一个劲地追求浪花，浪花在水

面舞蹈，盛开着朵朵的白花；它纯洁、活泼、欢畅……

青年人总有天真而狂妄的理想；在沙滩上种花毕竟是公认的傻子。我们不必做这样的傻子。

不过，豪迈奔放、勇往直前的海浪，却予人不少的启示，值得大家学习。——在文艺的海滩上，有过低潮期，也有过繁盛的高潮季；然而，海浪却永不安息，永无尽时。即使它有退却的时刻，但它总是很快地又把广阔的沙滩拥在海的怀抱里；而且正如雨果说的“一阵阵波浪经过时各有所攫”，它不会白费工夫的！

月华引吸着海潮，海浪扑击着岩石，傲岸的岩石终于现出灿烂的色彩；这是真理吧？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文艺的海浪，将永远存在，甚而在嶙岩间喧腾着。但愿我们永远心镜明洁，凝神观照！这本集子以“不碎的海浪”为书名，用意就是藉此自勉，更愿与大家共勉之。

形容本地的文艺事业是一个无依无助的孤儿，显然是不确的说法，至少像首都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创设的“学术文艺出版基金”，便直接给写作者一种关注、奖励和扶助。这项出版基金最重要的目的，是在“提倡华人文化，而进一步促进全国马来西亚文化的发展”；创设者的一番心意，是令人钦敬的！个人侥幸地获得文艺组奖金，谨在此致表谢意。

记得在4年前，某书刊曾登出拙著《小镇归来》的出版预告；全文在海外排了143版，经已校完最后一次稿，结果仍“功亏一篑”。这件事到此已告一段落了，因为该集子所收集的一部分作品，现已归入这本小书里头。过去曾预防订购的读友，使我惴惴不安；我不能不在此作个交代，并申表歉意。

个人的能力到底是有限的，非有别人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不可；而这本集子的出版过程，钟赋先生、杨智玲女士，题字的萧劲华老师，为作者画像的蔡淡兄，他们多方面的照料，在此一并致谢。

1975年11月19日

(四) 不碎的海浪·再版小记

《不碎的海浪》再版了！

一本文艺书能够在短短的期间内再版，当然值得高兴，但实际上，初版与再版加起来，还印不到4千册，比诸在外国，一本新书销量达数十版，印几十万册，是难望其项背的。——它距离理想还有一万八千哩呢！

我们有信心，我们认定，本地有这么多同胞，在提高人心的醒觉之后，自有更多人来支持与扶育马华文艺，让它好好地苗长。

是的，诚如一位作者所说的，任何有文化良知的人，都不愿看到马华文坛会继续出现真空。作为一位有意识有思想有灵魂的人，在追求基本物质满足后，一定会转而寻求更高级更持久的性灵生活。

日前，一位马来部长告诉我们：文学是充实“语文是民族的灵魂”这句话之任务的重要工具，因为文学可以直达人们的心坎。文学也是加速生活觉醒，美化灵魂和提高人类崇高感的工具。

这话端的不错。他还强调科学工艺与文学艺术必需并重，才能为人类生活带来益处。

而我们，在文艺的低潮期，不敢对文艺存有“奢望”；只希望本书的再版，可以影响本地的一些出版社，或可使他们对本地作品具有信心，从而为更多的写作人提供出版的机会，则幸甚矣！

1976年2月28日

(五) 贝壳之歌·后记

在那段还有权做梦的年龄，每每有过多的妄想；虽则一再渴望心灵平静，然而，幻梦总多于实际。与那位狂言“看见风的人”之

新交莽闯上“文坛”后，随即越过了“长堤”，落脚在一个荒凉的渔村。

喔，我原是个山芭的孩子，但在海的身边，却成为爱海的青年，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大自然更使人喜悦。

忘不了，在那生命色彩顶翠绿的年头，那段望海的日子！那时候，虽然自己带点漂泊感伤，但还不至于“我底心一直被关闭在小小的硬壳里”（川端康成在《少年》中语）。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着：“如果我算是还有一份写作的才华，我也许会以甘露清泉般的文句，来点缀一下这可悲可悯的人生；同时点缀我这颗贝壳般的落寞之心！”

当时，我确实对自己有过要求，企冀自己的生命有所意义，能够在寂寞中充实生活。白天，在工余之暇，我老爱在海滩眺望海浪掀起的纯洁银花；要不，就是走访渔夫和村民，或在《旱风》中投身在橡林里。夜晚，就在记忆的城堡，捕寻那《迟开的槟榔花》之余韵与芬芳。

假日，徘徊在奔艾海滩上，凝睇《不碎的海浪》，稍后拾拾最美的贝壳。贝壳在阳光下闪烁着，洁白璀璨，晶莹圆润。而摆在案头的贝壳，该是挺了解海的秘密，它也跟当地的村民一样有说不完的故事吧，那是属于大海和原野的。于是，在构思中，又增添了几许习作的素材。

以《贝壳之歌》为书名，不外就是纪念那一段思想感情比较纯的日子。友人梁志庆在其散文《沙滩》里写道：“拾沙滩上的贝壳，再编织一个多彩的希望吧！”——哦，你我不是都有一串多彩的希望么？

有时我想，倘若贝壳真的会谱出歌来的话，它的歌儿也是寂寞的、低弱的，它似乎难以唤醒人们的觉醒——绝大多数的人对文艺的认识仍然是“肤浅”的，甚少人明白文学是文化精华的一个层面。

我们固然有点失望，但绝不灰心，甚而有决心的接受现实，那是残缺的现实。凡是握笔杆子的，都应当坚持不变的据点：写作的志趣不变，永远抱定“薪火不灭，希望就开花”的信心，顽强持久的谱唱下去！

话说回来，目前在我国有3个社团，能够为马华写作人设立“文艺学术出版基金”，这个突破，倒令人感动；这种精神，是值得嘉许的。这一回，我又得益于社团的赞助，特此谢谢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萧劲华老师第三度惠赠墨宝题字；挚友蔡淡负责一切出版事宜，还设计封面和画像；陈雅、刘祺裕等兄的盛情及帮助，使我倍觉友情的温暖与可贵！

至于那些常关照我的文友和读友，也让我趁便谨于此致谢，并祝福大家！

1977年2月17日·除夕

（六）山鹰·后记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好些年前，诵读《贝多芬传》的时刻，最欣赏罗曼罗兰这些话儿。唔！那不仅是指“老大的欧罗巴”，若拿来形容当时本地文艺的景况，也大致如此吧。

可幸的是，今日的我们，绝不是孤单，仿佛已呼吸到“英雄们的气息”。——那些提供“文学出版基金”的贤达或社团，多少总

算给写作人带来一小道暖流。

企图靠心灵而壮大的人，总有一个不平凡的梦；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每每为梦而喘不过气来。然而我是个幸运者——现在又有机会受着神光烛照。

四天前，收到那部由我国28位各民族小说作者执笔的《马来西亚短篇小说选》（KOLEKSI CERPEN-CERPEN MALAYSIA）；本书里的《摆渡老人》，恰巧是其中的一篇。翻阅拙作的巫译文字，我有一丝意外的欣慰！

马年伊始，许多人都抱有一种鸿图大展，飞跃进步的期望；而我，只觉得我们应当守住清纯的心志，以更坚定的写作信心朝向明天，甚而对它偏执与狂热，在力所能及之下，学写更有意义的作品，才是正确的意向。谨以此与文友们共勉！

书名要用得适切，并不是容易之事。——山鹰是我孩提与少年时代比较常见的猛禽。这里以它为书名，不为其他，只希望学这种几近绝种的野禽之勇猛与坚强，或可在文艺的苍穹，利用空气中的气流，展翅乘风翱翔、盘旋……鹰有锐利的目光，有超过音波的冲刺速度，而且它是风的骑士，谁不羡慕它飞翔的英姿！

在新马文坛上，苗秀先生是个资深的小说家。我有幸与他有几面之缘，不过《序》中过誉之处，自觉是个人担当不下来的；多谢他老的勉励！

心仪已久的韦晕先生，所赠送的评语，敬领教益，致谢！

每次出书，从付梓到发行，总要给友好带来诸多的麻烦；这回，我要特别致谢庄延波兄、萧劲华老师、郑易、张礼明及林过等兄。我始终认定：倘若要长久舍“利”求“真”和“不改其乐”的话，必须继续追寻，同时接纳大家的意见；唯有这样，我们爱好文艺的红炭般之心，才不会冷却下来。

1978年2月9日（戊午年初三）

（七）笔端所触及的——《飞向子午线》代后记

近些月来，有个机缘赶着阅读逾50位本地知名小说作者的约百万言的创作，使我对近20年来的大马华文小说界有深一层的认识。在品评过程中，至少有10位小说作家给我印象良深，应该让他们得到应有的高评价。

那批前辈小说家，认真创作的精神应受尊敬，因为他们那高度完美的呕心之作，形式独特，表现技巧圆熟，人物更具立体感，主题与形式达成和谐，给了我不少的启示。

直忙到稍微可透一口气的时刻，孟沙兄从都门挂号寄下拙著《飞向子午线》的打字稿。细校这8个中短篇之际，许多极为复杂的往事又映现于脑幕，而心坎里是愁喜参半的：喜的是我的第10个单行本即将问世啦！愁的是我似乎缺少了创新精神，不能通过艺术手法将现实生活及事物浓缩在这部集子里；由于过分关切小说的社会意识，很少做象征的描写，所以未能把一些说教意味隐晦起来。至于从艺术的整体表现中，是否有了艺术生命，发挥共鸣性和波延力，或从典型环境中塑造出典型人物来，那还是个问号呢。

收集在本书的8个创作，都是60至70年代的习作；最早一个短篇是于1962年在一个落寞的渔村写下的《楼迟》，原稿篇名不同，而且多了三几千字，本来是想让那位出身于中层社会的不幸少女，体验更多迂回曲折，顺逆变化的生活——历尽艰苦和辛酸后才站立在另一阶层里，可是誊稿时却提前结束，就让它保存这个现貌吧。我承认塑造这个不幸人物并不成功，最大的原因是悲剧性的感染力不够。

而这点，正是我年纪20出头时期同情心太丰富的“毛病”。这也是我早期作品中的一大弱点和通病吧。记得有位文友曾在信里提醒我：慈悲为怀的笔触恰足以削弱我小说人物的悲剧力量。我当虚

心接受这个批评。十年后（1972年），我写《火坑里外》的时候，心就狠得多了，主人翁（也是个少女）的下场是悲哀的；在情牵孽缠，恩怨纠结的故事发展中，也暴露了戴着假面具的人肉贩子的丑恶面目。像《火坑里外》一样，创作《年假》也不外是要正视人生，向人性虚伪挑衅和对社会的邪恶宣战。

其它如《抓一朵友谊》《从林麓山归来》《现代武林客》及《抹拭心灵尘埃》4个小说的几个男女人物，孕育在我心中也有多年了。创作必有动机，人物多有蓝本，然而，小说创作必需有虚构，不能完全是事实。《飞向子午线》则是3年前才找到的新素材，演绎成的新主题。较早时，还完成了另一个类似题材的《西归又南飞》，可惜不能同时在此登场。

重读这8个80年代以前的小说，个人对自己的一点儿成绩是绝不满意的。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谁也不能满足于一种表现形式或执着于一种技巧，必需多方面进行试验，何况我还不能充分地运用最适切艺术表达力。以往，也曾不量力地有着眼历史，刻画伟大的时代风貌的抱负；然而，顾着多方面的问题，好些有时代气息的题材都相继放弃了，正像我笔端所触及的众多小人物一样，作者本人并不是大勇，也是弱者之流罢了。

过去，小说销路是书籍之冠，如今也大不如前了。香港作家刘以鬯说：“小说正在作垂死挣扎。”据说在市场上闯荡江湖，不妨豪放一点或野一点，故此选定《飞向子午线》为书名。《飞》始终是大家心焉向往的事嘛！

数天前，美国成功发射了太空梭，人类对太空的飞行有了更大的信心。在新的80年代里，我将向前辈新进再学习；不论在纵的继承（传统的写实主义）或横的移植（源自西方的现代主义）上，我愿重新出发——冀望也有起飞的一天！

1981年4月23日

（八）幸福的孩子·后记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几乎天天跟少年儿童生活在一块儿，所以，对他们的生活情形和心理状态了解一点。我喜欢学习写一些东西，很自然地，也常以少年儿童的家庭背景、学校生活和课余活动等作为写作题材。

多年以来，以年幼一辈为中心的短篇小说，也写成好几个，已结集的有二：《小孩札记》（1975年6月·今天出版社）、《犯罪的孩子》（1977年10月·泰来出版社）。此外，也整理过一两个类似的小集子，却因为某些阻搁，至今还是无法与小朋友见面。——而这本小小的新集子《幸福的孩子》，内收6个小说，写作时期是自1962年至1982年，先后以5个笔名发表在新加坡知名的文艺报刊上。应该顺便指出的是《猎人底话》，曾获得新加坡教育部主办的“1973~74年儿童读物征文比赛”文章组优胜奖第2名（编入合集《美丽的心》）。校对这些旧作的时刻，稍感不安的是小说中的用字遣词不太适宜时下的少年儿童阅读；出版之前，又无法全面性地修改一番，我只希望它会是小朋友初读马华小说的读物之一。今后，要是有机会再习写同一类的儿童小说，自当尽量符合幼小一辈的需求。

从《小孩札记》到《幸福的孩子》，二书的出版将近隔了9年的时光，却一直受到主编马汉兄的鼓励与关照；诗人林方兄和设计封面及插图的陈浩先生，他们的帮忙令我难忘——敬谢！

1984年1月17日

（九）黄梨成熟时·后记

今年的6月至7月间，我一直在构思，可是，却未能兴致盎然地完成这篇短短的后记。

偶尔翻查书台上的最新资料，文艺副刊编辑兼作家甄供（纪铮）兄说：“……马峇（梦平）原本是从事文艺创作的，写小说和散文是他的特长，但近年来他却关注到作家资料的搜集和编写，出版了《马华写作人剪影》、《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等书……”（详见甄供作《从文学历史海洋中探骊得珠》·1984年6月24日南洋商报《星期专论》版）

另一篇新闻则披露：“……《马华当代小说选》由马峇负责编选，收集小说宛五十四人之作，是二十年以来（1960至1979年）的小说总结，文字达四十万言……”（见1984年7月23日星洲日报·大马新闻版）

谢谢甄供兄的关照与褒嘉；也感激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实现《马华当代文学选》（温任平策划）的出版计划，使我在1980年间花了几个月所编选的一部选集不至于徒费工夫，寸心喜慰。

呵，6月、7月，令人“心神不定”有月份！其实，对于一个惯于忙碌（有时只是无事瞎忙）的人来说，一年里每个月份都有它特殊的意义、记忆或感慨；比如本年度4月中的一桩交通意外，便使我有重生的感觉，随而兴起“大难不死，必有重任”的感慨。——个人蜚居的小市镇，每年的5月杪到7月原本是梨农繁忙的季节，然而近几年来却已“平静”正常化了。拙小说里描述的“黄梨旺季，烂梨如丘”的情景已不复存在；目前，不可能在这个季节里再爆发梨菁滞销的危机了。这是可喜的现象吗？值得有关从业员再深思。今天，连下一辈也会发出疑问：“黄梨生产的大冬季节，马路上载黄梨的罗厘排长龙阵，生产过剩，熟透的黄梨变成废物，倒弃路旁……你在瞎胡说，把小说写到哪里去啦？”幸好有采访有关的新闻时，还保留着在70年代前后拍的一些图片，可证明当年的梨农在旺季时唱过悲歌。石火光阴，岁月无情，世态多变，虽则不是日长岁久，然而许多事物都已改变。一位出国几个月后归来的人，很可能

便要为国内既成的现状而触目惊心呢。有时想来，如果缺少文字的记载和表达，过去的史实很可能在短期内将被无情的岁月所湮没，真实的故事竟让人家误以为是子虚之言。

友人林君表示，这本集子里，有几个题目都不错，为何偏偏选了《黄梨成熟时》作为书名。个人的答覆是：约十年前觉得这篇小说描绘环境还可以，便要求萧劲华老师写了书名，如今萧老师归道山已6年，有机会出版这本小说集，正好拿他铁画银钩的遗墨来纪念当代一位豁达大度的书法家。再说，我居住在这个以黄梨为镇名的小地方，弹指间将近21年，这个书名多少显示着个人的乡土之情吧。

先前陆续出版的几本小说集，都未按照写作时期让它先后问世，通常是随意挑选一些短篇整理结集的；这本集子也不例外，所收集10个短篇的写作日期相隔甚久，较早的写于1967年，较迟的在1982年完成。主题篇《黄梨成熟时》与它前后的《黄梨乡之恋》和《梨镇风雨》，实为连贯性的一个完整小说，不必分开也是一样的，发表在原上草（沙风）先生编的《大众晚报·大众文艺》副刊的时候，曾分开为三篇连续刊出。大体上来说，这本集子中的小说是从平实、寻常事物中找题材，注重作品反映生活是否真实深刻，希望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多年来，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生活的原始材料，不过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未必深入，我所接触的很可能只是表面的生活现象。人与人之间错综又复杂的社会关系，它构成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想要在自己的笔下将他们典型化、概括化，绝不是一件简易的事。同时，对主题的挖掘、形象的塑造、情节的开展、结构的安排和语言的修饰等环节，都是教人煞费苦心的事。重读以往的习作，自觉必须悉心再学习掌握和运用艺术表现手法，将各种艺术手法交互运用；对于间接描写、对比描写和心理描写，以及倒叙、插叙等等，都不宜忽略。在这里，顺例抄录美国的一句谚语：“不

向前看的人，最后会发现自己落在后边。”愿藉此自勉，并与写作界朋友共勉，今后才有望吐故纳新，塑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

久已无暇写小说的名学者萧遥天教授，从百忙中惠予序文，他对晚辈的要求相当高；我也希冀有一天可跳出“青年圈”，谢谢他的勉励！拙著在出版过程中，承蒙新加坡七洋出版社主持人林方兄、美术工作者张礼明、吴松森二兄和张雪珍女士，以及作家黄叔麟、江南等兄的关照，感铭肺腑，谨此致表谢意。

1984年7月27日

（十）慈颜·怀旧·小人物

——《静静的文律河》代《后记》

5月，原是属于诗人的，也是康乃馨（母亲节）的月份。

今年的5月，我有过一阵子的欢欣，然而紧接下来，却有着深重的哀痛”

5月16日，获得了所谓柔佛州各民族活跃教师写作奖（1985年全柔共颁发与四位华巫教师）；5月20日上午9时半，母亲（邱门谢氏冬奈太孺人，1915～1985）辞世了！噢，大故遽遭，我等于是失去阳光，因为洛震说过：“母亲是灿烂光辉的朝阳。”

“逝者不复见，悲哉长已矣！”（白居易诗《感逝寄远》）最近，趁剪稿在付梓之前，修饰某些语言文字，竟在我终天抱恨的时刻，瞥见先慈偶尔出现在自己的小说中。我不曾正面写过她，可是在环境描绘里，总有她真实的影子出现在小说背景内，有的确实是她的言行呢，比如在短篇《打赌》里，她晚间煮绿豆汤招待工友是确有其事。在偏僻的山芭，屋漏柱斜，厕所无门（只挂上麻袋遮

蔽），路面泥泞；她与先父含辛茹苦、缺吃少穿的养育了逾十名儿女。数十年历尽坎坷苦难，使先慈种下了老年多病的根由。

记得先严（讳大可邱公府君，1905～1958）与世长辞后，我曾在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写于1963年）里，把真实的他给写了一点进去。有时候往深一层思索，在我以往的好些习作中，都有个人童少年的社会环境的写照。感谢父母，为我提供了18载（1941～1958）的悲欢岁月；虽则那是简单不过的生活，然而却让我长大后，在学习写作时获得了思想养料和创作素材，并增添自己的形象思维与艺术想像，提高感受、鉴别和表现生活的能力。

过去，我比较喜欢写点小说，经年累月，笔下也出现了一些小说人物；有些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很自然的事。日军南侵，马新沦陷，当年虽然幼小无知，但我隐约记得流离失所，忍饥挨饿，日寇残暴肆虐，放火焚烧房屋时红火满天的情景……1983年12月初，本地的报刊转载了白先勇的短论《岂容青史尽成灰》；这位驰誉的小说家写道：“文学和历史都反映时代，如果说历史是理性客观的记录，那么文学便是感性主观的投射，二者相辅相成。抗战文学正反映了苦难的中国，苦难中中华民族拼死抵御外族入侵的悲愤与辛酸。抗战文学史料的整理，实在是当今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我在1977年4月完成的《静静的文津河》，于同年8月20日开始在《南洋商报·读者文艺》副刊连载6期，也可算是我对日军侵马的“感性主观的投射”吧。

这个短篇也引起我缅怀往事；50年代中期，我寄居在文律大姐丈家里念初中（每天清早搭校车到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求学）时，每年的家历正月20日是日军在文律码头残害虐杀良民的纪念日，我大姐丈（吴奉新君）也跟随许多受害者的家属于这个忌辰，办了祭品，在码头附近上香吊祭，因为他母亲不幸的遭遇，正如许许多多遇害者一样，冤屈未伸，谁不义愤填膺？我早就决意根据这个史实

写个小说，如今经已实现，但写得并不出色，我只是尽了点心意罢了。

今日，在小山村区域里，有点机会可作些新闻报道；有些恶徒横行的采访，令人心惊胆战。翻开报纸，在社会新闻版里，也常触目惊心：劫案频频发生，外来悍匪既打家劫舍，又向弱女残毒施暴；加上出现在报端的种族两极化危机的言论，正是人心不古，今非昔比。我不由地又怀念童少年那段乡居的岁月，村民淳厚，各族友爱和睦，守望相助的情形。这使我忽地记起丹提说过的一句话：

“最大的哀愁，莫过于在苦难中回想快乐的时光。”因此，我格外敬重《再见村长》里的主人翁，怀人弥切。

试写《霸王载妖姬》，旨在道出时下青年男女谋生的困难，霸王车司机的苦况和欢场女郎的辛酸生涯，一对男女虽然产生了感情，但却戛然中止了。我大哥曾驾过十余年的“霸王车”，从他的讲述中，积累了一些生活的原始材料，给我带来了这个创作灵感。若是有人询及《海斗》的写作动机时，我的回答是：1961年与我交往的现在妻子，原是个“渔家女”；而我又在62和63年，被调派到一个类似荒岛的渔村去教书，有这样的机缘让我接触到渔民，也许会比较容易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

其它几个短篇，也都以生活真实为基础，尽量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现象，加以集中、缀合，以期准确而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可是完成后，却发觉在谋篇布局、主题的提炼和人物的塑造等方面，多未能臻于理想。我也不否认个人还不能充分地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性格特征；同时，对于情节结构的安排、艺术技巧、语言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仍有待于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这一回，有机会出版这本新书，首先，我要感谢威省钟灵校友会颁发文艺出版基金，资助本书问世。跟着，我谨向设计封面的张礼明兄、写序文的名作家方北方先生、封面题字的姚雪垠教授、扉

页题字的萧劲华老师（已故）、撰赠古典诗的颜龙章（写新诗的水沫）老师、为本人画像的国际画家兼诗人陈瑞献（牧羚奴）兄，和督印的诗人林方兄等一一致谢！拜这几位名家师友之赐，使拙著增光不少，厚谊隆情，真令人纫感靡涯。

1985年11月17日

（十一）浮生三部曲·后记

几天前，帮助我对稿的一个家庭成员表示：“你这本书的小说人物，多是不幸与悲哀的一群。”

我默然点头。塑造这些小说人物与他为伴的那段日子，我底心情比谁都来得沉！

在80年代里，至少有6个年头，该是我最失意与懊恼的人生阶段。然而，个人的得失，不可能在抗命中烘托出精神挣扎的侧影。

苦恼是个人去招惹而来的，我有长夜反省的必要。

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有些机缘是意想不到的。而我，在80年代末的最后一年，居然有机会搁下职务，应命前往都门接受一个为期3个半月的课程（2月13日至5月26日，领导教学课程）。

久蛰村镇，教了整整30年书，如今又回到全国最著名完备的师范学院（MPIK·蕉赖专科师范学院）去。初期，我千思万想，免不了心烦意乱；不过，我始终提醒自己：应当珍惜机缘！首都吉隆坡，自有现代城市的气魄，也有高度的文化气氛，可让我扩大视野、增进见识。后来，我果真见到了许多新事物和新变化。在学院里，见到一群一群的隽秀青年，他们在学海争游，含英咀华，几年后必成才人贤士，投入西马、东马各地学府服务。于是，我也常回忆青年时代的生活脉搏；1960年前后自己在师训班受训的情形，与今日

所见的学员生活两相比较，其中的迥异与变化委实太大啦。我几乎失去了适应力。因此，午后四时过后的课余时间，老喜欢邀同房的高蔡下坡——一同跑“布鲁拉耶”总车站附近的几家书局，有时漫步于它邻近的几条“英雄”街道，目的不外是要开拓个人的生活境界。

4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开向新山的长途巴士快车还得一个半句钟后才启程，我趁便又四处溜达。我沿着行人较少的行人道漫步，无意间折入 HANG LEKIU 路，望见雪兰莪福建会馆大厦。我陡地觉得非常亲切；噢，福联会不是有过两度资助我出版小说集么！

于是，在南下的长途巴士车厢，我告诉自己：回家度周假时，抽空整理一部集子亲自送去应征。

之后，幸运之神特别关照我——终于有机会出版这部《浮生三部曲》；我底心情，喜可知也！

有时想起来，我是够幸运的了，从1975年开始迄今，先后获得了4个大马华人社团的资助，让我有机会出版6部小说集：《不碎的海浪》（1975年）、《贝壳之歌》（1976年）、《山鹰》（1977年）、《黄梨成熟时》（1983年）、《静静的文律河》（1984年）、《浮生三部曲》（1989年）。这么一来，我有58个短篇小说已汇入6部小说单行本里，同时有了多次的机会在书后直抒胸臆，因而心绪开朗舒展！

今年4月间，原在新加坡出生而现居沈阳的萧村先生寄赠一篇书评《从槟榔乡到黄梨镇》（那是对我过去的好些小说集的总评文字）；同年11月6日，又有机缘在新加坡与他会晤畅谈、真诚相见。李先生恂恂然一派儒者气质，更有一份雍容气度；本书收录他这篇激励前进的大作，旨在提醒个人应走的文学道路。

临末，我要感谢张礼明、马汉、杨天助诸先生好友，为这部集子的出版而费了不少心力。

1990年12月24日晚·可冬小筑

(十二) 幸运年·城乡人·活语言

——《城乡回旋曲》代“后记”

90年代的第2个年头——1991年，在我来说，是个“幸运年”！

在今年8月之前，我有机缘先后出版了：（一）短篇小说集《浮生三部曲》（1991年1月新加坡新亚出版社）；（二）散文集《绿化大地》（1991年7月新亚出版社）；（三）新马华文作家/写作人辞典《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年8月新山书辉出版社）。

许是个人处理得不当，不擅于分配业余时间，加上有多少的惰性使然，再为了上述几部书的出版事宜，我似乎比以往更忙碌啦！好些文友的来信迟迟未覆，许多好书也未能翻阅；我着实有几分心慌的感觉！8月25日晚间，远居东马的吴岸宗兄，他以大马华文作家协会评委会主席的身分拨来长途电话：“……经丛书评审委员会审核后，兹决定接受第一批12本，于今年11月初出版。……你的小说集《城乡回旋曲》已被接受，并列为丛书之五……”于是，我又为着这个新的单行本而在紧迫的日子中“回旋”了。

有机会出版短篇小说集，该是我过去笔下的小说人物的一大幸事。在幻境中，总觉得还有许多往日笔下的小人物站在小说的长廊上争求让他们再“出闸”：——“请让我出去吧，我已等待多年啦，许多同时期或较慢诞生的兄弟姐妹都已在你的单行本中与读友们再见面……请别把我扔弃或关起来！……”

这一回，收集在本书里的8个短篇小说，最早的一个是写于1969年8月的《原野春雷》。1984年7月间，我在《黄梨成熟时》的后记中写道：“先后陆续出版的几本小说集，都未按照写作时期让它先后问世，通常是随意挑选一些短篇整理结集的；这本集子也不例外……”而这部《城乡回旋曲》所辑录的短篇小说，其情形也是同样的。

这些小说人物，是在大马城乡居留的部分典型人物；也许所创造的环境的典型性不强，对人物行动的个性化表现平平，不过，当时与这班小人物相处（下笔创作的时刻）之际，原是有意在谋篇布局的艺术构思上和细节价值的具体表现方面力求突破。然而，现时读起来，自觉在小说情节的典型化提炼方面仍然做得不理想。

书将出版啦，收在集子里的好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就让他们在本邦城乡的回旋中，以自己悲喜剧的角色在读者面前“亮相”吧。

由于时间匆促，我来不及把本书剪报的复印稿寄与中国南通的评论家钦鸿先生请他写篇序文，幸蒙他好心关照，及时寄来了书评《艺术地反映生活的真实——试论梦平近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钦鸿在附信中写道：“马华文坛有不少人向我表示，需要听到客观的评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据说有些人对中国作家的某些评论一味吹捧颇反感。倘说我过去所写的评文，也或多或少有说好不说（少说）坏的倾向，则以后必须逐渐纠正。评彼岸、草风等文，我实已如此做，本文（指《艺术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亦然。希您能理解歉意。……”

我始终认为，任何一位小说家都应当有雅量来接受别人直率的批评；否则，他是不可能有所进步的。——谢谢钦鸿的书评，让我反省深思，引以为戒。事实上，我是短篇小说创作之缺点何止这三两点！

有一项我顺此提及的，是拙小说《狱里狱外》的主要人物苏信池和他妻子的内容故事，是位朋友告诉我的一段事实的故事（并非虚构的小说人物）。苏嫂本是良好妇女，后为生活所逼（苏信池是个劳改犯）当了酒吧女；她虽不卖身，可是却过惯而喜欢那场生活。吃“硬饭”的生活毕竟太辛苦了，而她丈夫出狱后又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无法养家；思想已变质的苏嫂也弄不清什么才是正常的

生活，自然会说出“惟有在酒吧里头，我才能找到一大堆的快乐”这番自甘堕落的话来。我之所以这么写，旨在加强出狱后苏信池的孤立悲哀，而他妻子却迷失了生活的方向。那段真实的案情就是出狱丈夫挥刀剁掉妻子（当了吧女）的手指，被判有罪又入狱。钦鸿认为“这未免扭曲了人物的性格，影响了情节的真实程度，并冲淡了这场冲突的社会意义”。要是让我虚构小说人物的话，我很可能也会刻画女主角的坚强与理智；然而，现实的酒吧间几乎腐化了所有吧女的人生观，因此，我也以这不幸的真实下场为结局，藉比更揭示了男主角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悔恨悲哀。

我十分赞同钦鸿所说的：“对话应当是个性化的语言，它来自现实生活，而又经过作者的提炼加工，成为小说人物在特定情景之下说出的与他身分、素养和性格特点相吻合的独家语言。”——今后，在再出发的日子里，我除了将纠正小说人物的“台词”之外，也决会减少篇幅的浪费，避免枝蔓过多，并对白描手法、动中写人、语言简洁洗炼、通过人物行动细节和语言的刻画，让人物性格特征在高潮中集合亮相、小说时空的设置与表现，和创造真实而典型的具体环境……等方面多化工夫。

是的“小说叙述人语言是一种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文学家进行形象思维和塑造文学形象时必不可少的物质手段，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见刘世剑著《小说概说》）。高尔基用“准确、明晰和动听”概括文学语言的特点。鲁迅更把“力避行文的唠叨”即简洁视为文学语言的第一要义。郭沫若说，文学语言要“简洁、和谐、熨贴、自然”，而且要有某种“色彩、声调、感触”。……

中国的文评作者汪曾祺在近作《关于小说语言（札记）》（1986年5月）中指出：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

剥离的。……现代中国小说家的语言趋向于简洁平常。他们力求使自己的语言接近生活语言，少事雕琢，不尚辞藻（详见《小说文体研究》一书）。……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论点。

最后，我要再次谢谢吴岸、钦鸿、杨天助、陈文浩等先生的关顾与协助，使本书得以早日问世。同时，我也向赞助出版这套“90年代马华文学丛书”的仁人志士敬礼——多谢大家！

1991年10月6日·可冬小筑

（十三）蒲莱山的情意结

——《笑傲山野》代《后记》

我爱山，也爱海；我爱山野，也爱岛屿。

过去，我出版了少儿读物《新马岛屿的故事》《马来西亚高原风光》《新马山峦的故事》，和月前重修增写而成的《新马岛屿风光和传说》……这都足以证明我对本邦的山峦、海岛及高原有着深切的恋情！

1963年杪，我开始居留黄梨镇，天天望见绵亘苍紫的蒲莱山。含笑青山，我不时默念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喜爱诗人辛弃疾在《贺新郎》这一词里的佳句。呵，“情与貌，略相似”么？

1986年底，我举家迁离了黄梨镇，心里忽而若有所失！后来幸好新居处（士姑来）也望得到蒲莱山；此后这7、8年来，所服务的工作地点如亚逸文满、武吉峇都或古来县一带，也常举目见山。尤其是南北大道的末端于去年杪通车之后，驱车奔驰在高速大道上一——上班与返家时刻，蒲莱山的情意结更紧密哩！这秀山奇水，总是

灰蓬蓬地显出她那诱人的魅力。

生活这样的环境中，我怎能不经常想起自己完成过的一个1万6个余字的中篇《笑傲山野》呢？早在26年前（1968），我就刻画了“蒲莱山的儿女”。任何男女主角，都曾经与作者相处过一段日子，跟他们同欢共忧。可以说，在本书里多位男女角色，他们不幸的际遇，在我下笔前后都曾为他们扼腕过，虽则这全是虚构的人物。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的曲折经历和心理轨迹，与我不是都很亲切吗？很多时候，现实情况如此，作者无可奈何，小说人物更是无可奈何！

在青色的年代里，何尝不曾试图认真生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进而生活创作化；然而，卅多年过去啦，自己又实现了些什么呢？——我与蒲莱山的情感和心态大略一样吧。

宋朝大诗人辛弃疾报国无路，白发空垂，却又不甘寂寞，他只得与青山倾心“相娱”、互为知音。“青山多妩媚”正是诗人风貌、性格的写照。……这么一涉想，于是，我决定选了十个中、短篇小说，整理为这部新的单行本，让自己笔下的一批人物再次“登场”——让大家见到某些精神面貌，和环境描绘所具有沉郁的乡土气息；这也是“相娱”的另一种方式吧。

本书有机缘出版，我得谢谢大马福联会暨雪福建设馆资助出版基金、前辈文学家姚拓先生惠赠序文，和画家陈文浩的封面设计，谨此致意！而已故萧劲华老师，他多年前书赠的墨宝，又另一次使拙著增光，顺此也为他追悼。——青山（蒲莱山）不老，但愿思忆常新！有一天，纵使自已已成为蒲莱山下的老人，我们也要为不老的青山讴歌雀跃。

1994年3月30日·柏园楼室

（十四）不幸与挣扎的一群

——《无根的花木》代《后记》

1994年的下半年，该是我心情比较郁闷的时期；近乎有两三周的时间，我本身也似在“迷失”的状态中，更感觉到正常生命和健康生活的珍贵。

过去，有几位读者曾向我表示：“你小说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不幸与悲哀的一群。”我除了点点头之外，便是无奈的淡笑。很多时候，我感到自己的痛苦也未必比快乐来得少；不过，我永远是乐观多于悲观的挑战者，不容易承认失败。与命运挑战，始终是我与众多小说人物所共同面对的人生战役。

11月杪，云里风兄在长电话里表示“应征的小说作品太少了”。较早时，他亦在信件中写着：“除公开接受文友申请外，将征求编委会成员惠赐佳作……”而我以前笔下刻画曾在报刊上露面的底层人物，又“站在小说的长廊上争求让他们再‘出闸’”（见拙著《城乡回旋曲》后记，页108），以便在单行本中再次跟读友见面。于是，我着手整理了这部短篇小说集《无根的花木》，用快邮于12月8日寄与评委会主席。

年前，我曾将个人的短篇小说集里的自序和后记处理为一篇长文《笔航小说海卅五载》；近日自觉有必要回顾12种短篇小说集的篇章及撰期——兹将它一一列明如下：

①《看见风的人》（1961年11月，与易草舒合集）——梦平的6个短篇是：暗云里的月亮（28-6-1959，撰写日期，下同）、灰夜（22-5-1959）、苦忆（20-10-1958）、赌徒日记（23-4-1959）、伙伴（17-3-1959）、困（24-7-1959）。

②《长堤》（1962年8月）——6个中、短篇：中篇《长堤》（12-8-1961）、第一阶梯上（4-1957）、弃妹（8-1957）、蛆蚀（6-

1959)、母子情(3-1960)、红灯(3-1961)。

③《旱风》(1972年9月)——8个中、短篇:沌雾(18-7-1971)、旱风(11-3-1970)、中篇《深芭行》(16-4-1971)、一件好事(2-4-1968)、顽童这一家(12-5-1963)、中彩圈外(9-11-1971)、站(5-7-1966)、种毒(14-8-1971)。

④《不碎的海浪》(1976年2月初出版,1976年3月再版)——8个短篇:愁雨(21-10-1970)、斩白鸡(11-4-1971)、洪水浩劫(17-4-1970)、不碎的海浪(2-3-1968)、铁道上的火花(30-1-1973)、第一流猎手(15-8-1972)、小镇归来(24-6-1968)、都门会(4-2-1973)。

⑤《贝壳之歌》(1977年3月)——11个短篇:欢聚时光(12-8-1962)、红烛(16-6-1971)、千里月(13-4-1964)、竹梆声中(7-9-1963)、白脑丈夫(17-2-1969)、老人与破伞(15-9-1965)、第一声妈妈(22-5-1973)、快乐新年(6-2-1972)、贝壳之歌(9-10-1968)、阔姐姐(28-2-1971)、娘惹妹(20-2-1971)。

⑥《山鹰》(1978年4月)——11个短篇:愚误(27-9-1971)、短墙(25-10-1970)、胡椒树下(9-1-1972)、媒婆与老千(21-8-1972)、红炭(8-1-1965)、刹那亲情(10-5-1962)、摆渡老人(20-9-1972)、飞鸟与睡猫(12-1-1967)、采访线上(20-12-1972)、微诚(17-12-1963)、山鹰(23-6-1973)。

⑦《飞向子午线》(1981年9月)——8个短篇:栖迟(10-6-1962)、抓一朵友谊(25-1-1966)、年假(18-10-1971)、火坑里外(27-11-1972)、从木剌山归来(14-8-1978)、飞向子午线(11-7-1979)、现代武林客(25-10-1979)、抹拭心灵尘埃(26-12-1979)。

⑧《黄梨成熟时》(1984年8月)——10个短篇:新一代(22

-2-1972)、金色的风铃(22-4-1979)、黑手摸暗路(2-5-1982)、笔友圈中(17-1-1977)、你再等下去(11-9-1972)、蓝天一片云(6-9-1967)、黄梨乡之恋(11-1975)、黄梨成熟时(11-1975)、梨镇风雨(17-11-1975)、曙光升起的胶林(2-10-1980)。

⑨《静静的文律河》(1986年1月)——9个短篇:再见村长(21-2-1969)、打赌(20-2-1971)、暮路(29-2-1980)、海斗(26-5-1980)、精神门外(20-5-1980)、(白鸽西飞(21-7-1977)、狗的天堂(17-11-1977)、霸王载妖姬(30-7-1982)、中篇《静静的文律河》(14-4-1977)。

⑩《浮生三部曲》(1991年1月)——9个短篇:狱里狱外(2-5-1973)、紫浪血花溅(16-12-1977)、勇敢的姑娘(24-6-1970)、张开黑伞(28-6-1979)、终曲悠扬(24-7-1979)、鞭影(12-9-1966)、三记拳头(30-9-1983)、西归又南飞(18-6-1979)、浮生三部曲(24-4-1977)。

⑪《城乡回旋曲》(1991年10月)——8个短篇:地下银会(10-5-1972)、尊卑之间(13-2-1977)、罪恶的代价(2-7-1984)、原野春雷(6-8-1985)、友族之花(26-12-1976)、最后一句话(10-6-1976)、童心魅影(30-9-1985)、城乡回旋曲(27-11-1979)。

⑫《笑傲山野》(1994年5月)——10个短篇:没有节拍的舞步(22-5-1970)、孽代(9-3-1970)、掠夺者(14-10-1969)、都市梦(27-7-1980)、病态历程(28-10-1984)、笑傲山野(24-4-1968)、火的葬礼(24-10-1980)、属于东方的(29-4-1977)、泪光映情花(27-11-1980)、在文艺的回归线上(18-6-1978)。

在上述12本短篇小说集里,共收录104个中、短篇,加上这部

《无根的花木》的11个短篇（合共115）；出现在这些单行本里的主角和配角，少说也有3百余名吧；在多少个迟眠的冷峭夜晚里，这许许多多悲欢的小人物都常在我身边，陪我度过犬吠鸡啼的寒夜，我怎能自叹孤单寂寞呢？再说，不幸人儿的悲哀与缺憾，都是我“一手造成”的；谁最无可奈何呢？去日苦多，属于我的似乎更多。我有自知之明，个人笔下的一些作品是平俗无奇的；有的显然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艺术技巧。当时下笔时，我只想反映他们实生活的侧面、挣扎者的侧影，和描绘他们的精神面貌。后来，有多位仁人善士肯助我，让这批习作相继结集出版，我就让这些边缘人物“出闸”啦；旁的问题就不曾充分地省思了。

我即将是“退休老人”呐；我可不愿成为喜欢走旧路的老人。去年12月22日，贱价卖掉了近9百公斤的旧报资料后，我虽则曾伤心一时，然而我也算是找到了比较明确的路向。我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让自己选定数位熟识友伴长期的与我共度良宵和寒夜；我希望他们面对生活微笑，正视残缺的人生，闪发人性的灵光……而我呢，不该一味慨叹无奈。人生无常；今后的我，要是还有能力笔邀小人物继续与命运顽战的话，他们自然会在明天的阳光下笑得较灿烂，活得更硬朗，怀抱着新希望苦撑下去。

临末，我要特别谢谢拿督张德麟和主编云里风及马汉、碧澄等兄台的关照与帮忙，让这部专集顺利面世。

1995年2月19夜·可冬小筑

(附录·6篇)

并不迟开的槟榔花

——介绍《新马华文作家群像》

莺莺

近些日子来，因着工作和朋友的交往关系，多少涉猎了些新加坡和马华报刊，每每萌发一些稍稍复杂的感想，觉得新马华文文学的存在和发展，经受着重重磨难，竟能以它的异彩的腾跃活力，形成目前比较蓬勃的局面，确令四海之内的炎黄子孙侧目，并受着巨大的鼓舞。去年秋与冬至今春，刚刚举办了《马华文学史料展览》，并在几个州巡回展出，最近又于怡保举行了《全国现代文学会议》。在那里，马华文学的鲜明形象无疑早已树立起来，而以马华社会环境的特殊，发展华文文学的条件比较困难，不少文学工作者都能有一种使命感，以维护民族的根的姿态来发扬和扶植文学，这是值得感佩的。反顾此地的文学界，政治因素，门户之见，囿囿框框，要搞起什么文学活动来，只能是一片片，一块块，哪能有一个全面性的气势！

今年元月，新加坡风云出版社出版了马华作家马岑撰著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这部令全世界华文读者瞩目的书，其前身是1980年初面世的《马华写作人剪影》，那时已收罗了202位作家条目，现加续篇凡505位作家，每位作家的介绍资料占一页篇幅，有《音序人名索引》及各历史时期人物索引两种检索方法。后者分作七辑，计为《战前殖民号龙舟的划桨人（1919～1942）》、《光复号登陆艇上的战士（1945～1949）》、《波澜壮阔自由轮上水手群（1950

~1960)》、《新加坡独立舰新阵容(1960~1969)》、《马来西亚艘上的生力军(1960~1969)》、《新华后浪飞翔之精英(1970~1982)》和《马华破冰船上的新锐(1970~1982)》。5篇附录包括曾圣提、原甸、黄润岳、颜龙章及匡光照5位有关本书的通讯或读后感。黄润岳先生以《东风第一枝·有序》词赠勉此书作者，其中有句云：“喜迟开的槟榔花，结子硕盈成串”。所谓“迟开的槟榔花”，原系马峇长篇小说的书名，黄氏引申而指此书，赞誉有加，意在作者耕耘五年，硕果盈累。

505位人物中，有些来自中国的作家，有些是已回归内地，但只要曾在马华文坛留下踪迹，也给予介绍，不过其着眼点仅仅放在居留新马从事文艺活动的情况。如郁达夫、铁抗、王任叔（巴人）、杜运燮、洪丝丝、高云览、米军、丁家瑞、张漠青、陈残云、林岩等等。有一些则往来香港和新、马之间，或仍留在新、马，或已定居港岛，如原甸、夏浓、忠扬、黄思骋（甫于香港病逝）等。

一翻目录，跳入眼帘的自然是一些熟悉的名字，如方修、潘受（衣虹），柳北岸、韦晔、方北方、苗秀、李汝琳、甄供、钟夏田、温任平、谢克、石君，等等，等等。只是因为作者平均分配篇幅，一些特别重要的作家，或许本应作更多的介绍，如方修，他是闻名东南亚华人文化界的文学史家，一说起他，人们不能不将他同《马华新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史稿》等巨著联系起来。笔者在此列举的一些名字，只是自己觉得不会太陌生的作家（未举之名，亦无怠慢之意），而该书收罗的5百来个作家的资料，应可认为比较全面的了。认识的人中，凡看过该书者，大都称赞资料较为客观。但笔者有时觉得在一些条目中，有些枝蔓本可以略去，增加一些实质性材料才好。如夏浓（第262页），前面近半篇幅说了不少题外话，诸如以“夏”字带头为笔名的写作者列举了夏霖、夏怀霜、夏浓、夏彬、夏弦、夏芷芳、夏桦、夏文新等名字，介绍了几个姓夏

的资料，而正题“夏浓”，反而漏了写上他的真名叫吴宗海。

此书作者在马来西亚，出书却在新加坡，有精、平装两种，可以邮购。不过，听说三联书店已经订购了一小批，相信不久便可与香港读者见面了。

◎原载于1984年4月20日香港《文汇报·文化之窗》

副刊（第485期）



坐者左起：古寅、潘亚墩、孟沙

站立者：马峇、高秀、华山、伍良之、甄供、马汉

（1992年6月20日·新山）

随思录·新马作家

施颖洲

来菲参加第2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的各地区代表带来了不少书，其中有许多好书，多数是他们的作品。

他们将那些书在大会会场展览，过后送给朋友。

他们带来的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峇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这本书最有价值，因为由这本书可以看到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自有华文文学以来的505位作家。

三年前，受邀请参加新加坡首届国际文艺营的各地作家教师收到百余册赠书。包括《新加坡共和国文学选集》（全套5大册）等好书；但其中令人感觉很实用的一册叫做《马华写作人剪影》。

《马华写作人剪影》出版于1979年，作者马峇。

先出版的《马华写作人剪影》，收有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200人的小传及照片。这本书的收集，可说是已近于完善，因为我们发现，此次报名参加第二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的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代表12人，《马华写作人的剪影》都收有他们的小传。

直到马峇此次来菲出席亚洲华文作家会议，我们才知道，他已将《马华写作人的剪影》加以充实，扩大，出版《新马华文作家群像》。

《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是540页的25开本一大册，编印精美，收有新加坡及马来西亚504位作家的小传及照片。

想知道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文学运动情况的人，只须阅读《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就可以知道大概。

此书著者马崧，是马来西亚出席亚华会议的代表，本名邱名崧，另有笔名梦平，他有短篇小说集8种，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等。

原载于菲律宾马尼拉《联合日报》（1985年12月24日）



菲华翻译家施颖洲（左）与马崧
（1988年4月11日·吉隆坡）

撰写传记著称的马峇

马阳

耗去5年心血收集整理，于1984年1月出版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使马峇一跃而成为名驰遐迩的文史家。《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一书，分七辑，从1919年承受中国“五四”余波影响的马华文学的萌芽期，到新马分家各自发展的八十年代，共收录了新马两国重要华文作家505人。图文并茂，用具体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60多年来新马华文文学走过的艰难而又光荣的道路。

马峇原名邱名崑，1940年生于马来亚柔佛笨珍县巴列岸东村。父母以采槟榔为业，他从小就在槟榔园里劳作。家贫，9岁才入学。1958年高中肄业，1959年进柔佛新山日间师训学院受训，1962年在华文小学执教至今。

马峇是以参加新马各地的征文比赛获奖起飞的，除致力于撰写作家评介外，还以“梦平”的署名发表大量短篇小说，出版了7个短篇集：《看见风的人》、《长堤》、《旱风》、《不碎的海浪》、《贝壳之歌》、《山鹰》、《飞向子午线》等，和一部长篇《迟开的槟榔花》。

《迟开的槟榔花》，可以说是一部大胆、别开生面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主题歌颂华、巫、印三大民族反对殖民统治的团结斗争的精神，表现了作家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感。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使人读来倍感亲切动人。故事发生在50年代中期，马来亚南部一个华、巫、印三个民族杂居的甘榜（乡村），以耶谷与紫瑛、黄贵清与玛莉安的爱情为线索，贯串着各民族团结起

来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

马峇是一个有着独特风格和鲜明个性的作家。他思想敏锐，语言朴实无华，结构严谨，善于以素描手法和简短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60年代中期，“现代派”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不赶时髦，不标新立异，执着地探索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原载于1986年5月14日

《广东侨报〈新马华文作家小识〉栏》



3位丘姓马华作家：吴岸（左1）、艾芸（右2）、马峇（右1）与归侨作家马阳（左2）合影

（1992年3月12日·柔佛古来）

人间喜剧的剪影

——梦平小说集《笑傲山野》读后

潘亚瞰

梦平是著名的马来西亚华文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尤其丰产，截至1995年止就出版过14本小说集。我最近推介过。现在写此文，算是评论其第12本中、短篇小集吧。

这本编号12的中短篇小说集是1994年初版的《笑傲山野》，全书共收10篇。作标题的那一篇是约1万6千字的中篇，其它都是短篇。

这10篇小说不是随便凑集成书的，而是根据各篇主题思想和语言风格“以类相从”而成集的。我就凭自己的喜爱，选析3篇，藉以与各方读者交流心得吧。

《掠夺者》作于1969年，当时梦平才是一位青年作家。我读此篇，回想30年来马来地区华人社会的变迁，不禁对此篇主人公，沈家女佣易喜花，产生一股抹不掉的同情与不平。固然小说纯出虚构，但是文学产生于社会，小说之“言志”也理应是无风不起浪的。所以我坚信，马华社会确有易喜花型的人物，同时又必有易喜花式的“不幸”，说命运也罢，反正社会小史总是集一些小人物“会演”成台的丑戏。

建筑绘测师沈业成结婚7年，苦无子息。沈太太年已34岁，也不像有老蚌生珠的前景。夫妻空有殷实的家财，房产花园小车一应俱全，但心病却无法消除。小说最讲究情节之巧，无巧不成书。《掠夺者》就是平凡中含着凑巧的。女佣易喜花遭入室暴徒强奸致孕，绘测师想入非非，索性收孽子为养子。女佣不用堕胎，主人免烦“买子”，两便又兼省钱。沈业成随和严谨，显然不是伪君子。而对比

之下，沈太太则度量奇窄，外亲而内忌了。她一面对女工柔和体贴，一面却严防丈夫与女佣接近。乃至收留孽子为养子之后，竟不顾易喜花的人格尊严，屡次对客人叙述女佣遭强暴而怀孕的史实。她的动机很明显，她要强调孽子沈凡度不是她丈夫跟女佣搞出来的。如此心术，人间能有几个可与比拟？梦平的深刻处，都是像这样让人敬服的。

易喜花以生母的身分，做女仆的工作。

母乳有益沈家少爷沈凡度，生母被勒令每昼夜喂奶8次，至少6次，每次要坚持20分钟……儿子需母乳，生母当母牛。沈家夺人之子，又让养子参加折磨其生母。

沈太太无子而权自作母，指挥生母如使牛。在易喜花怀孕期间，沈太太要这副待产机器重营养，松情绪，以求生子身体壮，胎教好。爱护机器原来是爱产品，如此人心！易喜花受尽欺凌，被剥夺了一切，最后只好弃子而走。沈业成夫妇是多面手的掠夺者，梦平这个短篇对马华社会的剖露是十分精明而到家的。

《都市梦》原意是写80年代以前的马华社会，却意外地也写了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社会。因为梦平小说一般都是“视域辽阔”的，所以不期然而然，概括了超国界的广地区。这个短篇的故事情节显示了作者的构思缜密，各种角色的配置都极具匠心。黄成炎和余山永这两个老同学的遭遇与性格，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生活的风云使他们从乡村流入城市，在极具现实的工商社会里做不切实际的都市梦。后来幻梦破灭，吃尽苦头，险些锒铛入狱，只好一同“打道回府”，再过新村割胶工的生活——平淡而不失业，困苦却没危险的生活。这是他们挤进城市，历险回乡的最后抉择。宋明标（另一同学）到城市里捞得不错，这对他们已经不再有“助推”的力量。而异族的马来青年列末（同村朋友）吸毒堕落倒使他们怵目惊心。更可怕的都市女郎玛莉张和琳达朱竟是一人而二名，一身而二任，

既是黑道头目的玩偶，又是黑帮诱骗男子的钓饵。黑头目洪其雄有两副面目。有时和气慈祥，帮你找工作，结局却似凶神恶煞，打骂随心，竟强迫你入伙去抢劫！黄成炎和余山永挣钱无路，交女友受骗，被介绍去“工作”竟是不能拒绝的参加抢劫。梦平巧笔生花，心思活脱，安排了他们两人喜剧性的相逢一梦破惊魂。终于幻梦醒来尚未迟，他们毅然决然回归不致于堕落的故乡。都市梦，梦难圆。

《笑傲山野》是梦平27、8年前的早期中篇小说。对于今日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的青年读者来说，它确实有“诗趣”、有“新风”，可读懂，但反映大马社会的写实深度与广度则不比作者的其它短篇为强。我受的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教育，对小说的基本看法是很传统的（或说偏于保守也无不可），所以我对此篇的评价并不甚高，反倒觉得文中表达颇有不足之嫌。

小说集《笑傲山野》所收的十篇佳作，在我个人读罢的印象而言，它不愧为当代马华社会“人间喜剧”的巧妙剪影。

稿于1996年10月20日



坐者：萧劲华夫妇

站立者左起：马峇、林庆文、马汉

（1975年5月24日·芭都）

马华社会的深刻反映

——读梦平第14本小说集《无根的花木》

潘亚墩

梦平（马峇）是马来西亚华人小说家，迄今已有3、40年写小说的经验了。大丰产，评论家跟不上细评深论。这是十分可惜的事，往往使佳作埋没而声名不彰。我曾评介过梦平的作品，对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他中文过硬，基础好，对“唐山”的社会风俗乃至历史都相当熟悉，这就使得他笔下的马华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文化渊源有自、意识形态真实，华人有华味、花木都有根。下边我例析他的三个短篇，以见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原理之精湛把握，和对马华社会的观察与理论之透彻入微。

标题短篇《无根的花木》写华文教师范崇裔的职业故事，十分深刻到家。崇裔华校高中毕业，又到英校进修2年，谋职艰难，当了家庭教师。他顺境安生，热爱本职，接受了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的思想，认为“华人不懂得华文就好像没有根的花木；而无根的花木，它的生命一定没有延续。”这种思想随着谋职任教，乃至当家庭教师挣一口饭吃的自然际遇，一步步膨胀和深化而变成一种随时都要找机会宣泄的本能。但是言者无心，听者却另会其意，“效应”是必有差异的。家长之中，黄明文夫妻构成甲型，史迪芬夫妇构成乙型，而黄家邻居则算是丙型。这种家庭教师“市场供求”情况是永恒存在的，它又要受大马华文教育政策松紧的“大气候”所制约。——这一切都通过错综复杂的细节，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范宗裔应征的上当，谋职落空，不得已而求其次，降格上门施教，学生由8人而12、而14，又回落而跌到谷底。生活之窘困可想而知。

以他能教三种语语文的本领而言，以他对中华文化与马来社会的学识而言，以他的读书人气节而言，以他工作（执教）之一丝不苟的执着精神而言，他都不该落泊到此田地。然而熟悉近30年新马政局和两代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命运的人，谁不说梦平短篇小说《无根的花木》写实创作的高度成功呢？

伦理文化小说《孤佬汉》是极有历史深度的移民心态的文学表现。古今移民不外逃避苛政或追求经济实惠这两个类型。中国人从元代开始走向南洋，到明代移民显然转盛、“三保太监”郑和七次率领巨型的船队“下西洋”去的就是南洋，史载他到过东爪哇，即今印尼要区。郑和是为明朝开辟海外市场，而“唐人”随流移民到达了几乎所有的南洋大岛。势所必至的结果是，“辟草莱，刈荆棘”的华人拓荒者所到之处，中原文化（唐山文化）必如影随形地渗透一切领域，《孤佬汉》主人公财久伯的思想意识岂不是道道地地“原庄”从唐山运过去的抽象货物吗？此老之顽固不化，屡次吃大亏也不肯接受教训，反映祖传文化也在新土生根了，砍不断，理更乱，这是天下四方的共性吗？就我个人的闻见而言，像“财久伯”这么离奇的人物，恐怕本世纪初中国境内就找不到了。那么马来华社至今还会有吗？小说都是虚构故事以播放弦外之音的。《孤佬汉》之入之事的心音，都应作实有观。比如女人假嫁，骗婚卷逃，这就不算华族的专利生意，世界各族都有。但梦平笔下的那些缺德事，显然是“华姐”之祸也。可怜的财久伯，至死不悟，死也要成家，哪怕借“油瓶”续宗族香火也聊可自欺自慰。这个短篇有两大成就。一是揭示了落后意识之可怕，二是揭示了社会道德败坏之可怖。《孤佬汉》是一篇很成功的批判现实的小说。

鼓舞人心的“性善论”小说《街边亲人》可与前篇“互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是，我们环顾当今太平盛世，有祝南郭和卓汕婆这样”小说人物的原型（模特儿）

吗？孟子必说有的是，荀子必说难搜寻。我看要规定尽度然后分别对待，“无差别就没有政策了。”应该说，革命前偶或有，革命后一时无。马来亚40年代革过命、60年代又再革命，如今也许算（鲁迅所说的）华革华命，和革……命吧。我没做过调查，少说为佳。至于敝国，则革命源远流长。远的史不绝书，近的“文革”显然成功地革了文化的老命。如今又改革起来了，开放进来了，也开放出去了。这般环境，老怕祝南郭和卓汕婆都未必愿安承教，落户养老。细心的读者或者还记得执拗的财久伯就住在养老院（老人院）里，但祝卓二位多半不至于跟拗执类聚一起吧。那么，祝南郭、卓汕婆，只应书中有，人间永世无，呜呼悲哉。

以上三例，疑似足以推介梦平《无根的花木》全书了。我总是把梦平看做写实小说家。

1996年9月14日 写于暨南园



左起：马岩、潘亚暎教授、杨平（台湾诗人）、田流
（1994年1月·新加坡）

南马生活的小说化

——读《马峇文集》评要

潘亚暎

久闻马峇（梦平）大名，直到92年夏才在新山见到他，他和马汉都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94年元月又在新加坡喜遇马峇，畅谈儒商文学，引为知己。马峇既是教育家，又是位名作家和文史研究家，著作等身，建树良多。我曾评过他编著的《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一书“功德无量”。如今他不仅是马华作协理事，而且是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副会长，与陈春德（云里风）一道两手抓、两手都过硬，值得赞赏。笔者赞赏他的拼搏精神和卓著贡献。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的“马来西亚卷”为著名小说家马峇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结集，总标题为《马峇文集》，实际是《马峇小说集》。中国有《郭沫若文集》之类兼收众体的先例，故称《文集》也算简便的约定俗成了。

此集共收作者1963至75年间发表三个短篇、一个中篇和一个长篇——总共5个小说。其中《槟榔花开》（原名《迟开的槟榔花》）是1963年完成初稿，直到1971年尾才修正定稿的一部长篇小说。我记述这个过程，意在提醒读者领会小说家创作的执着精神。这是研治马峇小说的学者必须具备的宏观认识。

马峇无疑是马华小说界的中坚人物。他的创作发展道路，实在可以代表马华文学成长的总趋势。在我看来，马华小说的最明显特征是它的现实性强。

在马峇小说出现的30来年中，国家在酝酿着诞生，政局屡受世界市场经济的冲击而不那么坚持昔日的僵硬原则了。这些时事的变

革不能不反映在马华小说及一切文学作品里来。就算特别精心挑选一篇“不涉及政治”的故事，如《洪水浩劫》那样近乎自然主义的记叙型短篇小说，也未能完全不对人世有所讥评。小镇知识青年丘森良到城里谋职，吃尽苦头，认识了秉性慈善的工头史正明。他们年龄相差20多岁，却能推心置腹而成为忘年交。恰巧有一晚森良在“史叔”家过夜，许妻和3个孩子也都在家。想不到时值雨季，积水成灾，半夜小洪暴发，房子几乎灭顶，门口的：“明吉摩河”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许家一妻三子全部丧生，只留下大儿子外出作客幸免于难。史叔和森良死里逃生，活着来共同收拾这场“洪水浩劫”，思考求得生命的意义：“凡是人只要有生命，纵使岁月是无尽的苍白，也绝不会教人失去飞扬的希望！……我活着，我还是属于人类的！生活似乎比死亡困难。我应该执着使劲地推动庄严人生的轮轨，确定自己生命的意义。与其无所事事地混日子，倒不如像苏格拉底所说的，我们且莞尔面对苦难吧！”短篇结尾写许传宜由消沉而振奋，太轻易了，说服力稍差。既然通篇写洪水那么细致入微，则青年经几句开导便幡然觉悟，那倒怪事了。

关于写洪水，大概是因为要突出浩劫，故极力写得逼真而周详。其实，马来西亚全境都属热带雨林气候，人们对山洪猝发都有丰富的感性认识。所以不必太着墨不留余地，大凡文学描绘，太详反失浮想联翩之趣。汉赋之味同嚼蜡，就是详过头了。在洪水多发区大谈水如何如何，实在有失“文学形象的概括性”原理之运用，我认为，这或许是《浩劫》的不是之处。未知读者以为然否？

我们再转话题，谈谈小说终究脱离不了社会现实。说到底，小说脱离不了政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若说男女情爱，这可以说纯属“个人”之事，他人不得干涉，政府也免劳过问之事。然而实情并不如此。读《槟榔花开》（见文集71页以下）吧，异族为什么不能通婚？玛莉安（女）跟黄贵清（男）的“自行割绝”岂非马来西

亚特殊政治的苦果？

《马峇文集》所收五篇小说，以及我所读到的马峇小说，居多都是马来西亚生活的小说化。作者的功力深，中文过硬，我很欣赏这些作品。

稿于1996年8月29日



大马堂联总会长丹斯里林玉静（右）颁纪念品予主讲人马峇。

坐者左起：冯世才（印尼）、骆明（新加坡）、蒲公英（菲律宾）、云里风（1992年6月7日·吉隆坡）

把炉中之火传给他人

——代《后记》

回顾童昔，深加省思，从几方面看来，我是属于那种带叛逆性的山芭孩子。

少儿时代，居住在荒芭，我任性，我贪玩，我好强，我敢于挑战，而兴趣是广泛的，举凡钓鱼捉鸟，爬树采果实，进沟捉生鱼，入芭寻野菜——那带着泥土芬香的瓜果最可口。这些荒野活动，即是我生活乐趣的泉源。

小学年代，我8岁才踏入校门，是个超龄生（战后初期，超龄生多的是，有些同学12岁才念小学一年级呢）；求学方面，我还算自爱。到了4年级，我开始爱上课外书。父母兄姐也好生奇怪：这么顽皮好动的芭童，居然能静坐下来翻书！

年轻时候，我沉迷于运动，喜欢篮球，更爱乒乓及羽球；既爱郊游，又爱看戏（电影）和听歌（唱片）。60年代末，又老爱看电视节目。后来，到了80年代，在时间不够分配与安排下，许许多多的娱乐兴趣都相继放弃啦！现今，唯有书报与写作，仍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一直没忘了文学大师们所说的一些话：

“没有文学的世纪，这世纪便显得没光彩”（佚名）。“文学重于一切，重于饥饿，重于欢乐”（鲍德莱）。“文学事业位于几百事业之上，所以虽仅达中等之人，比之在普通鄙俗的事业上占有最卓绝的地位者，已高出一等矣”（朗费罗）。

近年反省，6、70年代的那股创作劲儿，目前已不容易持续下来。我不想太苛责自己。说真的，在历史的长廊上，为了搞点马新华文写作人/作家的传记和生平简介等文学史料工作，我化了不少

的时间；在某些方面，我也做了一定的牺牲。这是自愿的，也是意料得到的，所以，自当无怨无悔。

岁月无情，我经已度过“青年之旅”，也耗尽了中年岁月；再过3年数个月即将过退休的老年生活。不久前，开始整理形同小丘的旧报堆，我依然有许多写作著书的计划。朱光潜在《谈文学（文学与人生）》一书中写道：“在这纷纭扰攘的世界中，我们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费在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奔波劳碌，很机械地随着疾行车流转……”

在往后的日子里，个人非自筑囚于寂寞之城不可！否则，又怎能进一步深入文学堂奥哩！我们深信：写作源自生活。唯有在生活中，深入体察、善于摸索、勤于积累，始能悟其真谛于万一。

既然已献身文学，那么，不论是为国家社会，抑或是为民族群体，我们都得锲而不舍、用志不二、细心体味、刻苦实践、反复锤炼、持之以恒，方能获益。通过集体的努力，必能点亮文学的火把，让它发出光与热，千秋不尽！——可不是么？文学大师福楼拜早就说过：“文学即是炉中的火一样，我们从人家借得火来，把自己点燃，而后再传给别人，以致大家所共有”。

1992年4月5日·新山马星园

1992年5月27日刊登于《南洋商报·文学之旅·第6期》

窗 外

（献诗）

在南方的蒲莱山下
更换了几只小窗眼
向窗外凝望怀想
在窗下伏案抚掌

远方有碧海云烟
近处的林茂花繁
慧眼还望见那座宏坛
无数文星在心空闪光

云山知晓
星月更明瞭
数千支笔铸成的剑山
屹立在赤道线旁
怀虔诚心来传灯
不灭之灯还散放温暖

莎琳

1997年3月3夜

作者简介

马崧又署梦平；本名邱名崑。1940年9月生于西马柔佛笨珍文律巴列岸东村，祖籍广东省丰顺县埔寨镇塔下管区。马崧乃当代马华文坛辛勤的作家之一，也是首位出版本地写作者传记专书的史料研究家，先后印行了三部专著。其中以《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84）和《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991）更受重视。目前是位退休小学校长。

从1961年杪开始，马崧另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一部中篇小说《小青树》、十四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游记、一部散文集和十二部少儿文学作品集等。曾先后荣获8次的小说组出版基金奖。1984年受邀编选出版了《马华当代文学选·小说》。现任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作协柔佛州联委会副主席和马来西亚儒商联谊会副会长。

ISBN 981-225-292-4



9789812252920



新亚出版社
Singapore Asian Publications